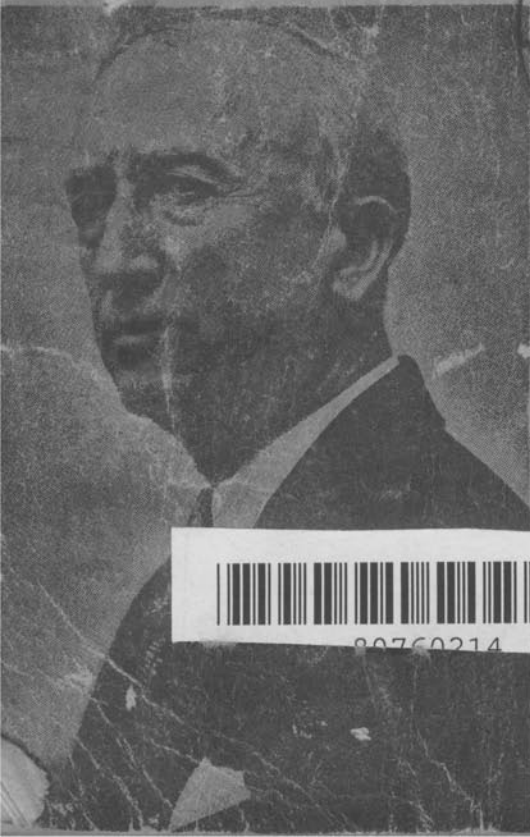


蘇美外交秘錄

Speaking Frankly



美國前國務卿

貝爾納斯著



80760214

中央通訊社

編譯部精譯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of China is hereby
 accorded exclusive rights to publis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PEAKING FRANKLY'
 for circulation both in China and outside
 of China."

James F. Byrnes

New York, December 1947



茲授予中央通訊社在中國國

內外發行“Speaking Frankly”中

文譯本之特權

傑姆斯·F·貝爾納斯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于紐約

蘇美外交秘錄

Speaking Frankly

美國前國務卿 爾斯納 著



王 芒 湯 象 汪 毓 先 李 約
汪 惠 吉 曹 德 謙 沈 志 秋 吳 道 生

校閱者

黃 席 羣 潘 煥 昆

中央通訊社總社編譯部精譯

美蘇外交秘錄 目錄

貝爾納斯履歷表

貝爾納斯旅程圖

蕭序

著者前言

第一卷 世界領導地位的序曲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一)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階段……………(二三)

第三章 轉變的開始……………(五二)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七五)

第二卷 和約——走向和平的五個步驟

第五章 倫敦會議的挫敗……………(九七)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解決了一個難題……………(一一九)

第七章 重到倫敦和再至巴黎……………(一三三)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在紐約的結局……………(一五一)

第三卷 未完成的和約

第九章 中歐——嚴格的考驗……………(一七一)

第十章 行動方針……………(一九五)

第十一章 走向亞洲的和平……………(二二五)

第四卷 前面的工作

第十二章 樹立人民的外交政策……………(二五一)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二七九)

第十四章 蘇聯要甚麼……………(三〇一)

第十五章 我們何處去……………(三二五)

勘誤表

著者貝爾納斯履歷表

衆議員

一九一一年—一九二五年

律師

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一年

參議員(兩任)

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一年

最高法院法官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九四二年十月

經濟穩定局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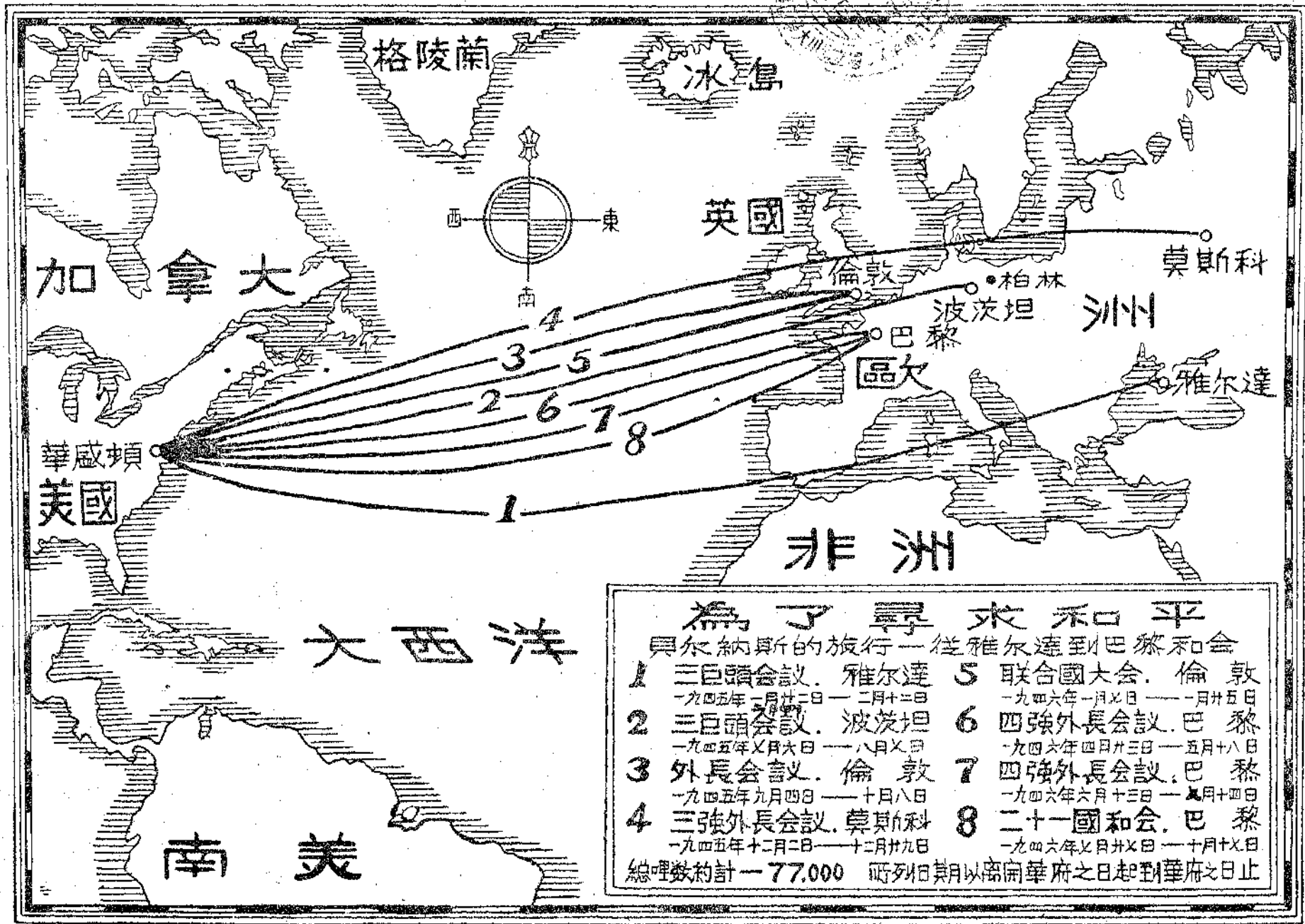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九四三年五月

戰時動員局局長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九四五年七月

國務卿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九四七年一月



為了尋求和平

貝爾納斯斯的旅行——從雅爾達到巴黎和會

- | | |
|------------------------------------|----------------------------------|
| 1 三巨頭會議，雅爾達
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二日——二月十二日 | 5 聯合國大會，倫敦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一月廿五日 |
| 2 三巨頭會議，波茨坦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八月七日 | 6 四強外長會議，巴黎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五月十八日 |
| 3 外長會議，倫敦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十月八日 | 7 四強外長會議，巴黎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 |
| 4 三強外長會議，莫斯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十二月廿九日 | 8 二十一國和會，巴黎
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八日——十月十九日 |

總哩數約計一77,000 所列日期以離開華府之日起到華府之日止

序言

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先生深感國際局勢日趨尖銳深刻，回憶他在戰時戰後所經歷的國際商談，頗有提供給世人參考的價值，故於退職之後，編著 *Speaking Frankly* 一書，敘述他在羅斯福總統在任之日，追隨左右，以及隨杜魯門總統，參與各種外交會商的實情，所說的都是外間所未會傳布的。從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學徒看來，全書盡是珍貴的資料。中央通訊社獲得原書後，即由編譯部王芒，汪毓先，汪惠吉，沈志秋，湯象，李約，曹德謙，吳道生諸君分擔翻譯，並由黃席羣，潘煥昆二君總其成。譯筆力求通達忠實，希望譯本與原書，辭意並無出入。原名可譯作「說老實話」，為求讀者了解內容起見，譯為「美蘇外交秘錄」，較為切當。中央社得著者貝爾納斯先生的許可，在中國國內外有發行中文譯本之特權，這是應當感謝的。

蕭同茲序於秣陵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

前言

如果我們能夠事先曉得我們立於什麼地位，以及預備向那一方面走，則我們對於應該做什麼以及怎樣去做，一定能有更好的判斷。

亞伯拉罕·林肯

有許多朋友勸我寫這一段史實。他們的理由是，這些事實在我的記憶中還很新鮮，我還能夠讀出自己的速記，因此我能以坦白說話的態度，對大眾有一些貢獻。

我主張人民的和平已有相當時日，而且曾表示意見，人民如果不曉得關於我們談判的事實，他們必不能以睿智的方式影響和平。在這種情況之下，諸君當可瞭解，我很容易被人慫恿得相信，我也許可以幫助那些有興趣於締造和平的人民，使他們曉得我們現在立於什麼地位，因此在做什麼和怎樣去做兩點，能有更好的判斷。

過去四個月來，我每天以很長的時間寫這篇原稿，在這四個月來，我已原諒那些朋友對我的慫恿，但是却沒有忘記他們。我並且認識寫作是一種職業，但不是我所做的職業。我並沒有想使自己夠格為一個職業作家，在文辭上多所修飾，而只以非正式和談話的方式，說明我們制訂和平解決方案的努力。

原稿完成之後，我對於其中「我」字出現次數之多極感驚奇，而且頗不痛快。現在已經來不及補救了。為了減輕這種錯誤起見，我希望讀者能夠想起，這裏的事實和討論都是作者所親自參與的，要避免常常用「我」字，實甚困難。

作者無意使這本書成為戰事停止以來，美國外交關係的一篇史實。其內容僅限於我們締造和平的努力，並旁及於和這些努力有關係的事實。例如，我們和南美鄰邦的關係，書中並沒有提到。這是因為在

敘述締造和平的史實時，實無理由去討論我們和南美各國政府或加拿大政府的關係。

在寫這篇史實時，我必須提及和我一同參加各次會議的許多人士。但是也有許多人士，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我們簡直無法申明我們的立場，但他們的姓名却未提及。他們的功績我永誌不忘，而且深為感激。

在準備這篇原稿時，我有多次還必須感謝那些在各次會議秘書處中勤奮工作，但其姓名幾乎不為人所知的人員。他們仔細編纂成功的記錄，在構成我們和平商談形式的線索方面，實有無價的貢獻。我自己有許多記錄，但都是在雅爾達會議之中的，我在那次會議中擔任顧問，並未參加辯論，因此能作完全的速記紀錄。

全書中有許多直接引語，這是由我自己的速記，祕書處的紀錄，或者有時候從談話後立即寫就的備忘錄中得來的。不過這些引語也許還有錯誤的地方，尤其關於蘇聯和法國代表說話的引語為然，因為在這些情形之下，引語只是譯員的話，而不是說話者自己的話。不過我在有所懷疑的地方，則不使用引語，而只設法描繪說話的要旨和措辭，以及當時的情況和氣氛。

總之，我已努力使諸君如親蒞會場。有些批評者也許會說，發表這些事實還嫌過早。我的答覆是，如果我能使這世界上的人們實際參與和會，而不只是象徵式的參與，那麼，目前我們心中的憂懼也必將消逝。

傑姆斯·F·貝爾納斯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於南卡羅來納州斯巴登堡

第一卷 世界領導地位的序曲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

十萬張嘴發出來的聲音轉起我對於危機的警覺。在大片土地上排成整齊行列的德國人呈現於我的面前，從他們口中湧起一陣讚美武力及其倡導者希特勒（Adolph Hitler）的呼喊。這不是夢魘，而是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德國紐倫堡（Nuremberg）的一幕真情實景。我也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以一種相當淡漠的關切態度看着希特勒這個人抬頭，但是對這裏的景象却不能淡然處之。

國內和國際間的事務使我和我的內人到歐洲去。我是出席巴黎方面各國議會聯合會的一個代表，當時以參議院失業與救濟委員會主席的地位，很想看看歐洲如何處理其失業問題。我們並未預定到紐倫堡。但是在慕尼黑（Munich）的時候，有一位我們會在船上見過面的德國外交部官員勸我們，如果我們不去看看納粹黨每年一度的大會，必不能對德國的經濟復原計劃作適當評價。

可是呈現於我們之前的並非經濟復原的計劃，而是武裝侵略的計劃。一萬二千人的軍隊走過我們的看台，伴着他們的是數十輛坦克和摩托化武器的轟轟聲，同時有四百五十架飛機掠過體育場的上空。當表演到達其最高峯時，希特勒直立在一輛敞車上馴過全場，右臂高舉行納粹敬禮。一片歡呼聲從羣眾中發出。但是我却恐懼——恐懼這種戰爭的魔影。

我們週遊全德國之後，我的懸慮益增。在漢堡（Hamburg）和不來梅港（Bremenhaven）的時候，我們目覩從紐倫堡回來的部隊受到熱烈歡迎。人民對於他們那迅速增長的新陸軍都感覺驕傲。不論在農村裏

還是在城市裏，都有關於戰爭的談論。老年人害怕；青年人却很興奮。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贊成恢復武力，他們深信這是德國人的天然權利而且是一種必要。

這些印象適與我們在法國所看見的成一尖銳的對比。那裏資本家和勞工的爭執已使法國陷入經濟的難關。每週從星期六中午起，到星期二早晨為止，商店和工廠都休業。有些工業部門甚至要求更少的工作時間。但是在相隔一夜火車途程的德國，工廠的工作時間延長而已延長。「工作便是快樂」的口號到處出現，德國人忙着增產，法國人却忙着減產。

我們到倫敦去。由於我們在德國所看見的一切，我便詢問所遇見的英國官員，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有什麼準備。這項問題使我們大感驚訝，其中只有少數人答覆。這少數人已在數月之前實施準備計劃。我們遊歷伯明罕（Birmingham）區域時，的確發現有一些工廠整日廿四小時都在生產軍事裝備。

甚至英國有限的準備計劃也引起主和者的強有力反對。我們回到倫敦的週末便有一個大規模的和平遊行。我會往參觀，並聽見其他旁觀者的批評。主和者的口號和美國國內所見的一般無異：「我們並非把子弟們養大了當炮灰，世界和平，」等等。參加遊行的都是善良人民——正如我們在美國每一邦中所看見的一樣——他們希望申明其對於和平的願望和對於戰爭的憎惡。當這些心地誠懇而不整齊的行列在街上走過時，我又好像看見紐倫堡方面，希特勒指揮下，踏着正步的紀律森嚴的隊伍。這種和平遊行似乎將完全無效。

當我把德國的炫耀武力和我在兩年前遊歷太平洋區域所見的一切聯想起來時，這種猜度似乎更具必然性。兩年前一大羣國會議員，曾在副總統迦納（Garnier）領導之下，到馬尼刺去參加菲律賓自治領首任總統奎松（Manuel Quezon）的就職典禮。那裏的美國各界人士都向我們表明他們對於日本日益顯示其侵略意圖的關切。因此當我們路過日本時，我會對日本的海軍撥款和海軍建造工作作一特別調查。把一

九三六年的日本預算加以研究，便可以看出其總額中至少有半數用於陸軍和海軍。美國大使館人員都相信公開發表的預算只透露海軍撥款的一部份。可是公開發表的數字已經足夠驚人，當我們回到美國時，我便要求總統設法取得關於日本海軍實力的更正確估計。

同樣令人不安的還有日本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機構。我開始時先以調查日本紡織工業為主，因為它和南卡羅來納州的主要工業有競爭關係。結果我曉得日本的工業，銀行業，航運以至整個經濟和政治生活都受集中管制。日本的權力完全在少數人之手，他們要使整個國家朝那一方走，便可以使它照着走。

無論在日本還是在德國，顯然都沒有機會訴諸其人民的判斷力。一切都由領導者決定而非基於民衆的一般願望。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我們自歐洲回來，我儘速向羅斯福總統報告所見所聞的一切，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立即鄭重考慮國防問題。

總統告訴我，我的話只證實了他從駐外官員代表的報告中所得到的結論。他對於歐洲的情勢發展至感不安。他更感不安的是使美國人民警覺於真正情勢的困難。

我告訴他說，全國人民的情緒，正如國會中所反映的，將使我們為陸海軍取得增加撥款的工作深感困難。可是他決心盡力使人民瞭解增加撥款的必要，我也答應幫忙。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總統在芝加哥發表其著名的「對侵略疫病施行檢疫的演說。」這是一篇強有力的痛辭。所以要發表這項演辭，其理由實有多點。我們的傳統願望是擺脫歐洲的糾紛而置身局外，而且基於願望的出發點，相信侵略性的國家主義可以歐洲大陸為其範疇。此外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參與歐洲政治結果所得到的失望情緒依然存在。我們以整個人民來說，實憎惡戰爭而重視本身的孤

立。

另外還有其他眼前的因素。

我們平時對於陸海軍的維持總帶一點勉強爲之的成份。這種勉強態度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有多次竟變爲率直反對的態度。我們所徵賦稅應該用於救濟而不應用於軍事準備的論調，當時實有相當力量。持這項論調的人說，世界上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嘗夠戰爭的痛苦了。此外，參議院軍火委員會也給予和平論者以鼓勵，他們支持一項單純的理論便是，戰爭只是渴望牟利的軍火商製造出來的食物而已。軍事供應品製造者都被稱爲「販賣死亡的商人。」國際銀行家更被稱爲替這些商人的產品製造市場。每當我向參院大會提出海軍撥款案時，總要應付這些主和者的口號和論調。他們擁有大量羣衆的支持。參議院走廊上總是塞滿聆聽這項論調的羣衆，其中婦女和學生總佔極高的比例。參議員佛萊濟 (Lynn J. Frazier) 常常發言批評海軍，但是主和論者的主要發言人却是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奈埃 (Gerald P. Nye)。他的誠實我從來置疑，不過我常常懷疑，他是否會經想到，一九三五年大批國會議員到日本的時候，日本海軍軍令部爲什麼在我們登岸之前，發電報單邀請他一人赴宴會。奈埃拒絕了這項邀請。後來在我們離日返美途中，他給我看一本書，其中是日本海軍發展的紀錄，是一位日本海軍將官送到船上來給他的。我相信他當時必然處境甚窘。

羅斯福總統自從其當政的初期迄今，即冒着各方的反對，設法增強我們的防務設備。他曾經把公共工程的經費撥給海軍建造計劃，並且獲准將陸軍兵額從十一萬五千人增到十六萬五千人。

總統對於他的芝加哥演說未在民衆中間引起反響一事頗感失望。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初才開始致力於喚起國會和民衆。

他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九日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說，大多數國家（包括發生衝突者在內）的大多數

人民，雖然都希望生活於和平，但是世界居民至少有四分之一已捲入殘酷和破壞性的衝突，這是一樁不祥的事實。

他接着主張海軍建造計劃增加百分之二十，建造戰鬥艦和巡洋艦各兩艘，試造各種小型艦艇，並將少得可憐的二千萬陸軍器材經費酌予提高。當時美國正規陸軍在世界各國的常備軍中，居第十八位。

但是由於民衆的反對性情，增加陸海軍撥款的努力，簡直是一種像走上坡路一樣吃力的鬥爭。一般注意力都集中於 WPA, PWA, AAA, CCC, NRA, 以及其他字母上。（譯者按：上項字母爲 Working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Public Work Administration, Agriculture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之簡寫，可譯作以工代賑局，公共工程局，農業調整局，民間土壤保持局，全國復原局。）這些字母把所有稅收都吸收去了。要縮小這些機關是一件難事，取消更談不到。這塵世中最接近永生的便是政府機關。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的兼併奧地利，同年九月的肢解捷克，都足使美國人民震駭。但是陸海軍的撥款在國會中仍舊很難通過。總統爲了喚起民衆注意起見，首先在一九三九年的新年期間，再以一篇有關國防問題的特別咨文送交國會。他這次要求五億元的撥款，其主要用途是充實陸海軍的航空隊。

三月廿七日，國務卿赫爾致函參衆兩院，要求廢止對交戰國禁運武器的法律。他附加解釋說，這種法律應有彈性，加以廢止之後，設如不幸歐洲發生戰爭，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置身局外。其後不久，羅斯福總統在白宮的一次談話中告訴我，他深恐希特勒將在夏間發動戰爭。七月十一日參院外交委員會以十二票對十一票，通過延期討論撤消武器禁運一事的議案時，總統和赫爾國務卿都深爲失望。三天之後，總統咨文國會表示遺憾，並附有赫爾國務卿強有力的聲明，籲請立即行動不要遲延。聲明中強調稱，如果撤消禁運法，我們維護和平的力量便將削弱。但是這項呼籲並無效果。

國會宣告休會，但是希特勒却不休息。他和他的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正忙着和蘇聯談判互不侵犯協定，並於八月廿八日締結成立。兩天之後，納粹大軍便侵入波蘭，而「閃電戰」（Blitzkrieg）一辭也開始列入我們的辭典。

羅斯福總統按照當時存在的法律宣佈中立，並實施軍火禁運。同時他又召集特別國會於九月廿一日開會，討論廢止禁運案。終於在十一月四日，國會才通過我們自從五月間以來便在努力爭取的廢止禁運案。

總統自始便認識在當前的緊急事態中，有採取兩黨一致行動的必要。爲了廢止禁運起見，他在國會開幕的前一日在白宮舉行會議，參加者有迦納副總統，赫爾國務卿，藍敦（Alfred M. Landon），諾克斯（Colonel Frank Knox），衆院議長班海德（Bankhead），參院領袖巴克萊（Alben W. Barkley）和麥克那利（Mc Nary），參議員皮德曼（Pittman），貝爾納斯，閔敦（Minton）和奧斯汀（Austin），衆議員白魯姆（Bloom），雷朋（Rayburn），馬丁（Martin）和梅普思（Mapes）等。

這是一羣重要人物的重要會議。

與會人士聽了總統關於兩大黨合作的呼籲之後，都有坦白的言論發表。藍敦認爲國會應該繼續開會。他認爲國會和行政當局雙方的判斷比一個人（這自然是指總統）的判斷可靠些。在共和黨代表當中，所發言論的令人感動無過於前一屆大選中的副總統候選人諾克斯。他說，戰爭必將蔓延，我們既不能置身局外，也未準備加入。他又說，我們應該忘却一切黨派利益，團結一致，準備保衛國家。

當總統決定任命兩個共和黨人參加內閣時，我對於他選任諾克斯爲海軍部長，絲毫不感意外，而對於他選擇智勇兼備的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爲陸軍部長更爲欣慰。

總統叫我探詢伊利諾斯州參議員盧卡斯（Lucas），問他是否通過諾克斯的任命。盧氏立即表示贊成

，幾小時之後，他又告訴我，他會和芝加哥市長凱利 (Kelly) 談起這事。凱利說，諾克斯所辦的報紙雖然經常反對他，但在目前的緊急期間，政治上的問題必須完全不加考慮。盧卡斯又說，他對於諾克斯的任命深感愉快。凱利市長是民主黨一大政治組織的領導者，他的話實足令人興奮，這表明政治上的考慮已經成爲次要問題。

參加白宮會議的參院議員們回到國會議事堂時，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那利說，他希望我轉告總統，他在會議上雖然沒有說話，總統却可以信賴他的衷誠合作。麥克那利是國會內外最幹練的共和黨人之一，後來他的確信守其合作諾言。每當有關於準備計劃的某種建議案提出時，按照參議院的議事規則，可能加以延擱，麥氏必允諾立即加以考慮，並給予有力的支持。他和當時担任少數黨督率員的參議員奧斯汀，都不聲不響地協力加速通過許多國防措施。

納粹侵略波蘭雖告成功，有一大部份美國民衆還未覺察當前的危機。當時因爲西綫沒有軍事行動，人民開始認爲這是「假的戰爭」。這項觀點極其普遍，在國會中也反映出來。一九四〇年初春，我們已將海軍撥款案審查完畢，其中規定添造戰鬥艦和巡洋艦等項。我和參院同僚談話結果，斷定這項法案如果未經大加修改，要想通過實甚困難，因此我便故意延緩參院對於該案的討論。有一部份撥款已立即可以提用。海軍方面也正有需要。但是我想確使這項法案能獲通過，而不致遭受修改，致減少新建造計劃的撥款。根據我國情報官員所作的談話以及軍事領袖的見解，我相信隨着春天的來到，納粹必將在西綫發動攻擊。結果不出所料。等到納粹發動攻擊時，我便將海軍撥款案提出參院討論。只經三小時便通過了，一如撥款委員會所提出的，並未再經過修改。

我們的困難不限於物力方面。陸軍有許多優秀的較高級軍官，不過據馬歇爾將軍說，他們的年紀都太大了，不適於擔當未來的艱苦任務。

一九四〇年八月，馬歇爾將軍列席參院撥款委員會，為國防撥款案發言。在休息期間他告訴我說，他的最大困難是無法擢昇具有非常能力的青年軍官。要將陸軍加以適當整編，必須有擢拔後進軍官的權力。他對我說，他在幾個月之前已經要求衆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梅氏（Merrill）提出必要的立法案，但是直到現在還無法採取行動。

他的需要非常迫切，因此我請他指定一位技術專家，起草一項他希望通過的修正案，並且說我願替他幫忙。按照參院議事規則，修正案不能在委員會中補入撥款案之內，因此在撥款案向參院大會提出時，我才將修正案提出，結果沒有反對意見便告通過，其中規定「在總統決定的國家緊急期間內，正規陸軍的任何軍官都可以被任為較高的暫時官階，同時不必取消其永久官階。」

當我們和衆院撥款委員會的委員舉行會議時，我解釋這項建議案的急迫性，他們也接受了。九月九日這項議案正式成爲法律，陸軍部按照其條款，開始破格擢昇青年軍官，使超出原有的較高級軍官，這些青年軍官後來果然領導我們的軍隊取得勝利。一九四〇年底以前，這種擢昇計有四千零八十八起。擢昇的軍官計有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凱尼（George C. Kenney），史巴茲（Carl A. Spaatz），克拉克（Mark Clark）以及已故的巴頓（George S. Patton）諸將領。艾森豪威爾擢昇時，竟超越三百六十個其原先的上級軍官。

敦刻爾克（Dunkirk）的慘敗終於喚起了我們的民衆，不過他們的反應却很紛歧。我們對於戰爭的憎惡心理和對於戰火已逐步逼近我國海岸的逐漸認識已發生矛盾。這兩種矛盾心理的妥協，是願意建立本身的防務，但決 避免捲入戰爭旋渦。

民衆情緒的紛歧可從政治集會中反映出來。

六月廿四日在費城（Philadelphia）開會的共和黨人，在其政綱中附加一項宣言說：「共和黨堅決反

對將國家捲入外國的戰爭。」

民主黨的政治領袖們，深知共和黨這項宣言對於老百姓的號召力量，因此也深望民主黨大會能對消共和黨宣言的力量。

總統要我在民主黨大會中代表他出席。他特別希望我注意政綱中的外交宣言。當政綱委員會開會時，我們顯然處於一項鬥爭當中。聰明而幹練的參議員惠勒 (Burton K. Wheeler)，希望宣言中反對參加戰爭。參議員華爾士 (David I. Walsh) 和麥加蘭 (Pat McCarran) 以及其他委員也抱同樣見解。提出的建議共有數種。我請求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華格納 (Wagner) 將有關外交的部份暫緩討論，讓我先和那三位參議員談談，看看我們是否能議定一項滿意的宣言。華格納並指派凱利市長和我們一同會商。

三位參議員堅持一項聲明，即「我們將不參加外國的戰爭，也不派遣陸、海、空軍到美洲以外的外國土地上作戰。」他們告訴我，有許多代表已經表示，如果他們得不到這類直接保證，必將反對大會。我最後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夠同意加入『除了在遭受攻擊時之外』幾個字，則我將向總統及國務卿提出。他們同意了。這實際上是我和總統第三次商談這項問題，這次赫爾國務卿也參加。赫爾遲遲不表同意。我指出我們如果在世界任何地點遭受攻擊，便可以作戰並派遣軍隊到外國去。無論如何，我們如果未經宣戰，決不能派軍隊出國作戰，而宣戰則是國會的權限所在。」

宣言終經委員會和大會一致通過。我不滿意這條綱目，深恐使希特勒像一九一七年時的德皇一樣，認為我們不致作戰，因之鼓勵他依照這項假定行事。但是政綱委員會委員所表示的見解充分表明，這已經是我們所希望做到的最高點。否則只有在大會中引起激烈爭執，暴露總統所領導的政黨的嚴重裂痕，從而減損其在國外的聲譽。這是兩大政黨爭取選民的一個好例子。

法國已經崩潰，對於英國的慘烈轟炸也在全力進行中，總統自動開始行動。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積存的物資中提出步槍和其他武器賣給英國，以補充其在法國灘頭所遺棄的軍器。以五十艘逾齡驅逐艦交換英國根據地使用權的談判也在進行。許多人抗議說，總統無權處理這些驅逐艦。我把這件事告訴他時，他便叫我注意檢察長傑克遜 (Jackson) 爲支持他而提出的法理見解。可是從總統的態度上看來，我認爲他更關切的是民衆是否將支持他的行動。雖然當時距離選舉只有幾個月，他仍決心冒這個險。

就在這個時候左右，國會也開始辯論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平時徵兵措施。可注意的是政府適在總統選舉之前不久提出這項爭執甚烈的法案。一位忠實的共和黨眾議員魏茲華斯 (James W. Wadsworth) 竟和民主黨參議員柏爾克 (Edmund R. Burke) 一同提出這項法案，使其具有兩黨性質。該案剛好在選舉前通過，它是否影響到許多選票尚屬疑問。

人民接受徵兵法一事表明他們對於歐洲的局勢亦有反應了。

自此之後，人民往往比總統和國會先見一着。他們已經看見戰爭的世界性。他們更瞭解援助友邦的切要，並爭取時間從事準備。

一九四〇年聖誕節之前不久，羅斯福總統在一次招待記者會中，透露其從我們對反抗希特勒國家的援助中，「取消美元痕跡」的計劃。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總統列席新國會提交其國情咨文時，更發揮這種見解。同時法案也已開始起草，以將計劃付諸實施。當時擔任財政部法律總顧問的助理的柯克斯 (Oscar S. Cox) 所擬的一項草案，乃被用爲徵求許多人士意見和建議的基礎。

一月十日，兩院的多數黨領袖參議員巴克萊，和眾議員麥考瑪克 (John W. McCormack) 同時在兩院分別提出這一法案。衆院方面給這項法案加上一個象徵性的號碼 H. R. 1776，最後於三月十一日成爲租借法。

新國會組成時，處理租借法案的參院外交委員會有兩個空額，由參議員格拉斯 (Carter Glass) 和我

補上。自此之後，我的主要活動便是設法通過租借法，柯克斯和陸軍助理次長麥克勞（John J. McCloy）奉派供給兩院委員會以及議員個人所希望得到的任何情報。我們必須向反對者承認，我們租借出去用於作戰的物資很少回來的希望。我們必須說明，這種租借可使他人能對敵作戰，並使我們得有機會訓練和裝備我們本身的武裝部隊。該案以十五票對八票經外交委員會通過之後，乃於二月十七日提出參院大會。外交委員會資望甚高的委員們在大會中主持辯論，充分提出理由，卒以六十票對三十一票通過。

這一法案通過之後，努力轉移到撥款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參議員格拉斯任主席，我也是委員之一。實施租借計劃的初步撥款七十億元乃獲通過。

一九四一年六月，最高法院法官田納西州人麥雷諾斯（Mc Reynolds）宣佈退休，我受任補他的缺。在其後的幾個月中，我沒有以任何方式參加國防準備工作，只有從報上以及進謁總統時得到一些消息。

六月廿二日德軍進侵蘇聯後，未捲入戰團的強國只剩下一個了，但是「羅賓穆爾」（Robin Moor）號的被擊沈沒以及「格利爾」（Greer）號和「刻爾尼」（Kearney）號的遭受攻擊，已表明我們不能再規避多少時候了。國會的反應是再度改訂中立法並通過更多款項供國防之用。總統和赫爾國務卿對於「軸心」東端的情勢也深為關切。日本的進入越南已充分暴露侵略企圖，決不能以來栖特使蒞美的「和平使命」為掩護。總統最後只有在十二月六日（星期六）直接向日皇呼籲和平。他所得到的答覆是日人在第二日未經警告而偷襲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的兩日後（星期二），最高法院開庭審理伯利恆造船公司（Bethlehem Shipbuilding Company）和美國政府間的一項訴訟。我必須承認那天上午我簡直極難集中心力審案。這一案件牽涉該

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營政府造船的問題。在其他任何時期，這都似乎是一件重要案件，但是當時在珍珠港方面消息不斷傳來，我們逐漸認識其後果的情況下，這案似乎毫無意義。

星期三清早我去晉謁總統。他仍躺在床上，滿床都是消息和備忘錄。有些紙張落在地板上。他已經醒了好幾小時研究情報並策劃將來。我一進門他便把損失的詳情告訴我。那時我才完全曉得我們船艦損失的程度。總統憂念，決心和痛惜之情交集。他不瞭解他一向引以自豪的海軍，怎樣會弄得如此地步。

我們一面說話，他一面按鈴叫人拿剃刀，起床開始修面。我們的談話乾脆移到浴室。他剛把肥皂塗好，我轉變話題說：

「總統先生，你曉不曉得，你對於最高法院的鬥爭結束之前，我已經認為你這樣做法是不對的，我在法院的工作經驗更證實這項觀點。」

他的剃刀半途停下來。我的話打中他的心坎。他以疑問和困擾的神情望着我，但是我繼續說下去：

「你主張法官們滿七十歲應該退休。以我的經驗來說，我認為他們應該滿七十歲後才任職。」他面色轉和了。我把昨天的審案情形告訴他，他笑了。

「自從我服公職以來，我即置身於危機當中，」我說，「可是昨天國家正遭逢其歷史上的最大危機，我所能做的却是以許多時間，聽取關於廿三年前造船付款問題的爭執。我時時想到在珍珠港沈沒的船艦，很難集中注意力於一九一八年伯恆公司造船問題的爭執。」

這些話是在一半開玩笑的態度下說的。當我們回到寢室時，總統表示他很重視我這些話。他指出我們加入戰爭之後，將需要通過很多立法案，擴大行政權力和改組許多行政機構。他說這些都需要迅速行動，而且由於我在國會中的長期經驗，他希望我能幫忙。於是總統便下令檢察長畢德爾(Francis Biddle)

清理一切作戰法案，並叫他和我會商。

這裏引起一項問題。總統交給我的問題除了和政府各部的官員之外，還需要和參眾兩院的領袖磋商。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怎樣會和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發生關係，的確頗費解釋。不過我們是在戰爭中——而且我們已有點害怕了。

十二月十五日，我正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奧維曼法 (Overman Act)，該案會授權威爾遜總統改組政府機構，以便以更高效率進行作戰，我忽然想起這便是我當前問題的解決辦法。目前改組已屬必要，總統也可以很容易的宣佈，因為我會經擔任參院政府改組委員會主席，他可以叫我從事研究，並提出必要改革的建議。我記得在一九一三年，我在眾議員的第二任內，塔虎脫總統會派最高法院法官休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擔任國會所設委員會主席，以調查第二類郵費問題。因此我對於他具有最高景仰的一位法官已為我造成先例。

基於這一出發點，我寫了一個簡短的備忘錄送給總統，說明我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

「我希望避免『聯絡』和『聯繫』的字樣，」我對他說，「這些字樣甚至將毀掉一個好人，」但是信還沒有送達白宮，我已經顧慮到公開宣佈也許會使我幫助總統的能力遭受限制。總統也認為我如果在他人所不注意的情況下去做，也許對他更有幫助。因此這事從未公開宣佈。

政府的每一個機關幾乎都提出緊急立法案的要求。其中有幾項要求的需要性還不十分看得出來。如果加以個別處理至少需要十幾個委員會開會討論，許多寶貴的時間也將隨之喪失。

我和檢察長以及柯克斯（當時已改任檢察長的助理）會商之後，決定這些問題最好由一個概括的法案加以處理。這樣一來，國會兩院僅須各以一個委員會開會討論。爭執比較多的問題也可以借助於人人贊成的建議案連帶通過。例如郵務部長華克 (General Frank Walker) 有一個所有武裝部隊人員免費郵

寄信件的建議，這幾乎必然可得一致擁護——因此便列為概括法案的第十項。

同時衆院議長雷朋和參院多數黨領袖巴克萊也贊成概括法案的見解。他們分別選定兩院的委員會，並和它們的主席磋商。結果第二次戰時權力法案乃由兩院司法委員會的主席提出，八日內即由參院通過，衆院二月底也予通過。

戰時生產的籌劃是另一個迫切問題。勞工方面已經保證合作，納德遜 (William Knudsen) 在爭取工業家的支持方面也有良好成就。不過我們籌劃生產的規模，並不足以供應我們的盟國和我們本身的武裝部隊。權力的劃分以及所造成的種種牴觸，實際上已使生產爲之延宕。機關似乎比決策還多，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報界和民衆都要求有所改革。

· 霍浦金斯 (Harry Hopkins) 當時是軍火分派委員會的主席。他住在白宮裏，在許多問題上供總統諮詢，一月二日霍浦金斯在和我通電話的時候，叫我在有關生產的問題上，貢獻他一點意見。當天下午我送給他一篇兩頁長的備忘錄，其第一點說，邱吉爾首相和他的供應部大臣卑維勃魯克勳爵 (Lord Beaverbrook) 這次訪美後盛行一時的設立供應部建議，將需轉移陸海軍的購料機關，這樣必將造成混亂，衝突和時間上的喪失，這是國家所無法忍受的。

我對霍浦金斯提出的備忘錄不主張單純的另設一個機構，而主張由總統指派一人，賦與監督和趕辦購料工作的責任。這個人可以設立他所需要的任何機構，但是等到有爭執發生時，他可以決定之權。備忘錄又說：

「你也許會說，『好的——找這麼一個人罷。』可是你如果要求一個十全十美的人，也許會永遠找不到。有些事是我們所曉得的。你如果引用一個只在某一特殊工業方面有經驗的人，他除了必需瞭解各種部隊的需要之外，還需學習政府機關的手續。如果你能想起當你到華盛頓時對於政府機關究竟有多少

瞭解的話，你便可以曉得一般負責執行工作的人員，對於生產機構各機關首長必須遵行的手續，所知如何的少了。如果你現在找得到一個在行政機關中當學徒出身的人，對於陸海軍以及其他部隊購料部門的問題有相當瞭解，又能指揮其他人員工作，那你就任命他好了，不必再去引進新人。」

「我們並不需要有一個鼎鼎大名的人以達到政治上和威望上的目的」，我繼續說。「你現在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能做事務的人。如果現有的「大事」們有那一個忍受不了這口氣要辭職，讓他走好了。他會覺得在家更是難過……在現有的人中挑選你所知的最優秀人才，然後讓他放手去做」。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總統的副官華生（“Pa” Watson）將軍找我說，總統希望和我見面。幾分鐘後，霍浦金斯又打電話來，要求我去見總統之前，先在他房間裏停留一會。他臥病在床，但是還能處理公事。他對我說，他曾經和總統簡單談到這項問題，但是因為總統不願意這樣做，他也沒有勉強。霍浦金斯說，他沒有把我的備忘錄給總統看，只在大體上討論到這項問題。我叫他把備忘錄給我，以便給總統看。

「我已在考慮指派一個委員會的問題，」他說，「但是我愈加考慮之後，愈接近你在這裏所說的結論」。

我促他立即行動。

「如果我在今日上午便須作一選擇，我將選定納爾遜（Donald Nelson），」他接下去說。「他昨天晚上會在這裏參加我們歡宴卑維勃魯克勳爵的宴會。我過去對他知之不深，不過昨晚我聽他在討論食糖情勢以及幾種生產問題，對於他見解的精當印象頗深。」

「我還沒有想到要推荐什麼人，只是促你採取行動，」我告訴他，並且提醒他說，「這個人必須在取得你完全信任之下才能繼續任職。」

最高法院就要開會，我必須走了。這一段談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這是我在法院開庭或開會時遲到的僅有一次。

當天下午華生將軍叫我在明天上午去見總統。當我到白宮時，預算局長史密斯（Harold Smith）已在那裏並告訴我，總統已叫他起草一個包括有我的備忘錄裏所提見解的行政命令，霍浦金斯也來了，於是我們便準備一項對報界發表的聲明，宣佈成立戰時生產局，任命納爾遜為局長。哈利（霍浦金斯之名）渴望總統立即行動。

「多一小時的延擱便會有多一批的人曉得總統在作何計劃，」哈利說。「我們所曉得的第一件事，便是具有不同見解的一批人將在這裏設法勸他改變初意，而且這項消息可能向報界洩漏出去。」

可是總統堅持他必須先通知副總統華萊士（Wallace），因為他兼任經濟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將因這項命令而撤消。總統說他將在午後和華萊士見面。傍晚我回到白宮看行政命令的最後草案時，才曉得這件事延擱了。威爾基（Wendell Willkie）來訪總統。總統和他談得很高興，把約會的時間也就誤了。結果遲到六點鐘左右他才把決定告訴副總統，接着這事便正式宣佈。

到了夏天法院休庭，我很疲倦，想回家休息兩星期。但是總統早就擔憂工資和物價情勢，要我在啓程前和盧遜曼法官（Judge Samuel I. Rosenman）會商。盧遜曼後來擔任總統的私人法律顧問，當時他奉命調協關於穩定我國經濟的最好辦法的各種不同見解。他已經擬好設立經濟穩定局的計劃大綱，有關各機關的首長都頗為滿意。我提出幾點建議後，終於啓程返南卡羅來納老家。

在家裏沒有住上幾天，我在一次沈酣的午睡中被我的內人叫醒：

「吉姆（貝爾納斯名傑姆斯，吉姆乃其暱稱），白宮要你聽電話。」

這是總統打來的，他說目前必須設立一個機構，有充分的權力執行物價和工資的最高限額。他問我

如果他以行政命令來設立經濟穩定局並賦予這種權力，國會方面可能有什麼反響。他深恐這項建議提到國會去之後，需要幾個月才能通過。

「總統先生，我認爲如果你想這事成功，必須先提交國會，」我回答。「工資和物價的管制問題太複雜，直接影響到太多的人了，如果不經國會授權，施行將極困難。未來的工作將極艱困。」

幾分鍾之後，內政部長伊克斯（Harold Ickes）也來了電話。他已經風聞總統正在考慮中的建議，這位老「畜鬼」希望我勸總統將它提交國會。我告訴他，總統已表示願意這樣做，他很高興。

這項法案終於提出而於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成爲法律。當天總統來了一個通知，叫我在次日上午去見他。

這又是一次在他床邊的談話，不過我對它的記憶特別深刻，因爲我在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服務從此結束，首次進入行政部門。

我們還來不及說「早安」，總統便說，他希望我向法院請長假而接受經濟穩定局局長的職務。

我深深感謝他的建議，但對他說，沒有任何人有權准許最高法院的法官請長假，法官對於履行責任應自負其責。我說管制工資和物價的工作，牽涉太多和政治問題有關的決定，我留在法院裏頗爲不妥。

「不過你也許記得，」我接下去說，「珍珠港事件後我第一次也在這間屋子裏見你時，已經表示願竭盡棉薄。你如果認爲這項職務對於作戰極其重要，我將毫不遲疑地辭去法院職務而接受新職。」

「吉米（與吉姆同），我的大部份時間都消耗在考慮和作戰直接有關和密切相關的問題，因此簡直不能以充分時間處理內政問題。我們必須設立的一切新機構都將增加管轄權方面的衝突，需要我來解決，我希望你替我解決這些問題。我將發佈行政命令，授予你解決權力，並使旁人曉得你的決定就是我的決定。」

一絲笑痕掠過他的面頰，他接着說：

「經濟穩定局長是一項重要職位，不過其重要性却次於我希望你直接代表我去做的其他任務。你做不到呢？」

我答應了，一小時之內便把辭去最高法院職務的呈文送給他。

離開法院不是一件易事。受過法律訓練的人誰都不能輕易離開。我喜歡這項工作，也喜歡我的同僚們，不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一個青年衆議員時，已經深深瞭解國內戰綫對於爭取戰爭勝利的重要性。而且我也看見過由於國內戰綫不夠堅強而喪失和平的悲劇。我覺得這項職務將使我有一個機會協助羅斯福為美國完成已故威爾遜的夢想。

我的感想已正確反映於我就任經濟穩定局長以後的第一篇演說。這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對紐約前鋒論壇報的時事座談會而發的，其中大部申論通貨膨脹的危機，其結論如下：

「如果有類似通貨膨脹的事發生，我們的人民將未及準備担負我們在組織世界以求和平方面所保證担負的一部份責任。那時必將造成最大悲劇。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藉從事全國性激烈行動以及徹底社會設計的辦法，又可以恢復元氣，但是那時又須經過一段期間，發揮我們的領導能力，然後這一個極度疲憊的世界才能建立和平與秩序。因此這一個世界最強和最權威的國家，必須使其內政安定。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必須能以本身的能力以及生產資源移充和平用途。我們必須指出走向具有廣大自由的世界的途徑，必須指出導向持久和平的道路。」

穩定工資和物價的鬥爭是一種艱苦的鬥爭，和生產者獲得較高價格以及工人取得較高工資的願望處於敵對地位。參衆兩院議員，勞工領袖，商人，農夫以及各種集團的發言人都會提出其特殊的申訴理由。他們於可能時並會向總統申訴。

總統在接見他們時所持立場極為得體。他以同情的態度聽了他們的一套話之後便說，「你們都曉得，貝爾納斯對於這一問題極其敏感。我不願意和他談這件事，你們應該直接找他談談。」他們便會聽從勸告，我會見過許多人。事實上這項職務使我認識許多人，但是沒有交到朋友。

穩定工資和物價的努力應該與戰爭同時開始。我們因為加入戰爭過遲，這項工作等於仰攻式的作戰。我說「我很抱歉但是沒有辦法」這句話已經說得厭倦了。這一條陣綫有許多地方變彎曲了，但是其守的成效却比我一向預料的好得多。

從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經濟穩定局實際開始工作的時候起，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四月止，生活費用指數增加百分之四·三。後來我們便起草了一個所謂「扼守陣綫命令」(Hold-the-Line Order)，由總統公布之。這項命令使我獲得更大的權力去穩定物價和工資。它給我在白宮裏的辦公處帶來所有的工會領袖。

不久之後，我斷定動員我國資源從事作戰的任務太大了，我不能有充分的時間兼顧它和經濟穩定的問題。經過和總統會商之後，他叫我起草設立戰時動員局的命令。

他依我的建設，要求文森法官 (Judge Vinson) 接任經濟穩定局長。文森沒有一刻遲疑，他辭去迴上訴法院的職務，幹練而勇敢地執行「扼守陣綫命令。」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起，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辭職時止，生活費用指數只增加百分之三·二。在他辭職以及撤消「扼守陣綫命令」以後的廿二個月內，指數增加為百分之二十·二。

戰時動員局天天遭遇的問題，都足以表現美國的經濟力量和世界命運之間直接而且密切的關係。我們所發出和消費的電力數量，直接決定有多少飛機可以飛過歐亞兩洲的目標上空。我們生產和運輸汽油的速率，差不多成了我們武裝部隊行動的速度計。運到船隻或戰時工廠中去的鋼，其數量必須顧及在萊

茵河和伊洛瓦底江(Irrawady R.)上構搭浮橋的可能需要。關於我們農場生產的每一項統計數字都必須詳加考察，因為這些數字不僅決定我們在國外所能供養的軍隊數目，而且足以決定同盟國萬千人民的生死。

這一可怕事實的驚人證據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擺在我的辦公桌上。總統從德黑蘭發來一封無線電報。他急切需要關於我們的登陸艇生產量可以擴充多少以及交貨的迅速程度的資料，每一機構都立即動員搜集，因為我曉得總統的要求牽涉到德黑蘭會議三巨頭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決定。

十一月廿四日，我電告總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間——即六個月之後——我們可以在本國的海港交出下列各種登陸艇：

坦克登陸艇(LST)五百七十艘

步兵登陸艇(LCL)六百六十五艘

登陸坦克(LCT)九百五十艘

機械化部隊登陸艇(LCM)八千四百六十九艘

車輛及兵員登陸艇(LCVP)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六艘

登陸指揮艇(LCC)九十九艘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予它們以超過其他一切軍火的優先權，包括允諾供給蘇聯前線的供應品在內。此外我們對於陸軍卡車，海軍船隻以及高辛烷汽油的生產也必將為之減慢。實際上我們做得比所提出的諾言還要好。

關於這一重要項目的生產情報，協助了在德黑蘭開會的巨頭們計劃在一九四四年夏間進攻歐陸，我們能夠依期在歐洲登陸，完全倚賴美國的生產能力，史達林會一度承認這項事實而舉杯致賀說：「沒有

美國的生產，聯合國將永遠無法贏得戰爭。」

即令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生產能力還繼續和時間競賽。一九四四年十月間我訪問歐洲前線時，曾看見我們如何密邇禍患。瑟堡(Cherbourg)附近有一處納粹「V」式飛彈的發射場。該場設在一個古舊的採石坑內，偽裝非常良好。德軍被驅出該地之前，一個完全不怕炸彈的鋼骨水泥屋頂還沒有完成。假如我們的進攻歐陸延緩幾個月，而不及在六月六日發動，很可能的從這一類發射場所，飛彈會像雨點一樣的降落英國，使我們永遠無法集中大軍發動攻歐。

我就是因為天天接觸這些事實，所以才有感而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七日，在全國報業俱樂部的午餐會中說：

「這一代美國人可以光榮地獲得或者屈辱地喪失世界的希望。如果美國能使用其生產力於和平，正如她用於戰爭一樣，則我們必將光榮地獲得這種希望。如果美國不能以其生產力用諸和平，美國以及全世界均將失敗……這不是我們應該持的一項理論，而是將遭遇的一種情況。」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階段

一九四四年聖誕節的那個禮拜，我在總統的書房和他討論關於航運的問題。他在看我爲他擬就的一份備忘錄後，拾頭對我說：

「吉米，我想要你這回和我一同去克里米亞（Crimea）。」

總統說的這句話使我感到非常驚異。關於不久要和史達林及邱吉爾開會這一件事，他過去會和我談到好幾次，但在這幾談話中始終沒有暗示到要我隨美國代表團同行。

「你知道別的會議開會的情形，」他接着說：「你担任動員局局長職務後，你已瞭解我們國內的情勢，雅爾達會議一定會有一些經濟問題提出，你對美國國內情勢的認識對於解決這些經濟問題將有很大的幫助。」

「總統出國以後，」我告訴他說：「一切工作是並不不停的。像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一些問題經常地發生。我想我應該留在國內，處理那些問題。」

然而他堅持我要同去。我同意了，但對於這項決定却感到不愉快。

在預定啓程的那一天以前我們一直沒有談到這一件事。那天下午，戰時動員復原局（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and Reconversion）的同人舉行會議討論預料在我離國期內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行前的會議使我更加相信我不應隨總統同去。我離開會場去看總統。黑人約翰梅斯（John Mays）正在給總統理髮，梅斯在一切正式集會中一向是站在白宮的正門前迎接賓客，這份差事他已幹了三十六年了。他還是在塔虎脫總統任內從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到白宮來，以後就一直白宮給人理髮，獲得白宮中人

的信任。他不僅待人週到，不失尊嚴，而且聰明謹慎。

在梅斯繼續給總統理髮時，我又懇切地對他說，我應該留在華盛頓。我把總統離國的一個月內，我們預料將會發生的一些問題，概括地給他說了一遍。總統精力極大部份貫注在國際問題方面，以致對於那時有多少需待戰時動員復原局處理的問題和待作的決定沒有能夠顧及得到。事實上我已竭盡所能不讓國內問題擾亂他對國際問題的思考。總統堅持他的意見，認為我非去不行，最後我終於同意。那天夜裏我們啓程去諾福克(Norfolk)，一月二十三日我們在夜色未退的清晨，從諾福克乘美國重巡洋艦昆西號(USS Quincy)出發，昆西號要把我們一直載往馬爾他(Malta)。

我們一行離開華盛頓時，總統正患重傷風。在船上他傷風得更厲害，大部份時間都留在房裏。他出來吃午餐和晚餐，晚餐後還看電影。但在我們抵達地中海以前，他只有一次或兩次能夠坐在甲板上。

我們在海程中欣逢總統的生日，那是一月三十日，總統的女公子波蒂格夫人(Mrs. John Boettger)將壽辰那天的晚餐弄得很熱鬧。從艦上軍需官處買來的禮物都一一敬贈給總統。總統忠誠的菲律賓籍司廚長堅持要做一個生日蛋糕。但別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將校們送了一個；士兵和准尉官們也都不甘落後。一齊有四個蛋糕送來了，這時我們這一行人中有一位忘記起總統剛四屆連任不久，他跑了出去，回來帶回第五個蛋糕。蛋糕裏插了一枝大蠟燭，要總統把牠吹熄。

生日這天大家都很高興，總統不掃人興，也很愉快，不過總統的外貌却使我感到不安。我怕他的病不完全是由於傷風，我向波蒂格夫人提到這一點。她想我的意見是根據在看電影時對總統的觀察。每回看電影，波蒂格夫人通常坐在總統的身旁，我坐在他的另一邊。她解釋說總統在看電影時因為鼻部呼吸困難所以都是把嘴張開，這使他看起來像是不大好，但他並不是真有病。總統的醫官麥克英泰爾(Dr. McIntyre)也認為總統的外貌是由於鼻部呼吸障礙和傷風的緣故。總統在每次患病後總是精力充沛，完

全康復，因此我也拋開憂慮。

我們到達馬爾他時，總統的體力已大見康復。當昆西號慢慢駛入馬爾他時，我們看見穿着海軍制服的邱吉爾首相站在海峽那邊英國軍艦西里奧斯號(H.M.S. Sirius)的甲板上向總統揮手歡迎。不久後，邱吉爾首相和他的女公子奧立佛夫人(Mrs. Sarah Oliver)到昆西號上來午餐，奧立佛夫人在英國婦女補助隊裏工作，担任軍官職務。午餐席上我們一共有十個人，只籠統一般地討論到不久即將舉行的會議。但總統却把他要在返國途中訪問伊本沙特(Ibn Saud)國王討論巴力斯坦問題的計劃秘密告訴了邱吉爾首相。他要促成阿刺伯人和猶太人間的和平。邱吉爾給總統祝福，但他對總統這項計劃的成功似乎並不抱多大的希望。總統的計劃後來證明沒有能夠如願以償。

那天夜裏，總統第一次乘聖牛號(Sacred Cow)專機飛行。幾個月前我會勸總統去海德公園(Hyde Park)和溫泉(Warm Spring)時乘聖牛號去，聖牛號是造給總統使用的專機，機中安置了一個升降梯，可以從機上直落地面。總統告訴我他不喜歡飛行；他不喜歡老是單調地只看見雲。他不愛飛行的其他理由叫人格外驚異。他想爲了個人使用製造了這架專機已經花了不必需的費用。他說造聖牛號專機事先沒有和他商量，他對造這架專機是不同意的。常有人指責他是美國總統中耗費最多的一個，而上面的這一句話却是出自這位被指責者之口！

就我所看到的說，總統出席雅爾達會議事先可說是沒有什麼準備。在我們離開華府前的禮拜六是他第四屆連任總統就職的一天，前十天也一直是忙於約會。在昆西號上，總統，李海軍元帥和我有四五次通常是在晚餐以後討論到一些需要考慮的問題，特別是關於聯合國組織的建議。但直到我們在馬爾他上岸的前一天我才知道我們這回已帶來國務院所準備的一份極爲完全的檔案，包括國務院對於若干問題的研究和建議。我問總統國務院有沒有提供給他任何資料，他告訴我這些材料都由李格頓中尉(Lieuten-

ant William M. Rigdon)負責保管。後來我看到這些絕妙的研究資料中的若干件，那時我認爲沒有能在海行中一一研討真是一大憾事。我知道在旅途中沒有能研討這些資料是由於總統的身體違和，我還認爲只有羅斯福總統憑藉他對各項問題的深刻了解，才能像他這樣無何準備而把問題處理得這麼好。

國務卿斯退丁紐斯(Edward R. Stettinus)和我們在馬爾他會齊，他是乘飛機先去的。我們在馬爾他也看到霍浦金斯先生(Mr. Hopkins)，他那時正訪問倫敦，巴黎和羅馬。哈利(Harry，是霍浦金斯之名)在馬爾他臥病。他首先乘飛機往雅爾達，在開會期間他大部份時間不能起床。他的偉大勇敢使他能出席雅爾達會議的每一次會議，但一散會他就趕回自己房間休息。我們代表團團員在他房裏開會，因爲麥克英泰爾警官堅持要他睡在床上。

我們這一行在飛離馬爾他時，有些人惶然不安。我們的駕駛員對於沙基(Saki)方面的機場不熟悉，我們知道那裏下了大雪。從沙基越過山嶺到雅爾達的一段艱險行程，各方面的報道也有不同。此外還害怕斑疹傷寒症的傳染，因爲有人告訴我們說德軍在撤離那裏時會把毒蟲散遍各處。

這些憂慮全是基於低估了蘇聯人士爲了要表現他們的殷勤好客而異常的努力。沙基機場的跑道刷除得乾乾淨淨，沒有一點雪花。從機場到雅爾達有八十英里遠，路上沿途都有蘇軍駐守，其中有很多是女孩子——荷槍實彈的女兵。黎伐迪亞宮(Livadia Palace)好極了，我們的總辦公處在那裏，會議也在那裏舉行。黎伐迪亞宮是沙皇的夏宮，我們以前聽說德軍已把牠搶劫一空，搶走了那座堂堂宮殿裏的一切陳設，只留下兩幅畫。我們幸福的美國人所習慣的一些便利在黎伐迪亞宮雖然無從找到，可是蘇聯人士在會議舉行前三週才得到通知，他們已發揮了驚人的努力，把黎伐迪亞宮修理一新。

蘇聯招待人員導引我們去看爲我們所準備的房間，一面告訴我們當沙皇們住在黎伐迪亞宮時那些房間是做什麼用的。不久我們知道金氏海軍元帥(Ernest E. King)所住的一間是皇后的闈房。金氏海軍元

帥在雅爾達開會期間常把這事記着。

雅爾達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星期日）開始舉行，那正是盟國勝利大見轉機的時候。德國在西線的反攻攻勢受挫於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遍是血跡的雪地，盟軍正準備發動攻勢越過萊茵（Rhine）。蘇軍已開始在德國東疆推進，三個月後便攻下柏林。當時戰局的發展非常順利，有一次羅斯福總統和史達林元帥竟輕鬆地開玩笑說，他們不是要打賭蘇軍會在美軍克復馬尼刺以前首先攻入柏林。我們對雅爾達會議的主要目標是為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的頓巴敦橡樹會議（Dumbarton Oaks）建議竟致協議。但盟軍的迅速進展也需要對歐洲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加以迫切的考慮。因此，總統在徵得其團員的同意後就在雅爾達會議開始舉行時提出對「我們將如何處置德國」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的建議，總統的建議本是配合情勢發展的自然步驟。

史達林立即表明他想討論德國的投降條款，德國保持完整或把德國分成幾國的未來形式，賠償以及將一個佔領區分配給法國這幾項問題。

一九四四年秋，蘇聯會和法國臨時政府訂立友好條約。但在雅爾達會議中即時表明這項條約，和兩國外交代表因訂立該約而交換的友好辭令，對史達林元帥關於法國對戰爭所貢獻的意見，並沒有任何程度的改變。他認為法國在管制德國方面不應佔有地位，他說南斯拉夫和波蘭比法國更應該受到考慮。

當羅斯福和邱吉爾建議分配一個佔領區給法國時，史達林同意了。但顯然地他的同意只是因為法國佔領區將劃自分配給美國和英國的區域。他特別反對讓法國派遣一名代表出席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他無疑和莫洛托夫向總統表示的意見一致，莫洛托夫對總統說：「只能算是對於法國的一種善意表示，而不是因為她應該享有這種權利。」

「我贊同法國能分得一個佔領區，」史達林說：「但是我不能忘記在這次戰爭中法國開門迎敵。」

他認為讓法國分得一佔領區，派遣一名代表出席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但對那些比法國勇於作戰的其他國家，拒絕予以同樣待遇將會造成困難。他說法國不久將會要求由戴高樂（de Gaulle）參加三巨頭會議。

邱吉爾極力爭辯，贊成法國派代表出席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他說假如有關法國和法國佔領區的問題，沒有法國參加討論而加以決定，英國人民對於這種作法將不能理解。事實上不會如史達林所說的，法國將會因此而要求由戴高樂參加三巨頭會議。邱吉爾先生幽默不過地說，三巨頭會議是極不容外人加入的俱樂部，門票至少是五百萬士兵或是相等的其他事物。

然而史達林却憂慮會有這種要求提出。他說戴高樂將軍是「極不現實」的，他反覆強調指出，縱使「法國沒有打什麼仗，但戴高樂已要求和英勇作戰的蘇聯，英國和美國獲得同等的權利。」

羅斯福總統沒有和史達林談論到關於戴高樂的問題。總統非常敬佩法國和法國人民，但並不欽佩戴高樂。有幾次他提到在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和戴高樂的一次會談，戴高樂會把他自己和聖女貞德（Joan of Arc）相比，誇耀自己是法國的精神領袖，又把自己和克雷孟梭（Clemenceau）相比，說他本人同樣是法國的政治領袖。

羅斯福總統最初的意見是假如法國能分配到一塊佔領區，就不堅持讓法國能派代表出席盟國管制委員會。但在辯論進行時，總統表示他想要進一步考慮這一點，要求暫緩採取行動。第二天霍浦金斯先生，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我向總統表示法國應該出席盟國管制委員會，法國不能接受一佔領區而沒有代表出席盟國管制委員會，任何其他行動將大大地使法國感到羞辱。總統最後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後來他還勸史達林同意的意見，結果史達林也同意了。

和德國投降有關的主要問題產生於在德黑蘭（Teheran）談到的一項非正式建議，其中說歐洲的未來安全需要把德國分劃為若干個別的國家。

會中對於這項問題只簡單進行討論，但三國似乎都一般同意德國應該被劃分為若干國。史達林元帥認為應該將這項計劃告訴投降中的德國人。邱吉爾先生建議說牽涉的問題非常複雜，需要加以進一步的研討。總統接着建議由三國外長研討這一問題，在以後三十天內提出建議。

後來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中沒有能獲致協議，美國駐英大使威南特(John C. Winant)代表美國參加那次會議。霍浦金斯先生在同年五月下旬再訪史達林元帥，那時顯然地蘇聯的領袖已改變了他的意見，認定我們和英國反對劃分德國。他說雅爾達會議中顯然沒有商獲協議，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中英國會解釋克里米亞的討論並不算是一項積極的計劃，而是防範德國不良行為的約束而已。他建議這項問題由以後在波茨坦(Potsdam)舉行的三強會議去討論。然而到波茨坦會議舉行時，三國政府的想法已避開劃分德國的問題，這項問題在會中沒有發生。

雅爾達會議就德國問題進行討論的全部期間內，蘇聯代表團最注意的一點是賠償。

會議進行時，史達林元帥坐在莫洛托夫先生和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邁斯基(I. M. Maisky)的中間。邁斯基曾任蘇聯駐英大使十一年之久，在雅爾達會議中常給史達林傳譯並提供意見。蘇聯對於德國賠償的建議，就是邁斯基提出的。

「我們的計劃預料應該從兩方面要求德國的實物賠償，」邁斯基先生解釋說。「第一、取得德國的國有財富，也就是取得德國的工廠，土地、機械、機械工具、鐵路車輛，國外企業的投資和其他。第二、戰後十年內每年的實物賠償。」

他建議一切德國工業的百分之八十應該撤除，特別是鋼鐵，工程，金屬和化學工業。他說航空工廠，製造合成汽油的設備和一切其他軍事工業和工廠應該全部撤除。

「我所說的撤除是沒收，實際的移走，作為賠償物資用，」他強調說。

保留百分之二十的德國重工業將可維持德國的經濟生活，他說。一切賠償應該在十年內付清，遷移工廠和其他財富應該在兩年以內完成。有作戰潛力重要性的德國工業應該國際化，這些工業的董事會由三強代表組成，三強願意管理這些工業好多年就多年。

邁斯基先生說，賠償只應付給那些直接遭受物質損失的國家，如工廠，土地和住所的損害以及國民私有財產的損失。由於這類損失太大，他建議由獲得賠償的國家間規定一種優先順序制度，以各國對於戰敗敵人獲得勝利的貢獻以及各國直接物質損失的價值為根據。

他又說賠償應該規定為二百億元，蘇聯所得部份應該不少於一百億元。

邱吉爾先生首先答覆邁斯基先生的聲明。他回想到聯合王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驗。

「經過的情形是很令人失望的，」他說。「費了很大的困難才從德國得到約十億鎊，假如不是美國在同時貸給德國一筆更大的款項，這筆賠款是永遠不會從德國得到的。」

「適當程度地遷移德國的工廠是一個適宜的步驟，」他說，「但我確信只就蘇聯一國說，你將永遠不能從殘破的德國每年得到約二億一千五百萬鎊這樣的數額。」他敘述英國的損失和極重的債務，還提到在分配賠償時必須加以考慮的其他國家所遭受的重大損失。

「第二，」邱吉爾先生接着說，「我的腦海中湧現着一個絕對飢饉德國的幽靈幻影。」

「假如我們對德國國內經濟的處置是使她八千萬人民實際上飢餓無食，我們將無動於中地說『這樣對你們好，』還是我們將得幫助他們，讓他們活下去呢？假如是這樣，這個負擔又由誰去肩負？……如果果你有一匹馬，你要牠拉車，那麼你必須要給牠相當數量的玉米——不然至少要給草料吃」。

「但必須不能讓馬踢你，」邁斯基先生頂了一句。

邱吉爾先生換轉話題，再舉一個不踢人的東西的例子，他說：

「假如你有一輛摩托車，你必須要給牠加上相當數量的汽油好讓牠向前開動。我贊成設立一個賠償調查委員會研討這項問題，目的是有理性地獲得我們所可能得到的一切東西。」

羅斯福總統在表明美國立場時指出在下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會貸給德國幾十億元，他強調說，「我們不能讓那種情形再又發生。」

「我們能夠不要任何德國人力，」總統說。「我們不要任何她的機械，工具，或她的工廠。在美國的若干德國資產將可和德國所應給美國的相抵銷，但這些資產的總額將很有限。」會後我告訴總統說，德國在美資金價值的最可信的估計在一億五千萬元，無論如何不會超出二億元。他後來就用這些數字指出和其他國家比較，我們所可得到的是怎樣的少。

總統在會中說美國人民要德國人生活下去，但不希望他們比其他國家，如（蘇維埃共和國）的生活水準高。他強調說美國在戰事結束後財政情形將很壞，我們將沒有錢送到德國，在糧食和衣住方面進行接濟。

「我所能說的是我們將在一個極不好的局勢中作我們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總統說，末了他說我們將支持蘇聯所建議的，設立一個賠償委員會。

史達林元帥接着參加討論。「上次困難的基本所在，」他說，「是要德國賠現錢。這樣一來，發生了德國馬克兌換外國貨幣的問題。這是賠償發生障礙的原因所在。」

史達林元帥主張負作戰重担的三強在賠償方面應享優先權。他說必須要承認「和我心目中的三強比較起來，法國並沒有任何犧牲。」他接着發表他的意見說，「法國現在參加作戰的有八師軍隊，而波蘭盧布林政府（Lublin Government）參加作戰的軍隊有十師。」無疑地，他對一國政府為本身權益而發言申述的看法是受了一國政府軍隊數額的影響。有人說在雅爾達會議中當提到教皇的意見時，史達林會說

過「他有好多師軍隊？」這樣一句話。史達林元帥在雅爾達會議中並沒有說過這句話。不過這却是他時常應用的衡量標準。

史達林在結束他的聲明時提出一項建議，主張要決定一下，賠償是否應該以對作戰的貢獻或是以所受的損失為基礎，或是兩方面都加考慮。羅斯福總統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會發表聲明，總統的這項聲明仍然是我們和俄國人士之間發生誤會的來源。總統說賠償委員會「應該在進行初步研討時以蘇聯政府所提賠償總額應為二百億元，而其中百分之五十應該給予蘇聯的一項建議作為討論的基礎。」

這一句話後來載在雅爾達會議議定書中，這項文件是由一個負責記錄會議中所商得的協議的委員會準備的。會議議定書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送給與會三國政府領袖最後批准，議定書還包括一項聲明，其中說賠償委員會可以考慮「使用人力」作為賠償的一種可能來源。會議席上並沒有討論到這一項建議，總統只會順帶提到一句，他說美國「不能取用人力，各蘇維埃共和國却能夠。」後來我知道關於使用人力的這一句話是蘇聯代表邁斯基先生加進去的，後來獲得其他代表團的同意。無論如何，在我離雅爾達的時候對於這一件事並不知道。假如我那時知道，我會已請總統反對在會議議定書中載入使用大量人力作為強迫或奴隸勞役的任何規定。賠償委員會後來所草擬的方案沒有包括「使用人力」的規定。但我要很歉然地說德國人和日本人現在仍由盟國拘留，當作勞工使用。

雅爾達會議以後的期間中，盟軍從東西兩面向德國節節攻進，盟方配合作戰的空軍和砲兵將德國的城市轟炸成廢墟，在這樣的情況下已非常明顯對邱吉爾首相所說的一點難以提出適當的答覆，邱吉爾首相說德國將不能為她在各個盟國使其人民所受的一切損失對盟國付出賠償。

和賠償問題密切有關的是規定波蘭疆界問題。羅斯福總統在討論開始時說美國認為波蘭的東部疆界應該一般依照所謂寇松線（Curzon Line）的規定。他說他仍然抱持他在德黑蘭會議中所發表的意見，

他認為不妨調整寇松綫的南端，好讓羅夫城（Lwow）和至少有一部份油田都被劃入波蘭領域以內。

邱吉爾首相指出他在議會中會支持寇松綫，並支持由蘇聯保有羅夫城。他說，蘇聯對羅夫城的要求「是不基於力量而基於權利的要求。」但如蘇聯願照羅斯福總統的建議而對「一個實力遠為薄弱的國家作一慷慨大度的表示」，英國「自將敬佩並感讚蘇聯的立場。」

史達林元帥隨即發表感情流露的聲明，提出答覆。

「寇松綫是寇松（Curzon 前英國外相），克雷孟梭（前法國總理）和美國方面代表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會議所商訂的疆界，」史達林說。「俄國人沒有接到邀請，也沒有參加會商。……列寧對於寇松綫是不同意的……現在有些人要我們比寇松和克雷孟梭更不像是一個俄國人。你們要迫使我們蒙受羞辱。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將要怎樣說呢？他們會說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遠不及寇松和克雷孟梭是俄國可靠的捍衛者。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地位並坦然無隱地回到莫斯科。」

說到這一點時，史達林起立發言，在整個會議期中，史達林情緒表現得這樣激動，這還是第一次。「我甯願戰事再繼續下去一些時，雖然我們要為這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讓波蘭在西方從德國得到補償，」他接着說。「我將保持這種見地，並將要求一切友人在這方面支持我……我贊成擴展波蘭的西部邊界到尼塞河（Nisse River）」

邱吉爾先生懷疑把波蘭的西部疆界擴展到尼塞河是不是好。他同意波蘭的西部疆界應該伸進本屬於德國的領土，但他指出「把波蘭這隻餵滿德國食物，因為喂得太滿以致消化不良而死，那將是件憾事。」他估計取得西面遠及奧得河（Oder River）東普魯士（East Prussia）的領土將須遷移六百萬德國人民。史達林抗辯說數目將遠比這要少，因為「我們的軍隊到了那裏，當地的德國人就逃跑了。」

邱吉爾提醒他必須考慮到「那些逃跑的德國人在什麼地方，」他接着問，「那些逃跑的德國人在

剩餘的德國境內有容身之所嗎？」

邱吉爾私下對我發表他的意見說，在尼塞河劃界也就等於要遷移近九百萬的德國人。他說這樣一個數額，永遠不是所剩餘的德國所能收容得了的。

這方面的討論歷時長久而切實，但史達林最後在原則上接受了寇松線，下面關於波蘭疆界的一段相當含混的聲明被通過載入會議記錄：

「三國政府領袖認為波蘭的東部疆界應該依照寇松線，在若干區域可作五英里至八英里有利於波蘭的移動。三國政府領袖認同波蘭在北部和西部必須獲得面積可觀的領土讓予。三國政府領袖認為關於這些讓予的程度應該在適當時期內徵詢新的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的意見，三國政府領袖認為波蘭西部疆界最後定界應該留待和會決定。」

不單是波蘭的疆界，波蘭的本身也是整個會議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所耗費的時間比任何其他問題為多。由於辯論的激烈，羅斯福先生所居的地位與其說是申辯者，毋寧說是公正人，雖然他和邱吉爾首相一致主張在華沙建立一個新波蘭政府。

在另一方面，蘇聯希望繼續保持盧布林政府。史達林願意加添幾個人，但他要確定那些加添的人不影響到蘇聯對於波蘭政府的控制。

羅斯福總統說他贊成的波蘭政府是能因建立了一個全國統一的政府而消除一切政治歧見，他所贊成的波蘭政府是能代表一切政黨的政府。他認為這樣的一個政府應該是臨時的，應該認為建立一個永久性政府是牠首要的責任。他說美國願意波蘭和蘇聯保持友好關係，他認為假如會中同人能夠解決波蘭問題，他們建立世界和平的工作就會因此而較易着手。

「英國，」邱吉爾首相說，「對德宣戰是為了波蘭的自由和主權不受侵害。世人都知道我們所擇取

的是怎樣恐怖的冒險，不僅英帝國而且是整個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命是怎樣千鈞一髮，幾乎爲此而斷送犧牲。我們對波蘭的關切是榮譽的關切。我們既已爲波蘭拔刀相助，抵制希特勒的殘暴攻擊，我們自永遠不能滿意於任何不能使波蘭成爲一個自由和獨立主權國家的解決。」

他重申羅斯福總統所表露的友情，他說波蘭應不能「自由懷有對蘇聯人民和平和安全不利的敵對企圖。」

邱吉爾先生明白指出由於兩個波蘭政府繼續存在所產生的危險。他主張對於進行自由選舉應作規定，同時可對蘇軍交通綫的安全提供有效的保證。

史達林的答覆流露無限熱誠，他說：

「就俄國人民說，波蘭問題不僅是榮譽的問題，而還是安全的問題。有史以來，波蘭一直是敵軍假道進攻俄國的走廊。過去三十年中，我們的敵人德國人兩度越過這個走廊。爲了俄國的利益，波蘭應該強大有力，能夠憑藉自己的實力關閉走廊；波蘭必須要能自由和主權獨立。因此，就蘇聯國家說，這不僅是一個榮譽問題，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在以後的每次討論中，蘇聯政府總是憑藉這種論點爲她在波蘭的行動辯護。他們對於一個友好政府的觀念是這個政府要在她整個控制之下。盧布林政府適合這種條件，史達林不願意和其他政黨的代表作任何洽商。後來我和莫洛托夫先生談到這個問題。我沒有能使他同意我的意見，我告訴他蘇聯的安全在下述的情況下更可確保，就是波蘭的人民對蘇聯表示友好，這要比波蘭政府因爲受命於蘇聯而不得不親近蘇聯要好得多。我還說政府是時而上台，時而下野的，但如蘇聯政府在波蘭的行爲能博得人民的友情，波蘭政府的對蘇友好自也不成問題。莫洛托夫沒有同意我的意見。

就在波蘭問題進行初步討論後，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信給史達林，建議華沙和倫敦的兩個波蘭政府

的代表和沒有參加上述兩個政府在波蘭國內的若干政黨的代表進行會商考慮組織新波蘭政府。這一封信成爲以後討論的基礎。與會人員對於總統的建議辯論了若干天。最後他們同意一項宣言，這項宣言除其他各點外，規定如下：「現在波蘭執行職權的臨時政府因此應該在更廣大的民主基礎上改組，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這個新政府組成後應定名爲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

會中指定由莫洛托夫先生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先生和英國駐蘇大使卡爾（Sir Archibald Clark Kerr）組織一個委員會首先在莫斯科和盧布林政府人員，波蘭國內的民主領袖以及國外的波蘭人士會商，目的是依照前列的方針改組政府。

宣言保證臨時政府依據普選和秘密投票基礎在最早可能期內舉行自由和不受拘束的選舉。

當與會人員接近我們所認爲對這個煩雜問題所商獲的協議時，羅斯福總統提出詢問說：

「你們認爲需要好久才能舉行自由選舉？」

「一個月以內，」莫洛托夫先生答覆他。

波蘭的選舉實際是在二十三個月以後，也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舉行，這個選舉就我們的標準說是不「自由」的。

在我們到達雅爾達的那天，我首次知道國務院已準備了關於被解放區域的政策宣言草案。總統不喜歡這件宣言草案，但宣言草案給我的印象很深，於是我就加以研究，看看能不能把牠修正以使總統感到滿意。和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以及其他國務院官員進行諮商後，準備好一件草案，總統對於這件草案表示贊同。

宣言提到「大西洋憲章的一項原則——一切民族有權抉擇其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民族中有被侵略國家以強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者應恢復之。」

宣言還有下列的聲明：

「三國政府爲造成被解放人民可以執行這些權利的環境，當對於她們所認爲其情勢有此需要的任何歐洲被解放國或歐洲前軸心附庸國，協助其人民：（一）建立內部和平的情況；（二）執行緊急措施救濟難民；（三）建立臨時政府，這些臨時政府要能廣泛代表國內人民中的一切民主份子，並保證儘速經過自由選舉而建立能應合人民意志的政府；（四）在需要的地方便利選舉的進行。」

三巨頭在這方面迅速商獲協議。至少，我們以爲三國的意見已經一致，但從那時以後，蘇聯人士和我們對於協議的適當解釋一直發生歧見。

建議的討論很短暫。史達林首先發言說「就整個說，我贊同這件宣言。」

羅斯福總統請注意包括「在需要的地方便利選舉進行」這項協議的一節，史達林迅速答覆說「我同意那一節。」

「波蘭將是根據這項宣言而採取行動的第一個例子，」總統說：「我希望波蘭國內的選舉毫無問題，有如凱撒（Caesar）的妻子一樣。我對凱撒的妻子並不知道什麼，但一般認爲她是純潔的。」

史達林含笑地回答說：

「一般對於凱撒的妻子是這樣地說，但事實上她有一些罪過。」

我真希望凱撒夫人的罪過要少於在我們看來這項宣言被違反的次數才好。在我看來，參加協議各方的意願似乎是有問題的。我們認爲這是向前邁進一步。但事實證明這一步走得很躊躇。

當協助三國外長從事草擬工作的人員協議在宣言中包括一項聲明（指出三國政府，在牠們判斷下情勢需要的地方將進行若干工作）時，蘇聯人士在不愛採取行動的時候就會說出——事實上他們很多次都是如此——在他們的判斷下，情勢並不需要採取行動。

美國人民熱烈地歡迎這項宣言的公佈。社論作者反應良好。從雅爾達會議結束直到今天，這項宣言始終是蘇聯和我們之間的衝突來源。但這也是我們藉以對世界證明蘇聯在東歐的行動已違反她自己所作諾言的基礎。就這方面說，雅爾達會議的宣言是有用的。

一九四三年十月，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去莫斯科時會帶去首次提出的一項建議，那項建議最後發展為建立聯合國組織的頓巴敦橡樹會議計劃（Dumbarton Oaks Plan）。他和總統相信在戰事仍然進行中的情況下獲得關於和平組織計劃的協議將遠為容易。他們的見解是如何的正確！

頓巴敦橡樹會議在一九四四年秋天開會，當時所剩下沒有解決的唯一主要一點是安全理事會中的表決方式。蘇聯代表團堅持安全理事會的一切決定必須要獲得各主要大國的一致表決。我們同意假如沒有獲得我們的同意就不能作涉及使用我們軍事力量從事行動的決定，但我們不相信否決權可以施用於一切事項方面。

我們最後提出一項折衷辦法，我們希望蘇聯方面能夠同意接受，總統在十二月五日直接把這項方案送達史達林元帥。同時美國國務院也準備了長篇聲明解釋並支持總統的建議，這件聲明會由國務院送達駐於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領和英國大使館。

我們為要適應蘇聯所堅持的在一切問題方面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的表決必須一致的一項主張，因而建議計劃內關於安全理事會的一章中的第二項（涉及安全理事會的表決程序者）應指出除去一點外，一切決定將需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致表決，例外的一點是在關於涉及促進和平解決爭端方面的決定，安全理事會的一常任理事國假如是所討論的爭端的一造就沒有投票權。我們相信這類案件具有類似司法的性質，在一個基於法律之下一律平等的原則的組織中沒有一個國家應該被置於法律之上。但在可能需要使用武力的決定方面，我們認為應該讓常任理事國居於特殊地位，因為她們將須肩負採取此類行

動的主要責任。

在會議的第二天，國務卿斯退丁紐斯正式提出我們的建議，總統當時要求即時對這項建議加以考慮。總統在支持這項計劃時提到三國政府領袖在德黑蘭會議中所商獲的協議，三國政府領袖在那項協議中宣稱：「吾人充份認識吾人及所有聯合國家建造和平之最高責任，此和平將獲得全球絕大多數人民之擁護，並在未來許多世代，驅除戰爭之禍患與恐怖。」

關於美國建議提出後，雅爾達會議中對於此方面問題交換的意見，各方面的報道不同，一九四七年春蘇聯和英國代表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討論否決權和否決權與原子能管制的關係時，就會提出這方面相互衝突的報告。因為這個緣故，並因為否決權仍然是聯合國機構中最糾纏的問題之一，我在這裏提出我在雅爾達會議中當與會者對於否決權發表意見時，所作遠為記錄的主要部份或許是會引人注意的。

美國是建議的起草人，她已明白表明她的立場，因此所交換的意見幾乎完全是出自邱吉爾首相和史達林元帥。下面是他們二人所交換意見的記錄。

邱吉爾首相：「世界和平有賴於三強的持久友誼，但英政府認為假如我們使自己居於想要統治世界的地位，而我們的願望却是要為世界盡責並保護世界不再身受世界人民大眾所已身受的駭人恐怖，那麼我們將使自己處於一種錯誤的地位。我們應在所已闡明的限度以內廣泛顧從世界的輿論。我們應有權利針對中國所提出的任何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舉例說，如香港問題。假如我們不認為交還香港是應當做的事，我們就不能被要求將香港交還中國，這是不成問題的。在另一方面說，我認為假如中國沒有機會充份申述她的意見，那也是不對的。同樣地，假設埃及以英國為對象提出一項有關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問題，如她已作暗示者，我也將聽從這項聲明中所概述的一切程序。我將這樣做而無所恐懼，因為假如我決定使用否決權，我們的否決權就可以制止採取行動，在這樣情況下，英國的權利依據第三

項的規定將可保持無損。

「總統先生，假如阿根廷提出一項問題反對美國，我料想美國將遵從最後五項中所列舉的一切程序，並對這個問題不作表決。然而，美國關於依據第三項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可以提出她的基本反對的意見。」

「英王陛下政府依據本身觀點認為可以坦然贊同美國所提的建議。我們看到三強不居於統治世界一切其他區域甚至不讓牠們聲述意見的統治者的地位，是有很大利益的。以我們擁有強大實力的國家，來採取那樣的地位，不讓世界一切其他區域獲得申述牠們意見的權力，一面在缺少第三項中所規定權力的情況下採取措施解決困難，對於我們是不當的，假如我們不對安全理事會中我們的朋友和同僚表示信服，我們所依賴的正是第三項所規定的權力。」

史達林元帥：「我願意能研究一下這項文件，因為只聽她讀過難於得到任何結論。我想頓巴敦橡樹會議決議的目標不僅是使每一國家有權發表她的意見，同時任何國家如就某項重要問題提出一項問題，她的目的是要就她所提出的問題得到決定。我相信與會同人沒有一個會反對聯合國大會的每一會員聲述意見的權利。」

「邱吉爾先生以為中國如提出香港問題，她只要能在大會中發表意見，就會滿足。邱吉爾先生可能錯了。中國將要求對她所提出的問題作一決定，埃及也將如此。埃及如只提出意見說蘇彝士運河應該交還埃及，她是不會感到多大滿意的，她將要求對於這項問題有所決定。因此，問題比只發表意見還為嚴重。我還要求邱吉爾先生指出是那些大國可能想要統治世界。我深信英國不想統治世界。因此英國已不在被猜疑之列。我深信美國也不願這樣做，因此在有意想要統治世界的強國中又除去了一個。」

邱吉爾首相：「可以讓我回答嗎？」

史達林元帥：「請等一下。各大國將在什麼時候接受那些將使她們不受別人指責說她們想要統治世界的條約呢？我要研討一下這項文件。目前我對這項文件不大清楚。我想這是一個比一個大國表明意願的權利或是某個強國想要統治世界的願望更為嚴重的問題。」

邱吉爾首相：「我知道在出席這次會議的三強領袖的領導之下，我們可能感到安全。但這些領袖可能不會永遠活在這個世界上。十年之間我們可能消失無蹤。新的一代繼起，他們沒有經歷戰爭的恐怖遭遇，或者會忘記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我們願意至少能確保五十年內的和平。我們現在必須建立這樣一種形勢，這樣一項計劃，使我們可以對那互相鬥爭的後一代盡量地予以阻礙。」

史達林元帥：「我想我們的任務是確保未來我們的團結，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就一項最能適合上述目的的條約商獲協議。未來的危險是我們本身間衝突的可能性。假如能夠團結，由德國方面產生的危險就不會大。現在我們必須思考我們怎樣能夠建立一種情勢，在這種情勢中，這次與會的三強，還有中國——」

邱吉爾首相：「——還有法國。」

史達林元帥：「是的，我們將保持一條聯合陣線。我必須對會議抱歉。我一直忙於其他事情，沒有機會詳盡研究這個問題。就我所知美國建議案的內容，一切衝突現經分爲兩類——衝突的一類是需要軍事性質的制裁的；另外一類包括可用和平方法節制而無需軍事制裁的衝突。因此我知道，在考慮兩種衝突時，所希望的是首先要對衝突進行自由討論。我也知道，在考慮第一類需要軍事制裁的爭端時，身爲爭端一造的常任理事國有表決權。但在第二類可由和平方法節制而不需要制裁的衝突，爭端的一造不得表決。」

「我們被人指責對於「怎樣表決」的程序過於重視。我們是有罪的。我們非常重視表決問題。一切

問題都由表決決定，我們所注意的是決議而不是討論。假設中國是一個常任理事國，要求把香港交還給她。我可以確告邱吉爾先生中國將不會孤立無援。她們將在聯合國大會中有若干朋友。如前所說，假如埃及提出要求，情形也將會和中國一樣。」

邱吉爾首相：「我可以說『不。』我將有權說假如我們仍然不信服，世界安全組織的權力就不能被用來對付我們。」

史達林元帥：「還有另一種危險。我在莫斯科的同樣不能忘記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時所發生的一件事，那時英國和法國曾經利用國際聯盟反對我們，最後開除我們並孤立我們。」

邱吉爾首相：「我完全滿意史達林元帥之能有充足時間研究這項建議。」

我深深為下面的明顯證據所困擾，史達林明白顯示了他對我們關於安全理事會中表決程序的建議沒有加以考慮或甚至沒有看過，雖然我們在十二月五日就已把這項計劃書經由外交航空郵遞送達給他。那天是二月六日，我想假如在那六十三天中沒有認識這個問題，他就不會對聯合國組織發生很大興趣。美國的建議是議程中的唯一建議案，而史達林竟沒有把牠完全弄明白，這使人印象更深。第二天會議中莫洛托夫先生宣佈蘇聯接受我們的建議（這項建議後來在舊金山會議中通過，大體上是一樣，）但這並沒有消除我的顧慮。

關於聯合國的討論隨後轉移到什麼政府應該成為聯合國會員一點。下面是談話的紀錄：

史達林元帥：「我有一張對德宣戰國家的名單。這就是說她們是聯合國大會的未來會員。在這些國家中有十個國家和蘇聯沒有外交關係。（這十個國家大部份是南美共和國。）我們將要和她們會集一堂建立國際安全。然而我們怎能和那些和我們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協力建立國際安全呢？或許會議會討論到這項問題。」

羅斯福總統：「我想她們大部份都願意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不過只是還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罷了。同時有一點要承認：那些還沒有承認蘇聯的國家中有大部份已同蘇聯的代表在布里敦森林會議（Breton Woods Conference）以及在其他地方舉行的會議會集一堂。」

史達林元帥：「那倒是對的。但和那些不想和蘇聯有任何往來的國家協力建立國際安全是困難的事。」

羅斯福總統：「我想和她們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方便途徑是邀請她們。這整個問題牽涉到過去一件舊事，在這裏應該把牠說明一下。」

「四年前，美國代理國務卿威爾斯先生（Mr. Welles）告訴南美洲各共和國說她們並無需對德國宣戰，但得和她斷絕外交關係。因此有五個或六個南美共和國認為她們應該被邀請，理由是她們在那時已經接受美國的勸告。這件事一個月前我才知道。因此，我會給這六個共和國的總統寫了一封信，對他們解釋假如他們想要參加聯合國會議，她們就應該對德宣戰。我想其中一個國家，厄瓜多爾（Ecuador）已經這樣做了，但還沒有機會在聯合國宣言（Declaration of United Nations）上簽字。巴拉圭（Paraguay）將在一個禮拜或十天內這樣做。祕魯（Peru）和烏拉圭（Uruguay）不久就將宣戰。結果是假如她們在宣戰後而不能參加未來的會議，那就有點不好辦了。坦白地說，這是威爾斯先生的錯誤，他沒有勸告她們宣戰，只建議她們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

「同時所有這些國家曾經幫助我們進行作戰。大量製造軍火的原料是她們供給的。結果是，我現在處於困難的地位。」

「除去那些簽字的國家外，還有少數的協合國（Associated nations），她們會和我們合作。她們會和敵國斷絕外交關係，但沒有宣戰。」

史達林元帥：「阿根廷 (Argentina) 怎樣？」

羅斯福總統：「阿根廷不在內。」

史達林元帥：「但阿根廷會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

羅斯福總統：「但沒有承認她是一個協合國。」

史達林元帥：「我不是袒護阿根廷。我不喜歡她；但我確實願望沒有邏輯上的矛盾情形存在。假如我們邀請那些宣戰的國家以及那些和敵國斷絕關係的協合國，那麼就還好像阿根廷這一類的國家。這是說土耳其和若干其他國家會要來。我想會經對敵宣戰的國家對那些沒有宣過戰，却一直抱着騎牆態度推測那一方面會勝和一般地說行爲不夠正直明瞭的國家是不會感到舒服的。」

羅斯福總統：「我的看法是只邀請那些會經協助我們的協合國，唯一條件是只要她們宣戰。」

史達林元帥：「她們應該在什麼時候採取行動呢？」

羅斯福總統：「立刻。給她們一個時間限制。」

史達林元帥：「我看，三月一日。」

羅斯福總統：「好，三月一日。」

邱吉爾先生也同意這項解決辦法，他舉例說土耳其一直到現在始終保持中立，她會被鼓勵採取這種立場。史達林元帥雖然有點勉強，但對這點也同意了。

莫洛托夫先生在宣佈蘇聯接受羅斯福總統所提關於安全理事會中表決程序的建議後，立即表示希望白俄羅斯 (Belorussia)，烏克蘭 (Ukraine) 和立陶宛 (Lithuania) 能被准許參加聯合國。他說，無論如何，他希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能被准許參加。史達林元帥也提出有力的要求以支持這項建議。

邱吉爾首相支持蘇聯的要求，他說，「我同情白俄羅斯，她英勇犧牲，打倒強暴。」

羅斯福總統不願意贊同，但在國際組織問題仍未決定的階段也不願意直接對邱吉爾和史達林表示反對，他因此聲明說：「不列顛帝國在她的各自治領如澳洲，加拿大和南非有衆多人口。蘇聯政府有和上面所說的三個自治領同樣衆多的人口。美國沒有殖民地，但有衆多的人口，巴西比蘇聯小，但在面積上大於美國。有許多國家人口很少，如開都拉斯(Honduras)和利比里亞(Liberia)。我們必須研究一項問題：是否有任何國家應當獲得一個以上的投票權。我不想打破一國一票的原則。因此，我們可以決定關於舉行會議組織國際機構的一般性計劃，然後在那次會議以前通過外長，或是在那次會議中，我們可以決定這些問題，我將願意提出這些問題來討論。」

關於這一點會中沒有異議。因為我極力反對應允蘇聯的要求，我想總統已做了一件可以稱道的工作，我們也可能不再聽到這項建議了。但在第二天下午舉行的會議中，總統開始宣讀他剛接到的外長會議的一份報告，其中說：

「第二節規定將由雅爾達會議決定聯合國組織基本會員國的名單。那時聯合王國和美國的代表將支持准許兩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基本會員國的建議。」

這件報告得到各方面同意。

我後來知道在外長會議中艾登先生(Mr. Eden)一心想確定不列顛聯合國各單位，包括印度(她還不是一個獨立國)都能參加聯合國，他同意了莫洛托夫先生所提關於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投票權的要求。斯退丁紐斯先生也同意了這項規定辦法。國務卿在外長會議開始進行時會就這件事對總統有所陳述，總統後來宣佈宣一點，三國政府的領袖也對此表示同意。

這項協議使我驚異，在我看來，這是很不聰明的。會後我向總統說明了我的意見。我提醒總統，在我們離開華盛頓前，他會告訴若干參議員假如史達林建議使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入會，他就將堅持美國四

十八州都成爲聯合國的會員。事實是各蘇維埃共和國並不比美國聯邦各州獨立。

我把過去的事情告訴總統，我告訴他反對國際聯盟的人是怎樣振振有辭地聲述他們的意見，他們指出英國因爲有自治領的緣故，將在大會中有五個投票權，而我們只有一個。我們國內人士後來知道自治領是獨立的國家，時常抱着和聯合王國不同的意見，但蘇維埃共和國的情形並不如此。我怕反對聯合國的人可能利用分配蘇聯三個投票權一點將和反對國聯的人依據他們的論據在二十六年前反對英國投票權同樣地有聲有色。我請總統至少要求美國也可獲得和蘇聯等量的投票權。總統怕爲時已晚，但他說將對這點加以考慮。

我告訴霍浦金斯說，最低程度我們應該從史達林和邱吉爾獲得這樣一項協議，我們以後運用不運用這種權力那是另一問題，霍浦金斯對我的意見表示同意。他後來和我一同勸請總統撤回他關於兩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協議，否則蘇聯就需同意美國也應該獲得三個投票權。總統最後告訴我們他將把這項意見向史達林元帥提出。在我們留在雅爾達的最後一天，那是二月十日，總統寫了一封信給史達林元帥，信中說：

「我相當顧慮恐會被人指出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中將只有一個投票權。因此，假如我要保證擁有美國國會和人民對於美國參加世界組織的衷心支持，我或者必須要求增添美國在大會中的投票權，以使美國得到同等的待遇。

「在我面臨這一問題以前，我願意知道假如我需要在未來會議提出有如前述的建議時，閣下不會反對，並將支持這項建議。」

第二天史達林元帥告訴總統他完全同意總統的意見，「因爲蘇聯的投票權既然因爲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的加入大會而增加到三個，美國的投票權也應該增加。」

「美國投票權的數額可能增加到三個，和蘇聯同她的兩個基本共和國一樣，」他說，「如果必要的话，我準備正式支持這項建議。」

羅斯福總統也會詢問邱吉爾的意見，邱吉爾說他將支持總統爲求美國和其他國家同享一律待遇而提出的任何建議。

當我抵達華盛頓時，白宮的地圖室（Map Room）裏已放着一封給我的下列電報：

霍浦金斯先生致貝爾納斯法官。

「總統關於美國在必要時爲求美國和其他國家同享一律待遇而要求增加投票權一點，已獲得邱吉爾首相和史達林元帥完全滿意的答覆。這整個問題公報中一點兒沒有提到，因爲這個緣故，總統非常希望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方面就是在私人談話中也不要提及」。

我料想總統有某種極好的理由不願意人家討論此事，因而接受了他的囑咐。

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後來決定不在舊金山會議中要求履行同意我們和蘇聯獲得同等投票權的協議。他沒有再和我討論到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他已改變了原來的意見。我承認一般民意對於蘇聯有三個投票權而我們只有一個投票權一點的反對並不像我預期中的那麼厲害。然而我認爲我們應該在舊金山會議中堅持我們在雅爾達會議所商得的協議。那時和現在我都認爲小國們會反對蘇聯和美國的要求的。假使如此也是正當的，結果蘇聯和美國政府只會有一個投票權。假如這樣那真可說是最好的解決。

讓蘇聯得到三個投票權，我們已樹立了先例。蘇聯人士是不忽視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先例的。如在巴黎和平會議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與會的會員。她們將要求在任何其他會議中獲得會員的資格。這是說蘇聯有三個發言權和三個投票權。她們從不忘運用三個發言權或三個投票權。

巴黎和平會議對兩項建議得到了協議，一種只需要大多數表決，另一種需要三分之二票數的表決。

蘇聯代表宣布在外長會議中，他們將不考慮任何少於三分之二票數表決而通過的任何建議。

參加和平會議的有二十一個國家。因此一項建議如有八票反對就不能獲得三分之二的通過。當蘇聯代表反對一項建議時，由於他們本身一開始就已有三票，所以要湊得八票是輕而易舉。設若蘇聯只有一票，或設若美國依照雅爾達會議的協議能夠得到三票，那麼得到十三票（比三分之二少一票）的許多建議都會已經通過了。

後來我又知道雅爾達會議中還有一項協議。這是一項「極機密」的議定書，其中協議由於蘇聯同意參加對日作戰，同意以千島羣島(Kurile Islands)「交予」蘇聯，作為交換條件。該議定書並且規定「恢復一九〇四年日本奸詐攻擊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所享的權利」，此外還規定歸還庫頁島(Sakhalin Island)南半部，開放大連港為自由港，允許旅順口為蘇聯海軍根據地，中蘇共同經營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美國利用她的力量使中國同意關於中國那一部份領土的規定。

我不知道這項協議，但原因是可以了解的。那是我並不是國務卿，國務卿是斯退丁紐斯先生。

因為華盛頓方面發生了一些問題，總統希望我和金氏海軍元帥一同回去，金氏海軍元帥定於二月十日正午離雅爾達。我們預料會議將在那晚結束，總統將在第二天啓程返國。但那天下午，史達林要求總統多留一天。他說他們不能完成他們的工作，他希望討論一下他認為重要的若干問題。總統同意了他們的要求。關於千島羣島的協議是在三巨頭的祕密會談中，而不是在會議席上所商定的，包括上述一件在內的若干議定書是在二月十一日簽字。那天假如我在雅爾達，可能我會知道這些事。

總統返國後，他沒有對我提起這些事，草約鎖在白宮他的保險櫃中。初夏時我知道總統已致力勸請中國關於旅順口，大連和鐵路各點有所讓步，但直到我就任國務卿後若干時，因為看到從莫斯科發出的的一項新聞報道，我才着手調查探悉整個協議的真相。我向杜魯門總統提起這一件事，他於是請李海軍

元帥 (Admiral Leahy) 把那些存在白宮關於和外國政府商得協議的文件移送國務院。我要知道一共有好多諾言還待兌現。

在考慮羅斯福總統所簽訂的這些太平洋協議是否聰明時，人們應該公正地去考慮作諾言時的環境。那是當德軍在西線發動有力反攻後的六個星期。當時盟軍在東西兩方雖有進展，但總統和任何其他的人在那時都不知道德國將能撐持好久，和在德國投降以前我們將遭受多少犧牲。總統在雅爾達開會時，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Joint Chiefs of Staff) 的官員也在那裏。他們知道當時的情勢。

證據明白指出上述的協議大部份是一項軍事性的決定。軍事領袖們已經致力進行他們所擬的進攻日本的計劃。他們無疑已向總統提供他們的估計，蘇聯參戰的話，我們發動這個攻勢將需犧牲多少兵力，蘇聯如沒有參戰，我們的犧牲將是多少。他們自然希望蘇聯參戰，在北面對付日軍。但史達林一旦知道我們的攻勢計劃已在進行，他也就知道我們將需要他的軍隊，因此他能為他的軍隊提出更多的要求。史達林先生對於提要求是沒有什麼怕難為情的。

對於羅斯福總統把協議保持秘密一點也不應該加以指責。蘇聯和日本訂有條約，我們不能宣佈蘇聯要和日本宣戰。而且，蘇聯的軍力那時集中在對德作戰。對協議作任何暗示將會促使駐在蘇聯邊界的日軍發動入侵的攻勢。同意蘇聯在德國投降後九十天調遣歐洲戰線的軍隊對於我們大家都有利益。因此史達林元帥和羅斯福總統所以希望保持嚴格秘密是很可了解的。

會議快要結束時，史達林元帥招待與會同人晚餐。當時報章引述參加宴會的一位美方人員的談話說，席間舉了四十五回酒杯。我願意相信這項說法，但只說這麼一句的確是錯誤的。假如不加解釋，這樣就無異說與宴的人都酩酊大醉。事實是每次舉杯，席上的人都只啜了一點，很多的人只舉上一舉杯，一點兒都不啜。那一頓晚飯吃了四個鐘頭。四個鐘頭內啜了四十五回酒，沒有一個人醉，那晚東西吃得

不少，廿四小時內可以不餓。至於我，我是不會喝酒的。

我在上湯的時候注意到維辛斯基先生 (Mr. Vyshinski) 把水倒在裝伏特加酒 (Vodka) 的酒杯裏，維辛斯基先生是我的鄰座。伏特加酒的顏色和水一樣，我認定了既然他能倒，我也就能倒。在進酒時人起立的那個必然混亂的一刹那，我把水倒進我的伏特加酒酒杯中。酒並不太刺激，但我的確知道那晚宴會的經過情形。美國方面有若干報道說蘇聯官員喝醉了，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公正地說我所接觸的一切蘇聯官員都很有節制。我從沒有看見有任何蘇聯代表在社交場合中流露絲毫醉意。

史達林元帥給邱吉爾敬酒時很豪爽，他給羅斯福總統敬酒祝總統健康時尤其豪爽，他說羅斯福總統是「促成世界動員對抗希特勒的工具的主要鑄造人。」

邱吉爾首相給史達林元帥敬酒時讚譽史達林是「一個偉大國家的偉大領袖，這個偉大國家的人民會將暴敵驅逐出她國境以外。」羅斯福總統得意地指出英蘇美三國間團結一致的特點，他希望這種特點能夠繼續保持不墜。

史達林所說的一句引起我注意的話是，「在戰時期保持團結一致並不太難，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要擊敗我們的共同敵人，這一點是人人清楚的。困難的任務將在戰後發生，那時不同的利害可能促成盟國團結的分裂。我們的責任是務使我們在戰後承平時期的關係也像在戰時一樣地堅強。」

我可以證明他所預言的準確，我同意他所說關於我們共同責任一點的意見。

當我們向所有軍事將領和陸海空三方面作戰英雄致敬時，我建議要「向我們各國人民——農場和工廠中的工作者致敬——他們雖沒有穿着軍服，但我們能夠獲得勝利却是有賴他們的貢獻。」史達林元帥同意我的說法，他離開座位走來和我碰杯。老實說，史達林是一個很叫人喜歡的人。

雅爾達會議的公報二月十二日星期一的午後在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同時發表。一切盟國的反響都

復良好，美國的輿論尤其興奮。費城記錄報 (Philadelphia Record) 稱道雅爾達會議是「戰爭中最偉大的聯合國勝利。」紐約前鋒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說，「最主要的事實是雅爾達會議已提供了盟國團結，力量和決斷力的另一個偉大證明。」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 說，關於三巨頭在平時和戰時合作能力的一切懷疑現在似乎已一掃而空。」

我的觀感也是如此。無疑地，英—蘇—美三國的友誼已經躍進到一個新的高潮階段。但羅斯福總統剛剛返抵美國時，三國友誼的高潮就已開始退落了。

美蘇外交秘錄

第三章 轉變的開始

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國內有極多的工作急待料理，人力極端缺乏，而擬議中的國民服役法，通常稱爲工作或作戰法，也是國會同有關機構方面爭論紛紜的問題，歐洲方面的戰爭即將結束，我們的整個生產計劃也正在檢討之中。歐洲勝利後租借法案，剩餘物資的處理同緊急救濟的各種計劃正在擬訂；而將我們的工業設備自戰時改作平時工作的政策正在形成。

在我出國的一段期間中，以上各種計劃，由於我局內幾位同仁的積極努力，很有進展，同仁之中，一位是幾個月以前我自陸軍部方面調來的克萊將軍 (General Lucius D. Clay)，協助他工作的是一位紐約的工業家西爾斯 (Fred Sears)，他爲人沈靜，不驕，對於工業過程甚爲熟悉，在戰爭期間，他曾好好的擔任過若干負責的任務，不支薪，用了錢不要償還，更不務虛名，他很爲國家盡了許多力。

前一年六月，正在國會考慮將戰時動員局擴充爲戰時動員復原局時，我在委員會中說明我並非爲自己要求戰後的權力，因爲我不擬留在政府內執行復原計劃，那時我們認爲在歐洲戰事結束之前，復原方面的工作不會怎樣進行的，然而在我自雅爾達歸來以後，我們決定馬上從着重動員變爲着重復原。

因此，我須對未來脫離政府工作的方式與時間加以考慮，我認爲將來擔任執行復原計劃的人應儘早負責起來，不應該使他去擔任一種只須去執行他本人未曾參與擬定的政策的職位。

無論如何，去職時間問題使我很感困難。我們曉得歐洲勝利日已非遙遠，不過危險的是華府方面所認爲顯然的事，兵士們或許還不甚明瞭。他們仍須攻渡萊茵河，我不願取任何行動——不論在國內方面講如何有理由——使前線遙想到國內擔任重要職務的人的努力，熱誠，或支持有些鬆弛下來。

三月中旬，我們在萊茵河東岸建立一立足點，並且經亞歷山大元帥 (Field Marshal Alexander) 通知，德國高級軍官提議在瑞士舉行會議，商洽義大利境內德軍投降事宜。因之我軍於三月廿三日開始大舉攻渡萊茵河時，我決定不應再事遷延。次日我便向總統提出辭呈，請求自四月二日離職。我所以定為四月二日是因為按照規定應於四月一日向總統及國會分別提出每季報告，而且我必須提出這項報告。

總統勸我留職，我便提到前一年秋季他曾答應我在歐洲戰事結束時可以離職。我向他解釋我是為了戰時工作才離開法院的；我不願在平時做某一部門或局的首長。我使他相信未來主持復原計劃的人應該獲得擬定此種計劃的機會，所以必得改變一下。

我們討論了若干問題，其中包括佔領德國的計劃。他以為陸軍部已計劃派次長麥克勞 (John J. McCloy) 到德國領導我們的機構。我同他說麥克勞決定留駐國內與史汀生陸長共事，陸軍部已遴選我的副局長克萊担任此項工作。使我驚訝的是，他竟不知克萊是何許人，我說我已請他到我的局內工作，因為我與各部官員接頭之後發現沒有人較他更為幹練多才，沒有一位陸軍官員像他那樣清楚明瞭文職人員的見解。總統看到我對於克萊不同尋常的推讚，要我帶他來一談。總統那天啟程赴海德公園 (Hyde Park)，不過在次一星期赴溫泉 (Warm Springs) 途中，仍將在華府停留一日。我們商定我們三人在那一天會面。總統抵達海德公園後不久就同我通電話，要我再考慮辭職的事情。其後因為我未變初衷，他要我建議繼任人選。我便推荐繼我出長經濟穩定局的文森 (Fred M. Vinson)，總統表示同意，並且說他回來後我們可以討論此事。

總統在回來的那一天，精神異常興奮。他在我們晤談之際對克萊將軍說，他對他前往德國，甚為欣快，他還告訴這位工程師將軍，他本人想在中歐成立一 TVA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以發展電力並救濟歐洲週期性的煤荒，克萊一直是立正的。總統沒有給他機會說一個字，總統剛剛講完，歐爾利 (Steve

Early)即進入室內，我曉得總統還有應了而未了的工作，於是請克萊在外面候我。我在屋內又停留數分鐘問文森的事，總統告我他要任命文森，並命我同文森商談，因為他在午後去溫泉之前，還有若干約會，他過一會並要和文森通電話。

我離開總統辦公室會到克萊後，我同他開玩笑說：「將軍，你說得太多了。」

「法官先生，」克萊回答說：「即便總統給我一個機會，我也懷疑能否同他講話，他的樣子使我太吃驚了。」

克萊已經有一陣沒見到總統了，我在以往忙碌而緊張的四十一個月中在白宮工作，因為我時常見到他，便未曾像克萊那樣發現他的容貌的改變。我們分手時，我雖然感到我們關係中重大的一頁業已結束，却絕未想到他生命旅程的結束不過是數日間的事了。當我在等待文森任命的批准時，我們曾在直達溫泉的電話上，數度談話，他自己說感覺好了許多，我便認為他像以前若干次一樣，正在「痊復」之中。

四月八日，我回到斯巴登堡(Spartanburg)，那裏的友好們對我熱烈招待。四日之後，聽到無線電廣播裏報告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同世界上千百萬的人們一樣。我茫然莫知所以。

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James V. Forrestal)從電話中告我他派飛機一架來斯巴登堡迎接我去華府，因為他認為在以後數日之中，我可以做些事，同時他知道我也要參加總統的葬禮。

次日一早我前往晉謁杜魯門總統。他對於突然落到身上的責任不勝其繁，不過很快的便熟悉了當前問題的情形。那日午後我回到白宮，他要我在次日早晨陪他一同往迎總統靈車，並且一同前往海德公園送葬。

杜魯門總統與我在回華府的火車上討論了若干問題。因為我才離開白宮幾日，我還能使他認識國內關係中的若干嚴重問題的情形。在談話之際，總統說願我做他的代表參加未來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

會議。

「總統，我對你的意見，深為感激，不過我不認為你應該派我去，」我這樣說，「代表團已經派定了，這是一個代表性的團體，其中有幾位很幹練的人物。經驗告訴我們，總統的個人代表在這種情形下時常使代表團甚為不快，彼此間的關係幾乎一定是私人性質多過代表性質，」杜總統同意這一點。

第二天他告訴我他願任命我為國務卿，我不願在承平時代充任考慮復原問題的機構首長，不過我卻願參加締造和平的工作。我說我接受任命，我們約定這次職務的更動和發表，不在舊金山會議結束前實現，那時會議剛剛要舉行。

或者還沒有有一位新任總統在初就任的幾個星期中比杜魯門達到更快地絡繹而來的大事。德國的崩潰與投降同舊金山會議佔住了舞台的中心。觀眾是世界的人民，他們為勝利所顛倒，對於未來充滿了崇高的希望。

然而我們這些熟悉雅爾達會議以後蘇聯行動的人們，在崇高的希望中，却也雜有焦慮的情緒。

在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前，甚至在他自雅爾達歸來以前，關於已經獲得的協議所將採取的行動，已和蘇聯發生了困難，其中兩大困難問題為波蘭與羅馬尼亞。

三國在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中曾經交換諾言說：「當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中，當使他們三國政府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前軸心附庸國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其中又說三國政府「當聯合協助」該區域中的人民「成立臨時政府，這些臨時政府要能廣泛代表國內人民中的一切民主份子，並保證儘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立能應合人民意志的政府。」最後又說，「當三國政府認為歐洲任何被解放國或歐洲任何前軸心附庸國中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他們當履行本宣言中所列舉的共同責任。」

不過話雖如此，在二月廿四日，只是會議後兩個星期的功夫，盟國管制羅馬尼亞委員會的美英代表要求舉行委員會會議時，却被蘇聯主席拒絕了。就在那一天，哈里曼大使（Ambassador Harriman）奉命將我們的希望通知蘇聯政府，就是我們希望羅馬尼亞的局勢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之下，或是由三國更高級當局諮商之下，得以井然的發展。

三天以後我們得到了答覆。莫洛托夫先生的次長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前往布加勒斯特，並且要求解散雷德斯哥（Radescu）政府，成立一新羅馬尼亞政府。同時莫洛托夫更通知我國大使說：雷德斯哥政府不能夠維持秩序，履行停戰條款，因之盟國管制委員會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並且隨時通知各盟國。

哈里曼立時奉政府命令通知蘇聯政府，說明我們不能接受，祇由某一政黨代表組成的羅馬尼亞臨時政府。同時更說明委員會應該採取措施以支持現政府維持秩序；應按照停戰協定給與新聞自由；所有政黨都要解除武裝，對於重大的政治事項，盟國管制委員會中的三個代表應共同諮商。

莫洛托夫告訴哈里曼說：維辛斯基在布加勒斯特，三國正在進行諮商。

三月五日，我們的大使致函莫洛托夫說：雷德斯哥政府問題應該由三國政府直接諮商協議；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蘇聯代表並未經常將各種事項通知美國代表；蘇聯的軍事當局損害了雷德斯哥政府維持治安的能力。次日他又照會莫洛托夫，否認與維辛斯基的間斷接觸便是雅爾達會議所協議的三國諮商。

當我們的大使與莫洛托夫外長在莫斯科交換上述意見時，羅馬尼亞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二月二十七日，維辛斯基到達布加勒斯特，並且要求於晚間同國王會面。國王當會同外長維索阿諾（Constantine Visoianu）接見。維辛斯基說：雷德斯哥將軍沒有維持秩序的能力；蘇聯政府雖然不願干涉羅馬尼亞的内政，却也有責任注意後方的秩序能夠維持，因此他要求立即解散雷德斯哥政府，然後成

立一以「國內真正民主力量」為基礎的政府。他得到答覆是，這事可予考慮。

美國駐布加勒斯特的政治代表，白里(Burton Y. Berry)曾不到維辛斯基。他便將美國的見解——在諮詢以前，不能採取任何決定性的行動——寫信通知維辛斯基。

根據白里送回的報告，維辛斯基先生次日又要求晉謁國王，要他對前夜的建議作一決定。國王答覆他已經將這件事通知雷德斯哥，並且已經開始諮詢各黨領袖推選另一總理。維辛斯基說這種答覆不能使他滿意。其後，維辛斯基一面看着自己的錶，一面向國王說：他只有兩小時零五分鐘的時間便須宣佈雷德斯哥將軍已經解職。維辛斯基又強調說，在八點以前，國王必須宣佈繼任者是誰。

羅馬尼亞外長當時便向維辛斯基先生解釋國王是一位立憲君主，他必須依照合乎憲法的方式行事；他只能諮詢各政黨領袖，按照他們的意見來選擇一人組織政府。維辛斯基反駁說，雷德斯哥保護法西斯分子，前一天以國王的命令將軍官十名解職，便是對蘇聯不友好的一種行動。他說這一件命令必須立即撤銷。國王同意他的要求，維辛斯基先生便離去了，臨走的時候，將門摔得很重以致門樞上的灰泥裂得很兇，以後從沒有修好；現在仍然在那裏，證明他的情感與手臂的力量。

國王宣佈他已邀斯蒂貝親王(Prince Stirby)組織政府，斯蒂貝親王也試行遵辦，不過却不能勸使共產黨參加政府組織。其後不久，維辛斯基先生便通知國王，共產黨領袖葛洛查(Petr Gроза)是蘇聯政府屬意的人選。不過國王仍繼續諮商各黨領袖。到了三月一日，維辛斯基再度進見國王，親自向他說明蘇聯政府要使葛洛查奉命組閣，國王遂決定使他組織政府。

因為葛洛查建議的第一個內閣不能代表人民，國王拒絕接受。維辛斯基寫通知國王，葛洛查建議的人選若經取消，蘇聯政府認為是敵意行為。據說莫洛托夫是這樣說，國王如不在次日午後接受葛洛查政府，那麼他對於羅馬尼亞的繼續為一獨立國家便不再負責。

葛洛查同時也宣佈蘇聯答應將蘇聯政府與羅馬尼亞的關係大加改善。羅馬尼亞可收回國內運輸機構的控制權；自匈牙利割取達琅西里瓦尼亞 (Transylvania)，停戰條款並且可以放寬，結果國王於星期一夜召集有歷史的各政黨領袖，要求他們拋開政治上的理由而支持他接受葛洛查政府的行爲。

各有歷史的政黨領袖對此不能同意，若干人並且勸國王遜位。不過他認爲他不捨棄國家對於人民最爲有益。在三月六日星期二晚上，葛洛查政府宣誓就職，隨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Marshal Malinovsky) 立即前來布加勒斯特，並且會同維辛斯基見國王。他們對國王說，後方如果不甯靜，他們便不能集中力量從事前線活動，羅馬尼亞政府過去沒能夠維持秩序，以後不許再如此。

三月七日，葛洛查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莫洛托夫通知我國駐莫斯科大使說，他在三月五日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業已經失去意義，因爲羅馬尼亞的危機已經由於新政府的成立而克服了。

當年九月，莫洛托夫在倫敦的時候要求我們承認羅馬尼亞政府，我告訴他，我們因爲這一個藉維辛斯基遞給羅馬尼亞國王的限期二小時半答覆的最後通牒而成立的葛洛查政府的性質，還沒有承認它。莫洛托夫先生於是承認維辛斯基先生會「協助組織政府。」蘇聯政府所以如此做法是因爲羅馬尼亞「有發生紊亂情形與內戰的嚴重危機。」

以上這些發展自然都會完全回羅斯福總統報告，結果政府便訓令哈里曼先生向莫洛托夫先生建議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一混合委員會，以保障實施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中所宣布的各種原則。莫洛托夫先生對於這項建議斷然拒絕，他在三月十七日的照會中說不需要採取何種行動；又說我們的建議會使盟國管制委員會失去力量，同時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沒被諮詢之說也不實在。

以上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盟軍正在進迫柏林，羅斯福總統極力避免暴露不睦的情形，以免予敵人以助力和安慰。總統告訴我他對於將來極爲憂慮，然而在目前還應經由我們的大使提出抗議，唯有在一

切辦法用盡之後，他才直接同史達林交涉。

一九四四年秋天，邱吉爾同他的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會經到過莫斯科，雖然沒有什麼正式協定，不過我們曉得他們已經有一種非正式的諒解，就是英國如果認為需要採取軍事行動來平息希臘的內亂時，蘇聯不加干涉，反之，英國也承認蘇聯有領導維持羅馬尼亞治安的權力。

英國對於蘇聯在羅馬尼亞的行為雖然非常不贊成，不過却也不願領頭向史達林抗議。總統認為羅馬尼亞的情形還不是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最好的考驗，英美在羅馬尼亞都沒有駐軍，羅馬尼亞完全由紅軍控制。總統知道蘇聯必須維持一條自本國經過羅馬尼亞通到其在德國境內的軍隊的交通線。他知道蘇聯會聲稱以前的行動都是為保護軍隊所必需的。他也知道無法自紅軍統治下的羅馬尼亞人士得到與蘇聯所說的妨礙其軍隊等情相反的報道，他認為蘇聯在波蘭做的事更明顯的違反了雅爾達協定。

雅爾達會議關於波蘭的決議有以下這句話：「莫洛托夫先生，哈爾曼先生，和卡爾爵士受命以一個委員會的資格，首先在莫斯科與現今臨時政府人員並與波蘭國內外其他波蘭民主領袖會商，以便根據上述方針改組現政府。」

三月二日，就是羅斯福總統向國會聯席會議就此次會議發表樂觀向為退還稱讚的演說的次日，哈里曼大使送來一件使人焦慮的報告，他說，莫洛托夫堅持僅有臨時政府——或是盧布林政府——所推荐的波蘭人士才能被邀同委員會商談。莫洛托夫所開列的應由倫敦邀至莫斯科的人士名單中，僅有一個是我們提出的名單中也包括的。他堅強拒絕邀請波蘭農民黨 (Polish Peasant Party) 的自由主義領袖米柯拉茲克 (Mikolajczyk) ——他是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一員，羅斯福先生曾經熱烈的向史達林元帥介紹過他。

蘇聯外長堅決認為盧布林政府應該是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的「核心，」委員會中的我國代表同英國代表拒絕這樣解釋雅爾達協議，他們指明雅爾達議定書原文同事先的討論都表明它應該是一個「新」政

府，而不是擴大後的盧布林政府。因此而演變成成功的難關，最後竟使總統與邱吉爾首相直接向史達林元帥交涉。

將近三月尾時，首相向羅斯福總統表示他認為雅爾達的各種協定逐漸破滅，除非設法改變這種局勢，以後將發生嚴重結果。三月廿七日羅斯福總統答覆說，他也曾以「焦慮而關注的情緒注視雅爾達會議以來蘇聯態度的演變，」他又說：「我非常明瞭目前的演變中所包含的對於當前有關問題以及舊金山會議與未來的世界合作的危險，他更將他擬拍致史達林元帥的電報稿附告邱吉爾。

羅斯福總統於四月一日將這電報拍給史達林，首相也拍電支持總統的立場。

總統的電報首先聲明他不能隱瞞目雅爾達以來「我檢討事態演變的憂慮情緒，」對於「我們在雅爾達所獲得的政治決定——尤其是關於波蘭問題的——的執行（這是世界所期望的）的缺少進展」表示遺憾；又說：他對於蘇聯「顯明的漠然態度」不能夠瞭解；他認為這種局勢的發生是由於蘇聯將雅爾達協定意義解釋為新臨時政府並不比目前華沙政府的延續多些什麼。總統強調他不能認為這種態度符合協定或是協定以前的討論。他說他必須向史達林元帥說明「任何使當前政府稍微改頭換面繼續下去的辦法，都不能接受，這種辦法最使我們的人民認為雅爾達協定業已失敗。」委員會遴選波蘭人士前往莫斯科商酌的權力如果被限制，或是為華沙政府分去一部分，那麼雅爾達協定的基礎就被破壞了。羅斯福總統說他不擬拒絕或否決莫洛托夫所提出的參加諮商人選，同時我們的大使也應獲得同樣的信任。他告訴史達林波蘭的政治應該極度安靜，同時我們也應該盡力使波蘭的不和的黨派停止反復的攻擊。鑒於我們的責任，他更要求美國代表同委員會內的英國代表可獲得訪問波蘭，一方面也告訴史達林說莫洛托夫在以前一個會議中曾有此種建議，不過後來又撤銷了。

總統又說明解決波蘭問題「對於我們的國際合作計劃的順利發展是如何的重要。否則，他提出警告

說：「他們在雅爾達考慮的對於盟國團結的一切困難同危險，會以更嚴重的形式出現於我們之前。」

關於羅馬尼亞，總統說他不明白何以那裏的發展不符合，關於被解放區的雅爾達宣言。他還要求史達林「親自檢查我們政府間關於這一問題來往的照會。」

在電文的末一部份，總統提到關於宜邀莫洛托夫先生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來往文件。總統於二月廿四日會拍電促請他參加，略謂：「我恐怕莫洛托夫的缺席會使全世界認為蘇聯政府對於本會議的偉大目標缺乏可以與人相比的關注。」

史達林對於莫洛托夫的不能參加表示遺憾，他的覆文的末一段說：

「至於各種不同的解釋，你會知道，這不能決定將來要作的決議。」

總統在警告蘇聯政府對波蘭同羅馬尼亞問題的態度會在輿論方面有不利的影响之後，提到史達林不贊莫洛托夫缺席對大衆所能發生的反響，就以下面這段睿智而誠懇的聲明結束他的電文：

「我認爲你一定曉得美國任何政府的政策——國內的或是國外的——的執行是需要人民真誠支持的。美國人民是由自己來決定，政府的行動不能改變它。所以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爲你的電中關於莫洛托夫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末一句話使我懷疑你是否重視這因素。」

四月七日，史達林答覆了，他承認波蘭問題已陷僵局，原因是美英兩國的大使違背了雅爾達協定。他說：他們認爲目前的臨時政府應該完全取銷，另成立一個全新的政府；他堅稱哈里曼曾經在委員會中聲明臨時政府中的人員可能沒有一個包括在全國團結的波蘭政府中——哈里曼否認有此聲明。

史達林認爲三巨頭已在雅爾達協議自波蘭約請五人，自倫敦約請三人。不過英美大使現在却又要每一委員有權自波蘭與倫敦約請無限制的波蘭人士。史達林說：只有能夠承認雅爾達決議——其中包括關於寇松線的決定——同真正努力樹立波蘭與蘇聯友好關係——的波蘭領袖才能被邀。我們一向明瞭史達林通

常如何解釋「友好關係」一語，所以就確實知道這只能是一位力圖成立一個甘心接受蘇聯命令的政府的領袖。

史達林在給邱吉爾的覆電中也表示，只要米柯拉茲克肯公開聲明承認雅爾達會議的決定並且贊成波蘭與蘇聯間友好關係的樹立，他可以不再反對邀請米柯拉茲克。史達林拒絕同意准許美英觀察人員前往波蘭，理由是波蘭人會認為這種事傷害他們的民族尊嚴。

總統同邱吉爾決定聯名拍電答覆史達林，美國國務院同英國外交部正在草擬聯合覆文，羅斯福總統死了。

總統死前幾天中，還爲着另一件事焦慮而特別煩惱。這件事在他死前最後一次致電邱吉爾時，便已存在心頭。

三月十一日，義大利戰區盟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元帥會得到戰略情報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的報告說：凱塞林將軍 (General Kessling) 同幾個德軍參謀人員願在瑞士同盟方晤商義大利境內德軍投降問題。英美聯合參謀部批准亞歷山大的計劃——派遣他的副參謀長前往伯爾尼 (Bern)——不過又命令他在蘇聯接到通知前，稍爲等待。哈里曼將這消息通知莫洛托夫先生時，莫氏說明蘇聯願意參加任何此種討論，並且將派紅軍軍官三人參加。於此聯合參謀部又通知蘇聯政府說，伯爾尼方面除掉準備在義大利卡塞塔 (Caserta) 盟軍總部舉行的會議外，不做別的事，並且表示歡迎蘇聯代表參加卡塞塔會議。指令中又命令向蘇聯政府闡明：假如德國要投降，亞歷山大以該方面最高統帥的資格，將進行談判，並且採取必要的決定。

蘇聯政府答稱：蘇聯軍官既不能參加此次討論，便即不派其前往卡塞塔，蘇聯的覆文並且「堅持」談判立即停止。

幾天以後，史達林致電羅斯福總統，其中說明假如蘇軍前線發生同種情形，他不擬拒絕英美代表參加討論。他說他認識了前此舉行的談判的重要性，因為它影響了東線的軍事情勢。

羅斯福總統答稱，以前並未舉行談判，並且向史達林保證他會充分獲得通知。這位蘇聯領袖所拍來的次一電報深深觸怒了羅斯福總統。

史達林提到前此並未舉行何種談判一節，力言總統顯係沒有接到手下軍事領袖的報告。據史達林接自紅軍顧問人員的報告，此項談判業已完成，同時凱塞林更將因此打開德軍前線使美軍得以前進。英美為答報這種軍事援助起見，同意為德國獲取比較寬大的和平條款。按照這種協定，德國已經將德軍三師自義大利前線調至蘇聯前線，美國軍隊已經獲准開入德境。

不問他本人對於這一電文的感想如何，羅斯福寫了一件很莊嚴的覆文。他說：德軍三師之自義大利前線調至蘇聯前線，在關於德人希望從事談判的消息到達亞歷山大那裏以前幾個星期就已經開始，因此談判對於軍隊的轉移並無關係。總統說：史達林一定會相信他是誠實的，艾森豪威爾不會不通知他就進行任何談判。過去一直並沒有舉行過像史達林所說的談判，同時他自從收到德國人的第一封電報以來，即已下令使蘇聯當局充分獲得通知。

在電文的最末一節，他將他的情感稍為發洩了一下。

他說：他對於給史達林報告消息的人對美國總統同他所信託的屬員所作的「惡意曲解」，深感遺憾；他表示相信給史達林報告消息的人企圖破壞兩國間的友好關係；他認為盟方的勝利剛剛似已確有把握，這種曲解便破壞了過去的同時也是完全勝利所必需的團結，實在是一大悲劇。

對於這一電文，史達林答稱：他並沒有懷疑總統的誠實，不過又重申他的信念，他自己的紅軍顧問處接到了正確無誤的報道。他說：他有理由認為它們是正確的，因為就在不久以前馬歇爾元帥同英軍的

指揮官還很關切的通知蘇聯指揮官，德軍集中某地準備進攻蘇聯陣地。不過蘇聯軍官曉得這消息是錯誤的，德軍是要在另一地點進攻，紅軍將兵力集中於它認為最適宜的地點，並且制止住了德軍的進攻。他說：他發現德軍可能是故意欺騙美英軍官，不過他仍願感謝美方這種協助的努力。大體上講，史達林的電文比較以前幾次客氣，羅斯福總統便於四月十一日致電史達林說：這一不幸事件現在已成過去，他很感快慰。

這時，同德國的談判已因爲其他的原因而展期，在這期間，聯合參謀部提出一件爲蘇聯軍事領袖所已接受的建議，其中規定三國中的每一國應當參預所有的投降談判，不過任何前線的投降事宜不能因爲任何一國家的缺席而延誤。

儘管如此，史達林的指摘同他那種顯然相信我們會經秘密締結一單獨和約的意味，以及最少在一封電報中具有的那種令人討厭的字句，大大地觸怒了羅斯福總統。當杜魯門總統就職後閱讀這些電文時，他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見解與態度完全同情。

羅斯福總統收到史達林最後一電的那一天，也收到邱吉爾首相的一封信。邱吉爾說：他在幾日之內需要向下院發表一次聲明，聲明內容主要是討論波蘭問題，不過也必須討論與蘇聯的關係。他極力避免提及任何足以在此緊急階段不利於軍事局勢的事情，他請羅斯福總統指教。

這時總統雖然已經因爲蘇聯的態度而至感失望，却仍處之泰然。他得到一種結論——我在幾個月之後才發現——就是與蘇聯相處，沒有一種簡便的方式可循。於是，在四月十二日，在他去世前一小時，羅斯福總統答覆邱吉爾首相爲將對下院發表聲明而提出請教的要求，發出下面這封電報：

「我要盡力將一般的蘇聯問題化小，因爲這種問題，以這種或另一種形態，好像每日都在發生，然而其中大部份卻都像伯爾尼會議一樣解決了。」

「不過我們必須堅定，我們的途徑，迄今都是正確的。」

這一封電報是自溫泉拍發的，上面有種種標幟證明它是由總統本人所寫的。他的意見，在今日與寫出這電文的那一天，是同樣正確的。

假若我們來推測如果羅斯福總統還在活着，歷史的演變將如何，實在是無聊的。不過以上這些電報可以驅掉我們的對蘇關係是在他去世後方才惡化的傳說。

總統的盡力求與史達林和好，會使若干觀察者低估他對邱吉爾先生的感情與欽佩的程度。那種情感是真正的，兩方都是熱誠地互相酬答，這是使他們彼此之間的和關於彼此的談話都可以坦白的。一種友誼。

每逢邱吉爾在白宫作客，總統便會向我們這般需要與他談論公事的人抱怨說，邱吉爾使他起得晚了。不過縱然如此，總統却顯然的對於前夕的談話感覺非常愉快。有一次在雅爾達的時候，我們正在一次長時間會議後準備就餐，總統抱怨這次冗長會議是「文斯敦（按邱吉爾名）的錯，他演講得太多了。」

「是的，他確是這樣」我答覆他說：「不過講演却都很好。」

總統開口笑了一下答道：

「文斯敦不會作別樣的演講。」

假如我在雅爾達的觀察是一種典型的例子，那麼總統確是用盡他用來促進人類關係的一切魔力與天才，使三巨頭會議的情調和諧。在那樣早的日子這種才能的價值不致言過其實，不過蘇聯的領袖們却對於總統的大度同他的願在原則上求妥協的精神的最高限度却估計過高。

在這惡化的情形中還有其他兩種因素。在戰爭期間，三巨頭所遇到的問題同他們所作的決定大都是軍事性質的。在戰爭將近終了時，政治問題顯開始變為重要，自然這些事又成了勝利國家間的問題。羅

斯福總統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事實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所發表的國情咨文中便已警告說：「我們愈接近戰勝我們的敵人，我們便勢必愈感覺到戰勝者間的爭論。」這是他那麼堅持，當戰爭還在進行時必須成立聯合國的原因。

第二因素是第一件的推論，這便是戰爭的結束同檢查制度的取消，將以前除了有限的幾位官員外很少人曉得的爭論使大家都注意到了。

總統剛剛去世時，我們的希望確會上升片刻，就是我們彼此間關係的氣壓表會停止下降。這種希望的上升是由於哈里曼大使同史達林元帥的一次會見，在這次會晤中，哈里曼要求蘇聯派遣莫洛托夫出席舊金山會議。

「羅斯福總統雖然去世，他的主張却必須繼續存在。」史達林告訴我們的大使說：「我們將以全部力量同全部意志支持杜魯門總統。」

其後他請哈里曼將他的話轉告杜魯門總統，又說他將派莫洛托夫到舊金山使世界明瞭他的態度。

此時，國務院已經準備好答覆四月七日史達林來電的關於波蘭問題的聯合電文，這篇由羅斯福總統命令國務院起草的電報由杜魯門總統與邱吉爾首相於四月十八日發出。電文中首先試求改正「閣下對英美兩國政府之態度所顯然獲得的完全錯誤的印象，」同時並否認我們兩國的大使會要求獲得邀請數目無限制的波蘭人士前往莫斯科談商的權力。他們請史達林注意羅斯福總統四日一日電報中的這一段聲明：「為求便利獲致協議，委員會可首先選擇少數但具有代表性之波蘭領袖，這一些人士可建議其他人物而由委員會加以考慮。」杜魯門同邱吉爾都說：「我們之間的真正問題在於華沙政府是否有權否決參加諮商的各個候選人。」他們說：雅爾達協定中找不着這種解釋，他們表示相信蘇聯又恢復在雅爾達原先所持之立場，不過這種立場曾經爲了獲得協議而加以修改。

莫洛托夫到達華盛頓時，杜魯門總統已經研究過雅爾達的各種協定，且對羅斯福總統與史達林元帥間的來往函電——尤其關於羅馬尼亞，波蘭與伯爾尼事件的，也閱讀得很多。他對於我們所認為的協定的迅速破滅以及後來雅爾達真摯精神的渙散甚以為慮。於是召集國務卿、陸長、海長、參謀總長、與李海軍元帥共同商談我們與蘇聯的關係。嗣後當莫洛托夫訪問白宮時，杜魯門總統對於我們之間的若干問題，尤其波蘭問題，作過坦白的敘述。據我返抵華府後所得到的消息，這一次會見，不甚和諧，結果也很突然。

在舊金山，關於謀求合作的努力會受幾乎每一問題所發生的爭論的損害。在第一天討論主席問題時，這種情形即行開始。在十六名與蘇聯討論改組政府問題的波蘭抗戰領袖被遠事宣佈後，杜魯門決定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以阻止我們間關係的逐漸惡化，他因此向史達林提議派遣霍浦金斯前往莫斯科，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出使。

霍浦金斯多次服務政府，勞績卓著，而本次出使的成績更使他獲有特殊聲譽。返國與杜魯門總統商討波蘭問題的哈里曼大使與霍浦金斯聯袂回任參加談判。包倫(Chip Bohlen)自然也同行，一方面為他們担任通譯工作，一方面充他們的顧問。他們送呈總統的與史達林元帥的談話紀錄是我們對蘇關係史上輝煌之一章，我對之極感興趣；那時我正在為前途的工作教育我自己。

談話的特點是坦白地交換意見與蘇聯思想的有趣的顯示。

史達林對於一旦顯明德國已經戰敗而蘇聯的協助不再為美國所需要後，美國友誼似將趨于冷淡一層表示關切，他並且舉出若干他認為可以支持此種印象的例子。

他舉出美國之同意阿根廷參加聯合國違反了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的聲明；又說：假如大國的決定可以為關都拉斯這樣的國家的投票推翻，他不得不懷疑各大國間協定的價值。

他說我們之認爲法國應爲賠償委員會委員之一實在是一種侮辱，旨在屈辱蘇聯，因爲法國會與德國單獨締結和約，並開放邊界使迎入德軍。

他堅決地說：雅爾達協定原來計劃以盧布林政府作爲組織新波蘭政府的基礎，同時除此以外也沒有合理的辦法，史達林又說：「俄國人縱然是樸實的民族，西方國家却時常犯了認定他們爲傻瓜的錯誤。」

他對於歐洲戰事結束時租借物品戛然中止的方式特別憤懣。裝載運往蘇聯的物資的船隻雖然卸載了，不過仍使他認爲取銷的命令是一種壓迫蘇聯的手段。他說：這是一樁重大錯誤；美國應該明瞭只要在友好的基礎上同蘇聯來往，便會有許多的利益。

關於德國海軍回商船事，他曾拍電總統與首相建議將其三分之一劃歸蘇聯，然而他不僅沒得到答覆，還得到一種印像，就是這要求將被拒絕。

這一些不滿的話使我們國內的人士甚爲驚訝，它們暴露出一種極端的敏感同一種達到驚人程度的幾乎是天性的懷疑性格。

霍浦金斯委婉而有力的將美國的立場加以解釋：關於德國的軍艦，我們打算將它平分給三強，同時更認爲這問題可以在未來的三巨頭會議中解決。他解釋租借的停止按法律說是必須的，因爲租借是只准用來進行戰爭的，對德的戰爭既已結束，同時蘇聯又還不是參加對日戰爭的國家，再運輸物資是沒有理由的。卸載的命令是一位與政策無關的官員所犯的錯誤，而且這命令也已迅即收回。他向史達林元帥提到美國在輸送食物同其他非軍用物品的時候，是如何寬大地解釋着這項法律。

史達林很快地承認了霍浦金斯聲明的正確，他說：假如事前有適當的警告，那麼對於這件事便不會有何種反感；他們的經濟根據着計劃，所以事前的通知對於他們是重要的。停止運輸的方式使他無法表

示——他本想像樣做——蘇聯人對於給與他們的租借援助欣感之深。

霍浦金斯對史達林元帥說：他最感煩惱的是發現史達林相信美國要以租借法案為施行壓力的武器。他說：美國為一強國，不需要採取這種手段。關於這一點，史達林說他對我們的解釋完全滿意。

哈里曼大使解釋阿根廷問題。問題的困難在於斯退丁紐斯國務卿允許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參加聯合國的問題獲得南美各國的協議之後，莫洛托夫又提出邀請波蘭現政府參加會議問題。在雅爾達絕未同意邀請波蘭政府。所以莫洛托夫的這一項舉動引起南美各國堅持阿根廷亦得獲准入會。我們不僅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支持許兩蘇維埃共和國入會，同時更進一步獲得南美各共和國對於此項動議的支持。斯退丁紐斯所以認為美國的鄰國既已支持其為烏克蘭及白俄羅斯所作的努力，他也應該同意他們的願望而支持准許阿根廷入會。

史達林祇說已經做成的事不能更改，這一切都屬於過去。

以上各種問題既已消除，討論遂進展至霍浦金斯之行的主要目的——波蘭的局勢。

在整個談話中，霍浦金斯一直強調以下一點，即自美國人看來，波蘭問題已成為我們能否與蘇聯解決共同問題的象徵。而此一事件的不能解決，將威脅我們與蘇維埃盟國間的整個關係。霍浦金斯說：因為蘇聯對蘇聯該由我們共同處理的問題單獨行動，我們的人民深感煩惱，他強調我們除希望波蘭成立一個可以保護我們所認為的各項基本自由並且將對蘇聯友好的真正獨立政府外，對於波蘭並無其他利益關係。

史達林元帥會重述他在雅爾達所發表關於蘇聯政府在波蘭的重大利益關係的各項聲明。他認為在本次戰爭之前歐洲各國政府的政策是使波蘭敵視蘇聯，這種情形不能允許它再發現。波蘭必須友好，也必須強大，他承認蘇聯會採取片面行動，不過他要霍浦金斯考慮到蘇軍駐在波蘭，而一支軍隊的交通線

必須加以保護，它的權力也必須維持。

在這次討論期間，史達林很有趣地提到他對於美國在世界問題中地位的觀念。他說，不問美國是否願意，我們是世界上的一個強國，同時也要接受世界性的責任。過去二年中若沒有我們參加的話，德國便不會戰敗。事實上，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表明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有理由為一世界強國，所以他承認我們有參與討論波蘭問題的權利。

關於應該邀請波蘭國內外的哪些人士前來莫斯科開會，並且考慮成立一個來執行雅爾達對於舉行選舉的決定的臨時政府，頗費過商討。

在談判時，史達林表示相信我們要秘密支持與蘇聯敵對或是與敵對團體有關係的人物。霍浦金斯以最有力的字句向他保證我們並無這種意圖，且絕不考慮任何似為此二種人物中的波蘭人。

史達林同意邀請米柯拉茲克；關於波蘭委員會的人選也得到了協議。結果，一個保證進行自由選舉的新政府隨之成立。由於新政府所作的保證，波蘭獲准參加聯合國，而我在就任國務卿後所簽署的第一件公電，便是關於臨時波蘭政府的外交承認問題。

霍浦金斯哈里曼二人與史達林會談之際，舊金山方面對於聯合國組織的表決程序發生爭執。蘇聯代表團堅持，一個爭端，除非該情勢顯然可由和平方法解決，那麼安理會若沒有五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甚至不能討論這種爭端。換言之，蘇聯認為即使理事會的議程也屬於可使用否決權的範圍。參加會議的若干人士都認為完全陷入僵局。

在這一時期中，有一次前駐蘇大使戴維斯(Joseph E. Davis)同我與杜魯門總統談話，戴維斯是向總統敘述與他赴倫敦的任務有關的幾項問題。總統對於舊金山會議的僵局表示關切。我建議他可乘霍浦金斯在莫斯科之便，直接向史達林元帥陳述我們認為否決權不應適用於程序問題，總統便給霍浦金斯拍一

電報，他把這電報遞交史達林。

我們的意見一經提出，莫洛托夫便出面為蘇聯的主張辯護。根據包倫的解釋，史達林元帥和他的外長的談話中，表明史達林並不明瞭牽涉的問題。他向莫洛托夫說：他認為這件事無何重要，美國的主張應予接受。他在表明同意美國的主張時，曾經表示提防若干小國製造，並利用大國間的不和以求獲得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大國支持他們自己的目的的傾向。他說：「一個國家不必祇因為是小的便天真無害。」這件事在兩方面特別有意義：第一，它表現蘇聯的領袖竟未獲得舊金山會議中關於國際組織的重大問題的報告。第二，它表示當問題交由史達林處理時，時常可能迅速決定，雖然這種情形會顯然的需要推翻其外長的決定。

霍浦金斯談話中獲得的一些協議使以前九十日來的難題獲得進步。不過和雅爾達比較，却顯然毫無進展。這種協議的意義是：在六月中我們要在波蘭建立我們在二月間已經協議應當立即成立的臨時政府。這並不是我們已經解決了波蘭問題。

非但波蘭與羅馬尼亞使我們煩惱，其他演變也是如此。四月十八日，蘇聯請其他盟國派遣代表到維也納，不過又主張在歐洲顧問委員會對維也納城內分區及臨時管制機構獲得協議前，各代表不能啟程。在美國支持之下，英國認為在我們的代表到達維也納並且考察那裏的情形之前，分區問題無法協議。最後，在五月十九日，史達林同意我們的代表可以為這種目的訪問維也納，不過須要明瞭分區問題還要用歐洲顧問委員會解決。我們的代表到達維也納時，却不許去看城區外的任何情形。停留不久之後就又奉命於六月十日或十一日離去。

我們更繼續焦慮舊金山會議中顯示的不和，莫斯科賠償委員會會議所遭遇的困難，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中業已發生的衝突的見解，狄托元帥在的里雅斯德區的好戰行為，伊朗希臘及土耳其境內逐漸緊張

的情形。

舊金山會議的順利結束是我們爲準備在未來三巨頭會議而分析當前局勢的總清帳貸方的一要項。三巨頭會議在霍洞金斯訪問莫斯科時已經議定於七月十五日在柏林舉行。

七月三日，星期三，我的平生好友美國行政法院院長華勒(Richard S. Whaley)爲我主持就任國務卿宣誓典禮。我在白宮內滿覆玫瑰的東廊中，向參加典禮的友人發表下列聲明：

「持久和平的創造所賴者有過於巧妙的外交，有過於紙上的條約，甚至有過於最智慧的政治家們所能擬定的最好的憲章。外交雖然重要，和約同世界和平的基本憲章雖然重要，然而這些事如果沒有各國人民不僅要獲得和平，並且要友好用相處的意志來支持，是不會成功的……」

「目前，遭戰爭蹂躪的世界上的人民，無可懷疑的都要生活在自由而和平的世界中。世界上政治家最高的工作，是協助他們明瞭，只有在他們容忍，並且尊敬其他人民所有而爲本身所無並且也不能共有的見解，情感，與生活方式的權利時，他們才會獲得和平與自由。」

三晚以後，我乘總統的專車前往紐波紐斯(Newport News)，與古斯他號(Augusta)軍艦停泊在那裏，等着送我們到歐洲，到波茨坦，這是向遠遠的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

我們在奧古斯他號艦辛勤地工作。國務院已經準備了一些備忘錄，內容包括想像中可能在會議上發生的每一個問題。一路上每天早晨柯衡（Ben Cohen）馬修（H. Freeman (Doc) Matthews）和包倫都在我的艙裏和我會晤考慮這些文件。像我這樣一位新國務卿不能請到比這三位更好的顧問。

甯靜而羞澀的柯衡自從羅斯福總統當政的早期起對於各項重要問題都參預過。我在白宮工作期間，他一直同我在一塊兒。我除了對他有真摯的感情以外，我認為他的頭腦是我平生所遇見的最優秀的頭腦之一。沒有比柯衡更不自私而專心一致的公僕。國務院的歐洲司司長馬修是外交界中的老將，他兼有複雜的外交知識以及敏銳的政治感和精當的判斷力。他是我們職業外交家中最優秀人才的代表，我對他倚畀甚殷。包倫也是這類人才之一。他在蘇聯消度數年以後，便於一重要時期內充任國務院的俄國問題專家。我相信他是會隨羅斯福總統與杜魯門總統參加過所有三巨頭會議的唯一人物。他會以通譯官和顧問的身份看見過這些會議。他對我是無價之寶。

我們四個人曾經花了許多點鐘來就國務院的備忘錄作長久而熱切的討論，有很多問題杜魯門總統的參謀總長李海海軍元帥也來和我們一同討論。在這些會議中我們議定一些擬向杜魯門總統提出的建議。一路上我每天至少有一次要和總統在一起披閱這些建議。等到總統核准一項建議案以後，便準備提交會議。結果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們在安特衛普（Antwerp）登陸時，我們的目標已經澈底清楚地地在我們的腦海中，並且已將那些支持這種建議的背景文件完全草就。

我們要就四大主要問題獲致協議：（一）在最早期間負責起草和完成和約的機構與程序；（二）關

於佔領德國的政治與經濟原則；(三)執行雅爾達關於解放的歐洲宣言的計劃，希望能夠結束克里米亞會議以來時常因為蘇聯的東歐政策而發生的磨擦；(四)鑒於賠償委員會未能獲致協議對於賠償問題應採的新途徑。

此外，還有其他許多目標。內中一項是我們希望能使義大利早日加入聯合國，以酬其人民在歐洲戰爭最後一年中的貢獻以及其對日本宣戰之功。其次，我們還有一個保證歐洲所有內河航行自由的計劃。

當我們到達一度會為德國影片業中心的柏林郊外柏貝爾斯堡(Babelsberg)的小白宮時，才知道史達林元帥將遲到一日。這給了我們一個稍事游覽名勝的機會，總統，李海和我一同驅車前往柏林。我們對於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印象很深。他們多半是租父母和小孩子。照例，他們是把所有的東西揹在背上，我們不知道他們往裏去，他們自己是否知道，也還成疑問，但等我們到了柏林以後方才相信他們走錯了方向。我們雖然讀過許多關於德國破壞情形的記載，這破壞的程度却使我們震異。它能使我們真正知道全面戰爭除了對於軍人以外現在所能加於老弱婦孺的痛苦。

七月十七日史達林到達後不久便來拜訪總統。我們必須記住稱他為史達林大元帥(一稱委員長)而不稱為元帥，因為酬答紅軍偉大的成功，他已經榮膺了這個新頭銜。總統和史達林這次是第一回會面。經過一度愉快的談話以後，總統完全非正式地邀請史達林，莫洛托夫和那位很能幹的蘇聯通譯官巴夫羅夫(Parlov)在這裏和他同進午餐。他們接受了。談話的性質很普通，精神却很誠摯。總統對史達林的印象很好，正如同我在雅爾達對他的印象一樣。談到我們的柏林之遊，我問史達林委員長他認為希特勒是怎樣死的。使我驚奇的是他說他相信希特勒是活着的，他可能在西班牙或阿根廷。約計十天以後我們問他是否改變了他的意見，他說還沒有。

午餐時，史達林委員長像通常在這種場合一樣的有趣味。他贊美總統所用的酒。當總統謝他時，他

請菲律賓侍者把酒瓶上的手巾揭開，因為他要看看上面的商標紙。我很高興他這樣做；那是加利福尼亞州所釀的一種酒。

午餐後不久，我們便驅車前往波茨坦和舉行會議的地點西賽蓮荷美宮（Cecilienhof Palace）這是我們今後許多回駕車行駛三英里的第一次。像通常一樣，每逢俄國作東道主時，他們總是慘澹經營的準備一切。西賽蓮荷美宮是前皇太子威廉（Wilhelm）的鄉村別墅，地方寬敞可充會議場所。那是一座兩層樓的棕石大廈，很幽美地位於格里布尼茲湖濱（Gribnitz Lake）。四面的房屋構成一正方形，中間是一個天井，紅軍在天井裏用纜牛兒花栽成了一顆二十四英尺寬的紅星。給各國政府的首腦預備了一套房間供他私人之用，每一個代表團同一會議室和職員們辦公的房間。

會議室是特別的大並且非常明淨。室的一端是一個很大的窗，高度上齊二層樓，所以光線充足，使參與會議的人們飽覽風景美麗的花園。

七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十分坐在大櫛木桌邊開會的除總統和我外，包括美國代表團的前駐蘇大使戴維斯（Joseph E. Davies）李海海軍元帥及柯衡；英國代表團的首相邱吉爾，外長艾登（Anthony Eden）艾德禮先生（Aclée）、賈德幹爵士（Alexander Cadogan）和一位通譯官；及蘇聯代表團的史達林委員長，莫洛托夫外長，維辛斯基先生（Vyshinski），那時任蘇駐美大使的葛羅米柯先生（Andrei A. Gromyko），蘇駐英大使古墨夫（F. T. Gousev），及巴夫羅夫先生。

幸兒這間會議室是大的，因為每國代表團的後面還擁着一羣代表團中的其他人員。當會議上所遇的各種問題需要特別技術顧問協助時，這後面的一羣人就有所改變。據我記憶所及，開幕那天，我們的代表團中包括哈里曼大使，副國務卿克萊敦（William L. Clayton），盟國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Edwin W. Pauley），國務院參事柯衡，助理國務卿鄧恩（James C. Dunn）及馮修。

由於史達林的提議，杜魯門總統被推為主席，他立即把我們在奧古斯他號軍艦上預備好的若干建議提出來討論。他國政府的首長顯然對杜魯門總統的努力準備好供討論的議案表示欽佩。

第一個建議為設立外長會議。前在雅爾達會議上會同意諸外長應經常磋商以處理我們所知道戰後將發生的困難問題，但亞末有意使這些會議與和約有關。在雅爾達會議上，和平看來尚是如此遙遠，就我們所知，會上從未討論應如何實現和平的問題，所以締造和平的機構是我們計劃在柏林會議中開始做的第一樁事。

我會以國會議員的資格密切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和會程序，我相信這一次我們不得不遵循一種不同的程序，如果我們直等到對日戰爭結束才舉行一個所有參戰國家都出席的和會，而無初步的草約作為訂立條約的基礎，則將有無盡無休的爭論。縱橫捭闔，利益衝突的交互作用，加上問題及人員的衆多，我斷定，結果將形成混亂局面，會議即使能成功地結束，也將延長一年之久。這是真的，連在凡爾賽會議上最後也會感覺須將起草條約的任務委諸少數強國。那些無代表在起草委員會的國家豈有機會得知條約中有些什麼及為什麼要那樣訂立。結果，在列強之間獲致協議時，較小的協約國家並無較戰敗的德國人更多的機會去審查或修正條約。

我們不但不設計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將促進強大國家間的協議同時供給較小國家以充分發表他們意見的機會。

幸運地，國務卿赫爾所首創，而由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在建立聯合國機構中施行的程序，已成爲良好的先例。舊金山會議的成就顯示早在頓巴敦橡樹會議及雅爾達會議的智慧，列強在頓巴敦橡樹會議及雅爾達會議上已獲致問題中比較重要之點的協議。

柯衡和我擬妥設立外長會議的計劃。當我把該計劃交杜魯門總統考慮時，我們懷疑後來我們認明是

真的事：蘇聯不願立刻擬訂一個對德條約。我們知道因為當前有許多嚴重的問題，並且因為沒有德國政府，若干時日的稽延是勢所必然的。但我們認為應該迅速作一開端，並且我們關於對義及對巴爾幹條約的經驗，將使我們在德國問題上較易獲致協議。

我用下面的話將外長會議的工作預示給總統：外長會議將首先討論對義和對巴爾幹諸敵國的條約，因為這些都是最少爭論的。諸外長將協議若干一般的原則並任命代表起草以這些原則為根據的條約。稍後，諸外長將討論對德條約，協議疆界，及地方政府等根本問題，於是指派各代表開始起草一對德和約，這些根據普遍協議的和約，將照頓巴敦橡樹，議建議交舊金山會議審核的方式，提交所有聯合國國家考慮及修正。最後的對日和約也將遵循同樣的方針。

總統在考慮後批准這計劃。時在我受任國務卿前不久。總統把我們擬就的備忘錄交國務院批評。國務院的官員們原已想到同樣的方針，於是推薦此項程序。

這是一個良好的理論。但在某一假定上是有缺點的。我會假定在戰爭結束時，那些聯合作戰的國家將深切期望一個和平的時代，所以勢所不免的意見上的分歧，可以無甚困難地獲得解決。

在雅爾達會議開過後，我們已略為醒悟，這是真的，伯爾尼事件及蘇聯津反關於波蘭及羅馬尼亞的協定等事警告我們，在來日將遇到嚴重的糾紛，並且不得不設法克服根深蒂固的猜疑。但羅斯福總統根據他與蘇人交往的經驗拍給英相邱吉爾最後電文中所說的話尤在我們鮮明的記憶中，羅斯福說：這等困難是可解決的。

今日你易於說羅斯福總統的忠告和我們的假定都是不保險的。下面是一句老生常談但却是老實話：「先知者不如後覺者。」但，如你能回想德國人剛投降之日美國人民對蘇人的態度，你將同意，由於我們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受苦及犧牲的結果，蘇聯對美國所存的好意，縱然不比任何其他國家所存的好意

大，至少和任何其他國家所存的好意一樣大。蘇聯在最近兩年半之內竟不識好歹，不問青紅皂白地撤回他對美國所存的好意，這幾乎是一個悲劇。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合作的假定，及我們設法合作的耐性，使我們現在必須表示的堅決意志成為正當的。

我們的樂觀的確沒有因會議上批准設立外長會議的提案之速度而減少。邱吉爾和史達林都會問起我們在外長會議中包括中國的問題；蘇聯代表繼續反對准許法國躋入列強之林，當邱吉爾提示諸外長考慮會議應由四個或五個會員國組成時，史達林趕快加一句道：「或是三個會員國。」

諸外長在第二天早晨開會，我們贊同中國的與會應限於遠東問題和那些有世界意義的問題。莫洛托夫先生重申他的意見為法國祇應參加起草對義及對德條約。我們最後同意每一條約應由與某一敵國簽訂停戰條款的各國起草，關於對義的條約，法國將被視為簽訂停戰條款的一國。

我們在當天下午把我們的建議提交諸國首長。邱吉爾詢及外長會議起草條約應「持他們遵從聯合國的觀點」一語的意義。我解釋道這是我們全體簽過字的聯合國宣言所規定的。接着史達林作了一項聲明，這個聲明的重要性我們在以後數月才辨出，他說文書中包括這樣一句，不啻是說「三強將代表全體的利益。」

經過這樣簡單的交談，美國代表所提設立一外長會議負責擬訂和約的建議，就成了柏林會議第一條批准的議案。

我所摘記的與莫洛托夫先生於七月二十四日午餐上會談的記錄顯示我們的最高希望。我們討論第一次外長會議定於九月在倫敦舉行的計劃，我表示相信我們應組織外長會議，並協導指導我們的代表和他們的幕僚擬訂條約草案的指令。接着我又加上一句：諸外長應能於旬日左右完成工作，而諸代表的有效進行他們的工作將使我們以後的會議縮短。莫洛托夫先生顯得很歡喜這意見，我們討論到代表的任派，

外長會議與聯合國的關係及希望。在我們回國時就開始起草對義和約，對於這一切問題，我們顯得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愛著我們明白的協定之鼓勵。去赴諸政府首長的會議，會上所起的辯論恐怕要把我的樂觀抹煞了，但並沒有。會上討論杜魯門總統在開幕會議上提出的另一個建議——在歐洲解放區履行雅爾達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

我們的提案上明言雅爾達宣言中所規定的義務尚未履行。長此繼續下去，將使舉世視為缺乏團結的證明，並將中傷對於共同揭發目標之真誠的信心。我們建議聯合行動，改組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政府，容許一切民主份子參加，以為建立外交關係及締結和約的序幕。我們還建議我三國應協助保，羅兩國的臨時政府舉行「自由及無拘束的選舉。」

我們的提案所引起的討論和問題是值得注意的。這些討論和問題形成許多點鐘疲勞協商的背景。

史達林對我們提案的第一反應簡直就是蘇聯自己有一個關於這問題的建議提出來，莫洛托夫於次晨外長會議上提出了他們的建議。這建議致力於嚴厲攻擊希臘。艾登憤怒地稱此攻擊為「假託的事實，」指出國際觀察家們，包括蘇聯的若干代表在內，曾被邀觀察希臘的選舉。艾登又道：不幸的是不能說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也有此舉。他的結論道，英國政府「痛恨」蘇聯提案中的非難，這事祇有報告首相。莫洛托夫先生回答此項譴責僅是對希臘政府的。他斷言英國有比蘇聯更多的代表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並引述英美報紙的報導作為證明，他指責希臘有比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更大的不法行為。

我對於這次交談的貢獻為重述我已說過多次的聲明。我恐怕這是莫洛托夫先生從未充分了解或相信的一個聲明。我告訴莫洛托夫，「美國誠摯地希望蘇聯在她的疆界上有友邦，但我們認為蘇聯尋求人民的友誼而非任何一個政府的友誼。所以，我們要各政府成為人民的代表。如果選舉舉行時，不僅報紙

和廣播記者受到限制，連我們本國政府的代表都受到限制，美國人民將不信任由這樣一種選舉的結果而建立的任何政府。我們不願牽涉於任何國家的選舉中，但由於戰後的環境，我們將與其他國家共同觀察義大利，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選舉。」

這次會談中包含以後數月中熱鬧的爭辯。無論何時蘇人被迫於一個煩擾他們或使他們處於守勢地位的問題，他們的標準行動程序就是蒐集一束英美報紙來自希臘的報導而開始反攻。莫洛托夫先生常似準備享受其他國家新聞自由的幸福。

數天以後，我們的提案又被討論，會上有趣地顯出蘇聯討價還價的技巧。

莫洛托夫說：「蘇聯不能贊同監督選舉。雖然，我能懂得，其他盟國為她們在這些國家的代表要求更大的便利。現在戰爭已告一段落，有多種理由以更大的自由給予這些代表們以及報紙。他們將有充分獲知選舉消息的一切機會。」

莫洛托夫提了一個抗議和一項諾言之後，接着提出一件申訴說，蘇聯出席義境盟國管制委員會的代表未受到適當的有禮貌的接待。他說了這些搪塞的話以後，又建議如果我們同意在外交上承認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就來討論我們關於選舉的提案。

艾登解釋在和約締結以前，英國憲法上不可能予以正式承認。我告訴莫洛托夫，我們的承認一個國家，必須根據我們自己對該國的評價而非該國在討價還價中的價值。但莫洛托夫先生是一個不易氣餒的人，他繼續不懈地努力，促我們在外交上承認羅保二國以為酬答我們所期目的之交換條件。

蘇聯討價還價的努力大部分集中於對義問題。我們承認義大利在對德戰爭中的助力和她對日宣戰的功績，我們會要求修改義國停戰條款，我們會建議以起草對義和約為外長會議的第一件事務。

史達林委員長和莫洛托夫先生都決定凡未畀予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恩惠都不應畀予義大利。

利。但義國與匈、羅、保之間經常有一種重要的區別：所有的外國代表都可自由地在義國旅行及報告他們的觀感。在一次交談中，邱吉爾先生說布加勒斯特的英國代表團會被「納入檻中，近乎拘禁」時，史達林插口問他如何能說這種不確實的話。

邱吉爾先生臉泛微紅，他說英國代表團所遭受的困難種種將使委員長吃驚，「一座鐵柵已經包圍着他們。」

史達林叫道，「都是神話，」並且堅說在羅馬尼亞的英國代表們所受的禮遇，與義境蘇聯官員所受者相同。

直等到會議結束，我們把這個問題與賠償問題相連接時，我們才獲得蘇聯承認議定書中的第十節，該節首先敘述希望締結和約及與所有的五國恢復正常關係，接着敘述三強「已以擬訂對義和約為新外長會議所担任的急要工作中之第一樁。」繼而述及其他四國，如可能同時擬訂對其他四國的條約，即允許同時擬訂對其他四國的條約。我們應付承認問題時聲明，「三強政府同意在最近的將來，參照當時的環境，分別研究，在與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締結和約以前，儘可能與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應付報紙問題作這樣的聲明：「三強政府無疑議地鑒於因歐洲戰事結束而改變的局勢，盟國報紙的代表們將享有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的發展報導給世界的充分自由。」

我應承認我們確有若干疑議，但這是我們致力討論此問題達數小時之久後所能完成的最強有力的新聞自由約定。

同時，蘇聯已將第二組譴責希臘的提案置於桌上，顯為報復英國因反對南斯拉夫而提出的議案。當議定書中上述的一節最後獲致協議時，貝文先生指出議程上有兩件反對希臘的提案及一件反對南斯拉夫

的提案。他建議這三件都作罷。史達林迅速答覆「是，歡迎。」這事足以表明提出若干譴責及反斥的嚴肅性。

會議中另一件引起激辯的事，是羅馬尼亞境內已被蘇人沒收的英美所有的工業設備問題。作為蘇聯對財產權利觀念之一例，這事預先警告我們在賠償問題方面將遇到的困難。戰前，美國和英國的公司在羅馬尼亞石油企業方面有大宗財產，包括寶貴設備的所有權。德國人侵略羅馬尼亞時，他們當然把這些設備沒收了。我國人民以為當羅馬尼亞解放時這些設備自然將歸還他們，但我們驚異地發覺蘇軍已帶走這等設備的大部分作為戰利品，並堅持對大暹尚留設備的權利。我們不能承認蘇人有權利取他們盟邦所有的財產作為戰利品。史達林，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都強硬地堅持這些設備不屬於我們的人民而是德國的財產，是他們有權利沒收的。其中若干設備是英美商人戰前自德國買來的。但蘇人堅持既然這財產原是德國的，這財產便不屬於我們。

許多蘇聯的提案都是維辛斯基先生提出來的。他是一位幹練而有進取心的律師。當他坐在桌子的對面用冷靜，灰色，銳利的眼睛看你並且毫不寬假地爭論他的提案時，你不難了解他之所以被選為蘇聯大「清黨」審訊中的首席檢察官。

所有權問題中設備復置及確認等問題，已完全成為技術上的。經過長時間的辯論我們才得指派蘇美及英蘇專家委員會調查我們的要求之合法性。

在會議開幕的一天，史達林宣佈他希望討論託管問題，說道：蘇聯「想要些戰敗國家的領土。」他的代表團遵此提出一案，建議蘇聯被舉為義大利一處殖民地的受託國，大西洋憲章是一項被遺忘的保證，他要領土——顯出他對託管的觀念。

當這一項提案置於議程時，邱吉爾先生甚至不願討論它。總統立即說明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屬於和會

及聯合國的問題，但不應對討論提出任何限制。爲此，邱吉爾先生發表一項憤激的聲明。

他說，「英國不希望自這次戰爭中得利。我們已蒙受可怖的損失。我們在生命方面的損失沒有我們英勇的蘇聯盟邦重大。但我們經過了這次戰爭已成爲世界上一大債務人。我們沒有恢復與美國平等的海軍之可能。我們在戰時僅建造主力艦一艘，却損失十艘或十二艘。但我們雖已蒙受重大的損失，我們並未作領土的要求——沒有要哥尼斯堡（Königsberg），沒有要波羅的海沿岸的國家，什麼都不要，所以我們是以大公無私的精神來解決殖民地問題。」

邱吉爾先生又道，「英國，當然，有重大的利益在地中海，任何現狀的顯著改變將需要長時間及審慎的考慮，」並且他要求史達林委員長說明蘇聯所希望的是什麼。

史達林回答說，「我們想知道此次會議是否將考慮義大利究竟是否喪失殖民地，如果是的話，我們才能決定這些殖民地應託那些國家管理。」

邱吉爾先生說：「我沒有考慮到蘇聯想要得到非洲海岸一大塊土地的可能性。假如是這樣，這就將得和許多其他問題加以考慮。」他說，這個問題恰屬於和會討論的範圍，殖民地的最後管治是聯合國處理的事。

總統最後插入他的意見。他建議這項問題提交外長作進一步的討論。總統的建議被接受後，會議席上的緊張情緒顯然轉爲鬆弛。

嘗外長集會討論這項問題時，莫洛托夫先生立即建議對這些殖民地的未來地位作一個具體決定。我提醒他杜魯門總統的聲明裏說，要作這樣的決定只能與和約有關。我告訴他一個月以內將開始處理這項問題，莫洛托夫同意等待。

蘇聯想進入地中海的願望，在討論關於管制達達尼爾時，更適度地但仍鄭重地表露出來。邱吉爾先

生首先提出這項問題。他以前曾和史達林委員長談到這點，現在他再度表示他願意參加修訂的協議，這協議將保證在平時或戰時，蘇聯的海軍船隻和商船自由通過海峽。然而他覺得重要的是土耳其不應當受到不當的驚恐，他提出由於蘇聯對卡斯（Kars）和阿達漢（Adahan）兩省和海峽中一個海軍根據地的要求而引起的關切。

「這個，」邱吉爾先生說，「已使土耳其對她的帝國完整和防衛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力量感到恐懼。」

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解釋說，對於上述兩省的要求是由於土耳其對蘇聯提出訂立同盟條約的建議。他們認為除去這兩省在沙皇（Czar）時代是俄國版圖的一部份外，蘇聯在簽訂一項同盟條約時理當規定以後她負有義務防守的疆界。史達林形容蒙特婁公約（Montreux Convention）是「仇視」蘇聯的，因為她給俄國的權利和日皇同等。他說土耳其太弱，不能給自由通航提供任何有效保證，因此，應當使蘇聯能夠防衛海峽。

「美國們同意修訂蒙特婁公約，」總統說。「然而，我們相信海峽應該是全世界都可通航的自由水道，並且獲得我們大家的保證。」

這樣地把問題提出了。蘇聯想海峽的自由通航由蘇聯或由蘇聯和土耳其兩方保證。這是說他們的武裝部隊將駐防土國境內。我們希望海峽的自由通航由聯合國保證。

蘇聯領袖對於達達尼爾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俄國矚目於她鄰國的這一塊區域有一百年。一百年前他們現在所尋求的防禦工事會有極大軍事價值。就今天說，假如沒有完全的空軍優勢，他們在海峽的防禦工事將毫無作用。

關於這一點，杜魯門總統說他深信假如貨物和船隻自由通航的障礙能夠消除，就能採取一大步驟致

力阻止歐洲再起戰爭。他接着提出我們所準備規定內陸水路自由無阻通航辦法的建議。

史達林說他不準備討論這項建議，理由是這項建議並不列於議程以內。總統和我們以後雖作了若干次努力，但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結果是協議把這項建議提交外長會議留待以後討論。當起草會議公報時，史達林反對有任何提到這一行動之處，他所說明的理由只是沒有需要和公報已經太長。

七月二十五日會議因為幾個星期前英國選舉的投票要在下一天結算而臨時休會。艾德禮先生會隨邱吉爾先生同來開會，為的是不論選舉結果如何英國代表的繼續一貫性將可保持。（按艾德禮先生當時是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

在邱吉爾先生和艾德禮先生回國聽取選舉結果的前一天，我問邱吉爾先生他以為他繼續留任的機會怎樣。他說他不知道結果如何，但指出自認了解選舉情形的人却推測保守黨將可在下院中保持大多數席位。他覺得勝利很有把握。另一方面，艾德禮先生給我的答覆表示他相信工黨將有良好表現，但將失利。有趣的一點是當我們在爭執被解放區應該怎樣進行選舉時，這兩位英國領袖在英國人民和英國海外武裝部隊投票幾個禮拜後，還完全不知道推動工黨上台的浪潮是如何地汹涌澎湃。其結果對我們會和他們討論到這一問題的人是非常驚異的。

英國新首相回到波茨坦時，貝文（Ernest Bevin）回來繼艾登外相的遺缺。就個人說，艾德禮和貝文以及邱吉爾和艾登這兩對極為不同，人與人間所可能的區別在他們兩對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印證。艾德禮先生在外貌以及態度（這方面更確實）上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大學教授。他講話不裝作雄辯，只明白而仔細地提出他的觀點。他非常謙和，態度不生動引人注意，要描劃這位吸引廣大羣衆的誠摯和莊嚴的人是件難事。

艾德禮先生和貝文先生到後不久曾訪問總統，我們四個人隨後討論到會議的工作。總統提到蘇聯對

於東普魯士的要求，並在地圖上指出假如依照蘇聯的要求，德國波蘭和蘇聯的疆界的改變將是怎樣。貝文先生對這些疆界即時有力地提出他的激烈反對。他的態度很激烈，以致使總統和我懷疑我們將怎樣和這位英國新外相共事。過了些時我告訴貝文先生在我們第一次會面時他所給予我們的印象，又說我們不久就對他的率直態度表示敬佩。我所說的話却使他感到滿意。實在說我和貝文先生會晤不久就對他的清晰頭腦，率直了當，坦白熱誠和對於諾言的謹嚴遵守極為尊敬。我不僅非常欽佩他的能力，我真愛他的丈夫氣概。

就我們所能辨別，邱吉爾先生和艾登先生接了艾德禮先生和貝文先生，英國在會議中對於各項問題的立場却沒有絲毫改變。英國外交政策的這種繼續一貫性給我深刻印象。後來在倫敦發生的一件事說明對貝文先生印象深刻的並不只是我一個人。貝文先生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時發表了一篇關於英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有一位密切留心國際問題的英國女士（他自然會將貝文最少有二百五十磅重的龐大身軀和艾登的修長身材做過比較，）和一位美國友人坐在會場樓廂中聆聽貝文先生演說。在貝文演說時，她掉頭對她旁邊的朋友說：「艾登演說得不壞，但他似乎長壯了一點。」

新英國領袖到達後，會議繼續進行，我們開始奮力討論我們面前的最困難問題——德國問題。

我們抵達波茨坦時面對着相當於一個既成事實的情勢，這就是就波德邊疆問題說。在雅爾達會議前，三強會同意把德國分劃為四個佔領區，並在雅爾達議定書的第六章中明確宣佈波蘭西部疆界的最後定界應該等待和會決定。議定書雖然似乎不容誤解，但我們在離開美國到德國去以前，已知道蘇聯沒有和英國或美國作任何諮詢，便將尼塞河以東的整個德國領土交予波蘭管治。

杜魯門總統和邱吉爾首相都會即時要求對為一切實際目的建立另一區域的這一片面行動提出解釋。總統說這種行動不僅違反協議，且將使解決賠償等等問題更感困難。

蘇聯的辯護是德國人在蘇軍進入前逃跑一空，因為在這區域中必需有一政府，所以他們准許波蘭接管行政。史達林委員長同意任何一國都沒有創立新區域之權，但蘇聯政府必須獲得紅軍後方情況穩定的確證。他後來承認波蘭事實上從這個區域搬走大量的煤，關於這方面，我們指出當然應該被認為是賠償的部份償付。

總統問，「假如德國一部分領土，在我們對於賠償應當是什麼的一項問題商獲協議以前就割掉了，賠償問題怎麼可望解決呢。」

史達林說總統所說的都是沒有關係的話，「因為在克里米亞會議中沒有割讓任何疆界，除了關於波蘭將能獲得領土的規定。」

「西部邊疆問題沒有規定，」史達林說，「蘇聯不受約束。」

總統重複說：「你們不受約束嗎？」

「不，」史達林回答。

我們還憂慮由於蘇聯這一行動將有更多的人離鄉背井。史達林雖說「在將給予波蘭的區域中沒有一個德國人留在那裏，」（戰前這個區域的德國人口將近九百萬人），但我們的報告說明那裏至少留有兩百萬名德國人。後來，波蘭政府的代表承認留下的德國人約有一百五十萬，但說假如這塊區域劃歸波蘭，上述的一百五十萬人口中就將有很多會自動遷離。

波蘭總統比魯特(Berut)在七月二十四日舉行的外長會議中提出波蘭對於德國東部的要求。他指出假如他們所要求的區域都給他們，波蘭整個區域將仍小於戰前，因為根據克里米亞決定，東面十八萬方英里的領土將移歸蘇聯。然而，他說德國東部區域將使波蘭獲得更健全的經濟和更同族類的人口。

邱吉爾先生曾指出，蘇聯所支持的這項計劃將取去一九三七年德國邊界以內近四分之一之可耕地。

他強調說德國的食糧供應不僅將因此斷絕，同時還將有一百萬以上的德國人被迫遷入西部佔領區，「帶着他們的嘴去吃。」

總統在討論到波蘭的要求和承認佔領期間波蘭在該區的行政權的存在問題時，一再指出在和會召開以前不能有領土的轉移。此外，我們特別避免允諾在對德和會中支持以任何特定界線為波蘭的西部邊界。

我們審慎地避免對波蘭疆界提出諾言，我們在議定書中關於將哥尼斯堡城讓予蘇聯一點所作的諾言中已經強調了這一點；我們說：「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宣佈他們將在未來的和約中支持這次會議的此項建議。」

柏林議定書為要避免波蘭或蘇聯聲述界線已經劃定或已有任何支持某一特定界限的任何諾言，特指明說，「三國政府領袖重申他們的意見如下：波蘭西部疆界的最後定界應該留待和約解決。」

從這一段史實來看，如有任何人力言波蘭西部疆界已由參加會議的人規定，或說已經應允將波蘭西部邊界在某一地點加以確定，是難令人深信的。

然而我們在一開始時，就已看出我們在當時將須接受波蘭在蘇聯佔領區內這一區域的行政權。這已是一件既成事實，我們不能強迫蘇聯恢復担負他們所已自動放棄的責任。但在我們討論賠償問題以前，甚至關於臨時行政權一點都沒有商得協議。

自雅爾達會議以後，蘇聯和我們關於賠償問題大有異見已很明顯。我們同意賠償應該取自「實物」的付給而不以現款方式支付。但在雅爾達會議至波茨坦會議期間，賠償委員會的歷次會議已表明我們的協議並沒有進一步的進展。

第一點是二百億元的數額，其中一半（或一百億元）撥歸蘇聯。邁斯基先生曾在雅爾達會議中提出

這個數額，羅斯福總統接受這個數額作為賠償委員會的「討論基礎。」當賠償委員會在莫斯科開會時，我們的代表鮑萊先生的一再努力，終沒有能從邁斯基先生得到支持這項數額的任何論據。在波茨坦會議中，史達林委員長和莫洛托夫先生都力促規定一個具體數額。我們最後協議從已經同意的宣言中刪去，任何以美元或設備噸位表示總額的語句。

莫斯科賠償委員會會議中的主要難題，是在我們堅持在德國能出口足額貨物償付它的主要輸入物資以前，它的出產不能撥充賠償。我們在這一點上也是依據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那時美國的貸款被用來幫助德國購買原料，把原料製成貨物後再運到其他國家支付賠償。我們決定我們不能再給德國支付賠償，因此我們主張必需的進口和墊款，在德國可以出口的產品中必須首先抵還。

我們希望使賠償問題成為全面經濟設計的一部份，這個願望碰到現實的困難。我們預期除了戰利品外，任何佔領軍隊假如沒有履行嚴格的會計手續都不得把任何財產遷離德國。要履行嚴格的會計手續，是爲了遷移物資的價值可以在以後所協議的任何賠償方案中扣算。但甚至在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就已接獲報告說，蘇軍已把決不能認爲是戰利品的財產和設備遷離德國。這些報告中有些使我們不願置信。但在我們到達德國後，對這些報告已沒有懷疑的餘地，我們在德國不僅接獲日擊者的報告，我們本身也得有確實的明證。

總統和他隨行人員的居處原來是德國一個電影製片公司總經理的住宅，據說這個德國人已被帶往蘇聯。他的妻子是美國代表團其他團員的一所住宅中的女僕。「小白宮」裏原有的陳設已撤除一空，後來因爲舉行會議的緣故，又把其他住宅的傢具搬了過來。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萊敦和鮑萊先生看到在美蘇佔領區分界線的某一點上，蘇方會於分界綫最後劃定以前，把那裏一所工廠（這個工廠後來留在美軍佔領區內）的機械撤除，運到距分界綫不過二百碼的蘇聯

區域，機械運到那裏就被擱在空地上。柏林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的工廠的一切機械據他們所見幾乎全被撤除。他們還視察了一些其他工廠，這些工廠是製造人製絲，冰和光學儀器的，情形也是一樣。

鮑萊先生曾和邁斯基先生詳盡討論到這個問題，邁斯基先生承認除財產可列為戰利品之外，佔領國如不以會計報告交給其他國家，便不恰當地把這些財產撤離德國。邁斯基先生想給可以包括傢具，沐浴裝置，銀器，煤和其他非軍事物資的戰利品下一個定義。他發覺這是不可能的。

最後在七月二十三日舉行的長會議中，我問莫洛托夫先生，蘇聯當局已取走他們佔領區內大量設備和物資（甚至包括家用物品）是不是確有其事。

「是的，這是的，」莫洛托夫先生回答我說。他接着說，假如這使我感到煩悶，他將願從他們的賠償計劃中減去一個適當的數目來抵銷已有的撤移；他建議這個數目可以規定為三億元。在我對這點表示反對後，他即時建議把他們的賠償要求從一百億元減為九十億元抵銷已有的遷移，「並由此而把賠償問題解決掉。」

但在巴黎，在紐約和一九四七年春在莫斯科，莫洛托夫仍然要求一百億元。

使財產遷移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波蘭在德國東部的行動，史達林承認德國東部的波蘭人取用西里西亞（Silesia）煤礦的煤產。莫洛托夫先生說，這個區域「必須另作考慮。」

我們代表團會從長考慮到這些實際問題。我們知道假如從全部德國獲取賠償，我們將須要求蘇聯提供一項會計單。我們深知他們甚至不能對他們所遷移的財產物資提供準確價值的估計，我們知道建立並保持這種會計辦法的努力，將會是造成經常磨擦，控告和惡感的來源。

克萊敦先生，鮑萊先生和我最後認為當前情勢中的唯一辦法是勸各國從自己的區域內滿足它的賠償

要求。我會和美國前駐蘇大使戴維斯討論到這一點，他也認為這是解決的辦法。後來經過總統的同意，我接洽在七月二十三日和莫洛托夫先生作一次私人會晤。

我說美國「深深關切」賠償問題的發展。我們時常贊同由三強訂立一項政策對德國經濟問題整個地加以處理，但我們沒有辦法看出蘇聯關於戰利品遷移等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怎樣能和一項全盤性的賠償計劃調和一致。我強調說我們很害怕「解決這些實際情況的努力將會在三國極無團結一致的時候，引起不斷的爭吵和異議。」因此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相信還是宜於考慮各國從自己區域取得賠償的可能性。

「就被認為對於平時經濟並無需要的工業設備」的價值說，其中近百分之四十是在蘇聯佔領區以內。我們建議將西部佔領區內這類工業設備的百分之十給予蘇聯。假如蘇聯希望要從英美佔領區獲得某種其他設備，這些設備可以用德國西部人民所需要的食糧或煤交換。

莫洛托夫先生答應把這項建議提交史達林委員長，供他考慮。

在艾德禮先生和貝文先生到達的前一天，莫洛托夫先生重提到這項問題。他抱怨說我們想不接受二百億元賠償總數的建議，想改變雅爾達會議中所作的決定。我從很多方面向他解釋，讓他了解羅斯福總統接受這項協議「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不是接受一種約束。

我告訴他說，「假如你回我要一百萬元，我告訴你將商討這項要求，這並不是說我將給你開一張支票。」莫洛托夫經過我這樣的解釋還是不能同意。因此我向他指明我們不僅曾接受這項建議作為討論的基礎，鮑來先生還留在莫斯科三十五天討論這一件事，他後來又到柏林，我們繼續就此進行討論。由於我以前對他解釋的許多原因，我們在此次討論後已決定那個數目事實上不可能。

艾德禮先生和貝文先生一到達後，我就去訪問他們，經過幾小時的討論後，獲得他們在原則上同意我們建議的結果。第二天，總統和我接洽和史達林委員長與莫洛托夫先生會晤，但史達林委員長傷風不

適不能參加。莫洛托夫來了。

我們聲明我們同意由三強平均分配德國的艦隻和商船，關於這一點，自會議開始進行後，蘇聯代表一直極力堅持。我們請他接受我們關於賠償問題所提的計劃。莫洛托夫先生因此宣佈蘇聯準備「在原則上」接受我們的建議，但願決定若干「細節。」主要「細節」是從魯爾交予蘇聯的設備的數量，他建議規定適當的數量為價值二十億元的設備！

我們解釋規定設備的現金價值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同意規定若干百分比的設備可以撥充賠償物資。莫洛托夫先生非常堅持要規定一個現金價值的數額，他說要不然，「百分比的數額就毫無意義。」

在討論時他說經濟委員會工作進行得不很好。我知道這是批評他的代表邁斯基先生沒有能力在某方面給蘇聯佔領區物資的遷移提出辯護。但我弄不清是怎麼一件嚴重的事使蘇聯代表不能提出有理的回答。自莫洛托夫提出這點批評後，曾任蘇聯駐英大使十年，英語流利的邁斯基先生就沒有在會議中出現過。

七月三十一日，我告訴莫洛托夫先生有下列三項待決問題：賠償，波蘭所管理的一部份的蘇聯佔領區以及涉及義大利和巴爾幹國家而我們定名為「參加聯合國」的文件。我提出一項建議，其中包括我們所願作的唯一讓步，並請莫洛托夫先生把這三項建議提交史達林委員長，好讓在下午的會議中提出討論。我告訴他我們要協議就協議三個，不然，就可不談，我告訴他總統和我將在第二天啓程返國。

那天下午舉行會議時，總統即時建議討論第三項建議，並叫我把三項建議提出。我提出了，強調說這是一項建議。

史達林委員長表示對「貝爾納斯先生的策略」（要求一次同時考慮三項建議）不同意。我答覆我們在過去三星期內會每次討論一項建議；我們現在把我們所願作的讓步一次提出，完全是爲了就三項建議獲

得協議以便結束會議的討論。因此，我們堅持這個程序。史達林又提出他的抗議，接着談判開始。他首先提出賠償方面驚人的增加數額，其次，他建議把從西部佔領區移往東部佔領區換取食糧，煤和木材等產品的生財增加至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我說假如他撤回他的其他要求並同意爭論中的其他兩項建議，我們將同意增加到百分之十五。他表示同意，會議於是在不久以後就宣告結束。

莫洛托夫至少在當時已撤回他關於共管魯爾的建議，這是蘇聯在西歐的一個主要目標。下列若干問題如關於佔領德國的經濟原則（包括視德國為一經濟整體的契約）；有秩序地遷移德國人口和修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境內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程序，迅速商獲協議，這便一部分地迎合了我們在爲實踐雅爾達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各國的宣言所提文件中列舉的若干要求。

我們同意促使我們的代表就審訊主要戰犯的程序迅速採取行動。假使發動戰爭的人在他們的頭上沒有光輪圍繞，反而賴子被套上繩索，將使戰爭少掉一些歡樂的成分。

要注意的是在波茨坦議定書中並沒有現有生產償付賠償的任何規定。所有以前的討論都被波茨坦關於賠償問題的正式協議一筆勾銷。蘇聯在一年以後重提它對從現有生產中獲得一百億元賠償以及繼續利用德國勞工的要求是不能原諒的。

依據下述的事實，要德國從她現有生產中提付賠償更無理由，單在西里西亞區域一地（這只是現在由波蘭管理的地區的一部份），可以徵稅財產的戰前價值是一百十三億元。波蘭同樣聲辯說她應該得到這個區域，因爲雅爾達決議將寇松線以東她十八萬方英里的土地劃歸蘇聯。此外還有東普魯士，關於這一區域，我們會向蘇聯提出保證，這個區域內可以徵稅的財產的價值遠二十五億元。這些區域的資源實在應當視爲賠償解決辦法的一部份。

縱使這個數額不夠慷慨，我認爲我們應該知道現代戰爭的情況既是如此，任何國家要對它所遭受的

損失覓求比例的賠償可說是目光短淺，徒然無謂。

由於史達林委員長在波茨坦會議討論賠償問題時會明白說出他「不喜歡貝爾納斯先生的策略，」我想他是認真地動了氣。就在波茨坦會議快要結束時，史達林委員長請總統允許他說幾句關於「工作得或許比我們任何人辛勞的貝爾納斯先生」的話，史達林委員長的這一舉動因此令人感到驚異，並且明顯表示蘇聯尊重以堅定的立場進行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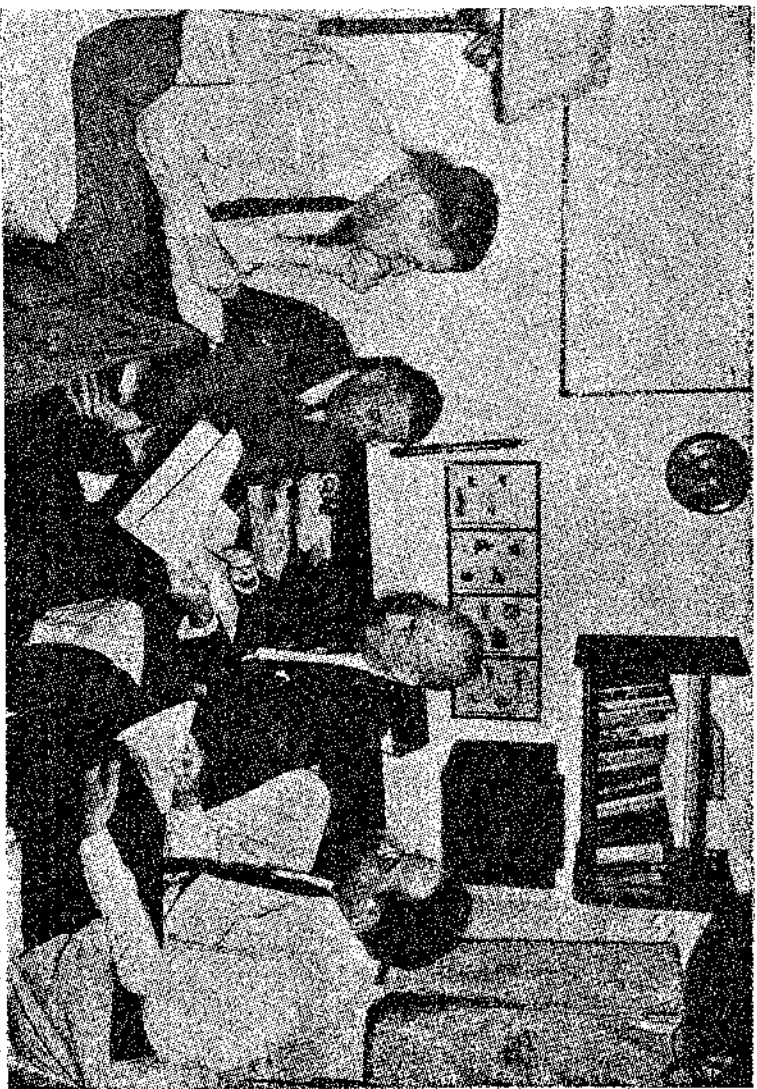
史達林接着說：「他促成我們協力商得很多很多的重要決定。」總統表示希望三巨頭下次開會時，地點能夠是華盛頓。

「只要可能，但願如此，」史達林回答說。

會議在愉快的情緒中結束。但登程返國的美國代表團或者不及出席雅爾達會議後返國的美國代表團那樣自信，事實指明在會議中所商得的協議必須要在經驗的堅硬鐵砧上錘擊出預期的成果。然而我們認為我們已建立了一個保持我們戰時誕生的團結的基礎。我們關於東歐的努力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成功。我們沒有能夠使義大利免付賠償。我們認為我們在奧國問題方面已獲成就。我們認為在關於德國問題的協議方面獲有真正的進展，雖然還有充份的理由使我們害怕將需很長的時期才能使蘇聯對德國問題的解決辦法開始工作，然而，我們相信我們關於賠償問題所商獲的協議，已使我們可以避免指責他們遷移自己佔領區內人民和財產的片面行動。

確實地，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料到和平的第一批條約要再經過十六個月幾乎不斷的協商後才能訂立。我們認為會議是成功的。我們堅決相信商得的協議將為及早恢復歐洲的協定提供一個基礎。

我們商得的協議確使會議圓滿成功，但那些協議的遭受破壞已使成功變為失敗。



衛柯，斯納爾貝，修馬，倫包起左，工作的上艦「他斯古奧」在中途議會坦茨波赴

第二卷 和約——走向和平的五個步驟

第五章 倫敦會議的挫敗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我列席參院外交委員會，會中正考慮對義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匈牙利的和約。委員會那時受到很大的壓力，主要來自美籍義大利人的集團，而想拖延該會的行動。拖延的理由，確在使和約不能成立。我在敘述美國於十六個月的艱苦談判中，怎樣採取主動地位以後，並籲請委員會顧到和約如遭拖延，而我們放棄領導地位後的種種後果。我接着要求議員們記住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最後一次國情咨文裏所說的話：

求全主義(Perfectionism)不亞於孤立主義，帝國主義或是權力政治，也將阻礙國際和平的道路。我們不要忘記二十五年前退守孤立主義的時候，並不由於對國際合作的直接攻擊，而是針對一般所說的和平缺陷。

在下次大戰後的失望時期中，我們甯取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而不與國際間看法想法不盡和我們相同的國家合作。我們放棄了逐漸獲致一個較好和平的希望，因為在一個大家公認為不完美的世界裏，我們沒有勇氣去完成我們的責任。

我們決不能讓這些再度發生，否則我們將重蹈悲慘的覆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路。

在我們致力於締結對奧國，德國及日本的和約，並且注視聯合國機構內國際關係的演進時，都應該記住這些話。

可喜的是，委員會同參議院，都遵循這些言詞的精神與羅斯福總統的智慧而行動。委員會對和約一致贊同，而參院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以七十九票對十票批准了對義和約，並且經口頭表決，批准了他的和約。

良好的政府，在於覓求最大多數的一致同意。這個原則，適用於國際會議以至各縣的法庭。這裏所述關於我們對歐洲四國和約努力求得一致同意的故事，不僅爲了其中的真正利益與重要性，也是估計將來許多問題如何解決的一種方法。

我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搭「伊麗莎白皇后」號赴倫敦出席第一次外長會議，我已經做了兩月的國務卿。從德國回來後的二十八天之中，充滿了許多行動。計有第二顆原子彈投落日本；蘇聯對日本作戰；日本投降，對佔領日本的部署；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與外長皮杜爾的訪問；戰後租借法的清理問題；對中國分裂黨派的竭力拉攏；各部會人員的任命，包括艾克遜 (Dean Acheson) 被任爲副國務卿，柯衡被爲參事，以及羅塞爾 (Donald Russell)，布拉登 (Spruille Braden) 與班頓 (William Benton) 被任爲助理國務卿。最後，有極重要的倫敦會議的準備工作。

在船上，我開始就國務院專家們準備的各種建議與替代建議努力工作。共和黨外交問題首席發言人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接受了我的邀請，參加代表團，我們與國務院人員每天聚會兩次，籌劃美國在會中對所有問題的立場。

在這些會商中我們所特別關切的事項，有一件便是蘇聯擴張的明證。我在白宮的地圖室內，會找到雅爾達協定關於千島羣島，庫頁島，大連及旅順港的規定。

在波茨坦，我們遇到蘇聯的各種要求，主張把德國東部的大片土地讓予波蘭，來補償蘇聯從寇松線東部取去的波蘭土地；她要求得到哥尼斯堡，(Königsberg) 要求參與魯爾區 (Ruhr) 的行政管理；並要求

控制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蘇聯想控制巴爾幹各國的決心已經很明顯，在波茨坦，她要求管制義大利北非殖民地的一部分，最好是黎波里坦尼亞(Tripolitania)。

最後的這個要求，尤其令人困惑，因為各種事態使我深信蘇聯在這片領土上的利益，主要是屬於軍事。在戰爭期內，他們對於經濟性的，並且顯然直接對他們有利的情形下，表示有意參加各國共同的多邊措置，但在牽涉到軍事與安全問題時，就主張片面行動了。

我們最後決定，我們的政策，應該促進佔一百餘萬方英里土地，與三百多萬居民的那些殖民地的獨立。而在準備獨立時，應由聯合國憲章下成立的託管機構治理。問題就在誰應該做受託國？國務院有些官員建議義大利繼續為聯合國充當受託國家。初聽時，這彷彿是最簡易的解決方法，但却別有強大的反對理由。

義大利對殖民地的治理，是毫無效率與勒迫壓榨。因此，在非洲戰爭時，當地土著對聯合國的宗旨表示同情，並予英國以極大協助。英國人在酬答勝納西部落(Senussi Tribes)的協助時，曾經允許他們不使義大利再來管制他們的土地與人民。據調查所得，義大利管制這些殖民地，每年都要招致財政上的損失，而文職人員的薪俸還是少得可憐。在美國撥救濟金給義大利的時候，讓義大利去接受這種財政負擔，似非明智。

義大利將成立什麼的政府，很難預料。殖民地對於她，除了是一片練兵之地以外，已經證明沒有價值，而在我們考慮着的和約之下，義大利不需要有大塊訓練軍隊的地區。但是超越於這些考慮之外的，是我們認為託管制度應該建立的信念，其目的僅在協助殖民地的居民發展其成立自治政府的能力，以便可准他們獨立。懷着這些思想，我便請我的一位助手準備一個在聯合國之下進行集體託管的建議草案。

我們到達倫敦，開始起草和約的工作，這使我極為高興。四週在戰時所遭破壞的景象，彷彿在提醒

我們所負責任的重大。從我在城中短程散步或乘車疾馳時的觀察所得，我認爲彌補這些破壞損失，至少要十五年。但我對人們的印象總較這些建築物爲深。我深爲英國人民的堅忍與勇敢所動。戰爭的結束，只帶給他們死亡人數的減少，但他們仍接受了所有的配給與規定。其精神的堅毅安詳，與我們國內爲少數物品的缺乏與管制而致喧囂吵鬧，實在是一個尖銳的對照。

外長會議九月十一日開會，我們對會議的組織與規程，立刻遇到許多十分分歧的意見。莫洛托夫甚至要求討論對日本的管制，真使我大爲吃驚。兩天以後，我們才算能開始討論對義和約。

會中同意以英國的草案作爲我們工作的基礎，各種將變成老朋友的問題立即出現。義南邊界，多得喀尼斯羣島（Dodecanese Islands）與義大利殖民地問題。莫洛托夫先生表示南斯拉夫如不出席，則不願討論邊界問題；而在我們討論義大利殖民地之後，他才願討論多得喀尼斯羣島。因此我提議邀請南斯拉夫與義大利代表出席陳述意見，並且提出我們在抵達倫敦後即告完成的義大利殖民地建議案。

我們的建議案，主張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指派一個行政官，蘇聯也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行政官將爲國際公務員，由任何會員國中指派，在行政官之下，設立顧問委員會，由英，法，蘇，美各派代表一人組成；義大利，及被託管領土的人民亦各派一代表參加。如果行政官不能盡責，而使顧問委員會中任何一國不滿時，可以由任何一國向託管理事會提出。我們的計劃並且主張託管在十年後宣告終止。

我在會中說：「這個計劃，能保證義大利殖民地不致爲任何一方的軍事利益而發展，如屬必要，並將由安理會決定在這些殖民地可能建立戰略基地的地點。這個計劃，將使世界人民歡欣鼓舞，因爲要顯示與會各國意欲實行諾言，並准許這些民族儘早抉擇他們生活於其下的政府。」

皮杜爾先生主張由義大利做受託國，特別是在託管理事會尚未成立，而且集體託管的如何進行尚不能有所表明的时候。王世杰博士立即表示中國代表團充分同意我們的建議。貝文先生聲稱這是一個新建

議，他要加以研究。他提到英國在戰時對勝納西部落的諾言。並說他不能先自答應，且希望知道其餘建議案是否將予考慮，因為他要使各自治領有機會將意見通知各外長的代表。其次，便輪到莫洛托夫先生發表意見。

他說，蘇聯代表團建議託管原則應用於若干義大利殖民地，由各國個別成爲各殖民地的受託國。他懷疑我們是否能努力就指派行政官一事獲致同意。他又說，他不願掩飾蘇聯政府要求一個個別託管地位的願望，這種要求的根據，是義大利黑衫軍(Black Shirts)十個師又三個縱隊侵入蘇聯時所造成的損失。他指出蘇聯政府在「不同民族之間建立友好關係」的「廣泛的經驗」，並建議把這種經驗應用於的黎波里坦尼亞，而且保證十年光陰足夠使該處準備獨立生存。

在一次秘密會談裏，莫洛托夫先生向我建議美，英，蘇三國，應該各爲一處殖民地的行政官。我告訴他我們對這點不能同意。

我告訴他說，我們的代表團，認爲就個別政府的管理權獲致協議，遠較就個別行政官獲致協議爲難，後者不會被指爲利用殖民地，而圖謀商業及軍事上的利益。這些領土必須構成一種託管地，決不能認爲戰爭的贓物，或是戰時所遭損失的賠償品。三處殖民地由三國瓜分，而不限制其軍事發展，不能有助於和平，反將播下紛爭的種籽。

當日下午，貝文先生提出英國的立場。他以特有的率直作風，說明英國不能同意蘇聯對的黎波里坦尼亞行使個別託管的要求。這種要求既然基於義大利軍隊在蘇聯所造成的損失，那末他只好被迫指出英國及其自治領對義大利作戰，遠在義蘇戰爭之前。他說，英國承認蘇聯在東歐的利益，並且已經支持蘇聯的要求，他對於蘇聯並不承認英國在地中海相同的利益，表示驚奇。貝文於是宣佈他支持我們的建議，但須加以修改。他不願受美國建議對於索馬利蘭(Somaliland)與厄立特利亞(Eritrea)實施時的束縛。

但對於利比亞(Libya)與的黎波里坦尼亞，他表示同意，「因為這是一種偉大，嶄新，而未經嘗試的考驗，同時因為英國希望在此一區域內，避免強國的衝突，至於厄立特利亞與索馬利蘭，他建議各代表願到阿比西尼亞(Ethiopia)獲得出海口的權利，並在願「予這些人民以較佳生存機會」的各國之間，謀取領土的調整。

後面這個建議，當然可以為我們接受。皮杜爾先生依舊保留他的意見。他說，法國在我們建議的細節能更形確定以前，「甚至在原則上」亦不能表示接受，他並且指出利比亞與法蘭西聯邦毗連疆界。顯然地，他怕允許的黎波里坦尼亞獨立後，將在法國領土上發生影響。

莫洛托夫先生是精明厲害而且絲毫不苟。他要討論的黎波里坦尼亞問題。他稱，蘇聯在北方有一個出海口，而鑒於蘇聯的廣大領土，在南方也應該有一個海口，「尤其是我們現在有權在遠東使用大連與旅順港時，」更應該如此。

他說，「蘇聯應該取得她所應得的地方，因此在地中海應該有商輪的基地。我們除當地人民所求取的民主秩序之外，並不把蘇聯的制度介紹進來。」他又說，「這不會依照在希臘所使用過的方針去做。」

在同莫洛托夫先生的私下會議中，我們與蘇聯人在語言上，顯然發生了另一困難的誤解。在舊金山會議考慮聯合國機構內建立計管制度的問題時，蘇聯代表團詢問斯退丁紐斯先生，美國對蘇聯負責某地的託管，將抱什麼態度。斯退丁紐斯先生作一概括的答復，表示蘇聯「有資格」在託管制之下，接受某地的管理權。莫洛托夫先生認為這就表示我們將支持蘇聯對某地託管的要求。他告訴我，他對我們反對蘇聯託管的黎波里坦尼亞的要求，甚為驚奇。他承認字面中並未特別規定為義大利殖民地，但蘇聯只有在這些殖民地中間，才有獲得託管的機會，所以其含義必係指此而言。

他一再重複這點，最後我說道：

「在美國，任何一個公民都肯資格成爲總統，但不是說每一個公民都將要做總統。如果你老是重複說我們答應過支持你對託言的任何要求，那末你自己不久就會相信這是我所說的話。」

我看到我並沒有說服他，因此我再度嘗試。

「如果我告訴某人，我認爲他有資格享用一所房子，我並不是說倘若他要求取得蘇聯大使館時，我必須支持他對這房子的要求。」

這也沒用處。他依舊相信斯退丁紐斯國務卿既有聲明在先，則找到一處可以使蘇聯心滿意足，行使託管權的領土，就是我們的責任。

這些全是開始的爭論。在以後的十六個月中，常常改頭換面，加些花樣的提出來，一直到我們明白知道這問題在目前不能解決爲止。其結果是，除非能預先獲得協議，否則軍政府就將繼續到對義和約生效一年以後。如果四國在那一年內不能謀得協議，則殖民地問題，將由聯合國大會決定，在大會中是無需一致協議的。

我們對多得喀尼斯羣島問題，也不能協議。會中四位外長認爲應該給予希臘，但是莫洛托夫先生堅持這些島嶼的問題，唯有與義大利殖民地地一併獲致決議，才能解決。

關於義南邊界，各國最初的意見，表示一致同意的里雅斯德應該成爲自由港。主要的問題，是莫洛托夫先生單獨主張該城應置於南斯拉夫之主權之下，而不顧及該港居民中義大利人佔極大多數。南斯拉夫，義大利，南非，澳洲及紐西蘭的代表在九月十八日發表其理由之後，外長會議各外長的立場，並未因此而有顯著的改變。但在聽到上面的意見以後，我便立即建議派專家到的港去劃定界綫，並訓令他們在劃分時，主要按照人口的因素，但也得顧到經濟因素。莫洛托夫接受這個建議，但隨後竟又翻悔，因

爲他的專家所提出的界線，不能由上述的訓令而實現。

莫洛托夫先生遇到的另一個四對一的問題，便是賠償。蘇聯的建議主張義大利所付的賠償品，總數爲六億美元，蘇聯應得一億。其餘各外長認爲義大利償還美國墊付的救濟費以後，剩下來支付賠償的就很少。

我出席會議時，認爲各外長能在十天或兩星期之內，就一般原則獲得協議，而引導代表們去進行詳細工作，但在第一個星期的末尾，這顯然成了空想。我們費了很多時候，去討論程序問題。法國要討論管制德國的問題。莫洛托夫要討論德國的賠償問題。他並且提出對日本管制委員會的問題。我們對義大利和約進展極少，而蘇聯代表團堅欲英美兩國對他們在東歐的傀儡政府，予以外交上的承認。

後面這項要求，我認爲是會中主要的障礙。在星期日早晨，我決定必須使莫洛托夫先生瞭解爲什麼我們拒絕承認由蘇聯設置並由蘇聯維持着的政府。那天蘇外長在鄉間度假，但我們仍定於五點三十分在蘇聯大使館會談。

會談之初，我說：「貴我兩國繼續合作，並應努力調和異見，以保持我們目標的一致，這對世界的將來，極爲重要。」我又強調「美國所關切的不是別的，只是蘇聯鄰國內對蘇友好的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回答道：「我必需告訴你，我對這點表示懷疑，如果不講出來，就是不誠實，」他接着說這種懷疑，由於美國對羅馬尼亞的態度而起。他說，羅國前雷德斯哥政府，「是與蘇聯敵對的，但受到英美的支持，而當對蘇友好的葛洛查政府建立後，美國與英國都撤消其支持。」

我對他說道：「關於解放各國的雅爾達宣言，已經美國人民熱誠接受，我相信你可以記得，葛洛查政府是在羅斯福總統任內建立的。你知道它是由維辛斯基先生對羅國國王下了一道限期兩小時半答覆的最後通牒而建立的。從那時起，羅國對我們的新聞記考的排斥，對我們正式代表的待遇，以及其他行動

，證實了我們對這個政府性質的疑竇。」

「我們的目標，」我說，「是對蘇聯友好以及代表國內所有民主分子的政府。」我指出雅爾達會議後對波蘭發生的誤解，已經完滿解決，我並且建議對羅馬尼亞政府的組織謀致協議。像對波蘭一樣。

莫洛托夫先生拒絕以波蘭為先例。他說，在羅馬尼亞，這種措置將造成內戰。他堅持只有在選舉以後，才能考慮改組政府。

我指出那時的政府就不是臨時政府，而是經選舉成立的政府；但如我們參加建立一個代表各黨派的臨時政府，則由這種政府進行的選舉，其結果將為我們的人民所接受。

莫洛托夫先生問道：「所有的黨派都一起參加英美政府麼？」

我答道：「不是，但在羅馬尼亞，我們說的是臨時政府，而不是由選舉成立的政府，由於葛洛查政府建立的方式，以及其隨後的行動，在葛洛查政府下進行的任何選舉，都將使美國人民懷疑。」

莫洛托夫先生於是攻擊希臘，並且問我們為什麼以不同的態度對待兩國。

我對他說：「這是事實問題，在希臘，我們的記者被允入境，自由行動，並且報導他們的見聞不受檢查。結果，英國人民曉得希臘的情形，且認為希臘的局勢，同你所形容的並不一樣。在羅馬尼亞，記者不准有任何便利，而葛洛查政府的行為，使我們相信它不能代表人民。」

「顯然地，」莫洛托夫先生說，「在希臘，記者們快活而人民不快活；而在羅馬尼亞，人民快活，記者們却不快活。蘇聯政府認為人民的情緒比較重要。」

雖然我們的代表們相信羅馬尼亞大部分人民都反對葛洛查政府，我却不願同他爭論這一點，而只想覓取解決歧見的一些方法。可是他堅持我們拒絕承認葛洛查，只因爲我們要看對蘇聯敵視的政府建立起來。我在一再堅持這種意見並不正確，並且在一切努力都不能謀取諒解以後，終於只好放棄，告

辭回來。

對美國代表團，這是一個暗澹的星期日夜晚。我們談論這次的會晤，以及久已提出的各種問題，蘇聯似已決心控制歐洲。我們看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我們知道必須繼續覓取。

第二天的事情，對我們並無鼓勵。在所有和約中，我們都建議嚴格限制武裝部隊，並建立一監督委員會，保證軍隊的限制。那天正在考慮對羅馬尼亞的和約。莫洛托夫先生立刻宣佈反對我們的建議。

貝文先生指出過去兩次大戰都從小國發生，如塞爾維亞（Serbia）與波蘭。所以，此後我們必須使小國不能發動戰爭，也不致成爲戰爭中首當其衝的犧牲者。

他說，「我們如鼓勵這些小國維持和平，而不去維持軍隊，並且發展其經濟，則亦將使大國免於災禍。」

莫洛托夫先生說，他從不以爲「解除一國的武裝，就能使它過平靜的生活。」並且，以同樣的譏諷語調，他問道：

「你們國內真有這麼些人可以派出去當督察，當總督，以及當其他要員嗎？」

貝文先生對紅軍在羅馬尼亞的活動，有強烈的感覺，他問羅馬尼亞從那裏得到現有的那麼些人。我插口說，我認爲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世界已經疲於戰事，」我說道，「在任何國家中，軍人都想回家。在被佔領的國家裏，他們應儘速返回本鄉。世界的人民，都切盼本會議有建立永久和平的行動。這些國家都很窮，如果我們能爲他們解除軍備的重負，也就是我們對他們最大的恩惠。我們已經保證經過聯合國來阻止任何國家的侵略。那麼，爲什麼這些國家需要大量的軍隊？」

然而我們並無進展，而對其他條款，又進入同樣毫無結果的討論。

星期三晚上，莫洛托夫先生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們幾乎以同樣的話，討論同樣的問題。他堅決相信我們的立場中，有若干隱藏的動機，而係基於對蘇聯的敵視。我無論說什麼，都不能勸化他。後來他說希望能知道我們所要的是什麼，以便我們能夠談判。

史達林，莫洛托夫及其他人士屢次發表聲明，都表示蘇聯追求的是安全，我對此印象甚深。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元帥會復述波蘭在二十五年之內，如何兩度被當作侵略蘇聯的走廊；從那時起，這種恐懼便出現於蘇聯的政策之內。莫洛托夫目前的要求中，就主張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應該維持完全服從蘇聯的政府。因此，我認為如果能在這方面予蘇聯以保證，則會議的障礙或可消除。至少，我們能去掉這些爭辯。第二天早上，我便與蘇聯外長進行另一次非正式會談。

我重述史達林委員長在雅爾達會議中與我的談話，並且說他所謂蘇聯在二十五年之內兩度經波蘭走廊遭到侵略，以及他對德國軍事力量復起的恐懼，使我獲得深刻的印象。

我接着說：「你知道，美國在歷史上，一向不願加入政治條約，但是我想問你蘇聯政府是否認為四主要國家間可以訂立一個廢止德國軍政的廿五年條約。如果蘇聯政府認為這是很好的意見，我就準備向總統建議，而我們可以一起向國會提出。至於細節方面，我們可再加擬訂，但我知道你的意見，是否這種條約確實有助於消除對德國侵略再起的恐懼——這種恐懼，在歐洲若干國家的政策中有重大作用。」

「如果你對這意見表示同意，」我最後說道，「我們可以告訴法國與英國。」

他說他不能表明政府的確切意見，但他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很可注意的意見。」他將要向莫斯科報告，我們在數日內可以再談。隨後，他又回到羅馬尼亞問題，並且告訴我，除非我們撤回我們的意見書，否則他須予以答覆，因為實際上，這是對蘇聯的非難。

我對他說，他有權發表聲明，且可以確信我將予以答覆。

第二天開會兩次，莫洛托夫先生與我在私下會談中所有過的爭辯，終於付供公開，因此，兩次會中都很緊張。

莫洛托夫先生聲稱：「在羅馬尼亞，葛洛查政府獲得人民中壓倒多數的支持，無人能否認這點……我請問，美國政府反對這個政府的理由，是否因為它與蘇聯友好？」

他聲稱我們認為羅馬尼亞政府不民主，「與事實並不相符。」然後他說：

「羅馬尼亞政府為羅馬尼亞人民所喜愛，但不為美國政府所喜愛。應該怎麼辦呢？我們應該推翻它，因為它不為美國政府所喜愛，而另外建立一個與蘇聯不友好的政府麼？在這種行為上，蘇聯代表團不能協助美國代表團。」

我向莫洛托夫先生指出雅爾達會議中，各政府領袖贊成建立臨時政府，因為它能廣泛代表各黨派，而應允及早進行選舉。

「在波茨坦，」我接着說，「美國總統聲稱美國不能承認目前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政府，這聲明不止一次而是十幾次。總統與史達林委員長間意見頗有分歧，但是史達林委員長從未質問美國的動機。」我指出我們在承認波蘭，芬蘭及匈牙利時所採的步驟，並且聲稱這些行動，斷然證明「莫洛托夫先生對於美國動機的聲明，既不公正，也不確實。」

雙方這種言論，便是那天早晨辯論的情形。當日下午，貝文先生宣佈支持美國的立場。莫洛托夫先生，當然站起來指責，但我因為看到進一步的討論，僅能造成衝突，因此拒絕對羅馬尼亞再發表任何聲明。莫洛托夫先生於是指責會中其他代表就羅馬尼亞問題對他「進行攻擊，」就這樣結束了討論。

第二天，九月二十二日，使倫敦會議破裂。

早晨十時以前，莫洛托夫先生的秘書來訪，說蘇聯代表團不能出席預定在十一時舉行的會議，並且

問我是否願在十一時三十分與莫洛托夫會談。我準時而往，知道他要討論日本問題。他解釋道，他從莫斯科接到的訓令，無疑在收到關於我所提議成立防止侵略條約的電報之前所發出。蘇聯政府通知他，締結防止日本再侵略的條約，現在正是時候，尤其鑒於投降條款在日本進行的方式，更有必要。他敦促建立對日本的管制委員會。

莫洛托夫提出管制日本的問題，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認爲這不過是他反攻戰中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却因此處於尷尬的情況之下。

英國先前提議過建立對日本的管制委員會。澳洲竭力要求在決定佔領政策時獲得更大地位。日本並不在倫敦會議議程之中。我首先要獲得我們佔領部隊的意見，因此不準備討論這個問題。我說各政府領袖在波茨坦時，曾經訓示我們以全力貢獻於起草歐洲五國和約的迫切任務。我向莫洛托夫先生保證在我回國以後，立即處理日本問題，並將與他通訊聯絡。

我們正在會談的時候，貝文先生走了進來。很顯明的，莫洛托夫請他在中午來，他却來得太早。莫洛托夫先生明白表示他要與我繼續討論。貝文就退了出去。到中午時候，他加入我們的談話，莫洛托夫先生立刻說道，他建議改組外長會議，因爲目前工作的遭到阻礙，是因爲開始時有了錯誤，在實際上，則是破壞了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他說，這錯誤，在九月十一日會議初開，並且決定法國與中國能參加對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和約的討論時，就已經釀成了。他主張法國與中國除根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在外長會議討論會與他們簽訂停戰協定各國的和約外，應該全部退出外長會議。這意見將於所有歐洲和約中排除中國；而除去德國與義大利和約，也將攔絕法國於各國和約之外。

貝文先生同我都確稱我們對波茨坦決議明晰的瞭解，是法國與中國在上述情況下雖不能對任何建議案行使表決權，但確能參加討論，而且在日前要求他們退出，將是一種不必要的侮辱。

我離開以後，立即打電話給總統。他在傑弗遜島俱樂部 (Jefferson Islands Club) 我便把情況概略告訴李海軍元帥。請他儘速通知總統，並且確定總統對波茨坦決議的了解與我完全相同。然後，我起草一封致史達林委員長的電報，且建議由總統發出。電中促請史達林同意中國與法國能繼續參加一切條約的討論，但只能對於他們訂停戰條款各國的條約中使用表決權。該信後由總統發出，其中斷言莫洛托夫先生的主張，將在全世界產生一種不良的印象。

電報上說，「三強將被指為甚至拒絕會中其他國家發表意見的機會，」並稱這是「一個太小的事件，不足使本會議破裂，亦不足拖延向和平與更佳諒解的進展。」

當莫洛托夫先生在午後會議中提出他的建議時，這對於其他代表，自然是至堪震驚的事。我們最殷切的勸導，對莫洛托夫先生毫不發生作用。深夜時，我去訪晤皮杜爾先生，我知道他非常憤怒。我怕他會退出會議，而公開發表憤慨言論。在還有機會從史達林委員長獲得善意的答覆時，我亟圖避免這種情形。可是，除在他合理的忿怒之外，皮杜爾先生答應合作，他而且這樣做了。

史達林的答覆，批准了莫洛托夫先生反對法國及中國參加會議的立場。會議臨到了絕境。

我作了若干努力以調和我們的歧見。九月二十八日，在與莫洛托夫先生及貝文先生的會議中我提出折衷辦法，希望能夠實行。第一步，對莫洛托夫堅持的意見讓步，即和約的初步草案只能由簽署投降條款的國家準備。這就是說，對芬蘭的和約，只能由英國及蘇聯準備；對羅馬尼亞，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的和約，則僅能由英國，蘇聯和美國準備。而法國只能參加準備對義大利的和約。但是，因為我們對小國的參加甚表關切，我們提出了第二步，我表示，我們對這點最欲堅持。

這一步規定和約擬定之後，均須提交和會，其中包括「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聯合國的全部歐洲會員國，以及在對抗歐洲軸心國時供給大量軍隊的非歐洲會員國。」

所以要這樣措辭，是因為莫洛托夫表示阿根廷如被邀請，蘇聯就不參加。

莫洛托夫先生想要有三個分別舉行的和會。他說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內，不能準備討論義大利和約。貝文先生問他爲什麼，他回答說，如果美國同意建立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他就比較容易準備！他先要求承認巴爾幹三國政府，作爲對義大利和約的先決條件，至此又加上一個條件。這點說明了他的伎倆。我們要繼續進行和約工作，他却要延宕和約。希望藉此強迫我們對他所關切的各種建議，表示同意。

第二天，我再作一次努力。我在我們的和會建議案上另外提出一節。就是「和約條款經被邀請國作充分自由之討論後，其最後之通過將由會盟和約中各敵國作戰之被邀請國爲之。」

我們已經走到十家路上。我們看到，若非屈服於蘇聯的要求，將無協議可言。我們決心不再讓步。但是讓這締造和平的機構在初次試驗中就遭到完全失敗，我們又很不願。

人民切盼着和平。國內的民衆，沒有清楚看到，總統和我在波茨坦所明白見到的蘇聯的野心。這些野心，在倫敦表露得更爲明顯。波茨坦會議後，我們避免公開表示我們的憂慮之情，爲了要與我們的蘇聯盟邦維持友好關係。外長會議的第一次集會，將是一個完全的失敗。我曉得這失敗將歸咎於我。

莫洛托夫先生斷定我對蘇聯是不友好的。並且電稱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我們的政策已經改變。他的態度極易瞭解。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中，他的需要是第二戰場與進一步的租借援助。這兩項要求都經羅斯福總統贊同。在雅爾達，總統同意將寇松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劃歸蘇聯，而爲補償計，並同意波蘭的西部邊界應予擴張。他又同意把庫頁島的剩餘部分同千島羣島劃歸蘇聯，并由中國讓予在大連的若干權利以及租用旅順港。我們同意在和會中支持蘇聯對哥尼斯堡及東普魯士（East Prussia）有價值地帶的要求。我們暫時承認了蘇聯在德國東部的既成事實，而且提出他們在那時候認爲可以接受的賠償辦法。

如今，在倫敦，莫洛托夫先生看到並無攜帶任何包裹回家去的機會。他不能了解我們爲什麼不肯接受他的解釋，那就是，我們政府間的「友誼」，需要我們讓蘇聯在巴爾幹各國建立完全的宗主權。就我而言，聖誕節已經過去了，——現在已是一月一日。我們還有很多賬單需要付錢。我要收回我們手頭一部分的欠賬，而不再發些借據出去。在那些欠賬裏面，我認爲有一樣便是雅爾達對被解放各國待遇的保證。

我相信，如果依照莫洛托夫先生所要求的去作犧牲，將會造成同盟國家，以及我們擁護的原則的失敗。只有拒絕向蘇聯的統治低頭屈服，我們才能爲將來建立健全的關係。我們的態度使他們震驚。在戰爭剛剛終了的時候，那時，蘇聯享受着我們大多數人民的敬慕與善意。蘇聯的領袖們知道我們人民對和平的強烈願望。認爲我們不敢使會議失敗。

我們在倫敦的立場，使他們要重新估計，使他們了悟不能強迫我們去接受他們的主張。就極現實的意義來說，這是力量的考驗。而最要緊的，這是在考驗我們是否真正相信我們就四海一家所作的言論，以及建立集體安全的願望。我是願意相信蘇聯之富願從事將世界劃分爲兩個勢力範圍的較爲簡易的工作。

我們之力主法國與中國參加外長會議已獲得普遍的讚揚。而爲了和平會議的鬭爭，以及爲小國爭取參加締結和約的權利，使我們贏得小國的好評。這迫使蘇聯開始重訂他們的政策，他們轉向聯合國中的集體行動是緩慢而勉強的：這轉變現在仍在進行中，而只有在蘇聯被世界輿論迫向合作，也只有在这种限度之下，才能繼續下去。

在會議閉幕前，我們試圖就例有的議定書謀致協議，舉出業已獲得協議的各種問題。但莫洛托夫先生對凡以九月十一日會中使法國及中國參加討論的決議作爲基礎的任何協議，都拒絕簽字。在一次對議

定書的激烈討論中，貝文先生提到莫洛托夫先生對他以前行動的指斥，並說這是「我歷來所聽到最接近希特勒理論的東西。」

這話的反應其速如電。莫洛托夫先生從席上起立，忿怒地衝向門口。到門邊時他慢了下來，給這位率直的英國人一個機會，以便請他回轉去，並撤回聲明——貝文這樣的做了。

又經過五次會議，依舊毫無進展。實際上，幾日來我們已經明白沒法成立協議。可是王世杰博士鼓勵繼續努力。會議的最後一天，王博士主席，不久，我們都明白蘇聯在用各種方法拖延時間，唯一似乎合理的理由，是第二天由我當主席，莫洛托夫似乎以為會議在美國人當主席的時間宣告破裂，較為合適。在休息的時候，我把這意思告訴王博士。他說，會議既因他的要求而展延，他就願意在破裂時負起主席的責任。

會議毫無結果地延到深夜，最後，王博士拿起主席用的小木槌，宣佈道：

「本人適為使本會延至今日之人。本人未聞有要求舉行另一次會議者，故宣佈本會於此閉幕。本人之殷切希望即為有關各政府將布置外長會議日後之集會。」

這是王博士果敢的行動。在我見到中國外交家工作的任何場合裏，總表現這種典型的政治家風度。中國的困難，自不能歸咎於外交代表的才智。據我的經驗在國際會議中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有更幹練的代表。

我現在回顧倫敦會議，全部會程中唯一愉快的經歷，便是艾德禮首相舉行的盛大宴會。會中鋪設輝煌，主人竭力招待，但我們會議裏緊張的情緒瀰漫席間。演說都很短，且很戒慎。在宴席結束前早就完畢了。在席間一段特別冗長的沉靜時間中，貝文先生開始靜靜地歌唱。我說「歐爾納斯德（Ernest Bevin）之名，你不會唱，我也不會唱，但是我有一個軍事助理在這裏，他會唱。」

「你有這麼一個人，爲什麼不請他出來？」他立刻回答道。

「你不會喜歡他，」我打趣說，「因爲他們所知道的都是愛爾蘭歌曲。這裏是聖詹姆士宮，而你是你聽到過的愛爾蘭歌曲最好的歌手。這不太好吧？」

「請他出來，」貝文催促着說，於是我去告訴凱萊上校（Colonel Hugh A. Kelly），他是一建築師，我在澤西城（Jersey City）的老朋友，當時是美國代表團的衛隊長。我說貝文先生希望他唱一支愛爾蘭歌。

他被弄得驚惶失措，但却挺身而出，演來極爲精彩。他立刻站在屋子中間，指揮將近一百人的團體，首相同莫洛托夫先生也在內，興高采烈的來一次「團體合唱」。莫洛托夫先生並要求重唱一遍「大兵鐘尼在愛爾蘭找到一朵玫瑰花。」

每個人都極爲愉快。我們行將離去的時候，這句話得到了最後與最確定的證明。在席間侍候的是一個僵硬，神矩，毫無表情的英國僕人，就同我們所能想像的英國僕人一樣。凱萊上校在穿大衣的時候，這僕人突然向他鞠躬，並道：

「請原諒，先生，我想說今晚這兒已經創了空前盛舉。我們都高興之至。」

會議破裂，我首途返美，知道必會遭到批評。民衆的失望可想而知。在我返國後，我立即向全國人民廣播，報告會議經過，我盡可能提出全部的情形，而不激起一點使幻覺破滅的波浪，因爲那對美蘇未來的關係，將有不利的影響。民衆的反響極使人感激。我於是決定如果我們要想獲得民衆充分的支持，而在國際問題中保持堅定的立場，則應予人民更充分的報導。

我並且決定，必須打開僵局；和平太重要，不能因過失而拋棄。

我們的困難中，主要原因似爲我們不能承認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因此我便着手處理這個問題。我

爲確信我們對於這些國家的意見，並不是基於錯誤或偏頗的情報，因此我派路易斯維爾城(Louisville)新聞報(Courier Journal)編輯艾德立治(Mark Ehrbridge)到巴爾幹去訪問。我訓令國務院人員不要把我們在羅保兩國的代表送回來的情報交給他，我要他以毫無成見的頭腦，去進行調查。

同時，我們向蘇聯表示，對於其努力與雅爾達協定的精神相符合的國家，我們不會拒絕外交上的承認。到十月二十日，我們便與其他三國共同承認了奧國的臨時政府。十一月二日，我們承認匈牙利的臨時政府。

根據在波茨坦的協議，我們發起修改蒙特婁公約(Montreux Treaty)的談判。十一月七日，我們向各簽字國送致關於控制達達尼爾海峽的建議，其中聲稱我們願意參與共同保證海峽的自由通行，而反對單由黑海國家成立的處置辦法。

此外，我接受邀請，於十月三十一日出席紐約前鋒論壇報座談會演講，大部份的話都對克里姆林宮而發。我強調我們承認蘇聯對於獲得友好鄰邦的重要性。我宣稱「美國決不參加那些國家中對蘇聯懷有敵意陰謀的任何集團，」——我接着說，「睦鄰政策·與婚姻制度不同，並不是排他的事件。最敦睦的鄰邦並不否認其鄰邦與其他國家友好相處的權利。」

演說中強調聯合國對促進安全的重要性，隨後我說：「在分裂成排他勢力與特殊權利範圍的世界中，我們不能獲得和平所需的合作。」我在結論中所說的話，是我希望克里姆林宮能加以深思熟慮的，我說：「必需有一個大家共有的世界，而將無任何人獨有的世界。」

同時，我請哈里曼大使謁見史達林委員長，那時史氏還在克里米亞度假。我要他直接向史達林提出關於和會的修正建議案，列舉被邀請國家的名單，並且根據我們所採的步驟，和他討論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情勢，以表示我們對合作的願望。

謁見的結果，顯示了蘇聯的態度。當哈里曼大使開始提出我們對歐洲問題的意見時，史達林截斷話題，說他所要聽的，是我們對管制日本的意見。哈里曼先生未曾準備，大為吃驚。而我的驚異，比他更甚。

在倫敦，當莫托洛夫先生提出日本問題時，他同時以討論程序問題，來打發時間。我們認為這僅是他神經戰的一部分。哈里曼大使當時在倫敦，他與我意見相同，認為巴爾幹是主要問題。到現在，我們猛然領悟，知道我們錯了。使倫敦會議趨於破裂的精華表演，是由於蘇聯人相信我們在日本的官員並沒有與他們作適當的諮商而激起來的。蘇聯在東京的軍事代表狄里夫揚柯將軍（General Kazma N. Derev-yanko），已經回莫斯科，這更可證實蘇聯的態度。

我們接到哈里曼大使令人驚奇的消息後，不久英首相艾德禮與加總理金氏到華盛頓，與總統商討管制原子的程序。這次會議所形成的協議，使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又投入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問題之內。幾天後，正是感恩節，我獨自在辦公室內，趁假日的甯靜，思索若干問題。突然，我想起雅爾達會議中，曾經同意三外長每三月集會一次，從那時以後，因為發生的事情繁多，無需召開定期會議，三外長集會一次，或能使締造和平的機構再度動作起來，我認為值得一試。第二天早晨，我致電莫洛托夫先生，提及雅爾達會議中，同意三外長應定期集會，並指出外長們已經在舊金山，波茨坦及倫敦非正式開過會，而沒有在莫斯科舉行。於是，我建議在蘇聯首都集會一次。我確切覺得，不論蘇聯如何款客，蘇聯政府必將發出請柬，而我相信如果我們在莫斯科集會，我就有機會與史達林晤談，我們便能消除和約的障礙。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提出開會的建議，有悖於眾所接受的外交程序。很多外交家，與專欄作家，都向我提醒這種程序，並且聲稱事先如不經外交上的往來，確保所爭論的問題的協議，則不應召開外長會

議。但鑒於所發生的一切情形，我知道經過函電往來或大使的交涉，不能有謀致協議的機會。世界和平對我們過於重要，不能不把握時機，經充分談判以謀致協議。此外，聯合國大會將於一月間召開，而這次是我們唯一能親自促請史達林及莫洛托夫與我們共同推進關於原子能管制建議案的良機。

因此，不顧外交家與專欄作家們的勸告，我到莫斯科去了。

美蘇外交秘錄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解決了一個難題

甚至於前往莫斯科的旅程也是緊張的，我們聽說，我們沒有蘇聯的領航員便不能在蘇聯上空飛行。他們於十二月十四日在柏林的某一爲雪所蓋的跑道上迎接我們。柏林與莫斯科之間沒有一處可用的機場，所以我們的飛機必須帶足了油，以便在發生危險時飛回來。當我們飛到距莫斯科大約六十英里的地方時，領航員們告訴包倫他們飛迷了路。他們在試認滿是積雪的地面上隆起的農舍。在任何情形之下，這也是困難的，加之在大風雪之中，真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將飛機弄得那樣低，我害怕遇着第一座稍微大點的山，我們便會同它相撞。

「這兒並沒有山，」包倫告訴我。

「我可以接受你的保證，」我告訴他：「只要你能告訴我「這兒」是什麼地方。」

領航員們同駕駛員要求許可他們再「盤旋」十分鐘，駕駛員說，現在所餘的油剛能夠這樣，餘外的油可以飛返柏林。我同意了，同時更告訴他們說：拿破侖同希特勒曾經想到莫斯科來，不過失敗了，所以我對於馬上回去也不反對。

十分鐘幾乎快完了的時候，領航員們看到一所熟悉的建築，他們於是曉得我們是在何處，幾分鐘之後。我們又飛向至莫斯科去的路上。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落錯了機場，不過在我看來沒有一個機場有這樣好。

蘇聯的招待敵得過氣候的爲難。外交部的官員預料到我們會在另一個機場降落，於是便使政府的歡迎者分至各處迎接，如是，莫洛托夫雖然沒在場，我們還是被他們以適當的禮節接待。

我們駛往美國大使所住的斯巴索大廈 (Spasso House) 時，風雪使我看不到城內很多的地方。我感覺失望，因為，像一個人對於那些難到的地方的想法一樣，我對於莫斯科很有好奇之感，不過我又以日後便可看一看而自慰。像平常一樣，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懷疑別人甚至是否會在莫斯科逗留過我所逗留的時間的一小部份，並看到這城市中那樣少的地方。除掉斯巴索大廈是我們辦公同每夜湊合着睡覺小時的地方；斯普里地諾佛卡大廈 (Spiridovka House) 是外長會議舉行會議的地方；克里姆林宮是我們與史達林會晤的地方以外，我在莫斯科所看到的唯一的地方是歌劇院，蘇聯政府在那裏招待各國外長。

會議於十二月十六日午後五時開幕，由於我的提議，莫洛托夫當選為主席。我看到史達林委員長對於遠東問題的關切，於是建議把在華府設立遠東委員會，和在東京成立盟國對日委員會的等項提案包括在議程中。其次是關於設立朝鮮統一政府作為成立獨立的朝鮮政府的前奏的計劃；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包括華北日軍的解除武裝在內。我們也同意對於蘇軍的佔領滿洲，印度尼西亞同希臘英軍的撤退，伊朗境內蘇軍的撤退，從事非正式的討論。此外議程中按照我原來的建議包括以下各提案：成立聯合國委員會考慮原子能的管制；重新召開外長會議，外長代表工作的恢復，又如果情形許可的話，將討論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兩國現政府的承認問題，我們表上的第一項原子能問題，經莫洛托夫先生要求，改列在議程之末。他祇是以這種方式通知我說，他認為這問題不甚重要。

我們的關於和會程序的建議是根據我們在倫敦時最後的立場；其中我們在準備初次草案方面同意蘇聯的立場，不過我們却堅持這些草案要提交一個和會。唯一的改變在末一節。現在這節規定在和會考慮草約並且提出建議之後，最後的草案應該由簽署停戰條款的國家來準備；換言之，英蘇美法準備對義大利的條約；法國不參預準備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同匈牙利的條約；法美兩國不參預準備對芬蘭的條約。

約。

最末一節是依照史達林在假期中與哈里曼大使會晤時提出的建議，我們勉強地接受了，不過我們曉得這是我們能與蘇聯協議舉行和會的唯一途徑。

第二天莫洛托夫先生提出了他的對案，其內容並未使情況比較蘇聯代表團在倫敦時的主張有何進展。其中規定在和會中，每一條約只能由真正與那一敵國作戰的國家來談商。實際地講，這就是說每一條約真要分別地開一個和會。對於保加利亞同匈牙利條約，只有五個國家還有資格，根據莫洛托夫先生的說法——參加和會的討論。討論保加利亞條約的將是三強，南斯拉夫同希臘，討論匈牙利條約的是將捷克代替希臘，餘四國同。關於羅馬尼亞條約的討論限於三強。而芬蘭條約則又只由蘇英兩國來考慮。至於義大利條約，參加者為三強，法國，希臘，加拿大，南斯拉夫，澳洲，紐西蘭，南非，巴西和阿比西尼亞——最多是十二國。

這是那樣明白的不能接受，於是我便建議先討論議程中的次一項，以等候莫洛托夫先生，維辛斯基先生，哈里曼大使與我準備在第二天舉行的一次私人談話。在私人談話中我坦白地表示我對於蘇聯建議的失望，尤其是因為我們的計劃是根據史達林元帥在與哈里曼先生的談話中所發表的見解而擬定的。莫洛托夫抗議說，他的建議與委員長的聲明完全符合。哈里曼大使於是表示他對於談話的了解，並且說明在他與史達林進行談判的第一天，委員長曾經提出與目前的蘇聯提案符合的見解，不過在第二天，史達林便已同意只舉行一次會議，在這會議中，我們提出的名單中包括的國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只要外長會議中的幾個相關國家保留「決定最後和約條款」的權利。

莫洛托夫先生願意承認美國就芬蘭條約發表意見的權利，不過再沒有別的進展。

我們在十二月十八日開會時，我立即根據我們建議的條文提出一份有資格被邀參加和會國家的名單

，其中包括「所有會以大量軍隊與軸心的歐洲國家積極作戰的聯合國會員國」。一共是二十一國。

「戰爭是整個的，」我強調地說：「盟國的每一個國家就像從事共同冒險的份子一樣的各在最宜工作的所在工作。中國牽制住日本，使美國得以獲得機會給予在歐洲作戰的國家更多的援助，中國有很大的貢獻。挪威的船隻協助供應我們出動轟炸的空軍；這些國家應該有參加和會並且發表意見的機會。這樣做並沒有壞處，同時還可以使世界人士信任三強的公正。」

貝文先生支持我的意見。他說：以挪威為例，它在本次戰爭之中損失了三分之一的海員。假如將它摒棄於和會之外，實不公平。會議的時間很長，不過却沒有結果，所以我們決定試開一個出席人數有限制的「非正式會議，」莫洛托夫提到我的名單，他說印度應該去掉——「它不是一個獨立國；它沒有自己的外交部。」同時，假如印度參加，三個波羅的海蘇維埃共和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也必須邀請，貝文先生自然不能同意擴除會經派遣大量軍隊至歐洲戰場的印度。

那一天夜裏，哈里曼大使，包倫同我前往克里姆林宮舉行我們與史達林間的第一次會議，我要在莫洛托夫採取後來難以取銷的立場以前向史達林陳述我的見解，我要晉謁有決定力量的這個人。

克里姆林宮，自然，素有神秘地點之名，又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喜歡看好的偵探小說的人，我對於第一次到克里姆林宮內部之行頗有期望。我們在到達史達林辦公室之前，被領着走過三個相連的房間，每個房間內都有幾個式樣相同的門，我正開始想史達林是被如何小心的保衛着，忽然想到任何一個外國人到白宮參觀時也會有相似的印象。一個人去見杜魯門總統時，須要經過一處大的外走廊，其後他被送入由機警的白宮衛士西門思（Bill Simmons）主管的候見室，其後他又須穿過總統秘書康納萊（Matthew J. Connelly）的辦公室，最後才走進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主要的顯明差別是克里姆林宮裏的人都穿着制服。

史達林的接待很一本正經，不過還誠懇。我將總統的一封信面交他後，我向他表示我們絕對相信我們之間沒有不能解決的衝突。

「我們唯一的目的，」我說：「是要生活在和平中，增進美國人民的幸福，並且以經濟的援助協助我們國外的朋友們恢復戰爭的損失。」

史達林答覆說他完全具有同樣的希望。我們也同意，鑒於我們風俗習慣的不同，時常將同一問題作不同的解釋是可以理解的。他更自動表示，他認為我們迄今對於解決我們之間的歧見是很成功的。

我向他簡述我與莫洛托夫先生對我們擬定的名單所作的討論，同時我也發現他面前就有一份名單，我說明假如印度同波羅的海三個國家都准許參加和會，「那末英國方面參加的就要有五個自治領，蘇聯方面也要有五個共和國了。」

「我沒法將這種決定在美國解釋，」我告訴他，「我要將名單中添進五個州，我的故鄉南卡羅來納也包括在內！」

莫洛托夫插口說：即使印度取消，英國還有四個自治領出席會議。

「蘇聯同美國的力量是足以單獨存在的，我確信莫洛托夫先生在會議中能夠適當的保護這三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權益，」我答覆說。「我們在和約方面已經有了重大的讓步，我們要求通過我們所擬的參加會議的名單不是過分的行動。」

史達林說：這一張名單與哈里曼本年十月給他看的相同，他看不出我們這方面有什麼讓步。我向他解釋這種讓步是關於各條約的準備同最後認可方面的，不是關於名單的。他認為每一停戰協定都已經由在對那一國戰爭中流血的各國簽字，他們也應該是簽字於和約的國家。例如比利時同荷蘭便沒有與羅馬尼亞及義大利作戰。其後他詳述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貢獻，又表示他可以接受我們的名單但須加上這幾

個國家。他說：他確信我們不久便會承認這幾個共和國。不過他也明瞭假如英國同蘇聯各有六票，而美國只有一票，美國方面會感覺不安。他說這種情形必須解決。一種方法是給與美國六票。他提到他在雅爾達會議時曾經與羅斯福協議，假如美國願意的話，美國可在聯合國大會中多有兩票。

我斷定他不願在那天晚上推翻莫洛托夫的決定。不過以後或者是可以的。於是我請他對此問題再加以考慮而使我們可以找到一種解決方法。他同意這樣做。

次日午後，莫洛托夫因事離開會議席。他回來後，走到我身旁，並且告訴我委員長適才由電話中通知我，他將接受我們提出的國家名單。

會議於是迅速協議舉行和會，地點在巴黎，日期不得遲於五月一日。然而這次協議之後却是長時期的爭執：就是和約擬定之後，應由那些國家簽字；是否應請中法兩國同意這個莫斯科協定，還是僅予通知；我們最後妥協是既通知，也請他們同意。

聖誕節前一天，我們接到中國的贊同的答覆。然而法國方面却没有回音。我亟欲使世界人士知道和會將要舉行了，像得到聖誕節禮物一樣。我會想搖電話給皮杜爾先生，不過沒有成功。我聽說他很忙，要同他的漂亮太太結婚。最後，我想我們就宣佈我們自己的協議，並且還聲明已經請中法兩國同意。我會建議以巴黎為和會舉行地點，不過在獲得法國的答覆以前，我們不提及這事。

於是，在一九四五年的聖誕節清晨，全世界的人民都曉得五個月的談判終於對舉行和會協助恢復「地球上和平」的事獲得了協議。

我們所獲得的解決辦法不是理想的，不過却也保證給與各小國發表意見的機會。比較大的國家雖不受和會建議的限制，我們却能夠使用一致通過辦法，不接受任意違反和會的建議的一件最後條約。經驗證明了和會的價值，紀錄更表明了凡是經過它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的建議，都列入了各條約。

我們獲得這項協議之後，遂轉而進行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問題。在會議的第三日我會造訪莫洛托夫，並且交給他一份艾德立治所提出的關於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的報告。我告訴他我們原想發表它，不過現在却留來討論，希望艾德立治先生的調查結果可以成爲一種諒解的基礎。

莫洛托夫還沒有看這件報告，便表反對。他說，艾德立治自然知道我是反對承認這些政府的，所以他的判斷一定受了影響。

我向他指出我給艾德立治先生的指示，這指示在報告的開端曾經複述過，同時表明他是一個完全自由的觀察者。我告訴他艾德立治先生在一次獨立而無偏見的考察之後，發現這兩個政府不僅不符合雅爾達宣言，而且是由一黨所獨斷支配，並用強力將人民中的大批民主份子摒諸政府之外。我請他特別注意艾德立治先生在羅馬尼亞發現若干親法西斯的通敵者，甚至還有親納粹的鐵衛軍人士都在佔有政府的要津。

莫洛托夫極力說明保加利亞已經舉行選舉，所以我請他注意艾德立治先生的批評。就是這種選舉毫無意義，同時事實上艾德立治在一個月以前就聽說選舉的結果將要如何了。至於羅馬尼亞，艾德立治僅是證實了我們兩人都曉得的維辛斯基先生的行動以及在葛洛查政府成立以後的壓制手段。

我請他對艾德立治先生的建議予以特別考慮，就是由蘇聯與我們成立一類似與東歐其他各昔日敵國獲致的協議。

我在給莫洛托夫兩天的功夫考慮艾德立治報告之後，即向各外長提出計劃書，建議對於這些國家應該分別採取的行動。這些計劃因爲各處情形的不同，所以彼此間也有些區別。計劃中主張由三國共同建議改組現有的各政府，使其包括所有的著名的民主份子。莫洛托夫對此極力反對。他認爲保加利亞方面已經舉行過選舉。同時在蘇聯看來選舉也是自由而無拘束的，所以在保加利亞方面不應再取何種行動。

他說：在這種選舉之後再來干涉，保加利亞的人民會深以為憤怒。他說反對黨永遠是不滿意的，所以便不理會對政府的反對。關於羅馬尼亞，他認為國王米琪爾（King Michael）除非是受了那裏的美英代表的煽動，絕不會要求三強協助他成立政府。我向他保證沒有這回事，他却不信我的話。至於艾德立治的報告，他也不睬。他說這個報告不過是重述了我的見解。即使不作這次旅行，也會寫得出的。

於是好像唯一的希望又需要與委員長去直接商談了，第二天夜裏我去看他。約定在午後十時。這正是通常我就寢的時候，不過也差不多是委員長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們首先談到撤退伊朗境內所有外國軍隊問題。於是我表示願意同他一談巴爾幹問題，「因為我同莫洛托夫先生對此頗有爭執。」

史達林笑了起來，他說這倒是沒有料想到的新聞。

「這件問題的解決同和約的進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那樣我們不能夠給他們經濟援助，」我這樣說。以後我迅速的概述實際的情形。我最後說：「假如我們不能成立協議，我只好發表艾德立治的報告了。」

史達林答覆說，假如我認為需要發表艾德立治報告，那麼他就請愛倫堡先生發表他的見解，愛倫堡是一個公正無私的人，曾經到過這兩國。

我告訴他，這兩個報告不能使我們兩國在這問題上團結一致反會分道揚鑣，實在是最不幸的事。我表示相信有他的協助與諒解，我們可以尋到民主黨派的代表同時也是與蘇聯友好的人。

他說：假如雙方都求解決這件問題，那麼便可以找到方法。嗣後他提到我們的報紙指摘紅軍對於保加利亞的選舉施用壓力的事。他說：這是無稽的。他引匈牙利為例說：蘇軍雖然駐在那裏，共產黨却沒有在選舉中獲勝。他強調說：蘇聯只要求鄰近的國家不同它敵對，以上所說的行為是蘇聯所不屑幹的。

他又說：這並不是說蘇聯只認爲共產黨才是友好的，不過他要我記住在戰爭期間匈牙利軍隊曾經進至頓河，羅馬尼亞軍隊曾經到了高瓦河。

保加利亞既然已經舉行過選舉，所以便不能要求有何改組，不過他最後同意可以建議他們，將沒有參加政府的兩個重要政黨的兩個真正代表包括在政府裏面。他強調說這件事不能使用壓力，只是建議而已。他同意我的提議，就是這種建議應由蘇聯發出。我向他表明我們保留決定使我們所以承認它的必要的條件是否已經成立的權利。他承認在羅馬尼亞方面，從事改變的困難比較小些，在討論了好一會後，我們協議派遣一個包括英美駐莫斯科大使同維辛斯基的委員會前往布加勒斯特，與政府從事增添其他黨派代表，且確使公民自由得以恢復並繼續維持。史達林要我將他接受建議（這建議原是在我倫敦提出的一）之事通知貝文先生。我同意將它轉告英國外相，一方又開玩笑的向他說：我們雖然被認爲與英國是一個集團，不過我却沒有像應該的那樣及早將我在這次會議中向莫洛托夫先生提出的建議通知貝文。

委員長笑了，同時更用同樣的態度答覆說：這顯然不過是一種掩飾集團的事實的外衣而已。

次日我將我們認爲史達林已經同意的關於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的建議提出會議。然而，我們却立即就其措辭的方式開始與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兩位先生作整日的辯論。當我們休會去參加委員長爲我們預備的聖誕前夕宴會時，辯論仍在進行。

在宴會席上，我坐在史達林的右面，貝文在他左面。我告訴他我們的報紙說他病了。我看到他面色很好，很感快慰。他說他最近的休假是若干年來的第一次，又說他發現在戰爭的緊張過去以後，他沒有以前那樣年輕了。他說，他在離開此地的期間也會過問了許多重要事項，但他也休息過，現在覺得比多年來都好。他說：他決定每年休假一次。

我非常誠懇地舉杯祝他，希望他還可以休假許多年，並且長享健康。我說：「戰爭所團結起來的人

，不要爲和平所拆散。」我認爲這句話說得很好，不過從蘇聯人士的不能欣賞一層看來，我斷定他們的

是獨身男子，或者至少不熟悉我們的結婚儀式。我確信他們並沒有不同意這種意見的。

我那夜與委員長所說的話，就像前兩次會議中的一樣，特點是令人興奮的坦白與誠懇，在若干問題之中，我特別着重的是伊朗的局勢。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第一次會見時，我告訴他我們對於伊朗的事情很憂慮，因爲羅斯福總統與他同邱吉爾首相會於一九四三年在德黑蘭作過保證。三巨頭於保證中承認「伊朗在對蘇聯敵人進行戰爭時所給予的協助，尤其是在運輸海外來的物資至蘇聯方面所給與的便利。」宣言中允諾，「戰爭停止後伊朗所遭逢的任何經濟問題，都應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的問題同樣予以考慮。它明白宣佈他們「與伊朗政府一致希望維持伊朗的獨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

莫斯科會議前，伊朗國內的演變表明這件保證有被破壞的危險。伊朗政府抗議說當它派遣軍隊一千五百名前往亞塞爾拜然彈壓伊朗人所說的由外國鼓動的變亂時，在途中爲紅軍阻止，並且命令它退回。伊朗政府因而要求撤退所有外國的駐軍，於是我們立即向遺留的美軍發出撤退的命令，同時又致電蘇聯同英國，要求他們採取相似的行動。

伊朗的抗議還沒有解決。我向委員長說，除非我們履行德黑蘭宣言，伊朗很像要在倫敦舉行的下一屆聯合國會議中提出申訴。我們對於蘇聯方面所說三萬名蘇軍由於一千五百名伊朗軍隊的開來會受到危害一件事，感覺難以解釋。

史達林於是敘述這一問題中他所說的「適切的事實。」蘇聯南部的巴庫油田與邊境相距很近，因而發生了特別問題。這些油田需要保護以防伊朗政府可能加於蘇聯的敵意行動。伊朗政府不可信任。破壞分子可能被派到巴庫油田中放火。因爲蘇聯根據條約有權駐軍伊朗至三月十五日，不願在該日以前撤

退。屆時蘇聯當對局勢加以檢討，以視是否可以撤退駐軍。蘇聯的決定全視伊朗政府的行為而定，他說明一九二一年蘇聯與伊朗訂立的條約，使蘇聯在可能遭遇外來的危險時有出兵伊朗北部的權利。

我說：鑒於他在德黑蘭發表的宣言，又鑒於伊境美軍司令康諾利將軍（General Connolly）所送來的報告，其中說伊朗政府在運輸物資至蘇聯的工作方面與紅軍同美軍合作的很好，我聽到他認為伊朗政府與蘇聯敵對時，感覺非常驚訝。他雖然有駐軍伊朗到三月的權利，我向他表明他並無須如此。美國却一向認為三月二日為最後期間，而不是史達林所說的三月十五日。

史達林告訴我蘇聯對於伊朗並沒有領土上或是其他方面的企圖。他們一旦認為巴庫油田安全之後，即行撤兵。

我越多考慮史達林委員長所說的保留伊朗駐軍的藉口，對於蘇聯的態度便越少信任。像他所說的，訓練精良並且充分裝備的三萬名蘇聯軍，為了恐怕造成騷亂，必須要制止缺乏訓練，而裝備也不齊全的一千五百名伊朗軍隊前往亞塞爾拜然，實是毫無道理的說法。他所說的恐怕自小小的伊朗來的破壞分子會進入蘇聯，並且縱火焚燒巴庫油田這回事，對於蘇聯之派遣大軍駐於伊朗境內，也是同等無謂的口實。他的承認撤兵問題要在撤退日加以檢討，表明我們對於他實行德黑蘭宣言的焦慮是有理由的，因之我決定再作努力使他明瞭我們對於這種義務的見解。

伊朗問題是我與他在第二次會議中討論的第一件事。我告訴他我對於這問題會在聯合國第一次會議議提出來的可能性「極為不安。」我又說：大國實踐對較小的國家所作的諾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警告他說：假如伊朗在倫敦提出這件問題，實在是不幸的事，因為按照我們所曉得的事實，鑒於我們所作的鄭重的諾言，我們必須支持伊朗的立場。美國對於在聯合國第一屆會議中蘇聯的必遭反對將極感遺憾，因此我希望我們可以在莫斯科採取防止這種可能的行動。

我們討論貝文的建議，就是派一三國委員會前往伊朗對於這一問題的各方面謀求解決，他對於貝文的建議不加可否。我於是又說我們希望不要在伊朗採取一種會使我們發生異見的行動。對於這一點，委員長回答說：「我們不擬做要使你面紅耳赤的事。」

聖誕節那一天，會議恢復對巴爾幹與伊朗的討論。最後我們對於羅馬尼亞問題得到了具體的協議，不過對於保加利亞問題則完全陷入絕境。莫洛托夫同維辛斯基要求擬出一項草案說明內閣只能夠包容對現政府效忠的人們。貝文先生同我指出這種措辭會排斥對我們所欲擴大的政府宣誓效忠的人們以外的所有傾向民主的人物。貝文說明他同邱吉爾先生相爭已三十年，假如處在這種規定下，他今日便不能在英國政府任職了。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後，我與莫洛托夫作了一次私人談話，除開別的事情以外，他說他認為「英國關於伊朗的提案，大體上是可以接受的。」他問我的見解如何。我告訴他我會予以接受，因為特別想避免使伊朗問題在大會中提出。當晚舉行會議時，莫洛托夫對貝文先生的建議提出幾個修正案。除開一個使人對軍隊撤退的日期仍不免懷疑的修正案外，貝文都接受了。他說：日期已經由條約確定了，因此現在建議的那修正案是不必要的。

我因為我們上一次的私人談話，認為莫洛托夫終會接受貝文的原文的。然而當我們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後會議時，蘇聯統帥部顯然已經改變了它的態度。莫洛托夫宣佈伊朗事件並未正式列入議程，「不能予以考慮，」貝文當時起而表示不滿。他說：他實際上已經接受了蘇聯所提出的每一個修正案，他說因為他與史達林所作的一段談話，他認為蘇聯會同意他的提案的。

「意見業已交換，這已經夠了，」莫洛托夫答道。「對於這問題，並沒有什麼決定。這件問題沒有列入議程，在公報中也不必提到。」

「我第二步是怎樣？」貝文問。

「你是很明瞭的，」莫洛托夫答。

貝文頗有些感觸，他說他認為對於這種情形已經瞭解，認為非常遺憾。

關於保加利亞同伊朗的激烈辯論妨害了我們對其他問題的協議，因此我建議我們在倫敦會議時再重新考慮未決的問題。我們要僚屬們起草由三外長簽字的議定書。議定書在清晨二時三十分草成，其後在一個正式會議中，拿出分用兩種文字寫成的議定書來簽字。那就是說一共有九份議定書我們都必須在上面簽名。貝文先生先簽了，文件送在我面前來，簽完字以後，我起身向坐近我的英國代表團的一位先生告別。

突然莫洛托夫先生差他的一位副官到我這裏來要我回桌去。他說他的手下人員「由於疏忽」之故，將蘇聯關於保加利亞的文件包括在議定書的俄文本裏面了。他問究竟是否可以接受。我們馬上說不可以。他於是建議我們可以將我的建議的上半部同他的草案的下半部合併。我告訴他我們不能「一半一半」的做事；他既然接受了一半，便應接受美國的整個提案。我驚訝的是，他首肯了。

貝文先生於是談諧的請他看看他口袋中還能不能尋到另一件「疏忽」使我們可以完滿的結束我們關於伊朗的討論。莫洛托夫很高興的說：他非常抱歉沒有了。於是將議定書加以修正以便簽字。

那是十二月廿七日上午三時卅分。我疲倦已極；我們大家都是這樣。莫洛托夫先生同維辛斯基先生或者還沒有像我們這般人那樣地精疲力竭，因為他們通常是在中午開始一天的工作，並且時常頂到午夜以後的。他們比較一個很久以前便曉得他的選舉人們要在清晨九時到辦公室的美國人更習慣於連續地熬夜。我們的飛機定於七時卅分起飛。我收拾起行裝，小睡了一會，同美國報紙與廣播記者談話，按時到達機場。時間好像還非常早，不過莫洛托夫同維辛斯基兩位先生已經來與我們送行。

三晚之後，在華府的一座無線電麥克風前向美國人民報告的這個人，比在早十五個星期以前坐在同一麥克風前的那個剛從倫敦回來的人是要愉快多了。在倫敦被拒絕的那要求舉行和會的建議已經在莫斯科被接受了，參加的國家又是按着美國名單選擇的。在十個月來欲使蘇聯順從雅爾達會議關於巴爾幹協議的經驗以後，我們充份的認識了諾言與實踐的區別。然而一向在這些問題中討生活的哈里曼大使，包倫，同其他的人們，却認為我們得到了一件遠較在雅爾達制定的協議更為精密的協議，因而有所進展。

關於對日政策問題——這是在倫敦會議中蘇聯的固執態度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我赴莫斯科以前杜魯門總統與我準備的計劃已經獲得了充份的贊同。關於我們軍隊的駐華問題已經獲得了協議，同時也已經激起史達林重申他對於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這一些事都在馬歇爾元帥開始努力促成一個統一而民主的中國的工作時來的，這好像是一個重大的勝利。

關於我預料要發生困難的原子能問題，蘇聯同意參加支持前此已由英國，加拿大同意的建立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議決案，議決案本身也無重大的修改。

會議議程中唯一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是建議任命一委員會，試求解決我們在伊朗的共同問題那件事。所以我對於一部份報紙批評我們的協議是「姑息」一層，既驚訝，又失望。我發現若干批評是個人性質的。又有若干是來自若干在思想方面顯然受騙了的人們，受騙的原因大抵是由於蘇聯檢扣自莫斯科發出的關於會議的消息。然而多數的批評不幸都是來自那麼毫無理由地反蘇，因而認為與蘇聯就任何問題成立任何協議都是姑息的那種人。

與我在波茨坦，倫敦同莫斯科得到同樣經驗的人們中，沒有一個人懷疑日後還有許多艱苦的日子。然而因為莫斯科會議的原故，我們都以一種更大的期望來迎接一九四六年的新年。世界上別的人們或者也是這樣，我希望如此。

第七章 重到倫敦和再至巴黎

從莫斯科回來後祇有五天，我又飛到倫敦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議。我所最關心的是：通過一個設立聯合國管制原子能委員會的建議，所以，當我離開華盛頓之前，我就宣佈等到聯大對上面這個建議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再回來。

可是，倫敦的日子却並不如如此簡單。在莫斯科所碰到的問題也跟着我們到了倫敦。哈里曼大使跑到倫敦來對我說：維辛斯基，卡爾，和他三人所組織的委員會在布加勒斯特商討改組羅馬尼亞葛洛查政府的事，沒有什麼進展。至於擴大保加利亞政府的努力，也同樣地沒有成就。伊朗問題却更見尖銳化。

駐在倫敦的伊朗代表跑來問我：是否應該把伊朗政府對蘇聯軍隊繼續駐於伊境及干涉伊內政的控訴提交安全理事會。他說貝文已經拒絕向他提供意見；因此希望我能夠給他一些意見。我告訴他說：我也覺得躊躇而不能貢獻意見，因為安理會正在組織之中，甚至連程序規則都還未通過，在它正在組織階段的時候，祇有最緊急的問題始可提出。不過，我告訴他說：很樂於聽取他這問題的事實，願意加以考慮，到明天給他意見。可是他竟不稍等待就向安理會提出了控訴。蘇聯代表團還以為這是貝文授意伊朗代表這樣做的。從伊朗代表對我說的話看來，我可確定這是蘇聯代表團的誤會。然而，正因為猜疑的緣故，蘇聯代表團在兩天之後也對英軍的駐在希臘提出控訴；烏克蘭代表團也同樣地控訴英軍的駐在印度尼西亞。接着來的辯論是辛辣的，而且造成一種導向協議以外任何事情的局勢。

這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外長代表們在聯合國大會會場外面只隔數排房屋的蘭開斯特大廈（Lancaster House）實際開始起草各項和約時所瀟漫的空氣。

一月二十四日的聯大一致通過關於原子能問題的決議後，我就啓程返國。但這時已經有種種跡象暗示外長代表將要碰到阻止外長在九月間會議中達成協議的同樣障礙。由於我們的建議，首先討論義大利和約，這不僅是因為波茨坦協定把義大利放在第一，而且是爲了法國是否有權參加討論其他未決的和約問題。

到了三月，外長代表對於三大問題，即賠償，殖民地，和義大利與南斯拉夫的疆界，依然距離很遠。對於最後一個問題，當時至少有過些行動。這就是曾經派了一個專家代表團作實地調查，奉命對義大利的疆界作一決定，這個疆界要（一）使受外國統治的義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減至最少數；（二）顧及當地的地理和經濟的因素。我國幹練的外長代表鄧恩就派毛斯萊(Philip E. Mosely)代表我國參加專家代表團；代表團於三月九日到達的里雅斯德。

外長代表於是轉而研究蘇聯代表團提出的對三個巴爾幹國家的和約草案。在這一點上，法國代表機警地退至局外。蘇聯的草案是很簡單的文件；實際上不啻是停戰條款的擴充罷了。然而，在取得對英美兩國所提修正案的協議方面來說，會議是有些進展的。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們曾經同意「於和約草案完成之後」及「五月一日以前」舉行和平會議。幾個星期已經過去，而外長代表所獲協議的條款又屬如此之少，因此，如果我們要信守對全世界所作的諾言，那就應該採取急劇行動。我就致函其他外長，建議舉行外長會議以加速外長代表的工作，並建議在巴黎舉行這個會議。我們前已同意以巴黎爲和會地點，我本人很希望外長會議能在巴黎進行。我很合理地確信：在共黨活躍於法國政治舞台的巴黎，莫洛托夫自不致堅決反對法國參加所有和約的討論。我們所能同意的最早會期是四月廿五日。

在第一次會議中，皮杜爾建議各項程序規則，規定四國代表團均將參加全部五種和約的討論。幾個

月來莫洛托夫雖會把這辦法看作重要原則問題而加以反對，但這次却很快地同意了。可是，這就表示他讓步的限度。

會議的議程乃是我們首先意見不合的主題。皮杜爾急於要討論涉及德國的問題，而我則先已提出美國對解除德國武裝和廢止德國軍政的爲期廿五年的和約草案。其次，我們又建議使外長代表開始對奧地利和約的工作。莫洛托夫願意討論德國問題，但他指摘我們的和約建議爲完全不適當，而且斷然拒絕把奧地利問題列入議程。

我看出如果我們要獲得進展的話，莫洛托夫和我二人一定要取得協調。於是我就請他和他的助手維辛斯基以及通譯官巴夫羅夫駕臨美國代表團辦事處與柯衡，包倫和我三人共進晚餐。

雖然我們的晚餐是一件安靜的私事，但對保護莫洛托夫的經常努力，却和保護史達林委員長一樣地並不鬆懈。晚宴的當日下午，蘇聯警衛官來到摩里斯旅館 (Hotel Neurice) 的美國代表團辦事處請我們把進膳的一套房間讓他們看看。我的秘書康納 (Cassie Connor) 小姐很樂意地把我內人和我所佔用的幾間房間都讓他們看了。因爲沒有聽到什麼批評，我們就假定他們已完全滿意於我們的佈置了。

那天晚上客人來到的時候，跟隨莫洛托夫的警衛官也隨着進來。雖然我們在大廳的每一頭都派有一個美國憲兵，但是莫洛托夫的侍衛却在大廳裏佔了一個足以眼看通到那一套五個房間裏（包括我的辦公室在內）所有的門的位置。

我的內人和康納小姐就離開我們的房間到下面膳廳吃晚飯去了。這位侍衛對於離開套房的人顯然是不很注意的，因爲在她們回來而我的內人想進入臥室的時候，我看見他舉起雙手大搖其頭。他的手勢，不論用那種語言來說，意思是她不能進去。她打着在南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 或華盛頓都應該聽懂的話，堅持這是她的房間，而且她剛離開這房間不久。可是這位侍衛先生還是很堅決——她不能進去。

兩位女士終於退到一間辦公室內計劃進入臥室的行動。她們於是乞助於陸軍，請站在大廳一角的美國憲兵幫忙。這位憲兵能說的俄語並不比她們多。不過他身上的軍服倒是說服了蘇聯侍衛，而使後者相信可讓這兩位女士放在房裏而無妨礙。無疑的，他所奉到的命令一定是不准任何人進入房間。由於憲兵的幫助，美蘇關係中的另一次危機便得以避免了。

或者莫洛托夫對於派給他的那些侍衛的稍覺不平常的方法並不注意，也不負什麼責任。這些警衛官或是受一個類似我們秘密警察的組織指揮的。我懷疑莫洛托夫有時或和我一樣的希冀逃脫地主國而不是我們自己所加於我們的經常的看守或監視。

在倫敦的時候，警察總監署偵探部派了一個名叫布萊克上尉 (Captain Black) 的最能幹的警官來看我，而他就從沒有讓我單獨離開他走出旅館一步。在巴黎時，一個說英語的便衣警官名叫胡芬格爾 (Rene Hourvenghel) 的就經常不離職守。我祇逃開過他一次——在和會一次特別沉悶的會議之後。我的內人，也和我一樣的鬱悶，建議二人出去走走。我當時不僅感到鬱悶，更討厭被人監視着。於是不顧內人的反對，帶她一同溜出旅館邊門，藉以逃掉監視。我想我們已經逃過我們的警衛官，而單憑這個想法就足以提起我的精神。等我們走了半小時之後，我偶而回頭一看——胡芬格爾正在那裏。原來旅館的職員已經報告過了，他就跟在我們後面。因為「法律」和我的內人的反對，我祇能做一個男人在這環境之下所能做的惟一事情：我承認我的過失，並且答應以後不再犯規。

有許多次當警衛官跟着我的時候，我覺得比我在那天晚上要危險得多。每天我們被汽車送到會議的地方；我們的汽車跟在兩輛警察機器腳踏車的後面，他們以每小時五十英里的速度在巴黎交通中心賽跑，並且每人都吹着一個小警笛。巴黎的街道擁擠着自行車，而每一輛自行車都不喜歡交通警察，並且完全藐視警笛。我也雖努力使護衛的機器腳踏車開得慢些。但他們依舊瘋狂地穿過紅燈。為保護自身計，

我們祇好緊緊地跟在他們後面，即使我們的緊張心情隨着時速表上的每一次跳動而增加，但也祇好這樣做。

我故意將我和莫洛托夫約定同進晚餐的事拋開不想，但這正好像駕車駛過擁擠的巴黎街道時那樣地鬆弛。在我們還沒有到達膳廳之前，莫洛托夫就開始猛烈指責美國在伊朗案件中的態度，這個案件自從我們上次會議以後，早已在紐約安理會中辯論過了。他責備我們的行動不像一個朋友，而他的政府却成了「反蘇運動」的犧牲品，在這個運動裏面，伊朗案件和安理會正被當作推進一種攻擊之用。我就首先提醒他關於在莫斯科時曾經和他及史達林委員長共同對於處理伊朗局勢所作的努力。當時所作的會談特別是在防止伊朗案件的提交聯合國。那時我會經明白申述：倘這個案件果真成為安理會的問題，那我們就不得不反對蘇聯政府。於是柯衡和我一同詳細舉出在安理會中所發生的事情的經過，並且強調如果蘇聯軍隊在條約上所規定的日期之後依舊駐於伊朗境內，便不能私自地去處理這件事；這問題就必須從輿論的見地來討論它。

因為這頓晚餐是在這樣不協調的情調下開始的，所以無怪我們以後對各項和約的討論，以及美國對德奧問題的建議，就很少成就了。第二天早晨，我和范登堡（Vandenberg）康納利（Connally）二人檢討這種情勢——我們一致認為外長會議要早日達成各項問題的協議，希望是很少的。

不過，會議對於限制義大利的海軍，處置剩餘海軍艦隻，三處主要的法義疆界的修正，以及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法國所建議的關於登達——布利加區域（Tenda-Briga area）的第四次變更等問題，却很快地取得了協議，於是我們就討論殖民地問題。莫洛托夫提出一個新的建議：把的黎波里坦尼亞置於兩國託管之下，望蘇聯及義大利共同管理。這使英國提出堅強反對，貝文提出了一個對案，主張利比亞全部，包括的黎波里坦尼亞和昔蘭尼加（Cyrenaica），必須立即獲得獨立。法國則站在蘇聯一邊反對英國

的建議。最後，莫洛托夫說，他願意接受法國所提議義大利來託管的建議。我們起先仍保持集體託管的立場，但後來說明如果其他國家一致同意，如果有確定的諾言准許殖民地在十年之內獲得獨立，則我們也可接受法國的建議。不過法國不能同意這一點，而英國則不願接受法國的建議。於是我宣佈我們仍保持我們的集體託管計劃的立場。

關於將多得喀尼斯羣島移交希臘的討論，仍未產生結果，因為莫洛托夫堅持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等到殖民地處置完畢以後。

我們的最長而且最困難的時間是用在義南疆界的問題上面。前往威尼亞西亞求利亞省(Venezia Giulia)的四人代表團在那邊化了四星期的工夫，然後提出四種單獨的建議。蘇聯代表的建議符合南斯拉夫的要求。美英法三國代表建議的疆界在北部是相同的，但在南方却又意見不一。法國的建議（大批是美蘇兩國建議的折衷辦法）並沒有顧到某些地理和經濟方面的條件，但確似乎把兩個少數民族的團體平衡得最是公平。我們所能得到的人口統計頗不可靠，但據我們所作最佳的估計來看，法國建議的疆界使留在南斯拉夫境內的義大利人變為十三萬人，而使十一萬五千南斯拉夫人留在義大利。祇有蘇聯代表建議必須把義大利在全部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的的里雅斯德從義大利版圖中割去。

五月三日，南斯拉夫副總理卡德利(Kardelj)和義大利總理加斯巴萊(Gaspari)分別提出了兩國政府的理由。這些理由和我們在倫敦所聽到的大部份相同。次日，各外長作五小時多的辯論之後，情勢仍無進步。莫洛托夫對南斯拉夫的要求表示不完全支持。他指責義大利將要利用的里雅斯德作軍事根據地，和擴充義大利勢力到鄰近的克羅提亞人(Croats)及斯洛文人(Slovenes)所居地區的跳板。他說：即使的港這城內的居民以義大利人多數，但我們不得把他稱為頭部的這城與身體部份的省份分開，而懲罰我們的盟國南斯拉夫。我指出一個給予南斯拉夫以前從未有過的三十多萬居民和數千方英里領土的方案

，實在不能說是懲罰。我提出願意更進一步接受法國建議的疆界以示折衷，而把寶貴的阿薩（Aras）煤礦區給予南斯拉夫。我更建議在爭執區域內舉行公民投票。但這些建議都未被莫洛托夫接受，由於貝文，皮杜爾和我不願再作讓步，因此除了轉向其他和約的討論外，就不能有所作爲了。

爲討價還價的最後努力起見，莫洛托夫邀請柯銜，包倫和我到蘇聯大使館他的辦事處晚餐。他建議如果我們同意將整個威尼西亞求利亞省，包括的里雅斯德，併給南斯拉夫，他也可能對殖民地問題和賠償問題改變態度。可是他暗示他對後一問題的讓步將以犧牲希臘和南斯拉夫的賠償要求爲限度。他斷然地說：蘇聯不能放棄她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一億美元的賠款。當我們說明我們不能同意時，他和維辛斯基二人就立刻發動一大套宣傳性質的指責，說美國是在從事於一個「帝國主義的擴張」的政策。他們列舉美軍的駐在冰島和中國，並且指責我們在土耳其，埃及和伊朗覓取根據地。我真被他們挑動得想用同樣的神色來作答覆，但我沒有這樣去做，僅向他們指出：如果說在冰島的七百二十名航空基地的工程人員和後勤部隊是對蘇聯的「帝國主義的」威脅，這是何等可笑的話；我再提醒他們：在莫斯科我們已經詳細商討過中國的情勢，並已對這問題發表過一個聯合聲明。至於中東方面，我們並無取得任何基地的計劃或企圖。

「我們的基本政策是儘可能地早日撤退在德日兩國以外各國境內的軍隊，」我在晚餐完畢後和他討論時這樣地告訴他。就是因爲這樣，我們一直在敦促締結對奧地利和約，俾使我國在該地的軍隊能夠撤退。但那是蘇聯政府本身——蘇聯在該地的軍隊較任何盟國的駐軍要多上幾倍——拒絕了這個建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對美國或美國的意向有什麼恐懼。我很抱歉的說：「這在蘇聯却未必如此。」

莫洛托夫，爲了支持他們對英美帝國主義的譴責，竟然回溯到一九一九年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革命期間美國遠征軍到達西伯利亞的事。第二天上午，他和貝文談話時也是這樣。當貝文說十九世

紀的帝國主義已經死去時，他批評說：他必須指出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是非常活躍的，由英國在希臘、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亞和別的地方的駐軍與根據地來看，便可得到證明。貝文對這些指責的否認，並沒有阻止莫洛托夫以後在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中發動同樣的宣傳運動。

就在這種情調下我們開始了其他幾個和約的工作。所以，無怪莫洛托夫把美國所提的保障多瑙河（Danube）經濟事務及自由航行機會均等的建議，看作祇是帝國主義的擴張和資本主義的獨佔的更進一步努力了。

我把晚餐時與莫洛托夫的談話告訴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後，他們也和我一樣感覺悲觀。在這種空氣之中，實際上沒有希望可以就任何爭執的問題取得協議。因此在五月八日，我建議我們應該拿召開承諾已久的和平會議來紀念對德勝利日的第一週年。我提出六月十五日為和會的召開日期，俾外長代表有充分時間就已獲協議的條款起草並傳佈一個報告，以及就尚未解決的條款提出四國代表團的意見。

貝文和皮杜爾都表示同意。可是莫洛托夫認為符合莫斯科協定起見，在對一切「基本問題」獲得一致協議之前，不能舉行和會。事實上，祇要蘇聯所認為「基本的」任何問題一日不獲協議，這就給蘇聯代表團一日享有否決權。然而我的建議顯然產生了某種效果，因為第二天外長代表的報告說明，他們在一晚之間居然能就另外十九點達成協議。在次一星期中，我們繼續作我們在召開和會方面的努力，但在外長會議桌上，在非正式會議中，以及在私人的談話裏，莫洛托夫還是依然強硬。顯然，他決心要延宕蘇聯佔領軍的撤退。

爲了想得到若干進展，我們建議指派特別代表開始對德和約的工作，但這也遭到反對。那一星期裏惟一的成就是修正對義大利的停戰條款，撤銷了盟國委員會和撤除了大部份的軍事管制。

到五月十六日，我們疲勞地同意休會，定六月十五日在巴黎復會。「在一個遭戰爭破壞的世界中去

建立一個民族的和平的基礎，是一種長久和艱難的工作，」我在五月二十日向美國人民作廣播報告時，曾經作過如上的承認。「一個民族的和平不能靠燦爛的外交勝利去獲得。它需要忍耐和堅定，寬容和諒解。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意志加在他人身上，但我們必須確定他人也並不認為可把他們的意志加諸我們。」

把六月十五日定作和會日期的努力既告失敗之後，我會經努力使七月一日以及七月十五日為召開和會之期，但還是沒有成功。不過，我向無綫電聽眾說，「當缺乏物資及缺乏糧食的世界在呼籲恢復和平狀態的時候，我們不能無限期拖延和平的締造以及軍隊從各佔領區的撤退。」我還提醒一句說：如果在夏季裏還不舉行和會，美國將要把這問題提請聯合國注意。雖然原來並沒有認為聯合國組織必須牽涉在和約工作裏面的意向，可是憲章第十四條確是授權聯合國大會「對於其所認為足以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之任何情勢，不論其起因如何，得建議和平調整辦法。」我認為，我們正迅速地接近這種「情勢。」

「我們必須為和平發動攻勢，一如我們對戰爭採取攻勢一樣，」我又說，並且表明我的信念，即「世上沒有一處鐵幕是不能為人類的總和情緒攻破的。」

莫洛托夫對於我這次演說的反響是迅速而激烈的。他向蘇聯報界發表了一個聲明，重複地指責英美資本家正在煽動新的侵略戰爭，並且目的在控制世界。他說我所提的和平攻勢，實即是「忽視和平利益的對於蘇聯的攻勢。」

不過，當外長代表在外長休會期間恢復工作時，蘇聯代表終於願意對五項和約的經濟部份作具體的談判。因此，在我們回到巴黎的時候，已經另替我們準備好不少新獲協議的條款了。

在這次「休會」期間，匈牙利總理納其(Nagy)來到了華盛頓。他在這裏的時候，公開聲明他贊成

由國際來管制多瑙河——這是一個附庸國家的獨立的驚人表現。他要求取回被德人搬走而被我國軍隊虜獲的匈牙利的黃金。我們就命令我方佔領區內的負責軍官，把黃金和其他顯然為匈人所有的財產退還他們。

六月十四日，我們又動身到巴黎。這是我在不足一年內越過大西洋的第十一次行程。爲了這次旅行，總統把他的座機「聖牛號」交給我們使用。我們這一行，還是和以前一樣，有康納利參議員夫婦，范登堡參議員夫婦，柯衛、包倫、我的內人，以及我的秘書康納小姐，她在這次覓求和約方面所達到的里程記錄幾乎和我同樣的大。

美國代表團於是又回到華麗的盧森堡宮出席第二次巴黎會議，決心盡全力使召開和會的請求能夠發出。我們預料到種種的拖延，但認爲當莫洛托夫明白了他不能再獲到任何讓步的時候，他也會同意的。會議在幾乎成爲慣例的初步爭論中開始了。美國代表團提出一個對奧地利和約的草案，要求列入議程。莫洛托夫不願討論我們的草案，却接受皮杜爾所提的把「檢討奧地利問題」列入議程的建議。於是他也提出一個反要求，主張檢討「義大利的政治情勢」，利用六月二日義大利國內對廢棄君主國體的公民投票以後所發生的示威運動，作爲批評英美佔領政策的機會。我想，我們很快地同意討論他所提出的建議，是頗使他感到驚奇的。但以後十一天裏的進展却是遲緩得令人苦楚。其後，到六月廿七日，一連串擁塞的大木料（即指問題——譯者註）突然顯露出鬆開的跡象。

這次鬆開的到來是最出人意料之外的，那是在一次冗長會議的結束的時候。先是，我們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在各和約中列入一項僅僅是原則上的聲明，就是：多瑙河應該是一條自由航行的水道。但這建議的討論並無結果。莫洛托夫抱着幾乎總是那樣單調的堅持的態度，主張多瑙河必須由沿河的國家來管制。我們把那天整個下午費在這些問題上，即限制保加利亞的海軍，修正登達——布利加區內法義兩

國的疆界，以及羅馬尼亞和約中的瑣碎條款等等。我們在這一和約的若干經濟條款方面的協議，促成我說出一句帶着幽默和希望的話：

「我們應該使今天的下午過得很好，而把多得喀尼斯羣島的問題給解決了。」使我感到驚異的是，莫洛托夫回答說：「蘇聯代表團並不反對那個建議。」

「莫洛托夫先生的話是不是說他同意這羣島應該歸希臘？」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的貝文，帶着不相信的語氣這樣地問。

這位蘇聯代表立刻回答說，他已經同意了，並且立即提議我們應討論此一問題。

「讓我休息一二分鐘罷，」我嘆口氣說。

莫洛托夫平心靜氣地推測或者可以作成其他方面的「好的協議。」我提議討論義大利的殖民地問題，他說這問題可以根據美國的建議把它解決，就是，在一年以後再作決定，如果到那時不能達成協議，就請聯合國大會來決定。經過外長代表的起草工作後，這問題就算通過了。

可是，賠償和的里雅斯德這兩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在六月十八日的商談中，美國重又提議蘇聯可獲得一億美元的賠償，從四種來源湊集起來：不能迅速改作非軍事之用的戰時工業設備，義大利在巴爾幹國家的資產，義商船「薩透尼亞」號 (Saurina) 和「佛爾開尼亞」號 (Vulcania)，海軍船艦及為美英海軍所鹵獲的其他戰利品。

莫洛托夫主張戰利品不能看作賠償的來源。嚴格的說，他是對的。戰利品應該屬於鹵獲的國家。但莫洛托夫主張蘇聯有權取得一部份義艦，因為在波茨坦會議中，美英兩國會同意在分配我們所鹵獲的戰利品德國艦隻的時候，讓蘇聯也佔得一份。我們告訴莫洛托夫說，海軍艦隻既是戰利品，蘇聯就無權獲得其中任何一艘艦隻；先前給予蘇聯紅海軍的德國艦隻完全是一種贈送的禮物。我們並沒有答應永遠把

我們的戰利品作爲此種贈品。蘇聯可並未把她的戰利品分給別國。

莫洛托夫接受了上面所說的三種賠償的來源，但認爲我們把這些資產的價值估的太高。他估計總共的資產大約是三千萬美元。所差的數目，他說，應該從目前的生產中去補充。我們把這問題放着，而建議調查義大利的商船及研究一個決定其他方面所作估計的方法。

三天之後，皮杜爾提出了的里雅斯德問題，就這城市很審慎地提出了一個臨時國際政府的建議。外長會議的其他三方都以較爲審慎的態度接受這個建議。那天晚上，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和巴夫羅夫三人到摩理斯旅館我的辦公室來與柯衡，包倫和我作一次私人商談。莫洛托夫作了一次顯然是最後的努力，企圖把的里雅斯德劃歸南斯拉夫。我們還是表示我們決不能同意使南斯拉夫的主權伸張到這個義大利人的城市，並提議雙方對皮杜爾的建議作若干考慮。

次日我提議我們應該發出七月十五日召和開平會議的請柬，同時我們應該利用中間一段的時間來尋求剩下的各問題的解決辦法。到十五日時所留下來的未決問題，我們祇消報告集會的二十一個國家。雖然莫洛托夫認爲我的建議還嫌太早，但貝文和皮杜爾都表示贊同，並且力促馬上發出請柬。我們最後決定星期一（即廿四日）起，就所有和約的進展作一檢討，到星期五再考慮美國對召開和會的要求。

星期一上午，莫洛托夫約我下午仍在我的辦公室再談的里雅斯德問題。在那裏，他建議的里雅斯德及其附近各區應宣佈爲自治邦，在主權上屬於南斯拉夫，而由四強草擬的國際規程加以統治。我們指出這和皮杜爾所提出的由聯合國管理而其行政長官由聯合國任命的意見完全不同，但我們答應予以考慮。第二天下午我們跑去答訪他。

「我們已經分析了你的建議，認爲這足以造成一個難堪情勢，」我說。「在南斯拉夫的主權和南斯拉夫人担任的行政長官之下，四強代表就不能有所作爲，而且和聯合國沒有什麼關聯。美國不能接受南

斯拉夫對的里雅斯德區的主權。我知道蘇聯不能接受義大利對的港的主權，因此，我們願意考慮打開一條出路的任何建議——或者如皮杜爾建議的讓聯合國來管理，或者把這問題留待和會決定。我甯願選擇後者，因為這樣可把責任加在廿一國的肩頭。」

莫洛托夫於是問我，如果的港問題解決之後，賠償問題能否「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加以處理。我說我並不認為這將造成不能克服的困難。

「美國不希望資助別國的賠償，」我說。「但是我們或可同意一個計劃，使蘇聯能將某些原料供給義大利，讓後者可以製造蘇聯所需要的商品，作為賠償。」

他又問道，如果對所有和約，包括對保加利亞和約在內，能夠達成協議，則美國是否將簽字於各項和約。我說我不覺得這一點有什麼困難，等這問題發生時，我自會應付。我就問他能否勸說保加利亞政府實行莫斯科決議。他可以給我的惟一的答覆是，他的政府會經嘗試過，但遭保加利亞反對黨的拒絕，所以，失敗應該由他們負責。在這次「試探立場」之後我們就分別了。

次日下午，皮杜爾提議舉行一次限制人數的晚間會議，每一外長祇可帶二位顧問出席。

每逢這種情形，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總是跟着我出席的。在那次會議中，莫洛托夫起初重又提出和我作秘密談話時說過的建議，後來却又進一步趨向法國的建議。這次不再主張設立一個南斯拉夫人担任的行政長官，而提議由兩個行政長官，一個是義大利人，另一個是南斯拉夫人，來一同管理的港。這種意見自不能受人熱烈歡迎，因此，最後貝文提請大家注意說，和會的程序好像並不決定什麼似的。莫洛托夫不悅地回答說，英國人不應低估他自己在產生這種結果方面的貢獻。

在這樣情調之下結束了談話，無怪第二天對多得喀尼斯羣島及義大利殖民地問題的協議要使我们感到驚異了。即使如此，要做的還是很多，而退讓的過程是遲緩和勉強的。為使擁塞的大木料能繼續行進

計，我提議把召開和會的問題列入我們下次會議的議程。莫洛托夫表示反對，但我促他注意，至少我本人要討論這個問題。第二天，除了蘇聯代表以外，其他各人都同意和會應該在七月二十日舉行。於是他主張把決定移後數天，以便考慮皮杜爾所提出的關於的港問題的新建議，

的里雅斯德問題就此步入了一個決定性的階段。我們並不喜歡自由區的意見，但這既然是脫離進退維谷之境的惟一辦法，我們就決定使自由區政府得以成立，使這政府有機會可以進行工作。莫洛托夫首先提議一個難於實行的領土大綱，使的港與它的碼頭切成兩段，把城區與水源隔絕，再將電力變壓器放在南斯拉夫境內。他要求由四強而不是聯合國來監督。我們拒絕變更我們的立場，即應該把責任交給安全理事會而不是交給對立的四強委員會。

我們認為自由區的成就不僅對於四強而且對於所有聯合國的國家均將是一個極重大的問題。四強在旁的地方既沒有表現出融洽工作的努力。自無理由盼望在監督自由區方面有什麼兩樣的情形。如把責任交給安全理事會，則全體十一個理事國家均將分擔責任。要求一個對立的組織是欠缺理由的。我們更認為聯合國比較為這唯一目的而成立的四強組織要更有聲望些。我們相信假使這個自由區的完整與獨立遭受侵略的威脅時，則安全理事會應負責供給軍事保護，如由四強委員會供給為上述目的之用的兵力，那就是不智之舉了。

到七月三日，我們重新發動召開和會的運動。這一次，莫洛托夫說：在賠償問題解決之前，他不能予以同意，但最後他終於不得不提議以九月一日為召開和會的可能日期。其他三外長都反對這樣的稽延，不過我們至少已得到他在原則上的允諾。那天會議開到晚上八時卅分才結束，大家覺得七月四日將是一個決定性的日子。

四日早晨是一個光榮的早晨。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還有加佛萊大使（Ambassador Caffery）

和我都參加了美國歐戰將士團 (American Legion) 安排的在華盛頓總統紀念碑附近舉行的典禮，然後我們又到羅商波 (Rochambeau) 紀念像向這位法國人獻花，以追念他對我國獨立的貢獻。

那天我們在下午五時開始會議。等到外長代表作完例行報告後，皮杜爾提議休會半小時，讓四外長到他辦公室去對規定和會日期的問題作一次秘密商談。在那裏，他解釋他所以要提議舉行秘密商談，是為了希望我們能夠把和會和賠償問題給同時解決了。

我立刻聲明我們前已一再申述我們願意重新檢討賠償問題，一俟和會日期定妥後，也仍然願意這樣做。我說，美國反對人家告訴她爲了取得召開和會的協議而應該在旁的問題方面如何去做。於是，莫洛托夫否認他在使用這種策略。皮杜爾又努力于取得折衷辦法，莫洛托夫乃要求從義大利的現有生產中取得賠償。這時我就插進去說，我們雖然感謝皮杜爾的努力，但我們不能在和會日期訂定之前商討賠償問題。美國人民不喜歡一種威脅的出現，我說，並且將以爲在這種環境下所獲得的任何協議，不過是企圖求得和會的買賣而已。

貝文在他的說話中甚至更爲尖銳。他說，如果他走出這間會議室，帶着一種他已經化了一億美元的代價向蘇聯買得和會的含意的話，他就不能再見英國議會。

莫洛托夫對這情勢加以估計後，就作成他的決定。他說，並沒有買任何東西的意圖。他不過請大家考慮蘇聯的合法要求。于是他同意外長會議在常會中應該肯先處理日期問題，然後再定賠償問題，希望兩個問題都能在那天解決。因此，我們又回到會議室，在五分鐘內就同意以七月廿九日爲召開和平會議的日期，於是命外長代表擬請柬。

美國代表團隨即提出一個賠償建議案——這建議案立刻成爲連續六小時辯論的中心。直到七月五日上午晨一點鐘，我們才疲乏地同意蘇聯應取得一億美元的賠償。這個數額由義大利平時經濟所不必需的工

業設備，義大利在巴爾幹國家中的資產，以及義大利目前生產的剩餘（係由蘇聯供給必需原料）去湊集。莫洛托夫願意使別的賠償要求讓和會來決定。

我們原望次日可以發出請柬，但我們完全低估了莫洛托夫的不斷的固執。他反對用外長會議的名義發出請柬，因為這將使中國成爲邀請國之一，更加重要的是，他堅持我們必須先同意和會的程序規則。于是又費了四天功夫作激烈辯論。莫洛托夫所建議的程序規則，使和會成爲除了通過四外長的工作以外，實際上無權作任何事情。當然，貝文不能同意使英國各自治領極少機會可以有效表達其意見的一套規則。我也一再告訴莫洛托夫，美國不會同意把一套規則加諸許多主權國家的集會，並且堅持和會有權決定其自身的程序。

在皮杜爾提議之下，我們終于又舉行一次私人會談。蘇聯代表接受了一個建議，即附在請柬上的程序規則草案只是外長會議的「建議」而已。列在這些規則中的一條說：一切建議應由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提出之。莫洛托夫雖堅持逐點談判規則，但被我拒絕了。我說的美國將不受這些規則的約束，而我不能允許這些「建議」居然獲得好像條約條款的逐點談判的地位。會談結束時，我重申以前的歷次聲明：「我請各位明白瞭解，」我說，「在和會召開時，美國將認爲她有完全的自由去接受或反對視爲適當與否的可能提出的任何修正或新的建議。」

這個聲明——不過是我在這次商談中所作的許多次類似聲明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因爲此後莫洛托夫的極力抹殺這個聲明使它成爲和會的最激烈爭執的問題之一。

最後終于達成了協議，請柬也终于在次日（七月九日）發出。

如果不明瞭這是皮杜爾在中間斡旋的話，上面這個協議的故事不完全的。就事實而論，他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物。戰前他是一個教授，戰爭期間他是一個地下軍的領袖，曾被敵人俘虜了去。釋放後回到

巴黎，就參加政治。像他那樣過去在政界沒有什麼經驗的人，居然在這方面表現出非常的才幹。在他領導之下，人民共和運動黨(Mouvement Republicain Populaire)獲得衆議院的最多數席次，因此，他就被推組織政府。後來他做了法國的臨時總統兼外長。他領導過一個包括共產黨，社會黨，及人民共和運動黨的聯合政府。能夠在法國順利地領導這種政府達九月或十月之久的人物，在主持外長會議的討論中一定是有助的。他以建設性的頭腦和動人品格使許多爭執很烈的問題獲得協議。

當貝文在七月十二日深夜放下主席用的小槌說，「諸位先生，我們在和會中再見罷」的時候，我感到非常疲乏而極想聽從總統和我的僚屬的勸告，在舉行和會之前到瑞士去休假。

但這兩個星期中在國內可做的工作很多。關於外交人員的立法以及其他這一類似的問題正在等着決定；還有遠東和南美的許多問題也待處理。於是，在七月十五日星期一晚上，我又在華盛頓對着廣播電台的麥克風向美國人民作另一次報告了。

「我們所獲致協議的和約草案並不是人的智慧所能擬訂的最佳草案，」我作了上面的承認。「但確是人的智慧所能獲得四大盟國協議的最佳的草案。在此破碎及疲於戰爭的世界中，這些草案實在代表我們所能盼望的恢復和平的滿意途徑。」

我於列舉草案的主要條款及所獲得的各項協議後，提到「四國政府在協調他們之間的意見方面所經過的激烈的爭執和重大的困難，」繼而又說：

「我原以為他們不容易了解我們，就如我們不容易了解他們一樣。但我有時認為我們的蘇聯友人常恐如果他們對於我們所要求的——甚至即使他們自己也這樣要求的——事情不作爭執而表示同意，則我們要把它們看的軟弱了。不過，在一個渴望和平的世界裏，不斷的爭執有時未必是有益的。」

美蘇外交秘錄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在紐約的結局

我們在準備和會的時候，深信我們可以代表兩黨與多數美國人民，提出美國的意見。華盛頓郵報提議給美國代表團以熱烈的歡送後，華府民衆的反響，便足以表現這種精神。在通往國家機場的路旁排列着的大批人們，以及機场上歡送我們的羣衆，在十一個星期的會期中，是我們獲得真正鼓勵的泉源。我們人民對和平願望的動人表現，使我們在求取和會與其對和平保證時所從事的十二個月的工作，與六千英里的跋涉，因此顯得更值得。

法國政府及人民盡一切力量，為締和工作，準備適當的場合。法國超出了地主國的職責，但他們雖盡了最大的努力，仍不能消除外長會議結束那幾天籠罩着的激烈情緒。

社交活動，對身體的耐力是一種測驗，我除了政府領袖與外長的邀請外，必須拒絕一切請柬。但是我必須承認，在和平會議這種場合下，社交生活確有益處。只要人們在社交場上相晤，並且討論各種問題，就有解決問題的機會。這種意見，存在於很多地方以及很多人們之間。甚至最高法院也承認這點，每一位法官走進會議廳，等候全體步入法庭的時候，總與已經在廳內的法官一一握手。我初任法官時，認為這很不妥當，因為我時常剛和一位或幾位法官談過話，接着又要彼此握手。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多年以前一位院長建立起來的老規矩，其理論是無論法官們在前一天爭辯得如何激烈，如能在第二天開始時握手交談，就必能調和他們的異見。我在與其他國家代表週旋時，並未忘記從最高法院得來的教訓，而在巴黎和會緊張的時日中，尤其有價值。

我們出席和會，所持觀點與蘇聯政府全然不同，這使會議在開始時，便發生了衝突。我們相信討論

應該充分而自由；凡對贏得勝利有所協助的國家，對於和約提供修正案或建議案時，應該獲得最廣泛的活動範圍，而他們的建議應該具有極大的力量。我們相信一個持久的和平，必須為人民的和平。

可是，蘇聯的態度，似乎認為和會應該對外長會議中所獲致的協議，予以簡捷的確定。而和平條件的建立，縱非絕對地，也應該主要地是大國所關心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信念，我在會議開始的演說中，宣佈美國將要支持外長會議所獲致的協議。但是，就像我在外長會議所說過的一樣，我對程序上的各項提案，都將參加表決，而不顧外長會議所提出的建議。如果和會經三分之二的多數，對外長會議未獲協議的任何實質問題提出建議案時，我將盡一切努力使外長會議通過該項建議案，而不管美國在和會中如何投票。莫洛托夫先生立即指責我們的立場，也就是英國所採取的立場，說是在破壞外長會議對和會程序規則所獲致的協議。第一次我忽略了他的指責，但當他再度提出，並且顯然存心使人憤怒時，我從外長會議紀錄中宣讀我所發表的六個聲明，都在保留美國對程序問題中任何修正案投票的權利。我說明我所以常常提出保留條件，只是因為我深知莫洛托夫先生的策略。

「從紀錄上看來，」我聲稱：「只有莫洛托夫先生會說我會經同意支持建議中的程序規則。」我指出當他說美國與英國支持表決程序規則上的修正案，是「前後矛盾」時，他自己最後對該項規則的同一部分，也提出了一個修正案。

「現在，只有莫洛托夫先生會那麼做。」我又說。

對程序問題的辯論冗長而又激烈。將近三個星期，莫洛托夫先生及維辛斯基先生使用議會裏雄辯家的一切才能，來限制小國與中等國家的參加。這和這些國家的利益與願望相反的。此外，蘇聯代表團在質詢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代表們的動機，以及指責一個個集團的形成而並無指責的理由時，其所用策略

的粗鹵無禮，使若干認為西方國家對蘇聯有失公允的與會代表們，都改變了他們的意見。從那時起，這些代表對蘇聯大加批評，且時常投票反對他們。蘇聯代表團宣稱，當和約交回外長會議時，他們對於由僅過半數通過的任何建議案，都將認為缺乏拘束力，而棄置不顧。但在很多次表決中，蘇聯的建議案都為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所擊敗。

莫洛托夫先生認為我們與英國人已經組織了一個反對他的集團。事實上，我從未出席過使人能懷疑我們有這種行為的會議。在和會的後期，他甚至指責我們唆使小國提出修正案。這種修正案，很多都在支持我們原先對和約建議案中所包括的各種目標，其後因為在外長會議中遭蘇聯推翻，而使我們被迫放棄。莫洛托夫對他的支持者的投票與行動，都加以嚴密的控制，他於是認為我們也是一樣。其實，例如比利時、荷蘭、南非、澳洲或紐西蘭，都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而我們在想對他們的意見有所左右時，會感到遲疑，這些對他都是不可思議的。因此，他指責我們組織「集團」，目的在破壞外長會議的工作。

「集團之說從何而來？」最後我不得不問了。「那些跟着蘇聯投了一票又一票的，憑什麼權利能稱我們這些不常與蘇聯同意的是一個集團？」紐西蘭提議所有建議案都使用過半數表決制時，在委員會中僅僅因十一票對九票而遭否決，當時沒有人抱怨這建議案是被蘇聯集團推翻的，但當蘇聯對表決程序的建議案在本和會中遭十五票對六票的壓倒多數擊敗，這種失敗就被指為盜格魯撒克遜集團所造成的了。這是何等隨便而惡作劇的言論！」

當程序問題的爭執接近尾聲時，我致電參議員康納利及范登堡，籲請他們參加代表團。我需要他們來衛護美國，對抗目前蘇聯與其附庸國對我們所加的批評。像過去一樣，他們立即答應了我的請求。他們也做了最有效的工作。

康納利參議員成為處理義大利和約中政治部份委員會的美國代表，由助理國務卿鄧恩以及一位傑出

的外交官員瑞伯 (Sam Rober) 爲輔。范登堡參議員代表我們出席負責處理所有和約中經濟問題的委員會，由現任助理國務卿索爾甫 (Willard Thorp) 協助。其餘出席各委員會者如下：羅馬尼亞和約委員會，由哈里曼先生出席，他那時是駐英大使。保加利亞委員會，由駐法大使加佛萊出席。匈牙利委員會，由駐蘇大使史密斯將軍 (Bedell Smith) 出席。軍事委員會，由康耐利海軍中將 (Richard L. Connally) ，巴默爾准將 (Jesse D. Balmer) 及勃萊斯上校 (Roland K. Pryce) 出席，該會同時也處理海軍問題。每日早晨九時，這些先生們就同我及國務院各專家會晤。每一委員會的代表都要提出報告，使代表團每一份子都知道各個委員會中討論的狀況，並且在必要時，可以獲得代表團對某件爭執問題的判斷。這是一個協調而工作順利的團體。沒有一位國務卿得到過更忠誠與更有力的支持。

在全體大會最初的某次會議中，民主新義大利的總理加斯巴萊，出席陳述義大利的意見。他與他的代表團被當作敵國的代表們看待。除了皮杜爾先生以外，沒有一個代表對他表示歡迎。皮杜爾是大會主席，他並且依照正式方式，在會中介紹加斯巴萊。義大利總理極爲機智地陳述他的意見，態度尊嚴，也很果敢。當他離開講壇，回到最後一排指定給他的座位時，他在沉靜的會場裏穿過中間甬道，行經很多認識他的人們。沒有人對他講話。我深深覺得這是不必要的殘酷。像旁人一樣，我會在倫敦遇見過他。因此，當他走近美國代表團時，我站起來跟他握手。隨後我給他一個通知，請他在當日下午到我辦公室來。我要鼓勵這位曾在墨索里尼手中身受痛苦，而又在同盟國手中受痛苦的人。

在離開華盛頓到巴黎去之前，我在一件對義大利極爲重要的事情上，獲得協助義大利新政府的權力。我們已經償付了法國給予我們軍隊的供應，但衆院撥款委員會拒絕我們的陸軍部償付在義大利購買的供應品，理由是義大利是一個敵國。由於他們的行動，財政部就停止付款。我把這件事分別通知衆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康農 (Clarence Cannon) 及委員會主要共和黨議員台柏 (John Taber)。這兩位先生時常遭

到隨便花錢的官員們的責難。但從我長期的經驗中，我知道他們所力爭的，僅在保護納稅者的金錢，而我常見他們對應該做的事情，總很表示同情。當我告訴他們，供應品是在義大利加入盟方作戰後才備辦的時，他們便立即聲稱願意撤消他們的反對。

我知道加斯巴萊總理在出席和會受辱之後，便在當日下午告訴他美國政府的這項決定。但我警告他，我們的決定須至對義和約獲致協議後，才能宣佈。我解釋道，否則要求義大利賠償的國家可能因此提高他們的要求。

有些時候，我們認為和會將無終止之日。在每一個問題上，若有極小的爭論，蘇聯就要提出意見，若干附庸國隨後都要發表支持的演說。每一次演說都要用三種語言敘述，因此進展很是困難。直到其他國家的代表，並未經過任何正式會議或諒解，僅由一致契合，開始避免發表演說，而以表決代替時，工作才開始推進。

可是，我認為蘇聯代表團及其附庸國的行爲，並不完全使人喪氣。如果莫洛托夫先生與維辛斯基先生在各委員會以及全體大會中以那麼多時間來考慮各種建議案，而在後來却對和會的建議案拒絕考慮，在我看來，這似乎難以相信。

在這些辯論中間，很少指責不是針對美國同英國的。我們被指為與「法西斯分子」謀取同盟。企圖以「外國托辣斯與卡迭爾」去「奴役」義大利，用資本去「征服」弱小國家，以及其他無數可惡而又可笑的名。

我們在可能範圍內，力求避免陷入這種辯論，但有些時候，却必須要答覆。其中一次便是莫洛托夫先生在前敵國就和約草案陳述意見後所發表的演說。這是一篇過甚其詞的演說，他支持前敵國對我們盟邦希臘的攻擊，並且將義大利與蘇聯控制下的巴爾幹各政府作不利的比較。這也構成了對英美和平政策

的直接攻擊。

我於答覆時告訴大會道：「在這個獨立世界裏的和平，不能由於漠視這兒對美國一再的詬罵與誣蔑而有所增進。」我極力反對「蘇聯政府給予本和會的印象，說其他前敵國比義大利還要民主，因為他們附和蘇聯的意見……美國相信各國主權平等。我們反對使小國成爲大國的附庸。」

我提到莫洛托夫先生指責某些大國在戰時乘機自肥，並問他是否可能指美國而言，美國在作戰中費了四千億美元，而且以一百一十億的租借援助昇予蘇聯。我指出我們不求領土，不要賠償，而和約草案中給予蘇聯的却有大批領土與億萬款項。

「美國必須駁斥蘇聯所說美國以經濟平等爲基礎所提出的經濟條款……是美國在榨取前敵國而謀自私利益的努力中之一部分。」

有一次維辛斯基先生反復指責美國試圖以「施捨」來統治世界，在他演說終止時，我看到坐在我們代表團前面兩排的兩位捷克代表在興高采烈地鼓掌。而我剛好獲悉捷克分攤到五千萬美元的信用貸款，用來購買剩餘物資。這筆信用貸款，是因爲捷克政府聲述需要財政援助以建設國家，所以才撥付的。我經過打聽，並知道捷克政府已與羅馬尼亞成立契約，在該項「緊急」信用貸款中，轉借給羅馬尼亞一千萬元。轉借的利率是六釐，外加百分之七的管理費，這使捷克人獲得很大的利潤，因爲他從我們那裏借去的錢，只要付二釐又八分之三的利益。

我立刻電囑國務院停止給予對捷克的信用貸款。幾天以後，非常幹練而又很吸引人的捷克外長馬薩里克先生(Jan Masaryk)，帶着一份代表克立門蒂斯(Clementis)跑來見我，克氏是捷克政府中的共產黨代表。馬薩里克先生詢問什麼事情擾亂了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我告訴他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無需受到擾亂，但某一國政府的官員，在聽到指責美國政府以「施捨」來統治世界時，會大鼓其掌，則對這個政

府的救濟金或信用貸款，就得停止。我向他保證我們希望與捷克友好，不想再給予施捨而對他們有所觸犯，尤其在見到捷克報紙對我們所作猛烈的言論以後。我並且告訴他我聽到羅馬尼亞轉借的事是如何感到驚異。並且說信用貸款是因為我們相信捷克需要款項的請求，所以才給的。如果羅馬尼亞需要從我們得到協助，他們應該要求。捷克不能做我們的攔客。

馬薩里克先生告訴我——我知道他是誠懇的——說，他不知道羅馬尼亞轉借的事，並且為這種行動表示遺憾。他說他將調查事實。另外那位先生知道這件事，但解釋說談判還沒有完成。我於是告訴他談判沒有完成，是因為我知道這件事並且使它停止了緣故。

後來，我接到情報，知道捷克政府的錯誤行為，並不如那麼厲害。因為事先有一位我們財政部的代表，到捷克去訪問。一位捷克官員來與他商量，詢問是否可以轉借給羅馬尼亞的事。美國代表說他對這事無關，他又說這意見可以提請美國政府考慮。捷克的官員後來便引述這話，來辯護他們與羅馬尼亞的協定，並說他們假定我們如反對轉借給羅馬尼亞，美國便不會預付貸款。

在同一時候，我們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中——該國的面積與紐約及賓夕法尼亞州一樣大，人口一千六百萬——又發生了另一危機。在那裏，狄托元帥獲得了控制權，他曾在蘇聯革命中打過仗，是一位經過徹底訓練的共產黨領袖。在一年以前，南斯拉夫軍隊似圖以武力取得威尼西亞求利亞時，我們會與他有些麻煩。南斯拉夫人最後退回摩根綫 (Morgan Line)，但沿綫地帶仍不時發生小戰。另一個摩擦的原因，便是飛機航行問題。陸軍航空隊在羅馬與維也納間開闢的航綫，飛經義大利北部的烏地諾 (Udine) 而達奧國的克拉根佛爾德 (Klagenfurt)。我們的飛機不能在兩點間作六十五英里的直綫飛行，因為南斯拉夫的西北角突出在這兩地之間，而由於南斯拉夫的抗議，我們的飛機奉命離開南國領土飛行。這命令時常難於遵守，因為那裏土地崎嶇起伏，在飛行上有很多危險。飛行員必須飛經一處山隘，那裏的山脈

高達九千英尺，四面環抱的羣峯則高至一萬八千英尺。在氣候惡劣的時候，很容易迷途，而不論氣候如何，飛行員都想繞圈子飛過山去。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一個友好的國家會因飛機誤入領空而有什麼怨言，但南斯拉夫指責我們侵犯疆界一百七十六次。我們的陸軍部否認了這些指責。

八月九日，有一架陸軍運輸機，載了七個美國人，一個土耳其人，和一個瑞士人，因為迷途，誤入南國領空，被兩架南國戰鬥機所襲擊，並且迫使該機在麥田裏作危險的降落。那位土耳其軍官受傷。其餘八人立即被軟禁在南斯拉夫京城伯爾格來德的一家旅館裏。八月十九日，另一架運輸機在飛往羅馬時，中途與烏地諾電台聯絡，說正飛臨克拉根佛爾德上空。從此便音訊全無。而據克拉根佛爾德的報告，該機被南斯拉夫戰鬥機襲擊，墮地焚燬。在五天後五個美國人的屍體被找到了。

國務院要求獲得南國方面對這件事的報告，狄托元帥發表了一篇交戰式的演說，其中指責我們派遣「整隊」的軍用機飛臨南斯拉夫上空。我致函南斯拉夫副總理卡德利，他是南國出席和會代表團的團長。我告訴他我所得到的消息，並且要求解釋。他說他除了一般的情報之外，沒有其他消息，那便是我們的飛機雖經通知不得飛臨南國上空，但仍有很多次飛過他的國家。

我對他說道，「南斯拉夫自稱爲對美友好的政府，你們的飛機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飛臨我們的領土，但即使你們與美國並不友好，而你們有一架飛機，飛過加拿大，迷了途，偶然飛臨美國上空，並且降落地面，美國官員將盡一切力量，以謀南斯拉夫飛行人員與旅客的安全和舒適，並將以此爲他們的責任。任何官員，如不能這麼做，則將遭受美國政府的訶責。如果說美國的軍用機，將在這種情況之下，對南斯拉夫的飛機開火，殺死其中的飛行人員與旅客，這是美國政府決不會存的錯誤念頭，這也是美國人民不能寬恕南斯拉夫的地方。」

我請他通知他的政府並索得解釋。同時我通知副國務卿艾克遜經外交途徑，送出正式要求。在接到

南國極不能使人滿意的答覆後，我下令通知南斯拉夫，除非我們在四十八小時內接到對我們要求的滿意答覆，否則我們將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採取適當行動。

和會中的空氣很是緊張，美國發出最後通牒的消息在各代表團之間傳播着。不久，我看到莫洛托夫集團中的某一人員走到南斯拉夫的桌邊去，向卡德利先生低聲說話。接着莫洛托夫先生與卡德利先生各經不同的門口走出會場。我們代表團的一位人員看見他們在前面一個房間裏作急切的談話，並且看見大半都是莫洛托夫先生在談。這或許不是討論我們的通牒的會談，但無論如何，我們在四十八小時沒有過去以前，接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在這期間，第一架飛機的駕駛員和副駕駛員飛到巴黎來見我。駕駛員告訴我，他們被軟禁在伯爾格來德一家旅館裏時，禁止與美國大使或任何美國人通訊。他獲悉有一位旅客是聯總的職員，便提議由他試與伯爾格來德聯總人員通消息。那位聯總職員照樣做了，但他的請求遭到拒絕。在這個請求被拒絕後的一小時之中，他們從窗外看見一輛美國製造的機車在車站上馳過，上面漆着UNRRA（譯者按即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英文名稱的縮寫）五個大字。他們知道製造這輛機車百分之七十的錢是由美國納稅者所供給的，這個念頭，對於他們的軟禁並不能有多少安慰。

事件是結束了，但不能從美國人民的腦海中完全抹去。這一件事，連同從捷克得到的經驗，使我相信聯總結束以後，國會撥充對外救濟的任何新款項，應該由美國來分派，而且應該給那些不因爲給予他們所請求的救濟品而指斥我們的國家。我覺得如果我們的代表們能夠獲得充分的情報而來判斷進出口銀行對外的貸款，則我們應能得到判斷對外救濟時所需要的資料。

在同時，和會煩倦的工作仍然繼續，會議常常延長到次日清早。在很多次對經濟條款的辯論中，我擔任主席，我自慶能將散會時間，從上午二時半提早到上午一時。五國和約的經濟條款差不多完全相同

，在對義大利和約的經濟部分逐條討論時，我希望對所有其他和約中同樣的條文不再要求逐條討論。但是蘇聯代表團却別有意見。

對每一敵國的委員會雖然由所有與該國作戰的國家組織，而委員會中對所有重要的問題，也都已逐條表決過，但是大部分的討論仍在大會中重複聲述，隨後並要求再行逐條表決，每次的結果都很少變動，但莫洛托夫先生從不放棄嘗試。甚至在小組委員會提案已經獲得三分之二多數表決時，他在要求對少數的提案逐條加以表決。結果使五國和約中每一建議案提出討論時，每次都要逐條表決兩遍。莫洛托夫先生及其附庸國所使用的諸如此類的策略，可以有助於建立他所指責我們企圖建立的西方集團。我們如果真會想建立一個集團的話，他却幹得太有效了，使我們沒法阻攔。」

很多天晚上，我從會場回到旅館，精神沮喪，體力疲憊。數星期以前，我離開華盛頓時，有一位記者在機場問我回到和會去，有何感想？我的回答是，用年老的黑人篤信宗教者的話來說，「我現在需要祈禱。」當和平的展望確實非常黯淡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的內人交給我一個從華盛頓寄來的郵包。其中大部分的信件都是那些聽見或是讀到我在機場上所發表聲明的人們寄來的，他們告訴我，他們也在為和會的成功與我的努力而祈禱。這些都是從渴求和平相信祈禱效力的人們寄來的，沒有一封是應酬函件。他們再也想不到這些信件對我有多大的安慰。

和會將要結束時。莫洛托夫先生很急促的到莫斯科去了一趟。我以為他希望與那裏的同僚磋商一番，我並且因此很覺高興。在和會中，他與維辛斯基先生對美國採取非常不友好的態度，而我認為他在莫斯科進行磋商後所獲得的任何改變，必會轉向較好的方面。因為很難變得更壞的了。

對和約的考慮完成以後，南斯拉夫代表團拒絕出席和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南國代表團團長致函給大會主席，聲稱南國因為不滿意對的里雅斯德的建議，所以不願出席會議，並不願簽字於和約。由於他們

繼續威脅大會，如不就的里雅斯德問題贊成他們的意見，則將不簽字於和約，因此我們的代表團便提出了一項建議，並且在表決時獲得多數的通過，其中主張凡拒絕簽字於和約的國家不能接受和約中規定的利益，後來，我在紐約舉行的外長會議中敦促通過這個建議，莫洛托夫先生也同意其中的規定，我才對南斯拉夫的簽字於和約，不再懷疑。

和會開始時，有未獲協議的條款二十六條，外加所有在外長會議裏獲致協議的條款，以及總共約三百個修正案，都須加以考慮。但和會真正的問題，在於的里雅斯德，賠償的總額，及對多瑙河的管制。

外長會議對管制的里雅斯德自由區規程的條文，未能獲致協議，並且指派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去擬具一件報告書。就像預料的一樣，這個委員會向和會提出四項不同的建議草案。我們原已擬具了我們的草案，並以國際聯盟對但澤自由市不愉快的經驗做着眼點。鑒於國聯指派的高級委員在組織嚴密的少數納粹分子控制當地的立法會議後，便無力保護該城的完整，因此我們決定的里亞斯德的行政長，應該具有強大的權力。這便造成了西方民主國家破例主張由安全理事會指派幾乎具有獨裁權限的行政長，而東方獨裁國家則欲使的港在民選的立法議會的控制之下。我們決定在無論何種情形下，必將盡力保護這個地區，使它；受到漸次滲入的策略，以及類似的計謀，而準備驟然來一個政變，使的里雅斯德併入南斯拉夫，就像但澤被併入德國一樣。

蘇聯的草案，除去給行政長以名義上的首領地位以外，並且要使的里雅斯德與南斯拉夫聯合，還主張共同管理的港的鐵路，以及彼此領土自由移居與使用的權利。和會最後以十五票對六票，通過法國對的港規程的折衷建議案，其內容與英美草案甚為接近，對蘇聯建議案距離較遠。

關於賠償問題的辯論，也是同樣困難。但和會最後通過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約中的賠償數額是三億美元，這數目是一九四五年在蘇聯停戰條款中決定了的。我們敦促外長會議承認瀰漫匈牙利的經

濟混亂情形，主張減少三分之一的賠償數額，但並未獲得成功。保加利亞對希臘及南斯拉夫的賠償，雖然經斯拉夫集團認為數額太高而加反對，但終於決定為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賠償問題最大的爭執，當然，集中於義大利。同盟國中各小國提出的要求，總數達數十億美元。我們在外長會議中既已支持蘇聯獲得一億元的賠款，對這些要求自不能全部拒絕，但我們嘗試着給他們一些比例的概念，說明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提出總數達二百億的賠償要求。英國也提出一百一十億的要求，但並無強索的意念。和會最後決議對蘇聯，南斯拉夫及希臘各賠一億元，對阿比西尼亞賠款二千五百萬元。阿爾巴尼亞的要求遭到拒絕。我們主張解除和約中諸如賠償盟國境內盟方人士的財富、資產、以及佔領費用的經濟條款，而謀減輕義大利的負擔。

對於美國及英國旨在保證巴爾幹各國的經濟機會平等以及對多瑙河的使用不加限制的建議案，積毀如山。蘇聯代表聲稱我們的目的在於反對他們對東歐的控制。我們表示我們將雅爾達獲得協議的原則，在和約中付諸實行。但我們被指為計劃達到資本主義對巴爾幹人民的「奴役。」在這次辯論中，美國得力於范登堡參議員及索爾甫先生者很多，並有林斯田先生 (Jacques Reinstein) 的協助。我們希望在和約中獲得若干規定，使前敵國於互惠基礎之下，必須在商務問題上畀予聯合國各會員國以不歧視的待遇，在國內進行商業時，並須給以與其本國人民相同的權利。此外，和約中並列入對平等經濟機會的保證，以及在談判民航協定時有平等的權利，其期間為十八個月。到那時，前敵國當可置於聯合國關於這方面所締結的協定的管轄之下。

范登堡參議員領導我們爭取多瑙河通商及航行的自由。貝文指出從一八五六年開始，多瑙河便由國際管制，但莫洛托夫先生棄絕這些協定，稱之為「帝國主義的條約，」並且堅持多瑙河的權利僅對沿岸國家有關。范登堡參議員在九月三十日口若懸河地發表一次演說，敦促通過英美聯合建議案，確定自由

及航行的原則。建議中主張在和約生效後六個月之內，召開會議，建立多瑙河新國際運輸制度，四強及沿河各國一致參加。這建議在稍加修改後，經和會通過，並列入和約的最後草案之內。

當這三個問題成爲和會中主要的爭執中心時，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困難問題，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困難叢生的領土問題及少數民族的爭執。這些爭執中，包括匈牙利以達琅西里瓦尼亞劃歸羅馬尼亞，羅國則將北布哥維納 (Bukovina) 讓予蘇聯，以及蘇聯從芬蘭獲得貝薩摩 (Petsamo) 與在博卡拉 (Porikala) 建立海軍基地的權利。此外，有希臘對阿爾巴尼亞南部北伊庇魯斯 (Epirus) 的要求，與這相對的有蘇聯支持下保加利亞對希臘西色雷斯省 (Thrace) 的要求。

在這些要求與反要求之中，義大利及奧國在會中提出及時的呼籲，要求本政治家風度制訂開明的協定，保證義大利所屬南的羅爾 (Tiro) 德語民族的基本人權。我們試以這點作爲合理的多邊協定的先例，去解決諸如捷克願將少數馬札兒人 (Magyar) 遣歸匈牙利等等問題，但得到了不重要的成功。

一起算來，和會中提交外長會議的建議案，有五十三條至少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另有四十一條由過半數表決通過。這個數目單明白表示，和會在十月十五日閉幕以後，外長會議在和約完成前，仍面臨數星期疲憊的工作。

和會雖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的，但我們感覺我們爲爭得召開和會所耗費的數月時間，是很得當而明智的。我們的論據，業已得到澈底地證明，那便是智慧不是四強的專利品，小國也能對和約作重要的貢獻。他們所提出的建議案的價值，可以由事後被列入和約中數目的衆多，而得到證明。

外長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在紐約開會。只有這一次對程序問題未加辯論，我們立即開始考慮和會對義大利和約的建議案。除此以外，極少變化。實際上，如果會場不是在華爾多夫亞斯多利亞旅館 (Waldorf-Astoria Hotel)，我或許要認爲回到一年前的倫敦了。

我們對會場的佈置，甚為關心，因為這次我們是地主國政府，要負責一切的佈置。在紐約尋找適當的食宿地，是一個大問題。聯合國大會代表七千人到達紐約出席十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使旅館中房荒的情形越加嚴重。直到華爾多夫旅館的經理，已故的布謀先生（Lucius Boomer）自動將第三十七層樓全套房，供我們作外長會議及各委員會的會場，並且在第六層及第七層樓騰出大批房間讓我們設置七十五個辦公室，這問題才算解決。

經過累月不懈的談判，我想我深知起草和約時所牽涉的各種困難。而在身負地主國的責任後，使我對這些困難，得到更多體驗。例如我們必須徵調一些電話接線員，他們不但要機敏靈便，絕對可靠，而且要能操外長會議參加各國的語言。會中佈置了特別的接線盤，某一代表團的人員拿起耳機，接線盤上便現出不同的顏色。接線員就能用那種語言與代表團說話。為了使主要代表們以及他們的文件獲得相當的安全，需要選派憲兵一百五十人，與很多聯邦調查局的密探及紐約市警察。

在這以前，我從不知道締訂和約若干技術方面繁複的情形。在紐約五個星期的會議中，油印的文件共計八十五萬五千頁。每一次會議的記錄，每一種動議以及所獲協議的記錄，都得用每一種文字與由每一個代表團去一再校訂。這種校訂文件的煩苦工作，由國務院東歐司的湯柏生（L. E. Thompson）與貝奇（Edward Page）二君處理得極為妥貼。在有關東歐區域的政策問題上，他們並與我共同工作。

編製檔案的工作，在各代表返國後，還繼續進行了兩個月。語文專家們必須審核三種正式文字的繕就的條約。並且用每一前敵國的文字準備一份。這就是說五國和約，每種都有四種文字的本子。將近十四萬三千張地圖需要裁下來，疊好後，插入條約之內。全部的工作，是製成二十種譯本，共計四萬四千。由國務院國際會議司司長凱齊納博士（Dr. Warren Kelchner）指導進行。

這些是新的事情，會議桌上則仍是舊的問題。莫洛托夫先生與維辛斯基先生全然不顧和會的建議，就像他們在過去十三個月中同樣地爭論着。南斯拉夫的代表來到外長會議之前陳述他們對管制的里維斯德港的意見，其言辭大致與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在倫敦所用的相同，而這些話他們在巴黎也會固執地申述過。

我得承認這確使人厭倦。而對於范登堡與康納利兩位參議員，必定更為厭倦，他們照常坐在我的兩邊，而我，因為是國務卿，所以完全由我說話。每次我發表聲明，得由包倫先生(Bohlen)用俄語複述，再由另一位通譯官用法語複述，這實在不是好辦法。再好的聲明，決不能在三種語言裏都很有興趣。通常，在翻譯的時候，兩位參議員，柯衡，以及其他代表團的人員會遞條子給我，建議如何應付業已提出的新建議或答覆爭論。但是有時候無事可作，只是待通譯官譯畢為止。在那些時候，兩位參議員便漫繪人像，他們都很有藝術天才，我想藝術家會說他們屬於「未來」派。柯衡則速寫坐在桌邊的人像，有些確可以認得出來。

那時，兩位參議員對判斷莫洛托夫的策略與動機，都極其擅長。第一因為他們是現實主義者，而他們在參議院悠久的經驗，使他們能夠判斷某人是否在圖修改建議案裏的詞句，或是僅僅在消磨時間。柯衡具有一種特別的頭腦。某一件事情既然是對的，他便不能了解莫洛托夫先生為什麼不表同意。例如他對奧國的情勢以及奧國人民在繼續佔領下所受的苦難，有很深的感覺。有幾次，當我用盡力量不能勸誘莫洛托夫先生討論對奧和約時，柯衡會寫一張條子，建議一個新辦法，敦促我再作一次努力。柯衡認為莫洛托夫先生反對這種新辦法，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他却會加以反對。

范登堡及康納利都會敬佩我的忍耐力，但同樣也會歎息我的缺乏判斷力。

紐約的外長會議，在討論了大批和會的建議案後，就其中一項才獲得了協議。這個協議還是由於貝

文先生的行動而造成的。議案所牽涉的是從速交付賠償物品的問題。英國代表團在巴黎時會力加反對，但終以十四票對七票通過。我們討論到這點時，貝文先生說道：

「這個條款，在和會中已經三分之二多數表決而成爲定案，我撤回反對意見。」

「那麼，我們可以認爲這個議案已經由外長會議接受了麼？」在會中代替皮杜爾先生的梅維爾先生這樣問道。

「我應該說明我在巴黎時，對這議案反對甚烈，」貝文先生答復道。「雖然如此，現在我却不願橫加阻撓，所以我撤回反對意見。」

「主席先生，」我插口道：「我認爲應該注意這是第一個通過的和會的建議案。」

「英國人在有些事情上仍是率先領導的。」貝文先生說道。

這時，莫洛托夫先生發表他對該條款的首次評論。並且幽默地轉向貝文道：

「我們希望英國在將來得到更多成功。」

我們對和會所有的建議案進行討論，在每一點上，蘇聯代表都拒絕遵照貝文先生承認和約中多數意見的先例，而且愈來愈猛烈。

但是，我們之間私人的關係，却大爲改善。莫洛托夫先生自到達美國後，便避免在外長會議中對美國有所抨擊。莫洛托夫先生與我會經共餐交談，這在和會中是沒有過的。在紐約，因爲關係改善，我們恢復了愉快的社交來往。會議的第四個星期內，莫洛托夫先生到華道爾夫旅館我的房間裏來看我，並且詢問應該怎樣使我們的討論獲得較爲良好的進展。

「我必須坦白地告訴你，」我回答道，「因爲你對所有和會中至少經三分之二多數表決所通過的建議案，都表示拒絕，我實在看不出有協議的希望。一年前從倫敦開始，我已經盡力對和約謀致協議。因

此，在極其勉強的情形下，我得到了結論，就是我們對和約不能獲得協議。對這點取得一致後，我想我們應該同意我們不能協議，但是不作巴黎和會時若干次辯論中，彼此間的激烈攻擊。」

莫洛托夫先生大為吃驚。他沒有準備到這麼些月來對和約如此不停工作的美國代表團，會發表這樣的聲明。他回答說他並不如悲觀，他認為我們能夠獲致協議。

「幾月來我拒絕轉為悲觀，」我對他說道，「但是最後我了悟我們對於和平條約並不抱相同的願望。如果我們沒有同樣的宗旨，進一步的辯論就無目標可言。我所特別焦急的事，便是宣佈不能協議的方式，不應使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感到震驚。時間是最好的治療者，一年以後，其他的人或許能夠協議。」

莫洛托夫先生雖然躊躇不信我的聲明是認真的，我却以強烈的語調，認獲致條約為不可能，而結束了我們的談話。

我晤見莫洛托夫先生的第二天，南斯拉夫代表西米琪(Simic)要求接見，他那時任南國駐美大使。談話之初，他便敦促修改南斯拉夫與的里雅斯德自由區的界線。他說，南斯拉夫為報償計，願意在義大利的賠款問題上有所讓步。顯然地，莫洛托夫先生只是用這種方法，來試探我們的立場。如果我表示願意與西米琪先生談判，就足以表示我向莫洛托夫先生所說的停止我們對謀致協議的努力這些話，並非真有此意。

「大使先生，我們對你的建議進行討論，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告訴他說。「我們已經得到結論，就是在目前的情形下，要獲得對和平真正有貢獻的和約，實不可能。我已經告訴莫洛托夫先生，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停止工作，並避免過去很多次討論中互相攻訐的情形。因此，討論你的建議，徒勞無功。」西米琪先生說把數月來的努力棄置一旁，極可惋惜。我表示同意，但說我看不出有別的方法。他試

圖重新展開話頭，但每一次我都只說我們已經竭盡力量。我說，莫洛托夫先生對締結和約的要求，使得現狀的繼續，成爲較爲滿意的代替辦法。我告訴他義大利政府在我們宣佈不能協議後，將會感到滿意，而我却看不出南斯拉夫會怎樣受到損害。

在第二天的談話中，莫洛托夫先生問我是否仍抱着昨日私人談話時我所發表的意見。我對他說的是的。他又說他認爲我太太悲觀。

「如果你真存這種意見解，」我回答道，「我很高興聽你發表你所以抱這希望的理由。」莫洛托夫先生表示他準備同意和會的若干建議案。我告訴他如果他採取這種態度，我可以改變我對和約結果的意見。

在外長會議最後一次正式會議中，莫洛托夫先生宣布他對若干和會的建議案表示同意，並且對其他建議案提出少許修正。他曉得我說什麼就真是什麼，他不能獲得再多的讓步。

莫洛托夫先生決定協議時，他大刀闊斧的幹將起來。他提出對若干建議案的修正案，但只是變更詞句，而不改變實質。我們十分願意在這種保留顏面的辦法下互相合作，幾天之內，我們對所有爭執的問題都獲得了協議。他的驟然改變態度，可以從下列事實中明確地反映出來，外長會議開始時，他反對所有和會的建議案；但和約在最後通過時，在至少經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五十三個建議中，包括了四十七個，在四十一個不能獲得三分之二多數而僅由過半數表決通過的建議案中，佔了二十三個。

這些協議，是正當數英里外佛拉辛草地上聯合國大會，辯論軍備管制時所獲致的，也是在熟識的希臘與伊朗問題繼續摩擦之下所獲致的，所以更有意義。而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也得到合理程度的進展。聯合國大會在外長會議閉幕六天以後，於十二月十六日休會，此時我們才能返回華盛頓，心裏相信我們終於在漫長的和平道路上，經過了一塊重要的里程碑。

這些條約，就像我在巴黎和會閉幕的廣播報告中所說的，「並不如我們在能自由處理下所想擬定的那樣。」但我深信這是我們為漫長的將來，在一致協議下所能夠希望獲得的和約。他們代表恢復安定局勢的一個重要步驟。停戰條款繼續有效一天，這五個國家的國民生活的各方面就都處於動盪不定和遭受干擾的狀況中。在這種情形下，對將來沒有計劃可言，尤其關於經濟發展的計劃，更無可能。

這些和約，也為同盟國從義大利，保加利亞，芬蘭撤退駐軍，並且在羅馬尼亞及匈牙利裁減警衛軍，預先有所準備。的里雅斯德問題的解決方式，使人對將來或可避免嚴重衝突一層能抱合理的希望。義大利被解除武裝，俾侵略行動不能受到支持。而南斯拉夫，雖然是黷武國家主義，我想信對安全理事會在該區的權力一定猶豫而不敢反對。對義大利的賠償處罰，較我們所認為明智的數額為重，但至少我們已經安排了緩和支付的辦法。

最重要的，或許是這些和約，將使前敵國能夠加入聯合國，以及他們能共享和分担世界銀行，貨幣基金會，糧食農業組織，與國際貿易組織等等專門機構的利益與責任。像這樣，這些國家便能與其他聯合國國家攜起手來，以合作的行動，去安定並促進他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與世界其他國家間經濟，社會與文化關係。

美蘇外交秘錄

波茨坦會議主席上



第三卷 未完成的條約

第九章 中歐——嚴格的攷驗

在德國和奧國，我們面對着我們是否有能力在歐洲，其實是在全世界，建立和平條件的嚴格攷驗。在地理上講，中歐這一個區域是歐洲大陸的心臟。在經濟上講，賴着它的礦產、工業、農業、和運輸，供給了歐洲大部份生命的元氣。在政治上講，這裏是一個導火線，它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以內已經燃起兩次全世界規模的衝突，它在目前仍然埋有火種——假若不運用技巧、努力、忍耐、和政治手腕——將仍會引起另一項世界大規模的衝突。

凡是誠懇而心懷好意的人士，都認為德國問題應該首先解決。然而實際上講，戰爭結束以後所發生的一切現象，都使我深信首先與五個次要國家訂立和約才是明智之舉。過去的那些談判紀錄，完全表現蘇聯代表團在討價還價時的一片機敏，以及在追求他們目的時的縱橫捭闔的手段；這些紀錄更證明他們為要就某些他們認為重要但與所討論的完全無關的問題得到讓步，情願阻礙一些毫無糾紛本可普遍接受的建議，使其不能得到一致的同意。假若除了對五個次要國家的和約之外，再加上討論德奧和約的各種複雜問題，這些策略恐怕又會得到任意施展的機會。而要想在任何區域內恢復和平，也恐怕更要延遲若干年了。

我們已經打開一條大路，可以使佔領軍從歐洲的一大部份區域內撤出。當這些軍隊撤出以後，這五國內八千萬的人民就可以有一個合理的機會，以抉擇他們願意在其統治之下生活以及在其統治之下實現

他們命運的那種政府。我們已經把無數的混亂、延擱、和壓迫的機會除去。我們現在已能更直接更清楚的面對着德奧的嚴重問題了。

我們應該承認，在各大國中，惟有蘇聯不急欲早日訂立和約。尤其是在德國，凡是任何足以延擱的政策，都為蘇聯所滿意。因為這樣可使他們繼續佔領撥歸他們的生產區，繼續吸收該區的資源，繼續以蘇聯的生活方式教導該區的人民，並繼續壓迫那些保持其他信仰的人們。延擱並可使他們表面上為了保護對德交通線的目的，繼續把武裝部隊駐於波蘭。

蘇聯的軍隊不像我們的軍隊，他們大部份是寄食於國外。假若一般社會或議會為了急欲想從賦稅冊中除去維持佔領軍的負擔而施用任何壓力的話，他們是不會遭受這種壓力的。就是蘇軍的士兵也不像我們的士兵，因為就在那些只剩了一片瓦礫的戰敗國中，也仍較他們大部份人所會見識過的更為富足，所以他們總很滿意仍然留在那裏。

爲了這同樣的原因，也使對奧的和約延遲，佔領軍繼續駐奧不僅可以直接達到蘇聯的目的，而且也可使軍隊繼續留駐於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以保護交通綫。在過去，我們已經領教過蘇聯「保護交通綫」這一句話的意義，原來當這句話在這些國內的內政上變成實際行動的時候，它的意義是很廣大的。

奧國問題是我們難以成立協議的最不幸的例證之一，這在我們和蘇聯都有同樣的感覺。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莫斯科的時候，赫爾——這是美國所聞名的最偉大的國務卿之一，這是一個我很榮幸地呼作朋友的人，一個當我在內閣供職時竟有福氣與其磋商的顧問——獲得他外交事業上最大的成功。在他協助完成的協議之間，有一個是關於三強宣言的協議，該宣言內規定奧國必須恢復為獨立民主的國家。

蘇軍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即開入奧國，於是立刻佔據維也納。幾乎在這以後的頃刻之間，即宣佈已

組織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我們是拒絕承認的，主要是因為該政府的組織大部份僅限於維也納的性質而不是全國的性質。

九月底奧國各區的政治領袖舉行一次集會，會議結果使共產黨內政部長的權力大受限制。對於選舉機構的控制權，警察以及公共安全的職務等都從內政部拿過來，交給一個五人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三大黨均有代表參加。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日，我們承認了奧國的臨時政府，到十一月廿三日，在盟國軍事當局的監督之下，該政府舉行一次「自由不受拘束」的選舉。選出的政府——由老資格的社會黨倫納(Karl Renner)出而領導，擔任總統，由費格(Leopold Figl)擔任總理——於一九四六年元月七日由四個佔領國加以承認。然而奧國的命運仍然操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之手。在未訂條約規定奧國的地位係一獨立國以前，盟國管制委員會仍然是最高的當局。也像德國的情形一樣，奧國（僅較南卡羅來納稍大一點）和首都維也納都被分成四個分離的部份，並且也像德國一樣，蘇軍佔領區不僅面積最大，而且也包含有重要的工業和最好的農地。

一九四五年的選舉，在一般的情形上看，反映出又恢復到納粹的德奧合併計劃以前所盛行的那種政治陣容，即社會黨和人民黨居於優勢，大致代表了一種市區與鄉區的分劃。在整個票數中，共產黨所得的還不到百分之五。自從舉行這些選舉以後，蘇聯對奧的政策已有顯明的改變。現在我們可以很公平的說，這個政策似乎是在懲罰奧人在納粹佔領期間和德人的聯繫，並且使得奧國縱然不在政治上也得在經濟上依賴蘇聯。

但當我們在波茨坦的時候，這些選舉還沒有舉行。關於對奧問題的決定，相當容易的即可得到。事實上，是由蘇聯代表團建議倫納臨時政府的政權應該擴張到一切奧境佔領區的。我國和英國最後都一致

同意，一俟我們的軍隊進入他們的區域後，即考慮該項問題。

當邱吉爾首相埋怨說，奧國雖在四月卽已落入盟國之手，這時已經是七月二十日，而英國軍隊還未被准許開入他們的佔領區之內時，奧國問題才算第一次進入波茨坦的討論之中。他宣佈局勢「不能令人滿意」——這是典型的英國人輕描淡寫的說法。

史達林指出，關於佔領區問題之所以剛剛才能得到協議，主要是由於法國的遲延。他並叱責邱吉爾的不應發怒，他說局勢之所以如此困難，是由於陸軍元帥亞歷山大的行動，較之其他英美在德境的司令們「技巧欠佳」。他說亞歷山大的「一舉一動，好像蘇軍是歸他控制一樣。」

這些困難很快的都告解決。兩天以後，史達林宣佈蘇軍已開始撤退到他們自己的佔領區內。以後在會議裏他又接受邱吉爾的要求，協助接濟非蘇軍佔領區內維也納人的糧食，因為該城的糧食平日都是從東部蘇軍佔領區內運來的。

這個問題滿意的解決以後，我們轉而討論賠償問題。莫洛托夫先生建議奧國的賠償應確定為二億五千萬美元，以實物在六年分期支付。他指定應受賠償者為三強和南斯拉夫。英國和美國不僅反對想從奧國得到賠償的任何打算，而且認為根據一九四三年的莫斯科宣言，我們應該把奧國當作一個被解放的區域看待，不應當作一個敵國，並不應向她索取任何賠償。

莫洛托夫先生回答說，美國沒有被奧國軍隊佔領，但奧人却在蘇聯作了極大的破壞，因此他們不能不受懲罰。

我告訴他，我們極為敬重蘇聯人民所受的生命犧牲，這種犧牲是沒有任何物質可以補償的。莫洛托夫先生說他是在講財產的損失而不是在講生命的損失。我向他提醒我們所用去的龐大的戰費，並鄭重的說，在計算損失的時候，損失了一座建築物 and 支付了一筆足以建造這種建築物的用費，其間是沒有差別

的。他以後就問我們是否同意把奧國和義大利的工廠和物資拿走作為賠償。

我回答說，我們不能贊同一個被解放的國家與國應該支付賠償的理論，但我們同意把義大利那些只能作為戰爭目的之用的工廠拿走作為賠償。

他不理會這種解釋，他說可以作為戰爭目的之用的物資「都是戰利品，」可以用任何方式拿走。我又指出，縱然如此，奧國也還需要聯總的救濟；假若一個國家一方面對盟國支付賠償，一方面又從這些盟國得到救濟，這是不對的。

在八月一日三強舉行最後一次會議的前一次會議中，正當審查會議的議定書時候，新任英國首相艾德禮說，他知道史達林委員長以前已經同意不向奧國要求賠償。但他又說他對這一點還不能十分清楚，他詢問這一點是否已成「確定」的決議。

「是的，」史達林回答。「此項協議應在議定書內載明。」

然而我們不久就發現，莫洛托夫先生已經決定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要取得至少是相等的賠償。他的目標是轉移到議定書內關於德國賠償的一節——即使奧境蘇軍佔領區內的「德國資產」可以作為賠償之用。納粹在七年的佔領期間，常常藉着強迫或完全使用武力使其轉移的方式，在整個的奧國經濟中獲得大量的利益，其中包含油田、銀行、多瑙河的航運等。蘇聯政府宣稱這些財產既已成為「德國的資產，」就應歸蘇聯取得。其他三個佔領國中，沒有一個會預料到波茨坦協定會有這樣的解釋，也沒有一個能接受這種解釋。這當然是與一九四三年一月各盟國在倫敦所發表的宣言相衝突，該宣言說凡以武力或強迫所轉移的財產均不得承認。若讓蘇聯將要求的財產拿走，即將破壞奧國的經濟；若讓那些財產仍然留在奧國但所有權屬於蘇聯並歸蘇聯統制，即不啻宣告奧國已不是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

奧國政府想把這些資產收歸國有，藉以制止蘇聯對於所有這些資產的奪取，但蘇聯當局對於這種法

律置之不理，理由是這種法律違反波茨坦協定。直到筆者寫此文時，想依外交途徑——即藉盟國管制委員會和外交會議——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切努力都未成功。據我國代表克拉克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經驗以及我自己在外長會議裏的經驗，都使我不能不得到以下的結論，即只要能避免的話，蘇聯是無意與奧國訂立和約的；它想延長佔領的期限，好在這期限內使用一切力量獲得對該國經濟和政治機構的管制，並使其與東歐集團密切的聯繫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的時候，我想討論德國在奧境的資產問題，乃建議減少佔領軍，藉以減少奧國的經濟負擔。關於第一點，我所得到的整個回答是莫洛托夫先生允許對該問題加以考慮。關於第二點，我的建議先是引起對奧國所加的一種罪名，即謂與人會想把法西斯份子「徐徐引入」政府。以後又拿出來一個文件，其中特別指責英國重建奧國的陸軍和納粹以及反共的白俄軍隊，其目的顯然是指揮他們進行反蘇。

貝文先生用一個直率的備忘錄作為回答，其中宣稱這種「完全沒有根據的論斷，應受絕對的反對。」他說，這種論斷只是表示一種令人「深惡痛絕」的不信任。他力言這一定是蘇聯駐奧的代表「聽到了那些想在盟國間製造猜疑和惡感的人們對他惡意杜撰的謠言。」他指出四強委員會目前正在各佔領區內調查這些所加的罪名，並建議在德奧兩國對於所有這種情形也應採取這種調查的步驟。

我們在莫斯科關於奧國問題的談判，進展的程度就止於此而已。

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通知參加外交會議的其他人員，我們想在下次巴黎會議中討論對奧和約問題。在四月二十五日開會的第一天，我就想把這個問題包括在我們的議程裏面。但莫洛托夫先生立刻反對，他說他的代表團還沒有來得及有機會研究我們所交去的文件。

「奧國和其他國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對於對奧和約應有特別的考慮，」莫洛托夫先生說。「蘇聯

代表團這時候不預備對此加以考慮。當然，我們對於貝爾納斯先生的建議要以充分的注意加以研究，當我們準備對此討論的時候，也會提出意見的。」

四月二十八日我和莫洛托夫先生及維辛斯基先生作私人談話的時候，我又想討論上述問題，他們告訴我與國政府還沒有表現出本身具有肅清納粹的能力，佔領軍恐怕至少還要更留駐一年。我建議可由各外長的代表們開始研究對奧和約，他們告訴我這是一件必須由外長們考慮的事。

到會議將終我們討論六月十五日開始的會議議事日程的時候，我建議對奧和約應包含在日程中，並由各外長的代表們準備一個和約草案供我們全體研究。莫洛托夫先生力言這種行動是「不適當的，」因為各外長的代表們恐正忙於所討論的五國和約的工作，貝文先生於是建議在休會期間由四強交換和約草案，並計劃在六月間加以討論。除了可以「採取步驟加強和促進關於討論對奧和約問題的準備外，」莫洛托夫先生拒絕負擔其他任何的責任；而貝文先生却提出報告謂，「只要能有任何可以行得通的辦法，」英國代表團力主在六月間討論對奧和約。

莫洛托夫先生再度聲稱外長會議正以全部時間忙於已在討論中的和約工作，又說：

「願上帝來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當前的和約工作。」

因為顯然莫洛托夫先生不能給予任何幫助，我也就只好回答說，的確我希望上帝能夠這樣。

我們在巴黎舉行第一次外長會議時，對於與國問題的討論就止於此。

在休會期間，美國將和約草案送交外長會議的其他人員，以便下次開會時作為討論的根據。這時候莫洛托夫先生沒有直接反對該問題列入議程，他僅要求延期再作最後的決定。外長會議於是接受了皮杜爾先生的建議，即於議程的最後列入「對奧問題的檢討」一項。到六月二十六日英國又提出第二個草案，但在七月十二日會議最後一天的以前，並未採取行動。以後我就要求通知各外長的代表們研究上述的

兩個草案以及其他法蘇代表團可能提出的草案，目的是要得到一個可以一致同意的建議。我說奧國是外長會議中所有的分子認為被解放的國家，他們都保證要恢復奧國主權上的自由，假若關於對奧的和約還未討論之前就與以前的各敵國訂立和約，實在是「不可想像的事。」

莫洛托夫先生於是提出了包括四點的建議案，第一，注意盟國管制委員會最近關於增強奧國政府權力的協議。第二，西部的佔領區內計有四十三萬七千流離失所的人，大部份都是切特尼克（Chetniks）米海羅維區領導下南斯拉夫的遊擊隊（和烏斯塔西（Ustashi）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德義支持之哥羅提亞法西斯黨——譯者註）匈牙利的薩拉西斯特（Salashists）俄國和烏克蘭的白衛軍，安德斯（Anders）將軍的波蘭軍隊，這些人是被他稱為「法西斯份子」的。莫洛托夫先生認為盟國管制委員會已發現這些流離失所的人「構成對於鄰近各民主國家的嚴重危險，同意把他們「立刻加以緊急」的疏散。第三，這種疏散的「順利完成」是恢復奧國充份獨立的必要先決條件。最後一點是，只有在其他的五國和約完成以後，才能容許各外長的代表們開始準備對奧和約。

我們立刻同意流離失所的人的問題確很迫切，並指出聯合國這時也正在研究。但貝文先生和我都反對把這個問題的解決作為開始和約工作的一個先決條件。我們也不能在還沒有確定事實以前就贊同上述建議案中的各種論斷。貝文先生這時提到對於德國在奧資產的界說問題，並主張成立一個四強委員會以尋求解決辦法。莫洛托夫先生拒絕討論，他說這不在議程以內。我指出流離失所的人的問題原也不在議程以內，但我們已經加以討論。

這樣一來，奧國問題的討論停止了。我們在巴黎就沒有更進一步的進展。

在紐約我們又設法討論這問題。這一次莫洛托夫先生却建議德國和奧國問題都應在三月間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時討論。貝文和代理皮杜爾出席的梅維爾（Couve de Murville）以及我都主張應指定各外長

代表立刻開始初步的工作。兩天以後，即十二月十一日，莫洛托夫先生同意指定一些負責對奧國和德國和約的代表，並決定他們應於一月十四日在倫敦開始工作。這時我又提起德國在奧資產問題；莫洛托夫先生說他沒有準備討論。我同意只要我們已經知道可由各外長的代表們對此問題加以考慮，我就不必急急於提出這個問題。

爲了要開始對奧和約的工作，從二月一直牽延到十二月，這時我已認識要想達到這個工作的目的還很遠，而對德和約的完成，恐怕還在更遠的將來。美國代表團斷定下一步最好的辦法是再圖設法減少整個歐洲的盟國佔領軍。我們認爲這樣的行動可以減少勝利國和戰敗國雙方沉重的負擔。我們建議四強應一致同意在四月一日時各國在奧境的四個佔領區內各將軍隊減至一萬人，在德境的軍隊應分別減至下列的數目：蘇軍佔領區減至二十萬人，英美兩佔領區各減至十四萬人，法佔領區減至七萬人。我們並主張在裁減上述的佔領軍時應同時減少各處沿交通綫的駐軍。我們建議在波蘭應以二萬人爲限，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應各以五千人爲限。

莫洛托夫先生說這是一個新問題，他沒有準備討論。貝文先生向莫洛托夫先生問及假若在莫斯科會議席上將該問題提出是否準備討論時，莫洛托夫先生表示同意。但當馬歇爾國務卿在莫斯科又將這個建議提出時，莫洛托夫先生還是不同意。

在莫斯科會議時，馬歇爾國務卿想要訂立對奧和約的種種努力都未成功。那時候設立的對奧和約委員會實際上也毫無進展。我們只有指望預計在十一月間舉行的外長會議上討論該問題，這樣一來問題又算延遲六個多月了。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我們也不一定對於和約就會得到協議。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當然不容我們樂觀。

我們必須要記着的是，我們並不是在對付一個敵國。我們所要訂立的對奧和約只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目的，即重建奧國的獨立和確定其邊界而已。假若一九四八年的四月——奧國自納粹解放下的第三週年——奧國能夠恢復一九四三年三強所保證的自由與獨立，的確要算我們的幸運。

關於德國的情形，我們初步的協議很令人滿意，但以後的發展却令人失望。在波茨坦的時候，我們對於德國問題會加以重大的考慮。甚至在我們爭得應首先就訂立各次要國的和約得到協議的時候，我們已經初步獲得關於佔領德國的一套政治經濟原則的一致同意。這些原則能夠打開一條道路，使我們早日獲得公平的和約。

在政治方面，這些原則不僅規定取消和懲罰一切的納粹，而且還樹立一種體制，使德國的政治生活能夠根據民主的基礎在其中重新建設起來。這些原則根據民主的理想對於司法和教育制度的組織加以指導，並提倡自由的地方政府和自由的工會運動。這些原則雖然堅持德國的政治機構應該採取分權制度，但在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和工業方面，仍主張建立中央的德國行政機關。

在經濟方面，這些原則主張禁止一切的軍器生產，限制可以轉為戰爭用途的各種工業的平時需要，消滅像卡迭爾一類的集中性的經濟統制。三強一致認為德國應被當作一個單一的經濟單位看待，最重要的是發展其農業和平時的國內工業。對於工業生產、礦業、運輸、交通、農業、工資、物價、對外貿易、貨幣及銀行等，盟國應有一致的政策。

我們原來希望關於賠償問題也應包含在這個原則以內。但由於在波茨坦會議以前蘇軍就大規模運走財產，使我們不得不斷定一個通盤的籌劃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希望，我們遂轉而計劃根據分區的基礎以處理賠償問題。然而縱然如此，我們那時也規定凡是可供出口的生產，應先用於償付必要的進口品，以後才用作賠償；這個規定顯然仍然需要一個全盤的經濟計劃和行政管理。

在波茨坦所成立的賠償協議的其他方面的問題，我們都未對其加以應有的注意。在雅爾達會議時，

本來建議賠償委員會應把「德國勞力的使用」視為一個可能的賠償源泉，但波茨坦三強會議時却把這個建議取消了，而且這一次簽字的議定書裏，也並沒有規定或者提及勞力的使用可以作為賠償。但在今日仍有違反鄭重的國際保證，把成千的德國人和日本人拘作強迫的勞動者那種可悲的事實。

在對德戰爭快要結束的那些日子裏，我們獲得很多的俘虜，以致要在後方加以照料頗感困難，而看守這些俘虜也需要很多的軍隊，於是艾森豪威爾元帥遂決定把大部份俘虜移送被解放各國看管。但這些俘虜本是向美國陸軍投降的，因此我們負有責任。對於拘禁在美的俘虜，我們想設法立刻送他們回去。我們遇到僱用這些俘虜人們的一部份反對，因為他們視這批勞力為有利可圖，但陸軍部長柏德遜(Paterson)和我都堅持原來的主張。雖然在獲得必要的運輸工具方面還有許多問題，但到一九四六年秋天的時候，拘在美國的最後一批德國和義大利的俘虜終於被遣回國了。

日內瓦戰俘公約在文字規定和精神上都是想在實際的戰鬥停止以後儘速將戰俘遣送回國的。蘇聯雖不是這個條約的簽字國，但英國和法國都是簽字國。

由於我所感到的條約加在各盟國身上的責任，我想他們也應該竭盡一切努力以促進戰俘的回國。但除非我們的戰俘已經送回國去，我是不能抱怨其他國家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英國宣佈一個計劃，要在一九四八年將他們最後一批戰俘送回國去。這在我看來似乎太慢，但至少這還是一個計劃。在同月間我又非正式的向法國建議一個我們負有責任的遣送戰俘回國的計劃。

那時候法國仍然拘有由艾森豪威爾元帥所移交的約達六十萬人的戰俘，其中有四萬人在煤礦中工作，二十八萬人在農場上工作，其餘的數目分散於各種職業中。

法國要求我在短期內不要有任何正式的行動，我答應了。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我要求代我們拘管戰俘的三國政府——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全體同意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將戰俘遣送完畢。

我的通知內指出，自從敵對行為停止以來，已過了十八個月了，因為強迫勞動的觀念為美國人民所憎惡，我們相信這些並不負有戰罪之責的戰俘是應該送回國的。法國政府回答說，他們固然知道戰俘應該送回國去，但因他們極感努力的缺乏，他們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遣送回國的工作。

在一九四七年中的時候，我國在德境佔領區內所保有的流離失所的人約達五十七萬三千人。只要有理由相信他們歸國以後會因為政治的原因而受處罰時，我們是不願強迫他們回到本國的，且將對他們給以供養。

我會向法國官員建議，請他們給這些人民以工作，但當法國代表們到德國的時候，他們表示甯願用德國的工人。我相信這是法國共產黨反對把這些反共的波蘭人波羅的人（Bols）和南斯拉夫人等帶到法國去。但法國拘留的德國戰俘越能更迅速的送回德國，法國也必會更迅速的要替被拘在德境和奧境內的流離失所的人尋找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我國政府宣佈已與法國成立協定，即約共四十五萬的戰俘——包括法軍及美軍所俘虜的——應於每月遣送二萬人，分期遣送完畢。這就是說，最後一批的德國戰俘須到戰爭結束的四年以後才能回國。該協定又規定各戰俘於遣送回國時應給以選擇的機會，或者讓遣送回國，或者仍留在法國充志願工人。我們又認為對於應由我們負責的戰俘應給他們以合同的規定，以便在某種環境之下可以保護他們選擇的自由。

關於蘇聯境內德國和日本戰俘的情形我們還不知道。史達林委員長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告訴霍浦金斯說，他們約有兩百萬的戰俘，其中一百七十萬是德國人。他說他們正被使用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莫斯科區域內從事建設計劃的工作，以及在煤礦內和木材工業內工作。他說德國人都是營養不良，所以都是效率不佳的工人；他很喜用匈牙利人，他們的營養較好。一九四七年三月蘇聯政府宣佈已經遣送回國

的德國人有一百多萬，剩下的還有八十九萬。

在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最後一次會中，關於遣送德國戰俘回國的問題終於得到一個全面的協定。該協定係四月二十三日所訂，規定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德國戰俘均應遣送回國，實際上這將與法美所成立的諒解具有同樣的效力。我仍然相信我們應該堅持法國應把那些應由我們負責的戰俘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遣送完畢。無論如何，我希望這個不應成爲賠償問題的一部份的問題，應在目前我們所同意的日期解決。強迫勞動營是希特勒政權的一種象徵，我們應儘可能的迅速取消。

這件事的經過又可作爲下述許多例證之一，即我們原認爲已經成立的諒解，後來竟成爲毫無協議可言。這就是爲什麼我說波茨坦對德國問題的協定已經失敗的原故。因爲這些協定既已失敗，到處都有批評它們的情形。但過處實不在於協定本身。蘇聯拒絕從事爲實現這些協定所必要的誠心合作，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德國問題的核心，然而這種事實直到波茨坦會議的好幾個月以後才爲我們明顯的看出，因爲法國在無意之間負了許多蘇聯十分情願分給別人的責任。

法國並未參加波茨坦會議，因此不覺受該會議所訂協定的約束；實際上，它對於一部份協定還極力反對。這些反對會在我們自德歸來的數週以後戴高樂將軍與皮杜爾先生訪問華盛頓時由他們向杜魯門總統和我提出。

他們所苦惱的問題是集中在重建德國中央行政機關的計劃以及對於萊因區魯爾和薩爾的處理上。戴高樂將軍恐怕這些行動是使德國重建爲一中央集權國家的前奏，他極認爲目前把德國重建爲一統一的國家，甚至要較過去更爲危險，因爲德國可能處於在東方興起的一個強而有力的斯拉夫集團的勢力影響之下。他說德國目前並不衰弱這一事實，「就很可能使人懷疑該國要成爲其他強國的政治工具。」這兩位法國領袖又力辯波蘭向德國東部的擴張，已使德國的重心向西移動，因而危及法國的安全。他們要求把

萊因區從德國分開由法國管理，要求兼併薩爾，以及把魯爾移交國際機關管理。

杜魯門總統和我都設法說服他們，要他們相信就運輸和貨幣一類事情建立一個中央行政機關，並不是設立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化的德國政府。我們斷言法國的安全若由聯合國來促進，要比藉分割德國領土來促進更為有效得多。我們力辯只有賴所有國家的聯合行動，最大限度的安全才能實現。

我們的這番努力雖然得到成功，但皮杜爾先生在倫敦外長會議的第一次會中又提出他的辯論理由來。他說對於德國西部的邊界若沒有確定，法國將繼續反對建立德國的中央政權。法國恐怕德國行政權力擴張到魯爾和萊因區後，將妨礙他們在和約中獲得他們所希望的控制。他們建議對魯爾建立國際管理的機關時，他們表現圓滑的含糊態度，因為他們不想提及蘇聯參加該政權的問題。然而這却給莫洛托夫一個機會，使他重提四強管制魯爾的建議。後來有人建議此項問題應由各國外長的代表們研究，但我們中的三位外長最後同意莫洛托夫先生的建議，即此次問題暫時應「經過外交方式」加以處理。

法國的所有各政黨都堅持政府應該採取皮杜爾先生所說的立場，但這種立場會阻礙了健全的經濟活動的恢復；並且還可以使蘇聯有所藉口從事拖延，而不再負何責任。我很明瞭為什麼法國恐懼，但我相信他們對於局勢應該採取一種新的看法。他們對於為經濟的統一所必要的中央行政機關，應該取消其反對。他們的反對甚至可以說很少理由，因為貝文先生和我在很久以前就會以書面提出保證，在訂立和約的時候我們將支持把薩爾讓給法國。他們繼續採取他們的立場，並不會影響到蘇聯的立場。蘇聯對於薩爾的割讓將繼續反對一直到最後一分鐘的時候，蘇聯並將設法就其他問題獲得法國的支持，作為取得蘇聯同意的交換條件。

誠如事前所預料，倫敦會議以後，所謂「經過外交的方式」竟毫無進展，所以在四月間去巴黎之前，我決定堅持我們應開始對德國和約的工作。美國代表團於是建議指派幾個特別的代表，由他們担任兩

項特殊的工作：卽就迫切的佔領問題準備一個報告，以及開始德國和約的工作。我指出把德國劃分爲四個滴水不透互相隔絕的區域，阻止人民商品，甚至思想的交換，只有迫使美國每年消費二億美元以供給糧食，這些糧食平日原是從蘇聯佔領區內運入的。爲要償付我們所輸入的糧食，只有增加出口商品的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不能繼續拆卸工廠，把牠們送往蘇聯作爲賠償。

我們力主第二件指定給各代表的工作，不必等待到德國政府建立以後。我們主張對於和約的性質以及應該建立的德國政府的種類，在我們自己之間應該得到一致的同意。必須如此，然後各佔領國以及德國人民才會知道何去何從。

法國和英國都一致接受我們的建議，但莫洛托夫先生對於指派各代表一節拒絕同意。更令我們失望的是，他對我們附帶的建議由四強訂立二十五年的條約以制止德國黷武主義的再起一點，也竟反對。

九月間我在倫敦會第一次與莫洛托夫先生非正式的討論這個建議，他的注意也頗使我感到興奮。但當以後我們不再聽他談到這個問題時，我就把這個問題放在預備在莫斯科會議上與史達林委員長討論的項目內。

我一直等到蘇聯領袖們殷勤招待我們聖誕前夕晚餐的時候。在我們舉杯相祝賓主盡歡以後，我們到客廳裏喝咖啡。當咖啡端上來的時候，委員長和我坐下來靜靜的閑談，只有他的通譯官巴夫羅夫和我們在一起。我告訴他，關於莫洛托夫和我在倫敦所討論的條約以後沒有再聽他談起，頗使我失望。他說他的外長已對他提過這事，但從他對我所提出的問題上看來，顯然他們並未對該建議加以鄭重考慮。

「這樣一種條約可以給歐洲的所有各國一個保證，卽美國絕不會再回到孤立政策，」我告訴他說。「我常常想起你在雅爾達時如何表示害怕再被德國侵略。你那時會鄭重地說，盟國間若繼續合作使德國廢止軍政，可減輕你的恐懼，並且也許可以影響你在巴爾幹各國的行動。」

史達林回答說，這是他還未聽過最好的建議。

「美國過去總是不願意參加這樣的條約，」我接着說，「但我們想置身於歐洲戰爭之外的過去已經非常不幸，我深信我國人民願意支持各強國聯合力量共使德國解除軍備的條約。這樣的條約必須經過參議院的批准，但我相信他們會批准，我也願意努力促成。」

「假若你決定爭取這樣一種條約，」史達林說，「我一定支持你。」

因為有這一段談話記在心裏，所以當我們回到美國的時候，我立刻準備一個對德和約草案。爲了要使誤解的可能減少到最小的限度，關於佔領期間的廢止軍政問題，我儘可能密切遵照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盟國宣言中所一致同意的文句。我還插進一種我所極爲注意的規定，即在對德訂立和約以後，四強還應保持一個督察隊。這個督察隊內包括一些具有工程知識以及相似的專門技能的人，他們是防止足以生產戰爭武器的各種工業的建立或轉變。假若這些具有專門技術的督察人員報告有違反條約的情形時，四強得要求德國政府命令此等製造廠家停止這些危險行爲。假若他們拒不履行時，四強得採取他們認爲必要的手段強迫其服從。

這樣一種契約的規定，可以減少保持大量駐德武裝部隊的需要。假若德國政府深知違反條約時將使四強之一或一個以上的國家在數小時之內就將以空軍飛臨他們的土地之上，一個解除了軍備的德國是不會不服從盟國總部的命令的。

根據我所建議的條約而採的行動可由多數投票表決。當然，在四強之中，必須要有三國才能構成多數。這種辦法的目的，顯然是要防止任何一國有阻礙立刻行動的情形。這稱否決權的消滅也許是造成蘇聯反對的原因，但縱然如此，這種原因莫洛托夫也從未提及過。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對於負此等行動責任的政府，得准其對於以前的敵國採取懲罰行動。

杜魯門總統極端贊成這個建議。他斷定這建議一定會被接受，並開始稱它爲貝爾納斯條約。我也和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討論過這建議。實際上，范登堡在一九四五年一日對參議院所發表的著名的演說中，也會有力的提出一個與此相似的意見。此外，我還曾把這個計劃交給由外交委員會指定和我磋商此事的一部份參議員們。在條約還沒有以最後的形式向他們提出以前，這些參議員們當然應該保留他們的決定，但他們在原則上是都贊成這計劃的。

在得到一般的同意以後，我於二月初旬就將建議的條約抄錄分送蘇聯，英國與法國，請他們可以此約作爲討論的根據，並可隨意提出修正或其他草案。貝文先生和皮杜爾先生很快就回答說他們贊成這個條約，不過還有一部份修正要提出。在我剛要離開華盛頓赴巴黎之前，我接到莫洛托夫先生的通知，只簡單的說他有某種反對的意見。

到四月二十八日和莫洛托夫先生一起吃飯的時候，我請問他那些反對意見是什麼。令我驚異的是，他說這個條約似乎是要把德國解除軍備的問題一直延遲到佔領結束以後才實行。他說德國之應該立即解除軍備已有協定存在，他建議組織一個委員會查明解除軍備的工作進行到何種程度。他又說，當調查完畢時，將來的管制問題就可以在一個單獨條約中具體規定。

引起我們起草這個條約的整個背景雖然他已經知道，但我還是向他扼要地提出，這是從雅爾達的談話中開始的，史達林在談話中表示恐怕德國黷武主義的再起。

「這個條約，」我說：「可以作爲免除你們恐懼德國再度進攻的額外保證，並可除去關於美國不充份負起保衛和平責任的任何懷疑因素。我必須坦白的告訴你，美國的許多人士都不能瞭解蘇聯確實的目的何在——究竟是尋求安全呢，抑或僅圖擴張。像這樣的一個條約，以及一個相似的對日的條約，可以有效地注意到安全問題。」

他回答說：蘇聯「贊成一個對德和對日的二十五年廢止軍政的條約，」但他強調實現以前關於立即解除德國軍備協定的重要性。我們討論得很久，維辛斯基先生和柯衡先生也都加入討論。柯衡和我盡力勸服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要他們相信我們的條約不會延遲德國的解除軍備，正相反，這條約是根據以下的推測，即解除軍備的工作可以立刻完成，並且這條約還可以保證德國的廢止軍政。

第二天我又在外長會議中提出這個問題，但莫洛托夫實際上仍重複着同樣的辯論。他說他願意仔細考慮我們的建議，但認為外長會議當前的「緊急問題」是適當地完成目前的協定。我把我們草案中開頭幾句關於我們政府以前所訂「實行完全廢止軍政和解除軍備」協定的話讀給他聽，並接着說在建議的條約內絕沒有「將要延遲或阻礙這種程序完成」的規定。

爲了對付莫洛托夫先生所指關於現有的廢止軍政的協定缺乏行動這一論據，我就與柏林的克萊先生交換消息。幾天以後，他向盟國管制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向四個佔領區視察，並就廢止軍政的進展情形提出報告。當我向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這件事的時候，莫洛托夫先生說他的政府願意支持。然而這並沒有改變他對於條約的意見。

當再度討論條約的時候，莫洛托夫先生採取了俄國人所常用的一種策略——發動攻勢。他說條約的期限還不夠長久；至少應定爲四十年。我立刻同意這種辦法。他又接着說：這「完全不合適，不能當作歐洲和世界安全的可靠的保證，」因爲廢止軍政和解除軍備的規定還不夠包容一切的廣泛。我就提醒他說，當我提出條約的時候，我會告訴他說關於解除軍備和廢止軍政各節的條文，是從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由朱可夫(Zhukov)，蒙哥馬利(Montgomery)，塔西尼(de Lattre de Tassigny)和艾森豪威爾等代表我們政府所發表的協定上採取下來的，並且我知道起草廢止軍政的計劃再沒有比他們資格更好的人了。然而這還夠不上包羅一切，我建議應加修改。

莫洛托夫先生又轉到他以前的聲明上，他說若不立即採取任何行動以解除德國的軍備，這樣的條約是無用的，我就指出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的克萊將軍會經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所有四個佔領區內解除軍備的現狀；並且莫洛托夫先生曾說他的政府願意支持，雖然每人都同意了，但蘇聯代表却不同意，他堅持認為調查不應擴大到工廠方面解除軍備的實施情形。我說假若他真正要調查的話，他可以訓令他的駐柏林的代表教他同意，那麼調查就可以立刻開始。

他這時又埋怨說這個條約對於使德國民主化這一類問題都「規避不顧。」我就解釋說關於將來的經濟和政治的目的，今後可以在和會所訂的任何條約中加以規定。我又說，關於規定爲了使德國服從所使用的方法和必要的武力的特別條約，不應與政治經濟的條約相混。

從我們的討論中已可明顯看出，他並無意用鄭重的態度討論條約，他不過只想找一種拖延的藉口。當他又繼續的說：「該條約忽視必須以羅斯福總統已在雅爾達所同意的價值總計至少有一百億美元的賠償給與蘇聯一點，」的時候，我的忍耐已經忍無可忍。他又繼續說，賠償的支付「自然」必須包括現在的生產品以及生產設備，他又提到克萊將軍所說的不再交付賠償的「非法聲明」。

「美國既然願意大大的擺脫過去的政策，提出這個條約來幫助保證歐洲的安全，」我回答說，「我們實在憤恨別人拿出關於賠償問題和佔領上細微困難的不相干的辯論來對付這個建議。」

「你把羅斯福總統的話引證錯了，」我又加上說。「從我的速記以及議定書的本身上都可以看出，總統只是說蘇聯的建議應該提到賠償委員會去作爲討論的根據。」在波茨坦的時候，杜魯門總統與史達林委員長都對下述的賠償計劃表示同意，該計劃承認要獲得這筆數目是不可能的，該計劃並且有意地不談到美元的總數。

「在波茨坦還訂有其他協定，」我繼續的說，「其中包括這樣的規定，即支付賠償時還應留下相當

的資源，好使德國不賴外來的幫助即可生存。還有一個規定是，出口應先用於償付必要的進口。縱然如此，美國每年還必須以二億美元作為接濟美佔領區內人民。並且還會一致同意，德國應被當作一經濟單位，但這一點也沒有做到。所以當你埋怨克萊將軍的行動時候，你必須記着他的行動只是根據波茨坦協定替美國主持公道而已。」

這時候莫洛托夫先生和我已經交談完畢，時已下午八點半，我們的怒氣和食慾都快要發作，所以我很快的接受了貝文先生的建議，將這問題留待明日繼續討論。

第二天早晨貝文先生和皮杜爾先生發表強硬的聲明，大體支持我們的立場。貝文先生說，英國人民認為德國的復興是和平的最大威脅，雖然他以後也許要提一部份修正案，但他的政府熱烈贊成將德國長期廢止軍政和解除軍備的辦法。他又接着說，保持歐洲的和平有三個方法：第一、在力量相等的國家之間謀得勢力的均衡；第二、由一個強國或兩個強國的集團實行統治；第三、由四強取得盟國的合作共同統治。他鄭重指出，英國政府相信只有最後的辦法才最有產生安定的可能性。

皮杜爾先生在聲明裏說，必須採取措施以毀滅德國「黷武主義的普魯士特性」，「美國的條約應該構成「大廈的屋頂。」他堅持認為，這絕不會成為賠償，清除納粹，或任何其他佔領上必要工作的阻礙，而是會使盟國抵制德國再起危險的團結更為具體，並將以「不可少的」美國的支持保證歐洲的安定。

這些聲明都是很動人的，但仍未能消除莫洛托夫先生的反對。一九四七年四月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又建議考慮二十五年或四十年條約時，蘇聯外長提出些新的反對理由。他所提出的有些理由和修正案是非常的不相干和荒謬，可以表現他是故意的使它們一定不能被接受。

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史達林允許支持這個條約以後，蘇聯的統帥部即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他們不讓美國在今後的二十五年或四十年中牽入維持歐洲安全的工作。美

國力量的壓迫將要限制行動的自由，不然的話，爲一個歐洲主要軍事強國的蘇聯是會享受這種自由的。使得這條約在皮杜爾先生看來具有吸引力的同樣保證，却使得莫洛托夫先生不能同意。我感覺滿意的是幸而代蘇聯立場負責的是莫洛托夫先生，從開初起，他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就與史達林的熱心顯然不同。

然而這不是說莫洛托夫先生將要繼續反對這個條約。他現在應該已經相信，無論條約不條約，我們是想保持我們在歐洲的利益。但當他決定要支持這個條約的時候，他也許要宣佈說：「蘇聯提有一意見書可供考慮，」他將要起草一個條約草案，包含一部份合理的修正案。他將要把這草案作爲對我們的一大讓步，也許要求我們以下的兩個條件給他作爲報答：即一百億美元的賠償和參加魯爾的一部份管理權。

我們在巴黎關於條約的討論既無進展，外長會議遂於六月十日再度轉而討論美國所提，指定外長代表就德國的迫切問題和條約草案同時工作的建議。

皮杜爾先生開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三天的討論。他指出法國的立場是，非至德國的邊界確定以後，不能確定任何政策。他又重新提出法國對薩爾的要求，將魯爾區實行國際共管的要求，以及將萊茵區從德國分割的要求。他的第二個目的是保證能從德國得到大批煤的供應。這個要求主要是對英國而發，因爲他正極端懷疑是否能在西里西亞波蘭所經營的煤礦內獲得大批的煤。但他對於指定外長代表就這些及其他問題開始工作是同意的。

貝文先生也同意指定外長代表一事，並斷言英國願意支持法國對薩爾的要求。他特別鄭重指出必須決定立即實施波茨坦協定，將德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看待。他說爲要接濟英國的佔領區，英國每年須由納稅人支付三億二千萬美元的費用，這種情形是不能繼續下去的。他又接着說，原因是其他佔領區內的

剩餘糧食，主要的是蘇軍佔領區內的糧食，都從德國運走了。

莫洛托夫先生說「不行，」除非各國外長已經解決了其他問題，是不能指定外長代表從事工作的。一個問題當然是蘇聯要求價值一百億美元的賠償，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魯爾的管制。他在指出後面一個建議時還附帶的指責說，廢止軍政和解除軍備都還沒有在西部佔領區內實行。

這在目前已經成了一個習見的問題。去年十一月間，蘇聯指責英國在英佔領區內保留納粹軍隊的殘餘。英國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在各佔領區內進行調查工作，以便作為處理與此相似的論斷的一個先例。於是蘇聯代表又將這個問題攔下。後來英國向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報告，說作戰物資仍在蘇軍佔領區內製造，建議調查德國境內工業方面廢止軍政的情形。當我們在五月間建議調查的時候，莫洛托夫先生雖然說他願意支持，但他的駐柏林的代表却阻礙任何的行動。現在當這些指責重新提出的時候，我又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拆卸軍需工廠和銷毀武器及解散武裝部隊的進行情形。莫洛托夫先生在回答時辯論說，除非我們對於德國經濟方面解除武裝的工作已經決定了一個全盤的計劃，這樣的調查是沒有意義的。

皮杜爾先生這時也插入辯論。他說他有這樣一種印象，即外長會議的各分子都是一些坐在旋轉遊戲機（有平置大輪一，上裝木馬木舟等物，兒童騎之可以隨輪旋轉以為樂者——譯者註）上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他是「一方面騎在自己的馬上，一方面又要就煤的問題再發表些意見。」

我就極力的說，我們可以指派代表，由他們將問題的討論範圍縮小，好使再度開會時能有較有結果的討論，這樣我們就可以離開「旋轉遊戲機」。（譯者按即不至再作循環而無休息的無謂辯論）莫洛托夫先生又問我，為什麼我不同意在十一月間舉行一次外長會議的特別會議。

「我並不反對舉行這樣的會議，」我回答說，「但為什麼要把我們今天能做的事推到十一月去呢？」

我恐怕正當十一月到來，我們建議討論這個問題時，蘇聯代表又要建議將這個問題交給各外長代表，這樣一來，到他們開始工作時，又須經過五個月的期間了。我很願意現在就開始工作。」

我們現在才知道，這種恐懼的推測完全對了。在十二月十一日紐約舉行外長會議以前，莫洛托夫先生是不同意指派代表從事有關德國工作的。各代表於一月間在倫敦開會，美國由墨菲出席代表，聽取對德抗戰的各小盟國的意見，並放慮起草對德和約的程序問題。我們都知道一九四七年三月和四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裏沒有什麼進展。現在全世界都希望寄託在德國投降兩年半以後的十一月間所預備舉行的下一次外長會議上，希望從這次會議能得到訂立和約的第一次真正進展的徵象。

美蘇外交秘錄

第十章 行動方針

對德和約與對奧和約的早日締結，是恢復歐洲政治和經濟健康的必要條件。各軍事佔領區間的障礙，軍事佔領的負擔，以及前途的渺茫不定，所有這一切都足以麻痺這一塊歐洲的「心臟地帶」，它們也像其對於德奧一律予以毫無差別的懲罰一樣，使我們的友邦和盟國都變成殘廢。

當我寫本書的時候，距離我們在波茨坦的西賽蓮荷芙宮開會準備一個我們相信可以成爲永久和平機構的適當計劃的時候，幾乎已有兩年了。這個計劃竟沒有滿足我們的希望。因此對於局勢必須審慎的估價，並計劃一個新的行動方針。

莫洛托夫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在巴黎外長會議席上發表蘇聯對德政策的最重要的聲明。他對於這個演說的重視，從以下的事實可以看出，即這篇演說稿是預先送到報上發表的——這種行爲在我們雖是司空見慣，但在蘇聯的外交家却是不常見的例外。蘇聯這種對德態度的第一次而且仍然是權威的表現，對於將來的任何計劃，都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莫洛托夫先生在演辭的開端，極端迎合德人心理——他批評一切主張德國應變爲以農業爲主的國家的政策。

他說：「採取將德國根本摧毀使它不成其爲一個國家，或摧毀其主要的工業中心而將其農業化的辦法，都是不對的。」他用各種方式一再申述這一點。「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毀滅德國，」他接着說：「而是要把德國變成一個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德國除了它的農業以外，還應有它自己的工業和對外貿易……摧毀德國使其不成其爲一個國家，或摧毀其主要的工業中心而使其農業化的政策，結果將使德國

成爲培養危險的報復情緒的中心，而爲德國的反動份子所利用，並將使歐洲失去了安定與和平。」

他以後又轉到魯爾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想創造一種雙頭馬的政策。

想把魯爾從德國分割的議論，「也是從想要毀滅德國以及使德國農業化的同樣政策發生的。因爲我們很容易瞭解，沒有魯爾，德國就不能作爲一個獨立的能生活的國家而生存。」他又接着說：「但是魯爾應該放在四個盟國的共同管理之下，目的是要阻止德國軍用工業的再起。」這樣一來，他一方面想讓魯爾留着不動，一方面又想把它拿走。

關於德國將來的國家形式，是他所注意的第二個問題，他對於劃分德國爲幾個自治邦的「時髦」談論，以及與此相似的建議，例如德國聯邦等，都加以批評。「西部佔領區的盟國當局，」他說：「曾經鼓勵一種德國聯邦組織的思想，」毫不顧及德國人民的慾望，而蘇聯認爲「對於這個問題以此種或彼種的解決方式加於德國人民身上是不對的。」除非經過公民投票的結果，絕不能採取這樣的行動，絕不能從德國分割任何領土。當然，他毫沒有談及蘇聯支持波蘭要求西里西亞及奧得河和尼塞河以東的全部領土的事。

「我們絕不應阻礙德國的鋼鐵、煤礦、及和平性質的製成品生產的增加，」他說。這時他又提到盟國管制委員會確定德國工業將來可以容許發展的水準的最近的行動，並說：「現在應該容許德國的平時工業有作大規模發展的機會……」他避免承認下面這一點，即當盟國管制委員會確定工業水準時，蘇聯代表投票主張最低的水準，僅賴英美代表竭力堅持，才確定了較高的水準。

他最後談到德國和約問題。

「在討論對德和約以前，必須解決建立一個全德國政府的問題……但縱然德國政府建立以後，也還需要很多年的時間來審查這種新的德國政府所代表的是什麼東西，以及是否可以信任……將來的德國政

府必須是這樣的一種民主政府，它不僅應能根絕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殘餘，而且同時還能實現德國對各盟國的責任。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應該履行對各盟國的賠償支付。只有當我們感覺滿意，認為新德國政府能夠勝任這些工作，並且實際上已在忠實地履行這些工作時，才可能真正談到對德締結和約問題。」

在這個最後的聲明裏，可以證實我們所抱的恐懼，即除非被世界輿論迫而出此的時候，蘇聯在今後的若干年內是不願意與德訂立和約的。他們將在盟國管制委員會和外長會議中利用他們的否決權，以獲得採納他們的「民主」政府的概念，以獲得一部份管理德國工業的權利，尤其是管理魯爾區工業的權利，以及履行價值一百億美元的賠償支付。

這是一個很有效力的演說。特地選定這時發表，藉以爭取那些預備在各市選舉中投票的德國人民的好感。他們對於悄悄地提出的賠償要求的不快，已被他宣佈反對未經公民投票即行分割和讓與領士的言論所抵消而有餘。但在演說中特別使德國人高興的部份，是譴責一切想要根絕德國工業和「農業化」德國的建議，這個迎合德國人心理的聲明的力量，我立刻就感覺到了。這種用心顯然是要利用德國對於所謂「摩根索計劃」的普遍恐懼心理，該計劃曾在美國報紙上普遍討論過。

一九四四年十月戰事仍在進行的時候，我正在巴黎。在我所住的賓館裏有一位講德語的士，他每天晚上替我翻譯柏林的廣播；這些廣播裏以各種各式的方式呼籲德國人民不要考慮盟國的投降建議。他們提出警告說，投降就等於實行「摩根索計劃」，該計劃將消滅德國的一切工業，並使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家。他們大大的誇張這個計劃，藉以煽動德人甯願戰死而不投降，莫洛托夫演說的目的，正在針對着德國人民，他們已經每天聽慣了上述的廣播，並且被灌輸一種思想，認為從美國得到的將只有最嚴厲的待遇。他是利用了德國人民心中對於美國政策的迷亂心情。

我必得承認這種努力的有效，因為就在我們自己的國家以內，關於美國的對德政策也會有迷亂的感

覺。其實，就在內閣裏面，對於這個問題甚至也極感迷亂。

我不禁回想起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在白宮時的情景，那時羅斯福總統曾經討論到他所建議的對德的和平。他說國務院中一部份用意良好但被人引入歧途的官員們正在計劃在他認為是「寬大」的對德和平。他說這並不是他的計劃，德國人民應受到他們對於戰爭所負責任的教訓，將要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他們的早飯午飯和晚飯都只應該僅僅有湯可喝。這好像不是羅斯福總統的口氣。這是他憤激之談。

這時候他指定一個內閣委員會研究對德的和平，其中有國務卿赫爾先生，財政部長摩根索先生，陸軍部長史汀生先生。

這個內閣委員會裏各人的意見極為分歧。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他們在總統辦公室舉行一次會議，參加者還有霍浦金斯先生。

陸長史汀生的意見是，他們是要設法防禦德國征服世界企圖的再起。但他說他們在方法上的意見不一。他認為摩根索先生的辦法將在實際上消滅了德國的工業。他引證摩根索計劃關於魯爾及工業區附近的規定如下：

「這個區域內不僅應除去所有目前已有的工業，而且還應加以極大的削弱和管制，使它不能在不久的將來再成爲工業區域——凡是未因軍事行動而毀滅的一切工廠和設備，或者完全加以拆卸並從該區運走，或者完全加以毀壞，各礦場的設備都應遷走，再將各礦加以澈底的破壞。」

陸長史汀生辯論說，這些資源構成歐洲生產力的自然而必需的資產。他極力主張這些資產應予保留，作爲圖謀歐洲大陸的利益之用。他的意思是，假若將魯爾實行國際化，或對其出產實行託管，該問題的解決就能符合全世界的需要和利益。

陸長史汀生也反對摩根索先生計劃中的另一建議，即主張對於所謂主要戰犯於逮捕後只須確實驗明

正身，可不經任何審訊，即由軍事當局處死的辦法。史汀生先生認為施行手續至少應表現人權法案中各種基本的規定。假若處罰這些戰犯是用合乎文明進步的高尚方式，對於後世的影響必然很大。

總統和國務卿赫爾差不多在同時要求我考慮擔任對德國問題的美國高級委員。我雖然以前曾告訴過總統想在戰爭結束時辭去戰時動員及復原局長的職務，但對這個新的建議也不想接受。不過我仍然答應對此加以考慮，並研究已經擬定的佔領計劃。在戰後期間會在國務院中很幹地指導着處理德國問題的李達爾柏格先生 (James Riddalberger) 把佔領的計劃交給我，並願意回答我所提出的問題。這個計劃所給我的印象是，要想依照財長向總統所建議的政策對德實行懲罰性的和平。我固然也和總統一樣對所謂「寬大的和平」表示反對，但我認為這個計劃實在是不必要的嚴厲，而為歐洲的前途設想也太不明智。

有一個條款特別令我驚異。其中辭句即等於說主要戰犯，應該一律審判並處絞刑。我就詢問是否會經考慮一部份戰犯可免罪或者審訊也許有發生錯誤的可能性。李達爾柏格先生也同意條款的辭句很有問題。他又說，為了對國務院表示公允，他應該告訴我該計劃中的大部份，連上述的一節包括在內，都是由財政部的代表們所擬定的。不久以後我就告訴總統和國務卿赫爾說，我不能接受上述的任命，因為我以為我不適於擔任這工作。

內閣委員會內意見的分歧，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魁北克 (Quebec) 會面時才達到頂點。國務卿赫爾沒有參加，因為他告訴我，總統會談所討論的僅屬軍事。顯然計劃有了改變，因為財長摩根索會經參加。陸長史汀生也沒有去，但當會議開始以後，他曾將其戰後對德計劃的意見告訴總統。

時局的發展使得魁北克會議非常重要。例如英美軍隊在德的佔領區問題已獲協議。在邱吉爾先生同意將英軍佔領區內的不來梅港作為美國佔領區的一部份，藉以保證我們可以使用這巨大的港口作為運輸

人員和供應品之用以後，我們也接受了佔領南部區域的辦法。

另一個重要的決議是九月十四日決定的，該決議係關於對日戰爭期間繼續對英施行非常慷慨的租借計劃。

關於這個協定也發生了各種不同的意見。財長於九月二十日交給國務卿的備忘錄內說，「總統認為應設立一個委員會，並建議應由摩根索先生代表他出而領導，斯退丁紐斯曾經參加過大部份的租借工作，所以也應為委員之一。」然而白宮所發表的備忘錄僅僅包括了魁北克會議的談話紀錄，並沒有把這一節包括在內。那時只有負責對外經濟處工作的克羅萊先生 (Leo T. Crowley) 有出而管理租借事宜的可能。克羅萊先生和總統曾經討論實行對英的租借工作。他說總統會教他繼續管理租借，並教他對於英國的要求也像對於別的一切要求一樣加以考慮，而不必顧及魁北克協定。

由於羅斯福總統的逝世以及歐洲投降和日本投降之間的時日很短，所以如何實行對英的租借計劃問題，並未成為各部門尖銳的爭論。

九月十五日邱吉爾先生和羅斯福先生簽字贊成關於戰後德國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以後即稱為「摩根索計劃。」總統贊成財政部長的意見，而不贊成國務卿和陸軍部長的意見，該協定中立刻引起華盛頓官員注意的是提到「德國的冶金、化學、和電氣工業」的部份。備忘錄中說，根據經驗，這些工業都能從平時轉到作戰用途，那些曾經吃過德國人苦頭的政府，應該有權運走這些為他們補償損失所必需的機器。

「因此，魯爾和薩爾的工業必須停止開工一律封閉，」備忘錄裏說。「我們認為這兩個區域應該放在世界組織下面的某種機構的管理之下，由該機構監督這些工業的拆卸，並保證它們不致託辭而被恢復。」這種消滅魯爾和薩爾製造戰爭的工業的計劃，是希望把德國變成主要為農業和田園性質的國家。

「首相和總統對於這個計劃都一致同意。」

國務卿赫爾並不贊成這個計劃。九月二十五日他勸總統與英蘇兩國政府就關於德國應採的政策成立一個堅定的協定，他說我們過去所採的原則，都是把這一類的事情根據三國一致同意的基礎辦理。就在這時候，國務院也並沒有看出英政府有贊成將魯爾和薩爾的德國工業生產設備完全消滅的跡象。他也不知道蘇聯政府的意見如何。

究竟邱吉爾先生是怎樣贊成「摩根索計劃」的備忘錄的，很難明瞭。當然，以後在雅爾達的時候，他對含有復仇意味的和平是表示不滿的。在波茨坦的時候，他辯論着說，德國的重工業不應減至需要其政府給以財政援助才能維持德國經濟的程度。在波茨坦會議以後，當四強就德國的工業生產水準取得一致同意的時候，英政府所主張的生產水準較之四強中任何其他國家所主張的都高。

從不久之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看來，羅斯福總統的態度究竟如何也同樣難以瞭解。

為回答國務卿計，總統於九月二十九日送一個備忘錄給他。然而直到十月二日才到達國務院。

總統在備忘錄裏說，他認為在這個階段裏，國務院或任何其他部發表英國和蘇聯關於德國工業問題的意見，都不會達到任何良好的目的。

「時局的真正重心，」總統肯定的說，「是使英國能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不致完全破產。」總統又說，有人會對報界發表「根本不確」的聲明。「並沒有人想使德國再成為完全農業的國家，但竟有抱這種思想的人已將這一點向報界發表。我希望我們能抓到她並加以懲罰。」

總統又說，他不能贊同這樣的看法，即一面眼着讓英帝國在財政上陷於崩潰，一面讓德國同時建立一種潛伏的重整軍備的局面，以致在二十年內又有進行另一次戰爭的可能性。總統的結論說，僅對工廠施行檢查雖不能防止這一點，但「沒有人想完全消滅德國在魯爾和薩爾的工業生產能力。」

就在九月二十九日總統的備忘錄寫好了的同一天，國務卿赫爾又送呈總統一個文件，這顯然是在他還未接到總統的備忘錄以前所起草的，赫爾先生說：

「內閣委員會不能同意關於處理戰後德國問題美國所採政策的聲明。財政部所提出的備忘錄絕對與國務院的意見不同。同時我已收到閣下的九月十五日的備忘錄，聲明關於魯爾薩爾以及在魁北克所決定的將德國轉變為農業和田園性質國家的意見。這個備忘錄似乎大部份是反映財政部對於處理德國問題的意見。因此我認為我應再將國務院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貢獻給閣下。」

國務卿赫爾接着就發表一個政策的聲明。他說，在經濟方面，我們的目的使德國不能再進行戰爭，並永遠消滅德國對歐洲的經濟統治。為要達到這兩個目的，必須（一）消滅一切不能轉變為和平用途的軍用工廠，並防止其重建；（二）迫使其他一切軍需工廠都轉變為製造平時貨物之用。

在一般講來，陸長史汀生似乎同意國務卿赫爾的意見。在他和總統的一次談話裏，他已表示了他的態度。總統告訴陸長史汀生說，他們的意見都相距不遠，他也並無意使德國變為一個農業國家。然而史汀生請總統注意魁北克協定的措辭，該協定說，這個計劃是「希望把德國變成主要為農業和田園性質的國家。」史汀生先生對於總統是有真正的感情，並對他在戰時的功勞深表敬仰。他表示希望總統不必贊成一個報復式的和平。總統同意史汀生的意見，並告訴他說，他也不知道怎樣在魁北克協定裏竟會簽字同意那樣特別的措辭。他說，這一定是未多加考慮的結果。

從總統在九月二十九日寫給國務卿赫爾的長篇備忘錄以前，他又送了一個備忘錄給克羅萊先生的一項事實中，可以明顯看出關於處理戰後德國問題的魁北克協定，已經成為總統非常憂慮的一個原因；總統致克氏的備忘錄如下：

「關於德國投降以後，如何管制德國的力量和能力，以防其將來再進行戰爭，你已從經濟的觀點加

以研究。這種工作必須加速進行，在國務院的指導之下，你應該得到工作上的幫助，如有需要人員的請求時，也可派遣專家與軍事當局外交當局及其他美國機關等共同工作，而留心使德國不再成爲後世的威脅。

總統還告訴克羅萊說，他要把他已請克氏進行研究的事宣佈出來。克羅萊的報告後來會提交國務院，並於起草最後一致同意的計劃時加以攷慮。

各部間關於對德計劃的討論一直繼續到三月二十五日，這時國務院經過與財政部及陸軍部的磋商以後，已經擬定了一個文件，由三部代表簽名後，即送呈羅斯福總統批准。當助理國務卿克萊敦代表我們出席經濟委員會的時候即會用過這備忘錄。其中並未講到使德國成爲一個農業和田園性質的國家。就連簽字同意魁北克計劃的邱吉爾先生也未對杜魯門總統或我談過。其實，在波茨坦的時候任何人都未對我們提到過。在波茨坦的時候，我們的建議成了對德應採的經濟和政治原則的計劃的根據，並由各國政府的首長批准。

莫洛托夫先生當然已經從我們的報紙上知道了由於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魁北克訂立協定的結果在我國政府裏所引起的意見的紛亂。莫洛托夫先生深知德國人民恐怕會有任何計劃使得一個具有熟練工業工人的國家變爲一個只有農業工人的國家，他就利用了這些恐慌心理而居然成功。蘇軍佔領區內由蘇聯所統制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歪曲的傳達我們的意見。共產黨駐柏林的領袖們散佈謠言說，美國已經對於歐洲局勢感覺厭煩，在短期內即將撤去駐軍。

到七月十一日，正是莫洛托夫先生發表蘇聯對德政策的重要聲明的第二天，我也發表了美國立場的一般性聲明。我的聲明很簡短，因爲我是要把注意集中在指定代表並使他們工作的迫切目的上。我本想到外長會議已經準備對德國問題有所行動的時候再發表我國對德政策的詳細聲明。以後我又改變主意

。因為蘇聯代表團強迫遲至十一月才對德國採取行動，以及由於蘇聯繼續在德國作歪曲的宣傳，我就決定立刻發表一個我國對德政策的充分的聲明。我覺得若在巴黎和會時發表這樣的聲明不大合適；於是決定到德國去並與美軍佔領區內的軍事和民政佔領當局商談。克萊將軍鼓勵我這樣做。他告訴我，在德國發表政策的聲明對於他的機關很有幫助，他就很快的開始佈置在斯圖加特舉行一次會議。

由於他的要求，我們就先到柏林去，從那裏再搭火車，爲的是在往斯圖加特去的途中，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個國家，以及受戰爭破壞的情形。我們坐在納粹政府替希特勒個人使用所建造的火車裏。這裏面的設備，當然要較美國總統所用的火車奢華多了。希特勒所用的一節車箱裏，包括有兩個房間，還有一個大的鑲有淡綠色磁磚的浴室。我的內人和我坐在這些以前爲希特勒和他的情婦布勞恩（Eva Braun）所佔用的房間裏，頗有一點奇異的感覺。

我們在沿路上看到許多美國兵，這種旅途的消遣很使我們高興。在一個車站上，月台的對面正停有一列兵車，有我們的一個士兵正站在火車的階梯上對五六十個德國人演說。我斷定他們對那年輕人所講的話一句也不懂，但是並不足以使他氣餒。他忽然在一句話的中間停頓了，向我恭維的喊道，「看，誰在那裏！嚇，吉米。」

九月六日將近中午的時候，我們到達了斯圖加特。在那有炸彈痕跡的車站上，瓦登堡（Württemberg），巴伐利亞（Bavaria）以及赫塞公國（Duchy of Hesse）各區的首長們都正等著迎接我們。我也極想會見他們，因為他們可以代表我們在德國重建地方自治政府及民主程序的第一次試驗。他們報告他們工作的進展，並表示相信英軍佔領區內的德人也願意對剛創始的地方自治政府作相似的努力，但還沒有很多的進展，參議員康納利和參議員范登堡向他們提出若干問題。我們和他們周旋半小時之久，以後就前往瓦登堡戲院（Württemberg Staatstheater），這是仍然屹立在斯圖加特的唯一大的集會場

所。

麥克納奈 (Mc Namy) 和克萊爾將軍會竭盡一切努力想替宣佈美國政策時佈置一個動人的場面，但我確信他們的計劃中沒有包括一項今天的節目。當我和麥克納奈將軍，墨菲及兩位參議員步上演說台的時候，樂隊演奏「暴風雨的天氣」。我不禁問這位將軍是否是他教這樂隊演奏這種帶有象徵意味的音樂。克萊爾將軍為要避免為人注意，坐到聽眾席上去了。

我開始演說，宣稱美國人民已經知道我們是生存在同一個世界上，「和平與幸福是不可分的，我們的和平與幸福不能用任何其他國家的和平與幸福作為代價來購買。」

「我希望德國人民莫再犯錯誤，以為因為美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所以縱當任何國家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以對其他民族或其他政府取得控制權的時候，他們也會袖手旁觀盼望和平……我們要繼續注意歐洲以及世界的局勢。我們已經協助組織聯合國。我們相信它可以阻止侵略國家發動戰爭。因為我們相信它，所以我們願以我們所有的力量 and 資源來支持聯合國組織。」

我以後就轉到美國相信德國所應實行的那種和平的問題。我說我們久已不談所謂嚴厲或寬大的和平問題，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反對嚴厲和報復性的手段，這足以阻礙有效的和平。我們也反對寬大的手段，因為這將引起和平的破裂。」

我們首先必須使德國從黷武主義中解放出來，並給德國人民一個機會「將他們偉大的精力和能力運用到和平工作上去，」並「在相當時候，使他們能在聯合國中取得一個尊榮的地位。」

「若在東方與西方間爭奪權力的武裝鬥爭中必須使德國成爲一個工具或者一個伙伴，這既不合於德國人民的利益，也不合於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發表了這個一般性的聲明之後，就提到必須採取的特殊行動。德國必須担当它應盡的一份責任，

以補償其對鄰國所加的破壞，這種破壞在一代之中已經有了兩次。美國希望波茨坦協定中關於廢止軍政和實行賠償的規定能充分實現，以便消滅德國的軍用工業和減少及遷走非為德國平時經濟所需要的重工業工廠，藉以減少德國潛伏的作戰力量。但這種規定的實行，不應使得德國工業的生產水準，被剝奪到沒有其他國家的援助，就不能維持通常的歐洲生活標準的程度。

「在確定工業生產水準的時候，不得從現有的生產中劃出一部份作為賠償之用，」我說：「假若從日常的生產中劃出一部份作為賠償，將與目前根據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工業生產水準全不符合，」我又加上說，美國絕不能同意支付較在波茨坦所協定的更大的賠償。

我又解釋說，波茨坦協定並未能實行，因為盟國管制委員會未能同意把德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看待。假若沒有經濟上的統一，就不可能完成盟國管制委員會所定的標準。美國意見以為，必須建立中央的德國行政機關以確定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和一個運輸、工業、和對外貿易方面的全國性的機關。

演講中繼續的說：「必須給德國一個輸出的機會，以便能有相當的輸入好使她的經濟能夠自給。德國是歐洲的一部份，假若具有龐大煤鐵資源的德國竟然變成一個破爛不堪的破落戶，那麼歐洲的復原，特別是比利時荷蘭和其他鄰近國家的復原，的確要緩慢下來。」

我發表了關於經濟原則的聲明以後，就轉到政治方面。佔領的目的絕不想就德國的經濟或政治生活實行一個「長期的外國的獨裁，」而是想「從根本上」建立政治上的民主。我們相信德國人民應負管理他們地方事務的主要責任。我們也必須對他們加以管理。以便政治機構實行分權，而地方的責任也能發展起來。我鄭重地說：「縱然是具有多麼好的動機和訓練的大批外國軍隊或外國官僚，」我們也不能相信它「最後就能成爲另一個國家的民主的最可靠的保衛者。」我們希望各盟國政府能確定一般的規則，使「德國民主根據這些規則而自己管理自己，」以便盟國的佔領軍的數目能限制爲「足以監視其服從那

些規則的程度。」我解釋說：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會建議一項條約使確能在二十五年或四十年之內有一支力量可以保證德國不再武裝的原因。我又發表了一個聲明，美軍報紙星條報形容說：「這就恰像醫生的命令一樣。」

「維持治安的軍隊或須要在德國駐守一個長的期間。我希望不要誤解。我們不會規避我們的責任。我們不會撤退，我們要留在那裏，並供給在比例上應有的一份維持治安的軍隊。」

同時我們贊成早日成立臨時政府，這個政府「不應由別由政府隨便指派，」而應包括在四個佔領區中的每一佔領區內所成立的許多邦或省的「負民主責任」的各主要官員。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個政府應使各中央的行政機關能適當的進行工作，並應準備一個聯邦憲法草案。

「現在也到了應該確定新德國邊界的時候，」我繼續的說。奧國已經被承認是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國家。在波茨坦的時候，各政府領袖會同意支持蘇聯想把哥尼斯堡城交予蘇聯的願望。至於西里西亞及其他東部區域的交予波蘭以便管理，我指出是由蘇聯在波茨坦會議以前所造成的。但我又鄭重指出，波茨坦會議的議定書會明白規定「各政府首長並不同意支持在和約中割讓任何特別的區域。」我們會在雅爾達同意將寇松線以東的領土應由波蘭移交蘇聯，我們並認爲在波蘭北部和西部的邊界也應有作爲補償的修改。然而應該割讓的區域的範圍，「必須在最後和約已一致同意訂立的時候才能決定。」

我們不能否認法國對薩爾的權利，我說，但就魯爾與萊茵區而論，「美國絕不支持對於無疑本是德國的領土作任何的侵犯，或對該地作當地人民並不真正願望的任何劃分。」我們決定這些區域內的資源絕不可再作爲破壞性目的之用。因此，我們「贊成對包括魯爾和萊茵區的整個德國加以爲達到安全目的所必要的管制，但絕不贊成把魯爾和萊茵區置於外來強國的政治控制或操縱之下。」

我在演說結束時說，德國人民必須明瞭，想要「征服和破壞世界的是德國軍隊。因此美國不能使德

國免除由於德國領袖發動戰爭所加於德國身上的痛苦，「但我們願意給德國人民一個機會，好讓他們從這些痛苦裏找着一條出路，只要他們尊重人類自由並遵守和平之路。」

當我演說完畢時，軍樂隊奏起我們的國歌，包括德國各領袖的整個聽眾都站立起來。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尤其是這一些文武佔領當局的聽眾，使得這一剎那特別動人。當最後一個音符消逝的時候，已離美國有數週之久的參議員范登堡轉對我說道，「這個「星旗歌」以前從未使我這樣的感動。」

這個美國政策的聲明在英美佔領區內都被普遍的發表，在法國的佔領區內發表的範圍較小。除了蘇軍佔領區外，一切佔領區內的廣播電台在轉播我的演辭的時候，都附有德語的翻譯。在蘇軍佔領區內，除了一個例外以外，由蘇聯所特許的報紙都只在第二版上刊登這條新聞，但對此所加的最長按語竟達一百四十行之多。

經過一個短時期以後，整個歐洲受共產黨控制的報紙就發動一個嚴厲的批評運動。在波蘭，關於波德邊界的聲明特別受到攻擊。他們認為美國違反波茨坦協定。但事實却相反。我們還可以記得，當我們對於蘇聯將一部份蘇軍佔領區劃歸波蘭的片面行動表示不平的時候，史達林會告訴總統說「西部邊界問題還未確定，蘇聯不受限制，」而最後的議定書上也說：「三國政府領袖重申他們的意見，認為波蘭西部邊界的最後確定應留待訂立和約時解決。」當史達林對總統提出上述聲明的時候，他所說的確是實情，但到八月十六日，即恰當波茨坦議定書簽字的十五天以後，蘇聯已與波蘭訂立條約，承認與得——尼塞線為波蘭的西部邊界。

斯圖加特的演說，使得蘇聯不能再對着波蘭人是一種說法而對着德國人又是另一種說法。他們不得不選擇一種說法，於是他們宣佈他們願意支持波蘭對領土的要求。德國的領袖們這時候斷言這種立場與以前對他們所作的諾言相衝突，於是在德國境內對共產黨運動的大部份的支持就開始消失。我相信，由

於我國的政策聲明，蘇聯原來希望擴大到柏林的勢力範圍已經退縮到受波蘭控制的領土內了。

在我們回到巴黎的時候，歐洲好幾國政府的代表們都向我表示他們贊成美國對德國的計劃。貝文先生也是向我提出祝賀的人們之一。他說這個計劃實際上也就是英國正要準備提出的。莫洛托夫先生並未提到這個問題，但據他的一部份僚屬所說的話看來，我的演說在蘇聯大使館內並未受到稱讚。

邱吉爾先生從瑞士打來一個賀電，約一週後當他在返倫敦的途中停留於巴黎的時候，他又問我是否我們可以聚會一次。我立刻通知英國大使，我很願意到大使館內會晤邱吉爾先生。英大使極想使邱吉爾先生到巴黎一事保守秘密，邱吉爾先生剛在日內瓦和布魯塞爾等受過很大的民衆歡迎，並不避見何人，而且對於保守秘密所採的步驟也似乎很感厭惡。我也和他一樣感到憤怒。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爲什麼要保守秘密，但我仍然與大使合作，更令我吃驚的是，他使這次訪問的保守秘密也居然成功。我實在料想不到我的離開摩里斯旅館到英大使館去，以及與邱吉爾先生會晤了兩個小時等情形，居然沒有被非常警覺的美國記者注意的耳目所偵察出來。唯一的解釋是這是禮拜六下午，我國記者也採取法國習慣在那天下午放假。至於特夫古柏大使 (Duff Cooper) 如何僅賴着邱吉爾先生的勉強的合作而使這位前任首相的進出巴黎都沒有記者曉得，就更難使我明瞭了。

邱吉爾先生只是要表示他對美國在斯圖加特所發表的立場很贊成，並想討論一些目前的問題。他沒有批評他的政府裏的任何官員。但據我看來，由於他是反對黨的領袖，關於英國外交關係上所發生的種種事情都沒有告訴他，他對於這一點一定不快。我們談了許多事情。在我們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史末魯陸軍元帥 (Smuts) 來訪，我們繼續我們的關於世界問題的討論。以後我就離開這兩位偉人。願他們永遠不老。

斯圖加特的演說使得一部份法國的政治領袖感到失望，因爲我們的立場反對把魯爾和萊因區劃分出

去，並堅持建立中央的行政機關。然而他們對於我們願在和會上保證支持法國對薩爾的要求一點，以及積極主張願在德境保持我們佔領軍的應有的比例上，很表滿意。

由於法國一部份領袖的反對，我就接受了巴黎美國俱樂部給我的一個機會，在十月三日發表演說，更進一步的鄭重指出我們決心幫助維持歐洲的安定與和平。

「美國人民會竭力想置身局外不參加歐洲的戰爭，其根據的理論是他們只應照顧他們自己的事，他們與歐洲並無關係，」我說：「然而這種理論並不對。因為美國人民已經發現，當歐洲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和平與安全就必不可免的要在結束以前牽涉在內。他們的結論是，假若他們必須要幫助結束每一次歐戰，頂好是先盡他們的力量來防止一個歐洲戰爭的開始。」

我於是又向法國鄭重指出我們所建議的四十年條約的價值。我鄭重的說，美國不僅要看到在和約成立以前德國就被廢止軍政和解除軍備，而且要能保證在和約成立以後的四十年間，德國仍處於解除軍備和廢止軍政的狀態中。

「假若能實行這樣一種條約，」我說，「魯爾就不會再成爲德國的兵工廠或歐洲的兵工廠。這是所建議的條約的主要目的。」

「美國堅決反對德國軍事力量的再起。它也堅決反對想要控制德國的鬥爭，因爲這種鬥爭又會給德國以實行分化盟國和征服盟國的力量。它也不願看見德國成了東方與西方間爭奪權力的工具或伙伴。」

我也解釋我們正設法想在德國啓發一種地方責任的觀念，好使人民注意於各邦而不注意於中央政府。

「我們希望能由德國的各邦建立德國的聯邦政府，而不希望由中央政府建立各邦。」
這次的演說足以向法國人民重新保證，美國所希望建立的德國，是能尊重其自己人民的自由，並能

夠不致威脅鄰邦的安全，尤其是法國的安全。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宣佈，斯圖加特的演說，仍能繼續代表美國對德國的政策。

蘇聯的政策也仍然是像一九四六年七月莫洛托夫先生在巴黎所發表的那種樣子。外長會議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莫洛托夫先生宣佈蘇聯對德政策的兩天以後，柯衡先生包倫先生和我應蘇聯外長的晚宴。吃了晚飯以後，我告訴他說，因為他在事前既已知道他不曾同意就對德和約及對奧和約開始工作，但他竟沒有來坦白的告訴我，我深表遺憾。不然我們就可以避免許多激烈的辯論，因為這些辯論並不會有任何成就，而且徒然有害。他這時也以完全解除了武裝的態度，同意我所說的是對的，並說假若沒有過辯論就更好了。

我問他，「那麼，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你對於德國問題的真心實意究竟是什麼呢？」

莫洛托夫答道，蘇聯所要求的是它已在雅爾達所要求過的——即價值一百億美元的賠償，並與美、英、法、等國共同參加四強對於魯爾工業的管制。

從這次以後，關於蘇聯對德的野心會有許多的推測。蘇聯的代表們也許還要替他們自己和各附庸國提出許多其他的要求，但我斷定莫洛托夫這天晚上的聲明實在代表蘇聯統帥部真正的慾望。

在兩個要求之中，蘇聯對於參加魯爾工業的管制更爲注意。該區的煤與鐵使蘇聯把它當作歐洲的兵工廠。他們想參加對於魯爾生產品分配的一切決定。根據我們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個建議非常不切實際。兩年多以來，管制委員會就會設法想就各佔領區間的關係得到某種協議。然而管制委員會裏的委員們想要獲得協議所遇到的困難，也正如各外長所遇到的同樣的多。我們還能在朝鮮找到另一個例子，我們會在朝鮮建議與蘇聯獲得聯合的行政管理權。僅僅在六月間我們才能與蘇聯重新進行

一年以前即由於我們不能獲得協議而中斷的討論。假若必須經過數月的討論才能就任何方面獲得協議，那麼要想由四強共同管制魯爾的各種工業，恐怕也是不能實現的事，恐怕他們對於有關任何工業的任何問題都不能獲得協議。四強的管制將使魯爾的工業受到有效的破壞，但魯爾的工業如能加以適當的監督，對於一個經濟上健全的歐洲却是非常重要的。

在討論魯爾問題的時候，法國表示贊成由西歐的盟國政府管制。法國沒有提到蘇聯的參加。因為要想教蘇聯同意對魯爾加以國際的監督而不讓蘇聯包括在內的思想太不現實，所以其他政府都沒有加以鄭重的討論。

對於魯爾的工業問題，也應在和約中與德國的其他工業問題一併考慮。當和約成立以後，關於德國工業的管制即應轉交於所有主之手。我們所注意的以及我們的責任是使得這些工業以後不致轉為製造戰爭武器之用，這個目的可以依照我所建議的四十年條約中所計劃的聯合檢查辦法而達到。我想這就是為什麼蘇聯反對這個條約的許多原因之一。他們知道許多人民都贊成對魯爾工業實行國際管制。假若四十年條約能得到一致的同意的話，那麼這些人民的大部份即能得到滿足，而將減少蘇聯控制魯爾工業的機會。

智慧和正義都使美國不能對蘇聯關於魯爾或賠償的要求讓步。然而莫洛托夫先生會說對於任何和約的成立，都有必要的先決條件。因為我們相信早日成立和約對於整個歐洲安定的恢復非常重要，我們就不得不考慮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做。

第一個步驟已經採取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我在巴黎宣佈，我們所已決心採取的行動只是一個最後的手段——即無論蘇聯參加與否，將佔領區實行合併。

我在開始時表示希望外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對於建立為獲得德國經濟統一所必需的德國中央行政機關能表同意。為了滿足皮杜爾先生所憂懼的各點，我說我們願同意法國對薩爾的行政管理權一直

繼續到德國西部的邊界確定以後為止。我接着說，但假若外長會議對於這些中央機構的設立不能同意，美國「只有另提建議作為最後的手段。」我說德國的任何佔領區內都不能充分的自給，若將任何兩個佔領區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看待，對於兩個區域的情況都能改善。我指出我國佔領區內部的官員最近已與英國的官員討論共同的農業政策以便交換一部份產品。

「在四強中對於實行波茨坦協定中要求把德國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來管理的規定還未得到一致同意以前，」我說，「美國願與德國境內任何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佔領政府合作，將我們有關的各佔領區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來處理。」

「若使目前的局勢繼續下去，結果將產生通貨膨脹和經濟癱瘓的現象。結果還將使佔領國的費用增加，以及德國人民蒙受不必要的痛苦。美國不願意分担使這種情勢繼續下去的責任。我們深覺竭盡一切努力，以便把德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來管理一節，得到四個佔領國的合作，是我們應有的責任。」

第二天早上，貝文先生宣佈他本國政府原則上願同意美國的合併建議。於是駐在柏林的克萊將軍開始與英國代表羅伯森（Sir Brian Robertson）中將談判；這些談判一直繼續到外長會議在紐約開會的時候。

在柏林和華盛頓的各次談判中，對各種問題都得到一致同意，只有一個問題是例外——即分担應由各個政府分別担負的每年的虧空。美軍佔領區一九四七年的虧空估計約有二億美元，英軍佔領區估計約有四億美元。英美代表都相信這種虧空會逐漸減少，合併的佔領區在三年之中即可自給。在這種條件之下，問題提到貝文先生和我的面前來。

貝文先生告訴我，英國財政部的官員力辯英國沒有這些必要的美元以彌補今後三年中的虧空，因此他主張美國担任百分之六十的負擔。我回答說，鑒於英軍佔領區內的虧空更為龐大，我們打算在我們能

對平均的分擔取得同意的時候，再多負擔一億美元，因此我們不能贊成負擔百分之六十的建議。我們駐德的代表們也許在自信上有錯誤的地方，我說，但他們堅信假若由他們負責管理具有那些工業和煤礦的英軍佔領區，他們縱不能消除整個的虧空，他可以消除大部份的虧空。我於是非常鄭重地建議，假若英國願與我們交換佔領區，我們就願意擔任整個虧空百分之六十的負擔。

貝文先生微笑地答道，「你知道做國政府是不會同意這一點的。」我承認我很懷疑英國是否願以他們那高度工業化的區域，以及其豐富的自然資源，來交換我們那大部份都是風景和農業的區域。不過我指出我的建議可以供他作為給那些正在壓迫他的英國財政部官員們一個很好的答覆。於是他同意了平均負擔費用。我覺得爲了只願拿出較百分之五十爲少的費用，而使英國陷入一種窮親戚或低人一等的伙伴的窮酸相，在英國實爲不智之舉。他們是一個愛面子的自負的民族，那樣一來會容易引起人們的憤怒。用其他的方式幫助英國似乎更好一些。

然而英國爲彌補他們佔領區內估計的虧空數目所遇到的困難，也絕不能小視。當他們在談判我們已於一九四六年春天給予他們的貸款的時候，他們那時就沒有指望以美元供給德人所用的糧食。這在他們美元的預算上是一筆很大的以前沒有預料到的負擔。這種事實我十分正確地相信影響了我對另一件事的判斷：即關於我們開始自合併的佔領區內搜集出口品的日期問題。我支持英國的主張，結果所得的決定將使他們省下了三千萬美元。

我曾希望法國也參加我們的合併。這就是我宣佈我們關於薩爾決定的原因之一。法國也要求蘇聯能同意關於薩爾的建議，但莫洛托夫先生一再反對。這種情形很令人失望，因爲我知道法國聯合政府對於和我們一起參加那種必然會冒犯強大的法國共產黨的行動，是會感到遲疑的。法國共產黨也很爲莫洛托夫先生的拒絕援助一個受普遍支持的法國目的而大大受窘，很歡迎有另一個問題能轉變人們對於蘇聯關

於薩爾立場的注意。以後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我就以書面勸告法國政府說，在訂立和約的時候，我們願意支持法國對這個區域的要求。英國也表示相似的保證。但法國政府始終沒有參加我們的合併。

我的希望是法國能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接受我們不斷的邀請，把他們的佔領區與其六百萬的人民同英美的佔領區合併，這樣就可使四千六百萬的人民能在三年以內有自給的希望。這個建議也隨時靜待着蘇聯的參加，以便四強都一律能實現波茨坦的保證，把德國當作整個的經濟單位來處理。

然而盟國的合作並不是蘇聯計劃中的一部份，蘇聯的官場對於合併的辦法提出大聲的抗議，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幾乎再沒有其他任何的事情會受莫斯科這樣嚴厲而繼續不斷的攻擊。這對蘇聯的官員們是一種信號，即他們自從波茨坦會議以來運用非常有效的否決權，已不再為不可侵犯的了。這可以證明我們拒絕永無限期的遵照一種只有在莫洛托夫先生的觀念中認為最好的道路。這可以表示西方國家是願意採取行動，以支持他們的利益和他們所認為的歐洲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的。

我們的第二個步驟當然是與德國和奧國訂立條約。而問題的中心是德國。

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關於準備對德和約我所已得到的最好的協議，是允許到十二月間在紐約致慮這個問題。在紐約時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同意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時再討論德奧問題。在莫斯科經過六週的談判以後，德國問題實際上還停滯在七月間的狀態。各外長休會後定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再行討論。假若蘇聯到十一月間還不改變其立場，那麼除了休會以後再行延遲到一九四八年的某一天以外，仍然不會得到任何協議。馬歇爾國務卿，貝文先生和皮杜爾先生等都在莫斯科竭盡他們一切的努力，想就各種重要問題得到協議，然由於蘇聯的反對，他們都未成功。

我們必須牢記莫洛托夫先生於七月十一日在巴黎所發表的聲明，他說「縱然在德國政府成立以後，也必須要經過好些年以後，再與他們簽訂條約，才算明智之舉。」我們還應記着他的另一個聲明，他說

我們沒有匆忙的必要；「我們應該把下一年的時間拿來考慮對德國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應忘記在考慮對義大利和對巴爾幹各國的條約時所遇到的情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們經過長期的辯論以後，同意至遲不得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在巴黎舉行和會。在巴黎時又經過長期討論後，莫洛托夫先生認為雖有以前的協議，但除非外長會議一致同意蘇聯所認為基本的條約上的一切規定，仍不能發出邀約參加和會的請柬。我們辯論說，我們應該發出請柬，應該盡可能取得協議，以後還應在開會時把那些仍未解決的問題提交大會。若依上述蘇聯的辦法，蘇聯代表足有力量使得除非蘇聯所認為的每一個重要問題都能解決得令它滿意以後，那些沒有參加外長會議的其他盟國，對於與敵國所將締訂的條約，甚至連考慮的機會都沒有。

全世界的輿論，也許會迫使行將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的外長會議，對於被蘇聯在莫斯科最後一次會議中所阻礙的對德問題加以鄭重的考慮。但我們必須明瞭，雖在那時蘇聯也還是要運用其同樣的否決權武器，好在他們未同意發出參加和會的請柬以前，從英、法、美獲得讓步。

我們已經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這種經驗足夠作為很久很久時期的教訓。印度人說得好：「假若我只受過你一次欺騙，恥辱是在於你；假若我受過你兩次欺騙，恥辱就在我了。」

因為我是首先向杜魯門總統建議外長會議的設立，應成為準備一切和約草案的機構的人，人們當能瞭解我是如何不願斷定它再也不能達到它之所以設立的目的。我在當初建議設立外長會議的時候，我猜想參加會議的一切人員必然都極想獲得和平。我們也承認這樣的觀念，即參加外長會議的一切人員必須獲得一致的協議。我們絕未想到這樣一個有價值的原则，竟被外長會議裏某一份子，用以將其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其他一切的人。我們之所以未想到這一點，因為我們猜想我們都是為一個共同的目的所鼓舞，即早日恢復和平。現在我不能斷定這是真實的情形了。假若蘇聯的領袖們繼續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以延遲

和平的恢復，並繼續把他們的軍隊駐在德奧及駐在藉以維持通往德奧的交通線的鄰近各國，必須要尋求其他方法以達到和平。

在對德的條約中，比較對義大利與對巴爾幹各國的所有條約有更多爭論的問題。因此很容易使參加外長會議的任何國家拖延工作並對拖延提出似是而非的理由。

縱然我們能排除這些障礙，並作了許多讓步，以致和會的請柬終於發出，我們仍然不能順利的向前進行。巴黎和會是從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一直開到十月十五日，我們很可以猜想對德的和會還要繼續到更久的時間。假若要依照以前的辦法，和會的建議必須提交外長會議，以便最後決定應將何項建議包括在條約中。

照這樣情形看來，就在現在我們所想像的最有利的環境之下，若再採取過去我們所會遵照的程序，將使歐洲和約的訂立更遲到遼遠的將來。為了和平與安全，為了無數盟國人民以及前敵國人民的經濟和政治的幸福，我們不容再長此拖延。

馬歇爾國務卿在莫斯科參加外長會議的時候曾經宣佈，假若關於對奧和約不能很快的成立協議，美國將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十四條的規定，考慮將該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我很瞭解他的態度，對他同情。我這時又遇到了和討論對義大利及對巴爾幹各國條約時相似的情形，於是於外長會議在巴黎的第一次會議以後就用廣播對美國人民發表了一個相似的聲明。

然而經過進一步的考慮以後，我斷定這種辦法不會有什麼幫助。聯合國憲章並不能給聯合國大會以採取行動的力量。它只有建議的力量。以前我還希望，假若聯合國大會提出建議，反映在這些建議中的世界輿論的力量，總會使得蘇聯接受這些建議，現在我已經要相信這種情形不會有了。

蘇聯將會向世界提出辯論說，這些建議是從一個包括了許多甚至並未對德作戰的國家的大會所提出

的。蘇聯的發言人將要指出，各種重要而爭論紛紛的問題例如魯爾的管制等的決定，將由那些對於擊敗德軍毫無實際軍事貢獻的南美國家阿刺伯國家和其他各小國的投票而表決。假若使得聯合國大會成爲解決這樣一種爭論問題的中心，實在是加給它一個它原來未想負擔的任務。假若遭受挫折，將嚴重的傷害它的威信和破壞世界人民的信心。

我們必須採取另一種行動路線。美國應該要求那些構成外長會議的各強國——當然包括蘇聯在內——同意在一九四八年初舉行和會。

在莫斯科的時候，馬歇爾國務卿建議下一次的和會應包括一切參加戰爭的國家。他主張一項建議的通過，不僅應得到所有票數的三分之二的贊成，而且也應得到那些有軍事貢獻的國家的票數三分之二的贊成。這個建議正與我們從一開始就抱定的目的相合——即由一切曾經幫助取得戰爭勝利的聯合國參加締造和平。同時，這擬議的表決程序，還可以防止那些僅有經濟貢獻的國家，在和會中獲得其不應有的權力。

假若參加外長會議的某一個國家拒絕我們所提的早日舉行和會的建議，其他國家仍然應該進行召集和會。他們進行召集和會時應該採用這樣一種方式，即對外長會議中獨特異議的國家，仍保留一個參加和會和成爲和會發起國之一的餘地，假若這個反對國以後決定如此的話。例如法國並未成爲舊金山會議的發起國之一，但它以後仍成爲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之一。也像這種情形一樣，其他國家應對着持異議的某一國家或某數國家繼續敦促其參加發起和出席和會。

每一個發起國都應準備和會的條約草案。無疑問的，他們在和會以前應儘可能就許多條款取得同意。自從德國投降以來已約有兩年半了，在這期間德國問題已由四強再四討論。在波茨坦的時候，四強中的三強已經討論政治和經濟的原則以及賠償問題等並成立協定。法國到最後也決定了和表示了他們的意

見。假若經過這一階段之後，四強還不知道他們的立場，他們是永不會知道的。

在巴黎和會時，對於處理這些草案及其他一切的程序問題，我們都已有充份的先例。也像在巴黎時一樣，和會應從其會員中指定幾個委員會研究發起國所提出的條約草案中不同的各方面。例如指定一個委員會研究政治問題，一個委員會研究經濟問題，另一個委員會研究軍事問題。假若願意的話，還可以成立輔助的團體以研究這些問題不同的各方面，這時各委員會就可以準備那些在他們研究範圍之內的條約中某些部份的草案。依照這種方式，凡是會與希特勒作戰過的一切國家，都可以參加條約的起草工作。假若我們準備最後還是要舉行一次和會，並有一個經過各委員會研究過的條約，像以前我們在巴黎時情形，那麼為什麼現在不就舉行呢？

我們必須明白指出，我們並不預備單獨媾和，或強定和平的條件。我們絕不想強迫別人接受任何特別的計劃。我們願意提出我們的計劃，我們也要敦促英國、法國、和蘇聯提出他們的計劃。這樣和會的各會員國才能作出他們的決定。

根據我們的經驗，我們一定會遇到蘇聯拒絕與其作戰的伙伴們共同參加和會的可能性。這的確要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喪氣，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一定都希望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然而這種可能性絕不會阻礙我們發動進行我所建議的方針。

到和會開會的時候，英美合併的佔領區大約管理得已很成功。到那時候我更希望雖然蘇聯佔領區內的人民不來參加，法國佔領區內的六百萬人民也來與合併佔領區內的四千八百萬人民共同參加在一起。合併佔領區內的某一政府或某數政府也能簽字於和約。

關於獲得德政府批准的方法，實際上有好幾種。馬歇爾國務卿在莫斯科的時候曾經建議，當憲法交與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表決通過的時候，還應要求他們對於應該成立何種政府以接受盟國和約的指示

也投票表決。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假若他們對此不能同意時，我們就可以考慮把條約本身交與公民投票表決。這時德國人民就必須決定究竟是接受這條約，還是繼續無限期的生活在軍政府和軍事佔領之下。

也許有人要反對，認為後一種辦法將使人發生這樣的印象，認為條約必須能為德國人民所接受才行。但我認為這樣的印象可以除去，因為這樣的辦法可以在為我們所接受的德國政府內除去了一個政治障礙，這個政治障礙就是他們認為已經談判了一個許多德人也許要覺得是壓迫性的條約。我不信他們會認為這也像目前狀態長此繼續下去時的一樣具有壓迫性。

在還未進行沒有蘇聯參加的行動之前，我們應該再度邀請蘇聯參加我們一同擬定和約。

這個條約也像對義大利和對巴爾幹各國的條約一樣，應該規定凡是沒有簽字的國家，不得享受條約中任何利益。假若蘇聯拒絕簽字於這條約，它當然再不能從西部佔領區內獲得任何賠償，也不能獲得其他由於和約的關係本應歸於他們的利益。

人們也許要說：假若蘇聯拒絕對條約簽字時，又將怎麼辦呢？

假若蘇軍從德國撤退，其他國家自然沒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但假若蘇軍不撤退，我們必須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去解決，作為最後的手段。這時候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起草和約的問題——這是聯合國從未打算去做的工作。我們這時候可能面對着一種似將危及和平的局面——就是聯合國之所以要成立去應付的一種局面。

蘇聯曾經宣佈遵守大西洋憲章，該憲章規定任何簽字國家不得作領土的擴張。蘇聯曾經在聯合國憲章裏鄭重保證不「以武力的威脅和武力的使用去妨礙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出以其他任何不符合聯合國目的的方式。」

德國東部也像德國其他部份一樣，只是暫時由佔領軍佔領，到和約成立後，佔領期間即告終止。假若蘇聯在大多數盟國都已成立和平後仍把軍隊駐在那裏，即可證明他們是想把僅在佔領期間劃歸他們佔領的領土永無限期的佔領下去。這種行動構成對於世界和平的威脅，因此聯合國應要求蘇聯從德國撤退。但人們也許又要說，蘇聯可以對安全理事會的任何行動實行否決。

因為我不相信，如果沒有人願意去實行，而竟建議一種行動的方針是明智的事，我們討論萬一可能發生的意外乃是正當的。我們絕不可開始那種我們還沒有準備去完成的事情。

我可以說，第一我就不相信蘇聯會迫使我們非採取最後的手段不可。我相信蘇聯絕不會置身於和會之外，因而使其自己對世界的其餘各國孤立起來。縱然會如此的話，我相信蘇軍也不會想永久地佔領整個的德國東部。然而假若我的判斷錯誤，他們真是要永久佔領德國東部，並否決安全理事會教他們撤退佔領軍的指令，我們必須準備負起顯然那時應屬於我們的責任。假若我們的行動還能有效的話，我們自己的心裏必須明白認識，也應讓一切的人們明白認識，假若我們是被迫而出此，爲了世界和平，我們是願意採取這些最後手段的。

但所謂「我們」我不是僅指美國。美國絕不願實行孤立的和平。這種道路我們以前已經走過一次。我們要實行集體的和平——假若可能，要與所有的盟國實施和平。但假若不可能得到一切國家的合作時，我們也要儘可能的多多爭取那些願意參加這種工作的國家的援助。

在聯合國憲章裏，我們全都保證「要聯合我們的力量以保持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並「採取有效的集體行動以防止及除去對和平的威脅，以壓制侵略的行動或其他破壞和平的行動。」某一個國家的否決權絕不會解除我們其餘各國所應負的這些責任。這是我們必須準備去實現的保證。

我希望、相信、並且我祈禱，蘇聯的領袖們不會迫使我們走上這條最後手段的路。但他們必須知道希特勒所已經知道的教訓——即全世界絕不允許某一個國家否決世界的和平。

第十一章 走向亞洲的和平

我們千萬不能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太平洋開始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在美國密蘇里軍艦上結束的那幕戲劇的第一幕，就是在一九三一年同月在滿洲開始的。跟着來的有一九三五年的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一九三七年的日本進攻中國和一九三九年的希特勒侵略波蘭。它們對我們美國人所引起的注意雖各有不同，然而這一切都殘忍地引導我們走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悲劇。

如果我們把歐洲當作可能的世界戰火的火絨箱，那末我們必須把亞洲看作一團醞釀之火。世界文明已在亞洲遇到一項偉大任務，這就是要把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大批人從中世紀帶進原子能的新時代。

在中國，很不幸的，一個戰爭的結束已帶來了另一個戰爭的開始。至少在目前講，我們在中國的誠懇努力已告失敗。但日本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已有令人興奮的進展，而可以與其早先迅速吸收現代文明的種種技術相匹敵。

少數財閥家族對日本經濟封建式的控制已被禁止，國教和崇拜天皇為神的事已經取消，人民已有權組織並自由選舉其代表。凡此種種以及其他各種改革都是走向民主社會的一個開端。這一切和實行這一速度都與通常人事的慢調成一反比。這種進展大部份應歸功於麥克阿瑟元帥的精明管理，但我相信一部份也應當歸功於我們的決定，因為我們已決定在我們的條件下維持天皇制，同時又把它當作執行盟國最高統帥的指示及政策的工具。

當我就任國務卿之初，我就獲悉國務院在日本投降時對我們應否堅持取消日皇的各種不同見解。在

赴波茨坦會議以前，我就獲得各種不同見解的備忘錄。這些備忘錄都放進了小皮包中，這個皮包包充滿了太平洋的和戰問題。

杜魯門總統和史達林大元帥在七月十七日的初次會談時，就開始討論蘇聯加入對日作戰問題。史氏說他還沒有和中國成立協定，而這項協定乃是蘇聯對日宣戰的先決條件。他向總統說，他在會議完畢後將繼續和中國行政院長宋子文談判此事。其中迄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大連港的制度問題。杜魯門總統表示美國希望能保證大連為一自由港。史氏當時答覆總統說：如果蘇聯獲得該港的控制權，那麼大連就將獲得自由港地位。但我必須指出，依照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所成立的協議，中國是可以保持大連的控制權的。

當時我們接到報告說：宋子文已向其本國政府報告，蘇聯提出超出雅爾達協定的要求。因為中蘇談判是依照羅斯福總統的諾言而舉行的，所以我對它很為注意。我很怕宋子文若果懷疑我們的態度，勢將難於抵抗蘇聯的壓力，同時也可能會作更多讓步，所以我在徵求總統同意後立即拍一電報給中國政府，說明我們不擬勸中國政府作超出雅爾達協定條款以外的任何讓步。

中蘇終於成立了協定，但事實已表現我們當時對大連的關切是很合理的。日本失敗已屆二年，但大連至今仍不是自由港。任何船隻在進入大連以前必須先獲莫斯科的進港許可證，不但船隻如此，船上的人員也須如此。

在後來一次會議中，史達林向總統和我說：日本駐蘇大使已詢問蘇聯是否願出任調人解決結束戰爭事宜。史氏說：日本此項要求並未表示日本願接受盟國要求而作無條件投降。莫洛托夫先生僅僅泛泛地向日本大使說他願在以後再討論此事。史達林說後來日本大使又致函蘇聯稱，日皇願派近衛文麿前來莫斯科，並攜來公文說明日本願結束戰爭，但盟國若要求無條件投降，則日本已決定以一切力量作戰到底。

史達林又說：蘇聯當時便致函日本大使說明其來函是一般性質的，其中並無任何特別建議，所以蘇聯不能作確定的答覆。總統表示很贊同史達林這舉動。

同時，陸軍部長史汀生又告訴我們，他已接獲七月十六日新墨西哥州試驗原子彈的報告，這報告明白表示原子彈已符合我們的最高希望，同時原子彈使用後的震盪很可能使已告動搖的敵人退出戰爭。在原子彈試驗前，我們早已決定如果這事能成功的話，那末我們一定要在運用原子彈前，先向日人提出一個最後嚴重的警告。

史汀生在七月二日已向總統提出一個明智的備忘錄，其中擬定了告日本書。總統就把這個備忘錄當作基礎草擬了一個宣言準備由中英美三國聯合發表。總統和我曾在這件事上費了一些時間。邱吉爾首相也提出幾個建議，而且也被採納。這個爲邱吉爾所同意的宣言大體都是依照史汀生所建議的，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中並未提及日皇的未來地位。這個草擬好的宣言後來就送交蔣主席徵求同意。

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會議暫告休會，因爲邱吉爾先生和艾德禮先生都要回英國去看選舉的結局。杜魯門總統就利用這個機會到法蘭克福美軍佔領區總部去旅行了一次。我也陪了他去。當總統到各地去檢閱國外的軍隊時，各地的司令官都設法叫樂隊奏「密蘇里華爾茲」曲，並且把部隊裏將校階級的密蘇里州人介紹給總統。總統像一切現任參議員或前任參議員一樣，是很有同鄉觀念的，他很喜歡這一切。同時在那天晚上他幾乎下一結論說：這次戰爭是密蘇里人打勝的。他還向我作諷刺地挑釁說：南卡羅來納州根本沒有參加戰爭。總統起先是和第三裝甲師長奚凱准將(Doyle O. Hicken)同坐一車的，後來又和第八十四步兵師長波令少將(A. G. Bolling)同坐一車。他乘的是敞車。他在每一次停下來的時候總要向這些軍官說：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在你們軍隊中發現任何南卡羅來納州人。最後開車的一等兵柏克(Warren E. Baker)實在不能忍耐了，他就回過頭來向總統說：「總統先生，我就是南卡羅來納州

人，我就住在國務卿家的轉角處。」

總統不禁大笑，他在第二次停車時馬上就把這故事告訴我。這一位年輕士兵居然在一位少將面前向總統說你是錯了，總統對他的勇氣很是欣賞。這位年輕人已表現對他本州的誇耀，同時他又表現了幫助造成我所相信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陸軍的精神。

那天晚上當我們回到「小白宮」的時候，那裏已有兩封電報等候着總統。一個是駐英大使威南特（Winant）拍來的，他報告了邱吉爾選舉失敗的驚人消息。另一個來自蔣主席，說他已同意現在大家所知道的波茨坦宣言。

這個宣言就馬上發表了，同時又以副本一份專差送交莫洛托夫先生。這宣言裏頭說：中英美三盟國的聯軍「已準備給日本以最後的打擊，」德國的經驗「已可為日本人民的前車之鑒。」這個宣言又提出警告說：集中於日本身上的力量已較用以摧毀德國的力量「大過不計其數。」

這個宣言又繼續說：在我們的決心下，我們的軍事力量的充分運用，勢必將使日本軍隊整個毀滅，同時日本本土也勢必要遭極厲害的破壞。

這宣言共有七節，其中要求日本依照這裏面的條件宣佈無條件投降。宣言又說：如果日本拒絕投降，那就要遭到極大破壞，但如果她投降的話，就可有雖屬嚴厲而公正的和平。但日本拒絕這個建議，這真是一大悲劇。

當天晚上莫洛托夫先生打電話來要求把這宣言遲兩三天發表，當我們告訴他這宣言早已發表時，他好像很感不安。第二天我就向他解釋道：我們不願把這個有關蘇聯還未對它宣戰的國家的宣言交與蘇聯而使它為難，所以我們就沒有先通知你。他沒有說他要有什麼修改，但僅說我們應該先和他商量一下。過了兩天，那是七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先生又來了。我們原已說定總統和我在那天要與史達林和

他會談一次，但莫洛托夫先生在那天對我們說，史達林身體不好。不過他已派莫洛托夫先生來和我們討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直接藉口問題。莫洛托夫說：蘇聯政府認為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由英美及其他各盟國向蘇聯提出一個正式要求，請蘇聯參加作戰。同時蘇聯還認為蘇聯在參加作戰以前，應先和中國政府簽訂協定。

這個要求又帶給我們一個難題。蘇聯和日本有一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以前和希特勒也有個同樣的條約，不過那條約已為納粹所破壞。我們不相信美國政府準備要求其他國家以不充足和不健全的理由去違反她自己所訂的協定。蘇聯在幾個月前已通知日本表示蘇聯要廢棄該約，但它的有效期限還差不多有一年。杜魯門總統對這事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都知道蘇聯在德國東部是怎樣行動的，她又怎樣的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違反雅爾達協定。所以就我自己來說，我必須坦白的承認，如果蘇聯決定不參加戰爭的話，我一定會感到滿意。雖然日本堅決拒絕無條件投降，但是我相信原子彈是可以成功的，同時它也可以強迫日本依我們的條件投降。我當時就害怕如果紅軍進入滿洲時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後來在他們退出滿洲前，我的恐懼却被證實了。

當雅爾達會議對蘇聯的參戰成立協定時，那時的軍事形勢完全不同。羅斯福總統和我們的軍事領袖都要求蘇聯參戰。他們決沒有料到我們在雅爾達協定後所碰到的各種困難。不過協定已經成立了，我們也必須守約。

柯衡和我會費了好幾個鐘點來決定如何才能使總統很恰當的答覆蘇聯的要求。柯衡建議我們應促蘇聯政府注意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

總統也贊同他的意見。那時已經深夜，僚屬們已經走光了。我就以柯衡的建議作根據，在打字機上

草擬了一個覆文，後來總統就批准了這個覆文。

這覆文首先提到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中英蘇美所簽字的莫斯科宣言。那宣言裏頭說：「爲了在秩序和法律還未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還未成立以前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計，中英美蘇應相互諮商，同時在必要時還得和其他各聯合國諮商，以便代表世界各國採取聯合行動。」覆文中又指出：擬議中的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六條已規定在憲章未生效以前，四強必須繼續以莫斯科宣言當作行動的基礎。覆文又引證憲章第一百零三條說：「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總統覆文的結論是這樣的：

「憲章雖然沒有正式批准，但它已在舊金山經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代表的同意，同時蘇政府也將爲安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在我看來，依照莫斯科宣言的條款以及上面所說的憲章規定，蘇聯似乎應當表示願與目前對日作戰的各國諮商及合作，以便代表世界各國採取聯合行動以維持和平和安全。」

總統後來告訴我說：史達林對這個答覆表示非常欣賞。其實他也應當如此。蘇聯宣佈參戰的那個聲明並未提到憲章第一百零三條，但我們却代莫洛托夫發現了這一點，這諒將使蘇聯的歷史家們誇耀蘇聯的對日宣戰，是蘇聯嚴格遵守國際條約的一貫作風。

我們在八月七日下午回到華盛頓。在六日我們已經在船上接到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我們到華盛頓的第二天，第二顆原子彈又落在長崎，而蘇聯也在同日向日本宣戰，自八月九日開始生效。八月十日清晨，我們從瑞士政府那裏接到日本的來電，說他們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件，「但附有一項諒解，即上述宣言中不包括任何足以損害日皇作爲最高統治者的特權的要求。」

這電報是晚上來的，總統和我到清晨才知道。我立刻跑到白宮，不久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也都來了。李海軍元帥要求立刻接受日本的建議。我向總統說：我要稍費一點時間來考慮覆文。

我說：「我看不出爲什麼我們要在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上表示讓步。這項要求是在原子彈還沒有投下，蘇聯還沒有參戰前向日本提出的。如果我們要接受條件的話，那也應由美國來提出而不能由日本提出。」

總統同意我的意見，並且要求我草擬一個覆文。

我就在我的辦公室裏草擬了一個覆文，一小時後我把這個草擬好了的覆文交給總統，總統也贊同我的覆文。在當天中午時候，陸軍部長史汀生打電話來說：他已經看到這個覆文了，而且非常贊成。覆文說：

從投降時起，日皇和日本政府治理國家的權力都應當受盟國最高統帥的節制，最高統帥將採取他在執行投降條款時所認爲適當的各項步驟。

日皇必須授權和保證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簽訂執行波茨坦宣言條件時所不可少的各項投降條款，同時日皇必須命令各地日本陸海空軍當局以及他們控制下的一切軍隊停止積極行動並交出武器；同時又須發佈盟國最高統帥爲了執行投降條款要求其頒發的其他命令……

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應依照波茨坦宣言由自由表達的人民意願建立之。

我們的覆文是在八月十一日發出的，我們都急迫的等候日本的反響。我深信日本會接受這覆文，但我對千萬人的生命所存的一種責任感，是難於逃避的。我當時就打電話給我們的駐瑞士公使哈里遜 (Iceland Harrison) 請他一接到日本的回音立即就通知我，而且要同時說明日本是否願接受無條件投降。同時我希望能節省密碼電報所耗費的時間。

八月十四日早上四點鐘後幾分鐘的時候，我的電話來了。這個電話終算結束了我有生以來的最長一次等待。哈里遜把日本照會的內容告訴我後，我立刻請陸軍部接通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的無線電報，隨後我就馬上趕到五角形大廈（Pentagon Building）和三盟國的外長在自動打字電報機上彼此交談。我把哈里遜的消息告訴他們，並說我們認為日本的覆文已等於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我還建議一個同時發表這消息的時間。電報機上發出了許多不同的答覆，我知道我不能使他們馬上意見一致。

但在另外一方面說，我認為我們不應當為了爭辯發表消息的時間而使全球人民一時聽不到這個愉快的新聞。所以我就停止討論而乾脆的聲明杜魯門總統將於美國東部戰時時間下午七點正宣佈這投降的消息，這似乎是最合適時間；同時我又請他們三國政府同樣宣佈這個消息。五點半的時候，我就把談話經過報告總統，同時又獲得總統對各項部署的批准。六點鐘時，瑞士公使館代辦葛拉斯里先生（Max Grassli）到了我的辦公室，帶來了由橫貫大西洋的電話上轉給我的日本覆文。再隔一小時，杜魯門總統就宣佈結束全球上最可怖的一次戰爭。

關於日本在投降前的一切，以後自會有人原原本本寫出來的。就我們所獲得的文件以及對若干高級官員的訊問中看來，日本在投降前五週，顯然還不知道史達林的意向。事實上，日本的不知道蘇聯會參戰，正好像蘇聯在德國入侵五週以前還不知希特勒的意向一樣。這又好像我們在珍珠港事變五週以前還不曉得日本的意向一樣。

在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訪問莫斯科以前，日本始終沒有對蘇聯起什麼懷疑。當時日本外務省大臣東鄉還說：「我們知道莫斯科對宋子文招待得很好，我們也知道他已和史達林會談，他們或許會成立什麼條約。」他還很詫異地說：「甚至有人在說蘇聯不久將參加對日作戰。」這可表示即使在那個時候，日本人的情報還不十分有效。

當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向莫洛托夫提出調停要求時，日皇顯然已知道他們的目標已經毫無希望了，不過日皇的顧問却還很相信他們可以保持日皇，同時也可以保留一些已經被他們征服了的土地。

從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致外務省報告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佐藤實在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名勇敢的代表。他通知日本政府說：政府給他的電文的性質太普及了，蘇聯不會予以考慮；蘇聯對那些文辭美麗而無內容的東西是不會相信的；所以，日本若不準備投降，那末它對蘇聯政府意見的探聽必將會徒勞無功。

佐藤向日本外務省說：蘇聯會堅持德國的無條件投降，所以它一定會聯合英美堅持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他說他知道他的見解是不符合日皇的命令的，但即使是「大不敬，我還是希望能保持不必要赴死的千萬人民的生命。」他強調「日本除無條件投降外已別無其他選擇。」

若日本政府能接受佐藤的意見而無條件投降，那末我們就不需投擲原子彈了。但日本軍閥大呼要獲得談判式的和平，所以佐藤的忠告未被埋會。七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向佐藤說：

「我們不論在什麼情形下都不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即使戰爭尚須拖延，我們尚須流血，但祇要敵人要求我們無條件投降，那我們就要遵照日皇命令一致作戰到底。」

日本政府所以不與瑞典瑞士接頭而與蘇聯接頭，它的目的是在向蘇聯表示日本準備全部應允蘇聯在遠東的要求。他們希望在答應蘇聯的要求後能在談判中得到蘇聯的幫助。他們又希望能藉此斷定蘇聯是否將參戰。

· 但日本內閣一直到原子彈轟炸廣島後才決定投降。

從日本外務省紀錄中，我們知道蘇聯駐日大使於八月十日會向東鄉提出照會，聲明蘇聯同意波茨坦宣言，並聲明對日本戰爭狀態的存在。東鄉也將那天早上經瑞士政府發出去的電報副本一份交給蘇聯大

使，請他轉交與蘇聯政府。這就是那個聲明日本願投降然須以不損害日皇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特權為條件的電報。我便於十一日答覆那電報，結果日本就在十四日投降。

日本投降得比我們所預料的要早，但我們對它的投降並不是毫無準備。國務院和陸海軍兩部代表早已組成了一個聯席委員會在那裏準備各種有關投降和佔領事宜的一般命令。但我們立刻就碰到了一個難題。這就是：誰來接受日本的投降呢？

四強已商定由麥克阿瑟元帥代表四強同時也代表美國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海軍的官員們不久即對這個佈置表示非常不滿。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提出他的理由說：太平洋戰事主要的是海軍的表現。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一島一島的從珍珠港一直推進到東京，他們已經擊毀日本的海軍。那麼麥克阿瑟可以代表盟國簽字，但美國應由海軍元帥尼米茲(Nimitz)代表簽字。我會做過參議院海軍撥款委員會主席，這或者影響了我的意見，不過我對福萊斯特爾先生的意見很表同情，我希望海軍能在其中參加一個角色。雖然一切佈置已經確定，但我仍答應福萊斯特爾說我要設法使尼米茲元帥和麥克阿瑟元帥一同參加簽字。

當福萊斯特爾部長真正對某事發生興趣的時候，他是不願睡覺的，而且他還不讓人家睡覺。那天晚上他用電話把我叫醒，他向我建議得降典禮應在密蘇里號戰鬥艦上舉行。我知道陸軍一定要認為這是海軍的詭計。如果他祇建議「一艘戰鬥艦」那一定是會發生爭論的，但他既已指定了密蘇里號，我知道這件事已可定妥了。總統在聽到這建議後當然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的好的意見。這樣就避免了陸海軍間的大磨擦。

但蘇聯人民或許不會知道福萊斯特爾的勝利。因為，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時，史達林在聖誕前夕請我們去看了一個蘇聯陸軍進入滿洲的電影。這電影表示日本作戰準備的目標僅在蘇聯；這裏頭又表示滿洲的人民熱烈歡迎蘇軍；最後則有和約簽字的情形。照這個電影看來，參加受降禮的主要代

表就是蘇聯和日本。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根本沒有在電影中出現。這一張影片的名字就叫「戰鬥艦上簽字投降條款。」它既未說明這條艦叫做密蘇里號，甚至沒有說明這是一艘美國的戰鬥艦。這整個的電影可使很多蘇聯人的印象中認為日蘇兩國在蘇聯戰鬥艦上結束日蘇兩國的戰爭。這使我瞭解蘇聯是極注意電影宣傳的效率的。所以我聽說現在蘇聯正在歐洲各國提倡放映蘇聯影片時，一點也不感到詫異。

我們已担任摧毀日本軍力的主要負擔，我們常常認定這戰爭是一個反軸心的整個戰爭，同時也認定佔領日本應當是盟國的責任。八月廿二日，我們邀請中英蘇三國與美國共同設立一個十國顧問委員會來執行波茨坦的宣言目的和投降條款。蘇聯和中國都馬上表示接受，但英國則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委員會僅有顧問的權力。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希望獲得較有決定性地位。因此委員會的成立就告延擱了。

九月中，外長會議在倫敦開會時，我就開始和貝文先生談判以求解決歧見。但我們還沒有進展多遠，又有新的問題插進來了。莫洛托夫先生忽奉莫斯科的指示來看我。他竟欲抨擊執行投降條款的方法，他特別對日本陸軍復員的方法表示不滿。他說：如果祇解除日軍武裝就讓他回國，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們應當把他當作戰俘扣留起來。美國應以蘇聯處置滿洲日軍的方法來處置這批人，這就是要他們工作。

我就對他說：在蘇聯所參加的波茨坦宣言中已保證「日軍在完全解除武裝後，應准其回國，同時也可准其獲得過和平與生產的生活的機會。」我向他保證我們將扣留一切戰罪嫌疑犯，但我們不願用俘虜來替我們工作。

沒有一個人能精確地說蘇聯一共帶去了多少日本戰俘。在一九四七年年中，最恰當的估計說約有五十萬人，運輸的困難會延緩我們的日本戰俘的回國時間，但他們現在都已返國了。我們自己一日扣留日本人或德國人，就很難堅持我們的盟國應遵守日內瓦戰俘公約和波茨坦宣言中的更明顯諾言。我在前面

某一章已經說過我們如何努力遣返德俘。波茨坦宣言中關於戰俘的積極聲明使利用日人爲奴隸勞工甚至更不可寬恕。」美國現在正應當要求它的盟國履行波茨坦宣言。

在倫敦，當莫洛托夫先生說應當把日本人關起來的時候，他甚至表示很怕我們的政策將使日本的侵略又告復活。助理國務卿鄧恩就對他說：我們建議設立遠東委員會可以使蘇聯政府有機會表達對日政策的意見，其中包括解除日俘武裝等問題。我也說：我認爲我們應當對日本來一個與對德條約相同的廢止軍政的條約。我向他保證我回國後一定會和杜魯門總統討論這事。

我們雖然已向他提出保證，但兩天以後會議開會時莫洛托夫先生仍宣讀他所準備好了的聲明。這聲明建議設立一個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這委員會包括美國、蘇聯、英國、中國、而由美國代表當主席。這委員會可有很大的權力，而且要比貝文所提議的大得多。在兩次冗長的會議中，我始終極力反對在議程中列入設立對日管制委員會這個議題。其他各國外長大體也支持我的意見，因爲他們都急於進行對歐各國和約，而莫洛托夫先生的要求，又似乎是他的拖延運動的又一階段。

九月二十六日，貝文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答應了我的要求來和我討論法國和中國是否有參加會議的各種討論的權利，以便解決我們對這一件事的不同意見。莫洛托夫先生立即轉到蘇聯所提設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建議上，他說：麥克阿瑟元帥現在所採取的政策已使我懷疑「蘇聯政府繼續派一名代表駐在東京是否有用。」我再三對他說：在這次召集來開始從事歐洲條約的擬訂工作的會議中，沒有準備討論日本問題。我重新對他保證說：祇要我一回國，我就會馬上澈底研究這問題，而且一定會和他通消息。

他說：蘇聯代表團不瞭解爲什麼在這次會議中不能討論這問題。他想探問報上所傳美國在日本發現價值一二十億美元的黃金一事是否和今天的局面有關。

如果這問題是英國外相，法國外長，或者中國外長提出的，那我們一定要認爲這是蓄意污辱，但從

這個問題被提出的方式看來，以及從蘇聯在各處的行徑看來，我知道莫洛托夫先生並沒有污辱他人的意思。

莫洛托夫先生在波茨坦的時候曾經承認蘇聯軍隊已經任意大規模地遷走德國財產，他還建議他的賠償要求可減少十億美元以抵補這些財產。他在波茨坦時雖對這件事有些感到難以爲情，但紅軍幾個禮拜以後又在滿洲幹起這一套來了。蘇聯在它的盟國中國境內已遷走一切所可遷移的東西。所以我們很可以瞭解莫洛托夫先生在看到美軍發現價值二十億美元的黃金的消息時候（這個消息後來證明是不正確的），他一定預料我們也在幹紅軍在同樣情形之下所將幹的那一套了——先把黃金搬走，同時在沒有將它在美國好好藏起以前，拒絕談到日本問題。

在倫敦，我有一次和莫洛托夫先生私人談話時，又努力了一番，設法使他相信遠東顧問委員會的設立，是考慮如何指導佔領日本的第一步工作。但我的努力沒有成功。

同時我也老在那兒要求貝文先生同意我們八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設立遠東顧問委員會的建議。我又非正式地同意當這委員會開會時，我們要支持准許它在東京華盛頓二地開會，以及印度應當爲該委員會委員的一項建議。英內閣當時就命貝文先生接受我們的建議。我獲得英國的同意後，就希望莫洛托夫先生能撤消他的新建議，再回到早先那樣的同意我們八月二十二日的建議。我立即給他一封信，說明四強現在已同意，所以委員會應於十月三十日開會。我希望蘇聯能派一代表出席。他回答我說：自從蘇聯同意八月二十二日的美國建議以來，各種局勢已經變更，現在他的政府要求成立一個管制委員會。當我啓程回華盛頓的時候，我還不能斷定蘇聯是否會有代表出席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

這種局面是我們和蘇聯整個關係中的一部份，一九四五年十月時，我始終被它弄得深爲不安。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對我們的各項問題繼續互通消息，那麼它們也許會調協的。但在這幾個星期中，我們一點

也不通消息。

我認爲聰明的辦法是假定蘇聯無過，因爲我們很希望能在締造和平的工作上獲得進展。於是我就把我們主張召開一個對歐洲條約的和平會議的建議加以修改，我們認爲這個問題是使倫敦外長會議成爲僵局的主要原因。我希望把這個建議送給史達林，他那時正在休假。但送給一國政府首腦的信一定要由總統簽字，所以我就草擬一信請總統令駐蘇大使哈里曼親自交給史達林。總統把那封信寫得非常誠懇。

十月二十五日，哈里曼就到加格里（Garry）去訪問史達林。他讀了總統的信（已譯成俄文）後就向哈里曼說：「日本問題倒沒有說到。」

我接到哈里曼來電後，立刻知道我們已在倫敦估計錯了。那時我們以爲莫洛托夫使用阻撓策略背後原因是和會問題，現在史達林的答覆已使我們認清他們實在更痛恨關於日本的問題。

哈里曼也同樣詫異，幸而他和我們一同到過倫敦，所以他能向史達林解釋我們八月二十二日建議的詳細內容。他明白表示他並未受權談判日本問題。他又說他知道我急欲想出一個辦法，與蘇聯政府和其他各盟國就對日政策互通消息互作諮詢。但如有不同意見，美國在執行佔領政策方面將不受干涉。

哈里曼雖然能把話題轉回到和會上去，但史達林心中仍舊最惦念日本，他第二日與哈里曼談話時，一開頭又重新提到日本問題上去了。

他說他不願意派代表出席遠東顧問委員會將來的會議，因爲正如莫洛托夫在倫敦時所說的，自他們接受該邀請以來，各種局勢已有改變。史達林在事實上已召回蘇聯駐東京代表狄里夫揚柯，因爲照他說，狄氏在東京既不能獲得消息，又無人和他諮商，在這種局勢下，他當然不能對麥克阿瑟以盟國名義所採取的各種行動分擔責任。

史達林說，蘇聯已被人家當作一個附庸國而不把她當作盟國。這當然不稱蘇聯的尊嚴。他說：佔領

當局竟允許日本報紙和廣播詆毀蘇聯；日本政府的改組既不通知狄氏又不和他諮商；日本各銀行被封閉時又不發表資產處置的消息。

哈里曼就解釋道：麥克阿瑟元帥是在執行蘇聯政府所同意的投降條款，一切資產都將暫時扣留而由盟國作最後處置。哈里曼還說明在簽訂投降條件以前，我們早就建議設立顧問委員會，以考慮史達林所恰恰提到的那些事情。哈氏要求史達林派代表出席華盛頓的遠東顧問委員會，因為蘇代表在那裏就可得到蘇政府願意得到的情報。

史達林並不滿意。他說他在東京的代表既直被當作「一件擺設品，」如果他再派一代表到華盛頓去，說不定會更有其他的歧見發生。他堅持說，如果美國願意和蘇聯成立協議，那麼這事祇能由我們兩國政府來開談判才能適當完成。他叫哈里曼注意蘇聯在戰爭中曾在滿洲邊界保持三十至四十師軍隊，牽制日軍達七十師之多。如果他們的建議被接受，那麼這些軍隊早已準備來協助佔領日本了。

因為將來討論對日本和約時，無疑我們一定會時常聽到這種說法，所以我要在這兒說明，即使史達林說的都是真話，事實上滿洲邊界上所留的三四十師軍隊並不對日軍的作戰努力有嚴重影響。由於美國海軍順利作戰的結果，日本在作戰早期已缺乏船隻來運輸軍隊和供應品到太平洋各戰場去。日本這些軍隊既然都難於移動，所以日本人把它放在滿洲邊界或其他各地一樣無關宏旨。想像得到的是，日本可以把這些軍隊用在中國大陸上作戰，但現在我們知道這實在也不足影響戰事的最後結果。

當遠東顧問委員會在華盛頓開第一次會議而選舉美代表麥考（Frank R. McCoy）為主席的時候，我們剛巧接到哈里曼的談話報告。於是該會就休會一星期以便再給蘇聯一個機會，遣派代表出席。

事實上，委員會在一開頭就不能有效地推進。英國和澳大利亞雖然願意和我們合作，但他們對委員會僅為顧問性質一點很表不滿。我立刻就認清我們必須想出一個方法，一方面要使麥克阿瑟不受過分的

干涉，另一方面又要滿足我們盟國想作更廣泛參加的願望。

我們經過了很多次的會議和爭辯，最後才議定了一個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委員會的建議草案。這個建議經總統批准後，我在十二月十六日的莫斯科三外長的第一次會議中提了出來。這個建議的討論一共經過六次會議，主要問題就是：莫洛托夫先生的反對印度參加遠東委員會；他的希望在盟國委員會中加入「管制」兩字；以及貝文先生的要求在盟國委員會中包括澳大利亞；最後是遠東委員會的表決程序問題。

起先我怕協議延遲太久，我們在休會以前不能得到中國的同意。但莫洛托夫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忽宣佈他願意讓印度加入遠東委員會。大家又協議委員會的表決應採取過半數制，但必須包括中英美蘇四票。貝文也同意在東京盟國委員會中英聯合王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祇共派代表一人。

新成立的遠東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在華盛頓開始工作。該會有權決定管制日本行政的原則，它的決議應由美國政府製成指令交給盟國最高統帥。這就是說沒有任何基本政策，不經我們同意便可以採納。同時，在委員會還沒有協議前，我們可以對一切緊急事務自由發佈臨時指令。

但有三項問題不在這權力的範圍以內。對於這三項問題，委員會必須以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表決來決定。它們是（一）改變投降條款所規定的管制制度，（二）日本憲法結構的基本改變，（三）與調換個別官員有別政府整個變動。我們的政策並不想專斷日本政府的大批人事更調，同時麥克阿瑟元帥調動個人或填補空缺的權力並沒有受到損害。

盟國委員會現在仍繼續供東京盟國最高統帥的顧問和諮詢。當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委員會成立時，我會聲明遠東委員會不能因在政策上不能獲致協議而阻撓麥克阿瑟的權力，盟國委員會也不能因對執行政策所提供意見不能一致而阻撓參帥的權力。現在差不多快要滿二年了，事實已證明這兩個機構的確沒有

干涉麥克阿瑟的管理權。麥帥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們在繼續執行着艱難的工作，他們所表現的效率已獲得美國以外的其他各盟國人民的稱讚。

在莫斯科會議時，莫洛托夫先生心中還有其他各種關於日本的問題。他首先詢問處置日本海軍的辦法，第二又問到處置日本冬島的辦法。在莫斯科會議前兩三個月，我們已建議日本海軍所剩下來的一切船艦都應當擊沉。英國和中國都同意我們的建議，但莫洛托夫先生却說，蘇聯政府要求獲得驅逐艦以下一直包括噸位較小的船艦在內的海面軍艦的四分之一，他還要求獲得日本的商船隊。海軍部長福來斯特爾會說過蘇聯所要求的海軍船艦沒有什麼實際價值，我們獲得福來斯特爾部長的同意後就答應了莫洛托夫的要求，而未會和他爭論。但我告訴莫洛托夫先生說，日本商船隊是要用來遣送日人回國的，同時我們認為這事最後應運同日本賠償問題，一併加以考慮。

我不知道為什麼莫洛托夫先生覺得必須再在會議中提出這問題，除非是他要我在其他各外長前重申我們的立場。他顯然不知道我已把送與他的同樣照會送與其他各外長了。他的另一個動機或許是想製造機會要求獲得一部份日本的漁船。貝文先生立即就說明漁船對維持日本糧食供應是極重要的。日本人雖然戰敗了，但「他們必須設法繼續活下去。」

於是，莫洛托夫先生又轉到日本的委任統治島嶼的問題。

我回答他說，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確定意見，同時除了有兩個協定會經討論到太平洋的日本島嶼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協定。第一就是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它規定日本必須交出靠征服而獲得的土地。第二就是推爾達會議關於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的協定。第二個協定我是在就任國務卿數星期後才知道的。貝文先生說：英內閣在推爾達協定訂立後好久，才知道有這協定，不過他們沒有意思要食言。

在莫斯科會議後以及一九四六年的大部份時間內，我們都在積極研究如何處理國際聯盟委託日本統治的這些島嶼問題。十一月紐約外長會議開會前不久，總統就召開了一個國務卿和陸海軍兩部長的會議來決定我們的政策。

國務院和陸軍部認為，因為日本是由於受國際聯盟的委託而獲得這些島嶼，我們的權力並不高於國聯所委託的權力，所以如果可能的話，聯合國應當宣佈它們為戰略區，再依照聯合國託管協定由我們來管理。舊金山會議時，美國代表團在羅斯福總統指示下會堅決提倡託管制。我們認為我們不能適當地採取足以表示我們對我們自己向聯合國極力陳說的制度缺乏信心的任何政策。日本已違反了它的委託書，所以我們可設法向聯合國求得有關這些委任統治島嶼的決定；至於屬於日本的那些島嶼，像琉球羣島，則應留待和會處理。

海軍部長非常講理，他並不要求我們做出足以表示對聯合國缺乏信心的行動，但他總想到美國為這些島嶼而犧牲的生命代價，所以他希望要確定將來的條款一定准許海軍在這些島上保持若干適當的基地。他只怕將來談判一旦開始時，國務院的下級官員們或聯合國的美國代表或將妥協並接受足以危及適當基地保持這些基地的一種辦法。我就向他保證若沒有總統和國務卿的批准，決不會接受對美國建議的任何變更，他說他很滿意這個託管建議。不久以後，我們幹練的聯合國代表奧斯汀先生就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了我們的建議。

外長會議在紐約開會時，正值聯合國大會也在開會，有不少託管建議都在等候通過，大家都希望聯合國託管理事會可以成立。

憲章中規定每一託管協定必須為「直接關係國家」所能接受。我主張各戰略地區的託管協定須由安全理事會通過，而美國為現在佔領各委託統治島嶼的國家，所以美國是有「直接關係」的唯一國家。大

會託管委員會美國代表杜勒斯認為「直接關係國家」的定義，應當等到託管理事會成立以後再確定，但蘇聯代表諾維科夫大使(Nikolai V. Novikov)堅決反對。

莫洛托夫先生要求我同意在任何問題中都應當把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作「直接關係國家」。他建議五強應換文證實這種諒解。他說蘇聯可能不致反對美國對日本委任統治島嶼的戰略性託管建議，但蘇聯政府希望能成立協定規定各種託管建議必須經五常任理事國通過。他說如果能這樣做的話，這屆大會就可通過兩三起託管協定，那麼託管理事會便可以組織起來。

我回答他說：關於「直接關係國家」的定義是聯合國本身對憲章解釋的問題，不應成爲我們兩國政府間的雙邊協議的題目。我當時答應我在考慮千島羣島與南庫頁島之最後處理辦法時，一定會記着他的立場。這句話立刻引起他的反響，他說蘇聯不擬對千島羣島和庫頁島實行託管辦法，這些事已在雅爾達解決了。我又對他說，羅斯福先生在雅爾達時會再三聲明土地僅能在和會中讓與蘇聯，他僅同意在和會中支持蘇聯的要求。我說：現在可假定我們將遵守羅斯福先生的諾言，我們自然希望知道在和會開會時蘇聯對美國建議將日本委任統治島嶼置於美國託管下的態度。莫洛托夫先生很快就領悟了這句話的含意。後來安全理事會表決美國的託管協定時，我很高興看見蘇聯代表贊成我們的建議，但我並不感到詫異。

在莫斯科討論中很佔重要地位的另一遠東領土問題就是朝鮮問題。

中英美三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已在開羅議定「朝鮮應當及時成爲自由獨立的國家。」在雅爾達時，羅斯福總統和史達林委員長會也非正式同意朝鮮應贏得其獨立，但若須有一個過渡時期，那就應當託管。朝鮮受日本的剝削已達四十年。日本僅允許少數朝鮮人受教育，同時不輕易使他們在工商業中佔重要地位，因爲這可以便他們獲得行政經驗。所以結果就有問題發生，結果就有朝鮮人民不知是否有

充分的訓練能立即担起政府的各項責任的問題。羅斯福總統的默許託管制，就是希望協助朝鮮人民發展各種技術和經驗，以便他們能保持他們自己的獨立。

朝鮮在事實上已分成兩部分，當我們到莫斯科時，我們就為這件事大感為難。在日本投降的時候，美蘇軍事領袖會議定在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日軍應向蘇軍投降，在三十八度以南的日軍應向美軍投降。蘇聯也接受這計劃，同時美國政府致麥克阿瑟元帥的第一號命令中也包括這一點在內。但原來為軍事便利而劃分的界線現在已變成美蘇兩國佔領區的隔絕界線了。

因此，我們的代表團就在會議中提出一個意見書，建議設立美蘇朝鮮混合委員會以便統一幣制、商務、運輸、電訊、電力分配，沿海航運等等的管理。我們又建議成立一四強託管制，其期限「不得長於容許朝鮮人民成立一獨立的，代表性的，和有效力的政府」所必須的時間。

幾天以後，莫洛托夫先生也提出蘇聯的建議，要求成立混合委員會討論經濟統一，設立臨時政府，以及建立一為期五年之四強託管制等迫切問題。為了促成協議，我們就接受了蘇聯的草案，而僅稍加修正，這草案已列入莫斯科議定書中。

但「託管制」在朝鮮人看來，不過是那在日人之下給他們帶來了很多痛苦的外來管制的延續，和他們所久已尋求的獨立的稽延而已。他們對託管建議的不滿使我發表了一個聲明：

「美蘇混合委員會與朝鮮臨時民主政府合作時，或將發現可能免除朝鮮的託管。我們的目標是在促使朝鮮早日成為國際社會中獨立的一員。」

很不幸的，這希望不會為後來的事情所證明。美蘇混合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開會討論如何執行莫斯科協定。但在我們看來是毫不含糊的文字在俄文中却顯然又有出入。在我們看來，朝鮮顯然應被視為一個經濟和行政的整體。但蘇聯將領却認為這是一個在完全分立的兩佔領區間，如何交易和如何聯繫

的問題。到今天已經過了一年半了，朝鮮還是兩個分立的佔領區，而對於建立臨時政府的進展也同樣令人失望。

蘇聯代表堅持我們在組織朝鮮政府時僅能和不反對託管的那些政黨諮商。但除共產黨外，大多數的朝鮮人都是反對託管的。美國則認為在言論自由的原則下，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表示反對意見便不去和他諮商。我們堅持必須和各政黨代表會談；這事的結果，是使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陷入僵局而休會。一九四七年的春天，馬歇爾國務卿在莫斯科總算設法把混合委員會的談判恢復起來，但這些談判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產生出任何具體結果。

美國佔領區內，朝鮮人正在很快的在行政上代替美國人的位置。臨時立法議會已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舉行第一次會議。這議會共包括四十五名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和四十五名指定的代表。它的目的並不是在鼓勵朝鮮成立兩個分立的政府，而是在為朝鮮人準備使他們負起自治的責任。

將來臨時政府成立後，我十分希望蘇聯能建議撤消美蘇混合委員會，同時取消擬議的託管時期。而第二點建議一定會特別獲得朝鮮的民心。不過蘇聯說不定還有別種目標存在心裏。在蘇軍佔領區內，紅軍已訓練了一支朝鮮陸軍，據估計數目約有十萬至四十萬人。混合委員會和美蘇的佔領軍撤退後，這些受蘇聯訓練的軍隊便是朝鮮唯一有效的軍隊了。無疑的，不論那時成立什麼樣的政府，這支軍隊一定會設法控制這個政府的。因此，我們必須要求蘇聯解散這支軍隊作為撤銷混合委員會的條件。

朝鮮並不需要受蘇聯訓練或者受美國訓練的軍隊，她所需要的是經濟援助。蘇軍佔領區內的肥料工廠都已被日人改為製造炸藥。蘇軍司令拒絕以充足的肥料運到美軍佔領區去。因此，如果要使美軍佔領區內的那些已經用得過度的土地能夠再生產的話，那就必須馬上輸入肥料。

朝鮮的工廠需要恢復。這就需要煤，原料，和替換零件。假使混合委員會再維持二年或三年而美國

代表能監督財政援助，美國或許可給它以推動朝鮮工業機構時所必需的援助。

美國和蘇聯都有使朝鮮成爲一個統一，獨立和民主國家的諾言。我們在沒有履行這項諾言以及朝鮮還不能以主權平等地位列入聯合國以前，我們的政府必須繼續注意朝鮮問題。這是走向亞洲永久和平的重要步驟之一。

另一件重要的步驟就是及早訂立對日和約。兩年來的佔領經驗已使我們獲得精當的判斷基礎。在麥克阿瑟元帥所執行的政策下，日本已有很大的進展。現在我們正應當協議和約條款，以便使日本人民瞭解他們的前途，而在盟國所規定的計劃下開始他們的善後工作。

正如我在討論德國問題時所提的理由一樣，我不認爲外長會議應該準備初步的對日和約草案。在日本第一次表示願意投降前數小時才參戰的蘇聯，不應當對那將給它以否決權的和平機構極力堅持。在另外一方面講，像澳大利亞那樣一個政府——它的軍隊是從珍珠港事變起一直打到日本投降時止——覺得它在對日和約中應當比在草擬歐洲五國和約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本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應立即宣佈我們認爲應當召開一個和平會議，而且規定一個較早的日期。委員會中十一個國家都是在對日作戰中有大量軍事貢獻的國家，所以也是應當準備和約初步草案的國家，這十一個國家由於參加委員會的工作，將近兩年來一直是在仔細考慮各種日本問題。他們一定可以毫無困難地準備一個和約草案交給和會來考慮。

和會應當包括所有對日作戰的國家。

草擬和約的國家與和會的決議都應由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即包括會有大量軍事貢獻的十一個國家中的三分之二，或其中的七國。當然我們要力求一致，但三分之二應可作決定，並且根據這些決定而商得的條約應交各國政府簽字。當然，否決權是不能完全取消的，因爲我們總不能強迫和會中的任何盟國

在條約上簽字。不過這個國家也不能阻止人家的簽字。

凡不願接受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的政府，將仍和日本處於一種技術上的交戰狀態中。然而我相信對日和約應和對義及對巴爾幹各國和約一樣，要規定任何拒絕簽字的政府將不能獲得條約中所規定的任何利益。

如果採用了這裏所建議的程序，我們當然將對我們所不同意的任何條款放棄我們的否決權。這就對擊敗日本負有大部分責任的國家講，將是一個慷慨大度的表示。這也可表示我們對各盟國的信任，同時又表示我們深信可用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成立一些令人滿意的關於處置日本的協議。

在草擬和約時，對領土問題應當沒有嚴重的爭執。美國無疑要履行羅斯福總統對千島羣島和庫頁島的協議，我看不出有任何反對日本保留琉球羣島中大琉球島以北各島嶼的意見。大琉球島以南各島，我希望能把它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為了情感上的理由，美國希望在大琉球島獲得託管之權。

賠償問題一定是最複雜的問題。遠東委員會在討論賠償問題時，蘇聯代表堅持在滿洲遷走的工業設備不得列入任何賠償方案中。蘇聯堅持這些遷走的設備都應當作「戰利品」。某一位蘇聯代表會估計這些遷走的設備共值九千七百萬美元。但美國的賠償代表鮑萊根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調查結果，估計直接損失超過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同時全部損失（包括毀損和復置費）則超過二十億美元。

蘇聯的立場是很難辯護的。這些工業設備當然應包括在賠償協定中，決不能算是戰利品，因為其中並不包括作戰武器。要把這些東西歸還滿洲實際上已辦不到，但在補償損失方面，我們最少能做到把它算成蘇聯分得的一份賠償品。

我們已在遠東委員會中採取這種立場，我們已得到其他九國的支持，但是蘇聯由於使用否決權，已能在委員會中阻撓這行動。

在對日和會時，我們應當與對德的建議相同，提出一個四十年條約，以便保證廢止日本的軍政，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有任何違反條約的行爲，就應當向草擬條約各國的大使或公使提出報告，各該國的大使或公使將組織一個實施委員會。像在對德條約裏一樣，這委員會的決議將採大多數表決制。

在和約和廢止軍政的兩項條約中，我們必須預料到將來曾有一段長時間要被牽連在日本的事務中。倘使我們不確定目前的各種改變將成爲日本人民生活方式的永久部份，那末我們過去兩年中所獲得的偉大進展可能就會失去。在精神上解除日本人的武裝要比物質上的解除武裝難得多。要對日本人民灌輸民主的個人觀念，需要作一次大的社會革命。祇有在我們能確定日本整個的新一代人是依照這種民主思想來受教育時，這一件工作才可永久完成。若不做到這點，那末最近日本勞工們所得到的組織權利，農民們所得的耕者有其田的權利，婦女們所得到的參加社會生活的權利，以及各政黨可毫無恐懼而活動的權利，或許都會被消滅被破壞。我們必須明智地和日本的新一代人共同工作，我們必須確立一種很公正的經濟方案，以便這一代日本人能獲得安定而有機會創造一個比在舊秩序下更好的生活方式。

我對中國問題說得比較地少，主要原因是我們在中國的努力成績大家都已知道得很清楚了。很不幸的，這些成績竟表示只有極少的成功。中國雖和平還遠得很。這個偉大的國家和它數億人民的前途本來很遠大，但現在仍祇是一個希望。這一個富於人力和資源的國家竟爲內爭所分裂，這實在是當代的一大悲劇。

我們可以對中國作的一個妥當的概論，就是：中國已在大轉變的開端了。我們應當在任何可能的時候鼓勵和幫助這種轉變。中國需要美國人的那種物質的工程和人的工程技巧。如果能夠妥善而不懈的應用這種技巧，中國的轉變就可以避免成爲足以危及世界和平的騷亂。但是中國若欲求其成功，那麼運用這種技巧的創造力必須來自中國本身才行。

中國的重要性並非祇有美國知道。憑我自己的經驗和以前所發生的事情看來，蘇聯顯然很注意和它東部邊界相連的這個廣大地區。外蒙古在實際已成爲蘇聯的保護國，在雅爾達時，史達林很順利的開出了他參加對日戰爭的代價，他要和中國共同管制滿洲的兩條鐵路，要把大連作爲自由港，要在旅順設立海軍基地。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到莫斯科的時候，莫洛托夫先生不斷地努力要發現美國祕密的或別樣的對華目標，到底是什麼，這已明明白白地顯出他是非常注意中國的。

很幸運的，我到莫斯科時已爲莫洛托夫先生準備得很好了。在駐華大使赫爾利(Haley)辭職以前，國務院已準備了一個對華政策聲明。在赫氏辭職前幾天，我會把這個聲明的初次草案給他看過。後來杜魯門總統派馬歇爾元帥爲總統赴華代表後，我就立即請他來研究這個草案，希望他能夠幫助我擬定交給總統的最後聲明。

在動身赴莫斯科前的那一個禮拜日，副國務卿艾克遜(Acheson)，馬歇爾元帥，以及馬帥的僚屬都在我的辦公室中集會。經過一個上午的討論後，我們就決定了後來經總統批准而於十二月十五日發表的那個政策聲明。從此以後，除了由於馬歇爾的建議或獲得馬歇爾同意以外，總統就始終沒有改變過這個政策。

我們在斯普里地諾佛卡大廈舉行第一次會議時，莫洛托夫要求討論美國在華北的駐軍問題。我同意他的要求，並且把我所準備好了的載有駐在華北的美軍確數的聲明交給他。我向他解釋道，這些美軍都是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協助解除三十二萬五千名日軍的武裝而駐在那裏的。我向蘇聯政府保證，一旦任務完成以後，這些軍隊是馬上會撤退的。我又向他們說：馬歇爾已以總統私人代表資格到中國去協助他們促成停戰，因爲這將結束中國的內爭，同時又可以解除日軍的武裝。

第二天，我就把杜魯門總統的對華政策聲明送交外長會議。這個聲明重申美國在華北的軍隊是在解

除日軍的武裝，這項任務的完成已因中國的內爭而告延遲，這聲明又強調我們深信衝突的雙方應停止戰爭，並應共同參加一個包括各政黨的全國會議以謀國家的統一。

這些聲明還不能使莫洛托夫先生滿意，他在兩天以後又提出了那個問題，這次我就向他詳細解釋，我們對盟國所負的責任，是務使華北的日軍解除武裝，這項任務最初如何指定由中國國軍來担負，國軍如何因為它與日軍之間有共產軍插入，所以就無法完成任務，我們如何因為這項任務原已由最高統帥分派給中國國民政府，所以我們自己就遲遲沒有採取行動去解除這些日軍的武裝，因為我們大家都只承認這個政府，所以我們認為應當給它一個公允的機會來履行這項任務。我再向他保證，假如必要的話，我們的軍隊將加入解除日軍武裝的工作，以便我們的軍隊能早日回國。

莫洛托夫先生說：他認為蔣主席的政府把共產軍的力量誇張過大。他以為中國人從來不願意自己作戰，但喜歡人家替他作戰。他說日本軍隊繼續留在中國當然「不可容忍。」同時他又無情的說：經過八年戰爭後，蔣主席應當學會怎樣處置日本人了，特別是他們已經投降了。

幾天以後，莫洛托夫又恢復攻勢，建議確定一個美蘇軍隊同時退出中國的日期。我又再度向他解釋，解除日軍武裝問題和紅軍在滿洲所遇到的問題是不同的。但幾分鐘後，他又把他自從會議第一天以後所常提出的同一問題來問我了。

「莫洛托夫先生，你不斷地問這些問題，是大概因為你很喜歡聽我的聲音，」我說。「我僅能用你在每一次問我這個問題時所作的答覆來答覆你。我現在預先告訴你，如果你明天還要問這個問題，你將會得到同樣的回答。」

那天晚上我要去看史達林。我已厭於和莫洛托夫幹這例行的工作，所以我就把這問題加在準備討論的項目中。

我把我和莫洛托夫的討論告訴了史達林，當時莫洛托夫也在座。我又提醒史達林他在波茨坦時會如何聲明蔣主席的政府是中國的唯一政府，而且還說過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他回答我說：蘇聯已有條約承認蔣主席的政府，他並不反對美軍駐華，不過他祇希望能夠對這事獲得情報。他又說：倘使中國人民相信蔣主席是在依賴外國軍隊，那他就會失去威望。

我就拿幾根火柴放在桌上表示沿華北各鐵路的共軍位置，日軍位置，和國軍位置。史氏顯得很感興趣，他就問起天津區的共軍力量。我回答說：據中共領袖毛澤東稱，共軍在那裏有六十萬人，史達林聽了爲之大笑。我說國軍在華北約有四十萬人，他就指着代表華北國軍的那根火柴問我道：人家以爲蔣主席所有的一百五十萬軍隊在那兒呢？我向他說：我們的陸軍和海軍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史達林又大笑起來，他說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愛誇張的人，不但誇張敵人的力量，同時又要誇張自己的力量。他對馬歇爾元帥卻加稱讚，他說如果有人能解決中國問題的話，馬帥是一定能夠的。

由於我和史達林的談話，外長會議就在第二天對這個包括在議定書中的聲明成立了協議。這聲明重申中國政府承認中國有在國民政府下成爲一個統一和民主國家的需要，同時又聲明美蘇兩國外長「完全同意願使美蘇軍隊，在不妨礙履行其各項義務與責任的最早而可行的時刻撤離中國。」

一九四六年九月，馬歇爾元帥向杜魯門總統報告：他再次留中國似乎並無用處。總統就命令在他認爲任務應當結束時，就可立即回國。我在巴黎把我們的決定告訴中國外長，他立刻表示馬歇爾元帥的離華，恐怕會使中國人民認爲美國已對中國問題不表關心了。我向他保證我們對中國的友誼關切，但我強調說：如果國共雙方都不願接受勸告，馬帥當然不能無限期的留在中國。

我們已竭盡一切力量來保證馬帥任務的成功，馬歇爾除了他本身的偉大威望外，還加上了美國總統代表的威望與權力。在莫斯科時，我們已獲得蘇聯正式重申支持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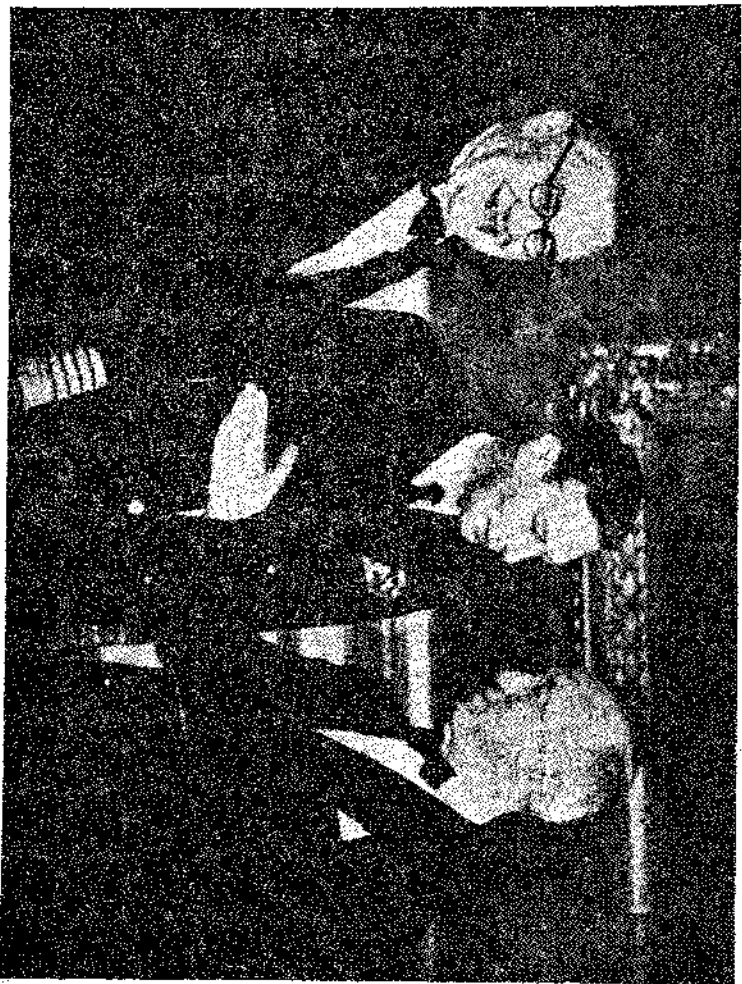
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政策聲明中也對中國人作過一次動人的諾言：

「等中國的情形有改進時，我們準備考慮援助實行……各種和內爭沒有關係的計劃，這些計劃將鼓勵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改革，同時這樣也可促進中美商人間商務關係一般的恢復。」

馬歇爾還繼續在中國努力，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為止。但交戰的雙方仍然一點也沒有更接近解決的途徑。我們那時就討論決定司徒雷登大使 (Leighton Stuart) 是否應繼續努力拉攏雙方。老練的外交官遠東司司長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 主張不必如此，因為如果馬歇爾元帥不能促成團結，我們再叫任何一官員強迫雙方接受我們的意見，那是不聰明的。我很同意范宣德的見解。

我們很多人都有干涉夫妻間家庭爭吵的不愉快經驗，同時我們也都知道，就是當雙方都不接受我們的勸告時，最好的辦法莫如不管這事。國家內部的爭吵也和夫妻的爭吵一樣。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的行動都是出於友誼的動機。如果我們仍要和他們保持友好，那我們總應當等待至少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已感到疲於爭吵的時候。在國際事件中和國內事務中，有許多時候，最好的作法是——不做什麼。

在我們處理亞洲的無數困難問題時，我們應當永遠記著我們的出發點都是一團好意。我們履行菲律賓獨立的諾言以及對獨立暹羅王國的友好行動，都可以作為那些希望擴充他們政治經濟自由的數億亞洲人民的明燈。不管亞洲將來會有什麼不可避免的改變，我們必須保證我們的行動決不會把這一團好意的源泉弄得乾涸。我們自己的安全和平，也都要看我們能否幫助亞洲的進步而定。



問他其和案議建能于原論討後會宴次一在斯納爾貝，文貝，世六治喬王英
。前之會開會大國合聯在簡，宮士姆詹聖在月一年六四九一星時普，慶

第四卷 前面的工作

第十二章 樹立人民的外交政策

這一代美國人民已經明瞭美國是世界和平與自由的主要受託人。美國所說和所做的足以影響地球上最遙遠區域的人民的生活。美國政府或國會人士的言論與行爲，常較許多旁的國家的君王及總統們所說或所做的要深入更多地方。甚至連史達林大元帥，在他與霍浦金斯的最後幾次談話中，也承認美國的全球性的利益與責任，並且說過我們的國家較任何其他國家更有理由當一個世界強國。

這種領導地位及其固有的責任，我們已經不得不勉強地領受了——兩次耗費不費的大戰並沒有把我們的勉強心情克服過來。可是如果沒有我們的主動，則促進及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聯合國或不致成立起來。如果沒有我們的決心努力，則能否很快地掃除戰爭的茶毒以讓聯合國有機會去展開工作，實在是很成問題的。

我們惟有在國際事務中去推進一個真正反映我國人民願望的政策，才可把顯然屬於我們的責任在今後數年內予以履行。我相信要樹立一個人民的外交政策，必須追求三項基本目標。

第一，我們必須要用一個在起源和發展上是兩黨合作的，在執行和性質上是國策性而不是政爭性的，以及因之是一個值得他國信任的一貫性的外交政策。

第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反映人民願望以及能夠把我們的政策變成有效行動的機關。

第三，我們必須掀開秘密外交的時代。我們必須確定我們的人民有機會去知道他們的外交官所面臨

的問題，因此他們能夠對擬議的解決辦法作適當的判斷。使人民有知道的權利，是發展一個人民外交政策的因素。

我從經驗中知道這些目標是不容易達到的。但是我在追求時所遭遇到事情，或者對於前面的工作有些幫助。

我對於第一個目標的信念，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得來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和南卡羅來納州的眾議員格拉斯及華勒二人一同在巴黎。從我們與軍事及外交代表的談話中，我特別對參加凡爾賽最高會議的我國軍事代表布利斯將軍（Tasker H. Bliss）的談話有深刻的印象。除了其他問題以外，他告訴我們說，他的同僚們在接近和平時，已失去了他們所懷抱的大部份理想；他們很少講關於制止一切戰爭的話，而却談到賠償及領土獲得的事。他認為除非威爾遜總統親自來到法國，能夠向各國政治領袖作一次成功的呼籲，否則建立國際機構去維護和平的機會是非常渺茫的。

我回到華盛頓後，就把布利斯將軍與我的談話告訴威爾遜總統。他對我說，在大戰的後期中他倚重布利斯的地方要較在歐洲的任何其他代表為多。然而，他不能照布利斯所建議的去做，因為他不會講話，他所可能作的任何呼籲，如果被譯成其他語言之後，就會失掉力量。不久，我又去謁見他，他告訴我，已經決定到歐洲去。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他當時的話：

「我準備到歐洲去，」他說：「爲了希望我可以履行我向全世界母親們所作過的，我們是爲制止一切戰爭而戰的諾言。」

他的話並不是對我而發的。他不過是說明他所以決定去歐的原因罷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羅斯福總統，並且表明我的意見說：威爾遜爲國際聯盟的偉大奮鬥之所以失敗，是因爲他連一個共和黨的參議員都沒有帶着隨他一同到歐洲去的緣故。羅

斯福總統對我的意見表示贊同。

在雅爾達，三強同意了支持頓巴敦橡樹會議的建議之後及羅斯福總統離開會議桌以前，他就命國務卿斯退丁紐斯 (Secretary Stettinius) 以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為出席舊金山會議的美國代表團的團員。他們在舊金山與斯退丁紐斯融洽地工作。他們的熱誠合作，大大地影響了以後參議院近乎一致地通過美國的參加聯合國案。

在外長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以前，我們決定邀請一位熟悉國際政治而有名望的共和黨黨員隨我出席。當時我認為一位參議員不能像草擬和約工作那麼長久的留在國外。我和參議員范登堡商量，他建議我邀請杜勒斯先生，因為他素來熱心關懷我們的外交事務，而且特別適合資格。杜勒斯雖然事情很忙，但還是接受了這個邀請，因此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幫助。後來我就建議杜魯門總統使杜勒斯成為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員。他的成就很多，並且繼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會議中出力。

我們在參加聯合國方面，一直保持著兩黨經常和縝密的合作。在聯合國大會兩屆會議中，除了杜勒斯以外，我們的代表團包括了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中高級的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委員，有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及白魯姆和伊登 (Eaton) 兩位眾議員。在倫敦舉行第一屆會議時，美國代表之一，就是被全體參議員所推崇的特拉華州 (Delaware) 前任參議員暨共和黨參議院議員競選運動委員會主席，我的朋友湯森德 (John C. Townsend)。

當斯退丁紐斯卸去出席聯合國的美國永久代表團團長職務後。我建議總統任命佛蒙特州 (Vermont) 共和黨參議員奧斯汀為我國出席聯合國永久代表團團長。總統對我的建議表示欣慰。他喜歡奧斯汀，因為他倆過去在參議院中很熟識。奧斯汀在作參議員的一生中充分表現了他在外交方面的廣泛知識和濃厚的興趣。他對於查普爾特比克會議 (Chapultepec Conference) 的成功有過很大的貢獻。而且，在事實

上，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對於解決戰爭和準備和平的工作一向是熱誠合作的。

當我們在莫斯科同意到巴黎去恢復和約工作之後，我就請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跟我去任顧問。他們慨然答應了，並且一直在外長歷次會議中以及在和會裏效勞。我把我國外交事務的每一方面就商於他們。在一九四六年中，他們有二百十三天不在華盛頓而專門費在出席國際會議上面。在這方面，沒有一個國會議員能比他兩位更忠心更努力地為國效勞了。

由於參議員范登堡代表的政黨是政府的反對黨，更由於他取得了黨內的絕對多數的信任，他的支持遂使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外交政策稱為美國的國策。

在外長會議中，每一代表團可在會議桌上佔得五席。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負責討論和約工作的外長代表，以及譯員。每一外長可隨帶人員八人至十人進入會議室。因此會議室內旁聽的人是很多的。各外長於是時常舉行秘密會議，以期在沒有旁聽者的場合之下可以促成協議。舉行這種會議時，每一外長可帶助手二人和譯員一人。凡碰到這種場合，我就請兩位參議員隨我出席。我甯可擇取他們的意見而不大仰求國務院幾個專家的輔佐，因為他們這兩位對我總是有幫助的。再者，我要使兩位參議員直接明瞭草擬和約的每一階段。

除非執政黨以我們的外交政策充分地告訴了反對黨的領袖，否則執政黨不能要求反對黨來分擔執行我們外交事務的責任。這種情形，在國會和總統屬於同一政黨時是如此；在國會大多數議員和總統不屬於同一政黨時尤其是如此。政府的行政部門不得先行宣佈一個需要國會採取行動的重大政策，而於事後把這政策告訴給反對黨的領袖。甚至，即使反對黨領袖認為這建議是不智之舉，他們也得去支持它，否則就要在國外造成一種分歧的印象。繞過國會的政策決不是兩黨合作的政策。

參議員范登堡和參議員康納利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我不但在和約方面，而且在國務院每日呈給我的

有關外交的其他公學方面，也去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對我是很有幫助的，並且，雖然我知道他們時常受到很巧妙的試探，却從沒有把我們的計劃事先向新聞界的朋友們透露過一次。

康納利和范登堡的參與外長會議，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足使世界人民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連續性的政策，並不因某一政黨的挫敗而告結束。我在離國出席和平會議之時，在華盛頓機場上舉行的歡送典禮中順便向全世界人民發表一篇如下的談話：

「現在的情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存在的情勢完全不同。那時，我們是非常分歧的。這一次，在擬訂和約方面政府與國會之間並沒有分歧。這一次，兩大政黨之間對於擬訂和約也沒有分歧……他們並非以任何政黨或政府任何部門中一員的身份來共同工作，而是以美國人的身份來協力工作的……我們深深地覺得，如果我們本一個國家的地位，以我們的力量去影響世界事務，我們必須要團結一致。」

但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我又體驗到兩黨政治不一定能夠保證團結。在巴黎會議之前很久，我就明瞭去造成一個公允和平的最本於良心的努力，未必能得到國內的一致支持。我已經在前面敘述過當倫敦外長會議不能達成協議的時候我所遭遇到的批評。我料到有這一着。但我未料到當我們在莫斯科的確達成協議的時候所受到的若干批評。

關於莫斯科會議的經過，我已經在前面敘述過了；冗長的談判，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三點三十分的最后會議，以及四小時後的七點三十分我們的起飛回國。在二十九日中午降落華盛頓時的精疲力竭就更不用說了。然而，我還是逕返國務院去工作。

當我問什麼時候可以謁見總統時，白宮的一位職員告訴我說，總統正泛舟波托馬克河上，恐怕要在船上耽擱好幾天。我託他發一電報給總統，說我已經回來了，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可向他作一報告，我打算在第二天晚上就莫斯科會議的工作向國人作一次廣播演說。

不久以後，我接到邀請，要我當天下午到他的船上（泊在鄺蒂哥（Quartico）附近）去會面。我搭飛機，在約莫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到達鄺蒂哥。

我把會議中所發生的事報告給總統聽後，他對我的舉措表示熱烈的贊許。並且留我晚餐。我記得那天在船上的是通常隨總統作這種旅行的一羣幕僚，其中有李海海軍元帥，艾倫（George Allen），佛漢將軍（General Vaughan），克利福（Clark Clifford），羅斯（Charles Ross），康納萊，葛若涵護將軍（General Graham），以及正在替總統草擬準備在下星期發表的演說稿的盧遜曼法官。

我們在進晚餐的時候，總統要我把剛才報告給他的關於會議的事再說一遍，我照着做了。在我申述的時候，總統一再插進來表示他的贊許。除了李海元帥之外，當時沒有人表示贊同與否，李海說，我的報告使他感覺情勢已大見改善，但他不贊成關於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問題的協議。我提醒他說，當羅斯福總統及杜魯門總統先後在雅爾達及波茨坦，就同樣問題（即成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兩國包括一切政黨的政府及規定自由選舉與四大自由）達成協議的時候，他和我二人都曾在場。「這些協議，」我說，「後來並沒有為羅保兩國或蘇聯所遵守。莫斯科協定不過是達成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目標的另外一次努力而已，」我告訴他。在莫斯科，我們取了以前為蘇聯所反對的協議，即派遣哈里曼大使，卡爾大使，及維辛斯基先生到羅馬尼亞去尋求履行協定的方法。我又說，這個努力雖未必能成功，但它的結果不致於較過去的情勢更壞。我問他，要是他的話，將做些什麼。我沒有得到他的答覆。

晚餐甫畢，我就告辭，因為我必須飛回華盛頓；更因為天在降雨雪，我恐怕華盛頓的雲層太低。於是大家沒有再談外交問題。

總統請我在除夕那天再來，在他的船上過年，我答應了他。

我上岸後，發現飛機的機翼已經為雪蓋滿，不能再使用了。於是我祇好坐汽車回華盛頓去。承一位

海軍軍官的感情，願意替我駕車到華盛頓，但雨雪已使車上的玻璃完全被冰片蒙住，所以他駕駛時感到非常吃力。待我到家時天色已很晚了。從莫斯科長途跋涉歸來再加上坐這一段汽車，簡直把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弄得糟透了。不過，等我踏進門口時，我的太太更給我一封電報，總算使那天有了個好的結局。那電報是我的親切的朋友及顧問赫爾打來的，裏面說：

我親愛的吉姆：我以最熱誠的心情祝賀你在莫斯科會議中的光輝的成就。諒解、信賴、友誼、和國際合作的整個精神已因這一會議的工作而大為改善了。

第二天晚上，我將莫斯科會議的經過向人民作廣播報告。我解釋這次所達成及遵行的協議，「應能把希望帶給許多地方的疲於戰爭的人民。」我並且表示一個信念，即莫斯科會議確足以產生更好的諒解。」

除夕我回到總統的船上時，他對我的報告表示祝賀。他說船上的人們前一晚都聽到了我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令人信服的演說。

但是，沒有幾天之後，有一二位報紙的專欄評論家寫着這樣的話，說是：總統電召我到他的船上，對我在莫斯科的協議表示激烈的反對。又說：總統與國務卿之間意見不和。一般新聞記者大都明白這種消息是從白宮方面傳出的，當外面謠傳總統的僚屬也抱着這種批評的時候，批評我的人更受到鼓勵而勇於攻擊我了。

事實是，總統在這次或無論那一次都並未向我表示過不贊同我在外長會議或別的會議中所抱的任何立場。他也從未向我表示過不贊同我對我國外交政策方面的任何一次聲明。

總統在莫斯科會議之前會致函史達林，表示贊同後來在莫斯科會議中所獲協議的大部份建議。我從莫斯科協議一事所得的經驗，顯示在尋求一個真正全國性的外交政策時，我們務必要預計到來

自左右兩方面的批評。如果如某些批評家所指摘的，這些協議是對蘇聯有利的話，那麼蘇聯就不會去違背它們了。然而事實上從那時候起，我們一直在對違約的事提出抗議。這就表明那些協議是爲了各個被解放國的最大利益而作成的。

可是，製造關於總統與我意見不和消息的人或人們，却依舊作此努力。總統雖在不止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中否認上述不睦的情形，但傳說依然不改。擔任公職的人都知道對曲解置之不理，但我承認這些不正確的傳說並未使我在一九四六年初期的忙碌生活感到輕鬆些。

我對一致支持我國外交政策的希望，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當我在巴黎的時候，受到一個嚴重的挫折。那天商務部長華萊士在麥迪遜廣場花園 (Madison Square Garden) 發表一篇演說，認爲杜魯門總統所批准的由我執行的政策對蘇聯太苛刻，所以需要一個對蘇聯比較和諧的政策。我對於華萊士的舉動並不感覺很大的驚奇，因爲過去他曾對「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關於我國與冰島談判使用我們在該地所築機場的談話。他的言論立刻被冰島共產黨作了有效的利用，於是使國務院在謀得一個有關防衛西半球的協定方面，遭到阻礙。

在巴黎，由於報紙上登着杜魯門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對華萊士演說表示完全贊同的消息，各國代表的腦海中都對華萊士的演說表示重視。這一傳說，引起了出席和會的各國代表間的紛紛談論；更引起了他人人士向我國駐在各該國京城的外交官員的探問。各外長因此懷疑我在歷次演說中是否正確地表現了美國的政策。

參議員范登堡發表了一篇聲明，說他要和政府合作，但他在同一時間內祇能和一個國務卿合作。

參議員康納利也宣佈說：他所支持的政策，是我們已經宣佈過的並且在一直遵循着的政策。

我決定不作公開聲明；這一件事必須請求總統加以糾正。

當然，我國代表團的處境是非常不愉快的。我極力避免與出席和會的各國代表以及其他外長晤面，因為我要避免答覆關於我國政府的政策是否已有轉變的一類問題。等到華萊士在白宮的石階上宣佈總統和他已經取得協議，在和會結束以前商務部長不再發表言論等語之後，我們的困難不但沒有減少，却反而因此增加。在出席巴黎和會的各國代表看來，這話暗示總統並不反對華萊士以後再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

當時我和白宮之間並無直接的電訊聯絡，我是從報紙上以及從助理國務卿羅塞爾打給我的許多電報中得知種種情形的。於是，到九月十八日，我呈給總統一個電報，追述我在四月間曾經聽從醫生的勸告而向總統提出過辭職。根據那次約定，我的辭職應該在和約完成之時生效。我在電報中又說：

「無論如何，如果總統不能阻止你內閣閣員之一的華萊士先生發表關於外交方面的演說，那麼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我若繼續在職，甚至暫時留職，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此，如果總統自己不完全明白在華萊士先生繼續擔任官職時，必須請他避免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話，我必須請您立即接受我的辭呈。在此嚴重關頭，不論何人做國務卿，務必要使大家知道他是得到了政府——並且儘可能的得到國會——一致支持。」

當然，我將留在巴黎以待繼任者的到來。如果您不能立即任命新人，却不妨任命一位國務卿以外的人來作出席和平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說，總統希望與我在電話中談話。可是，那天的電話聲音不很清楚，後來我才知道電話線與第三者糾纏在一起，公司的接線生不能把線路「分清」以便我們通話。我問總統可否安排電動打字機談話。他說可以。白宮有一架電動打字機，巴黎的美國大使館也有一架。我就到大使館的報務室向報務員口述一個聲明如下：

我明瞭總統之所以要取得華萊士先生所宣佈的協議，乃是想調和我們和華先生之間的歧見。

但華先生最近的言論，使我國政府在國外的代表，以及旁的政府的代表，更懷疑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究竟將是怎樣的一個政策。

華萊士先生已重申他還是保持他在紐約演說的立場，他不否認那次演說是有意在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一位內閣閣員向報界發表談話，說他依舊不改變對您的外交政策的批評，和他在講台上作這種批評，是很少差別的。

華萊士先生現在雖已答應在這次巴黎和會結束以前不再發表言論，但從他的聲明的形式來看，暗示他將繼續公開發表他自己的與您不同的對外交政策的意見，也暗示您承認了他以您的內閣閣員資格有權去這樣做。

如果政府本身在它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面有所分歧，則不能希望使世人相信美國人民是有外交政策的。

如果華萊士先生依然是閣下政府中的一員，並且實際上暗示他將在和會結束後恢復他對於您現行外交政策的批評，那麼出席本次會議的美國代表團的地位將不因華萊士同意不再在和會期內發表言論而告恢復。我們所得到的，不過是您自己的政府停止批評您政策的諾言而已。

世人今日所懷疑的，並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是閣下的外交政策。

這次的和會，不過是締造和平的全部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和會僅向外長會議提出建議，而由後者在和會休會以後開會起草各項條約的最後定本。因此，當外長會議在談判的最緊要關頭時，華萊士先生依舊可以恢復他對我國外交政策的公開批評，並且說，他將繼續這樣做。

其次，這次和會僅在處理若干條約，至於對德國，奧地利，及日本等國的和約工作，仍擺在我們面前。這次和會僅是一個開端，如果我國外交政策不保持連續性的話，那麼和會所完成的工作將無最後性之可言。

您和我現在正遭遇到與和會完全沒有聯繫而需要國內保持一致的最嚴重的問題。

如果我國政府的代表知道在和會結束後我們將出現您的國務卿和您的商務部長所發表的互相矛盾的言論，那麼在此間的美國代表團對於和約的工作就不能有多大的作爲了。就事實論，這些抨擊既然是一位內閣閣員所加於我們的，那麼我們的努力實已受到很大的妨礙。

等到和會結束後，外長會議開會作最後決定時，我每日將碰到華萊士先生所發表的與我的意見相衝突的言論。到那時我一定要堅請辭職。與其政府讓我們到十月廿三日（希望和會可在這天結束）回國，遠不如讓我們現在就回國。

如果華萊士先生對我有什麼惡感的話，那麼閣下接受了我的辭呈後，他或者願意支持你的外交政策，或至少不再攻擊這種政策。

在我看來，重要的是，應該努力恢復對我國外交政策的信心。

我誠懇地希望，閣下在任命新人時，能夠宣佈您對於以前由您自己所決定而現在正在執行中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忠實及專心一致地支持的；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任何政黨或團體的外交政策；以及，您並不希望或者慮變更美國的外交政策。如果爲了任何理由，您希望藉任何方法來修改您的政策的話，我希望您能夠把您所決定的任何政策，宣佈爲我們要去遵循的美國的政策，普通公民雖可以表示他的反對的意見，但您的閣員却不容表示與您政策矛盾的意見。

我一直向每一位與我商談的外長極力陳說，您所訂定的美國政策是一個永久的兩黨合作的政策，他們可以信任這政策是不變的，即使政黨有何轉變，這政策總是保持不變的，因為我們已經第一次得到共和黨的合作了。至於所謂在六星期內將與華萊士先生重新檢討這個政策的任何聲明——華萊士的言論已經引起這種警惕——將使各外長懷疑我國政策的穩定性。

鄙意以為如果莫洛托夫先生相信到十月廿三日又將會發生是否准許華萊士再攻擊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則莫洛托夫甚為滿意。在內閣中，沒有其他關員要求有權批評，或說被允許有權批評您的政策。到現在還未決定內閣關員必須支持閣下的政策，這當然對我們是有害的。我國代表團的工作現已在停頓狀態中。各國代表團的代表紛紛詢問我國政府是否將准許華萊士再發表演講攻擊我們，以致使我們忙得不得開交。旁的政府必不致准許關員這樣去做，他們不明瞭我們何以有此情形發生——除非華萊士的意見為我們所贊同，或者人民的意見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我不欲請求您採取足以迫使華萊士退出內閣的任何行動。但我認為凡自認效忠於您的人，就不該這樣嚴重地損害您的聲望和我國政府在國際間的聲望。倘您把我們接到的來自希臘的電報給華萊士一閱就可證明這尤其是確實的。您與我會費了十五個月的時間來樹立一個兩黨合作的政策。我們本來做了一樁很好的工作，能使世人相信這是全球所能信任的永久政策。這件工作現在已被華萊士毀於一旦了。

我不宜在此引述總統的話。但我不妨說，由於這次藉電動打字機的通話，我知道他並無變更他的政策或聽任他人懷疑他的意見的意向。他沒有告訴我將採取什麼行動。但在第二天，他以一種使美國絕大多數人民感到滿意——我認為如此——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

華萊士辭職後，美國政策的信譽又告恢復。康納利范登堡兩位參議員依舊以堅定不移的忠心來支持

我國的外交政策。「華萊士事件」發生於國會競選期間，以後就產生了國會中大多數席次由民主黨落入共和黨手中的轉變。參議員康納利在初步選舉中遭到了對敵，但他仍不願放棄在巴黎的爲國效勞，而並未回到家鄉去爲本身努力。參議員范登堡也是一位參加連選的候選人，他不但沒有參加競選運動，甚至僅能匆匆回到密執安州的家鄉投了一票；他籲請旁的共和黨人都來支持兩黨合作的外交政策。

我的致力於保持兩黨合作的外交政策的成果，可從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參議院以絕大多數票通過對五附庸國和約的事明白表現出來。當我知道這件事後，不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與固執的參議院的奮鬥，以及他的和平努力終於挫敗的往事。於是我更希望我們的決策者永遠不要再蹈威爾遜總統的覆轍；希望從今以後使兩黨的負責領袖能夠從我國政策開始釐訂一直到最後形成時爲止，隨時知道此中的情形。

關於發展及維持一個人民的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因素，是要有一個有能力負責我國外交事務的機關。通常總是將國務院作爲對付我國外交方面缺點（這缺點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疏忽而造成的）的鞭策機關。國務院的組織與活動，還是需要我們去繼續研究。國務院的組織，從戰前九百職員擴大到現在分佈在華盛頓十八棟大廈裏的三千人左右。我到職後不到幾個月，由於戰時機關如「戰略情報處」，「戰時情報局」，「對外經濟處」，及「剩餘物資管理處」的整個或局部併入了國務院，遂使國務院的人員增加幾乎一倍。這些戰時機關的併入，使我頗覺不快。替這些戰時機關做「料理後事者」的工作，當然是很壞的事。最有能力的人一定不願留在即將解散的機關，而急於尋找一個有生氣有前途機關的永久工作。工作精神的萎頓以及其他問題便日甚一日。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爲基本上屬於行政性質的工作，實在不宜由國務院去承擔。

國務院應該是一個決策機關，而不能變成一個負責推進各種活動的機關。國務卿在決定推進這些活

動方面所耗去的時間，自必分去他應付重大外交政策問題方面的時間。

因為我認爲國務院是一個決策機關，所以我反對陸軍部把我們在歐洲及太平洋方面的佔領機構交給國務院節制。國務院不適於這些工作。它不能網羅一班人組成一個有效率率的機關，因爲這些僱員祇能得到暫時的職業而須離開家園到遙遠的國外去工作。假如把航運和運輸的維持，警戒，視察，以及佔領軍的無數責任都移交給國務院，它的決定重大外交政策的任務就會大受妨害。我們須保持我們在德國的麥克納將軍和克萊將軍，在奧地利的克拉克將軍，以及在日本的麥克阿瑟元帥等已經發展得很有效率率的機構。

主張移交的人辯說，陸軍部和國務院之間的職權是分立的。我認爲這理由並不妥當。在有關外交政策的一切問題方面，當然是分立的。總統決定我國的外交政策。但他的決策是根據國務卿的建議而採取的。決定的政策必須交給陸海軍兩部去執行，因爲這兩部的人員在訓練和經驗方面最適於推進上述的必要活動。在和約生效之前，佔領工作的應該屬於陸軍部，就等於它所擔負的作戰工作一樣。當然，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但其他國家的軍政機關既未加以放棄，我們的軍政機關也不宜放棄。

當然，國務院及陸海軍部之間必須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繫。在今日的世界上，沒有注意到用軍事力量來支持的政策，絕難成爲一個政策。自戰爭初期起，國務院與陸海軍部的首長不但會經常磋商，而且還成立了一個「聯繫委員會」，由三部門各派代表參加，經常開會討論共同的問題。

記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間，我會同意「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所提出的一項建議，這對於將來達成聯繫方面的努力必定很有幫助。這項建議的要旨是設立一個國立軍事學院作爲國務院及陸海軍部高級官員的聯合訓練機關。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這個軍事學院就告成立。從那時起，外交官員就不斷地被派到那裏去受訓練，這個新的機關現在已經做到一件最有效的工作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向總統建議頒佈一項關於設立一國防委員會的行政命令，這委員會由國務卿及陸海軍兩部部長組成，使我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可以取得完全聯繫。命令中規定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為國防委員會的軍事顧問。委員會除了秘書處外，應設立一個聯合情報處。我所提的上面的這個建議雖然沒有被通過，但它所揭櫫的許多目標後來被採入關於合併陸海軍兩部為一個國防部的法案中。這個法案現在既已付諸實施，因此我國外交和軍事政策的聯繫問題更需繼續加以研究。

一位在職五百六十二天，其中三百五十天化在出席國際會議上的國務卿，自不能說他已經在一個像國務院那樣的機關裏做到了許多基本的改革。事實上，在我就任國務卿的最初幾個月，我們雖做了一次自覺的努力，幫助國務院使它所受到的一種嚴重的「改組驚惶」裏恢復過來。但我們確做到了一項改革。這改革雖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可是我認為它在我國外交事務的執行中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當我就任國務卿的時候，我想得到一個關於我國政策的廣泛說明。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關於現實外交政策的基本工作指南。在以前，我們從未擬定這種文件。國務院中有許多官員祇能規劃我國對某一區域的政策綱要，這說明顯然是他們對於我國政策的看法。可是我們並沒有一個考慮妥善且經認可的，而能表明我國對整個世界目標的權威文件。於是我就提出把各項政策說明的擬定工作，放在國務院各項工作的最優先的地位裏。

因此，我們就設立了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專門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負責起草一個綜合我國政治，經濟，及情報活動的全盤方案。等到這個說明的草稿擬定後，就寄給我國駐海外的使領供他們檢討及批評。我認為過去我們所決定的政策，往往並未徵求駐在外國，每日接觸當地實際情勢的外交官的意見。我更認為，如果使這些外交官來協助釐訂政策，則他們必更能遵循一個一貫的方案。為了這個目的，我就使我國駐在幾個較大國家的大使館獲得國務院的許多或全部的政策說明，讓他們來批評。國務院收到

他們的意見後，卽加以研究，再由專家草擬一個最後的政策說明。經各方認可後就成爲我們的工作指南。爲配合情勢的演變起見，我令負責官員每隔六個月必須對這些政策說明重新加以檢討及修正。

除非國務院把它決定的政策告訴給我國駐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員，則此種決定實無意義可言。過去數年中，我曾到各地美國大使館去考察，發現國務院的駐外代表以及陸海軍武官對於我國政府對該駐在國外交政策的看法，各不相同。如果我們自己的人員不明瞭本國政府的政策，我們就不能期望外國政府來瞭解這政策。我在職時，也把我們的政策說明送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我們做到對各國的政策說明之後，我又提出設立「區域」委員會，以檢討我們所擬定的對某一區域內每一國家的政策，及審查我們的目標是否前後一致。關於此點，我們決定了由另一組織來負責檢討關係重大的政策說明。首先設立的是拉丁美洲「區域」委員會。這是由專門研究拉丁美洲外交的著名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貝密斯 (Samuel F. Bennis)，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孟羅 (Dana G. Munro)，及羅吉斯特大學教授柏金斯 (Dexter Perkins) 組成的。因爲我的辭職，就使我沒有機會去進一步推進這個計劃。我能夠把這些對世上每一國家及包含我國各方面利益的外交政策的說明移交給馬歇爾國務卿，心中至感愉快。馬歇爾對這些政策或有別的不同意見，但至少他能夠確切而迅速地斷定這些政策是怎樣的政策，從而把它們轉爲符合他自己意見的政策。

上面所說的這些政策的說明，另外還有一樁好處。就是，它們需要發展一個一貫的行動方案，並且迫使負責官員注意明日的危機而預爲之計。

一個計劃最週密的機關之有無力量，端賴它的人員的有無才幹。

我出任國務卿後，立卽覺得到國外去出席會議將使我不能出席國務院本身的會報。於是我請副國務卿艾克遜主持會報。每天早上由他接見各司司長。我在國外時，艾克遜就把他們所考慮的重大問題報告

給我。我在國內時，艾克遜常在每天傍晚和我商談這些事。我們兩人難得在每天下午七點鐘之前離開國務院。如果我不知道國務院的工作是在具有非常才幹與精力的人物如艾克遜副國務卿的指導之下有效推進中的話，我就不能如此完全的在國外會議中致力於締造和約的工作了。

我還得向那些以外交當作終身事業的品格高尚的人員表示敬意。我所遇到的大部份職業外交人員，大都是既有才幹又有忠心地努力工作的人，他們著實可以拿到遠較政府所給的薄俸為多的收入。

我要打破一個外交官祇知講究衣着及專赴宴會而實際上無所事的惡習。今日的外交官應該知道社交上的儀表遠不及成天工作的精力對他更有價值。跟我參加過許多次國際會議的屬員，當能發現他們整天工作不停，已不只一次。事實是這樣的，我任國務卿的一年半裏面，在所有來見過我的國務院人員中，我記得祇有兩個是穿着參加舞會或宴會的褲子來見我的——這兩人却是藉政治關係謀得職位的！

然而，應該認清的是，我之所謂我們的外交機構，不論過去，就是現在也還是很不適合我們必須在世界政治中履行的任務，並不是有意侮蔑。我特別對於在我任職期內所產生的挽救上述情勢的行動，感覺欣慰。這次行動，就是以「改善、加強、及擴大外交機構」為目標的「基氏——康納利法案」(Keenan-Conally bill)的通過。這法案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經杜魯門總統簽字。二十二年來我國外交人員的責任和範圍發生了極大變化的一段時間中，這尚是第一次關於外交人事的法案。

努力取得這個法案的工作是赫爾國務卿任內肇始的，斯退丁紐斯任國務卿後，繼續保持這方面的努力。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外長會議在巴黎的第一次會議休會時，這法案正將提交國會，所以我拒絕了朋友們的勸告，甯可返國處理這個問題而不願乘休會一個月之便到瑞士去休假。從悠久的經驗中，我得到一個教訓，即除非我們決心去做，否則國會（或其他方面）是不會有動靜的。

我帶了助理國務卿羅塞爾一同到國會，請國會中的朋友協助支持「基氏——康納利法案」。這次又得

感謝兩黨的合作，使國會在休會之前特別舉行一次表決，結果居然得到參眾兩院的一致通過。這次行動，對於我所說的樹立一個人民外交政策的第二個目標的完成，又邁進了一步。

由於新法案的通過，外交官員的年俸乃得提高，而毋須再指派有錢的人去當大使了。同時，全體人員自上至下一律提高薪金，又規定了訓練和晉級的更嚴格的必需條件。新法案旨在使外交人員能夠真正成為政府及人民的代表，它使國內最有資格的男女（不論其是否為政府中人）能以任何等級的外交官資格到國外出。我認為最重要的規定，是使國外的外交官不時返國在國內担任各種不同的職務，俾不致失去與美國生活的接觸。我記得威爾遜總統曾說過一句話：「派一個美國人到倫敦或巴黎去是容易的，但要使他在那裏依舊是一個美國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代表本國駐在國外的人，和代表本州人民駐在國會的人一樣，需要時常回到「故土」去走走。

在其他方面，國務院也正在格外注意人民的輿論。各大報紙的社論以及無線電評論員的意見，每天擺在國務院官員的桌上，並且送到國外的使館去。私人或團體的函件以及請願書，也被分析了作為輿論動向的證明。國務院的聯絡科，經常與全國各地自願的團體保持接觸，不但使他們獲知外交動態，並且取得他們對當前問題的批評和建議。在這些努力的後面，是一種堅定的了解，即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是一個迎合美國人民意見而且得到他們堅定支持的政策。

第三，樹立一個人民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先決條件，自然是消息靈通的人民。就國際關係來說，全世界現仍感受着統治者彼此秘密締結國際協定的時代遺風的痛苦。但美國至少正在迅速擺脫那種時代的習慣。

因為戰爭的關係，脫離秘密外交的趨勢就遭到了阻礙。軍事和政治上的協議既然時常是互相關連的，為作戰努力計，就不得不需要秘密。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及史達林大元帥三人間的歷次會議，都

是不准新聞記者參加的祕密會議。許多記者或可從間接方面得到關於會議，討論及協議的消息，但他們爲遵守戰時自動新聞檢查的制度，乃不得不避免發表消息。

在波茨坦會議時，雖然太平洋戰爭那時仍在繼續中，新聞記者對於三強約定不發表會議消息的事，依舊表示不滿。當時美國各報和廣播公司派了許多記者到柏林去準備採訪會議的消息，但會議地點波茨坦在蘇聯佔領區內，於是他們就沒有得到進入該地的許可。各報對這件事痛加抨擊，然而在總統回國向國會報告之前，他們並沒有得到任何詳細的消息。因爲那次會議中有若干項有關對日戰爭的協議，所以在這方面的保守祕密當然是合理的。不過從那時起，我常常希望當時能夠把有關歐洲問題的消息多多給我國人民知道。

等到外長會議在倫敦開會的時候，就無保守軍事祕密的理由了。不過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辦法，是每日發表一篇包含所會討論的問題以及達成何項協議的公報，而並不報導各代表所發表的言論或其採取的立場。這一點雖似較波茨坦會議進步，但在實行時却一無進步可言。當時，每一外長派有代表一人參加草擬公報的委員會。但公報却和一切旁的問題一樣的需要得到外長的一致同意。外長會議本身達成的協議既屬如此之小，所以，公報除了報導辯論（這是不准發表的）以外，就沒有東西可以報導了。在此情形之下，新聞記者們惟有向有代表團方面的人——我們假定這種人是奉命不得透露消息的——去打聽消息。因此，關於會議的報導，不僅不充分，而且常常不正確。

在第一次的公報上，就發生了糾紛。蘇聯代表主張不發表任何消息。其他各國代表却認爲應該發表一篇公報祇說外長會議業已同意討論義大利和約，並將開始研究英國代表團所提的草案。經過長時間辯論後，蘇聯代表終於同意發表一篇毫無消息的公報如下：

外長會議本日下午四時舉行第二次會議，至六時三十分散會。由於若干文件有待譯及研

究，乃經決定將原定明日舉行之會議改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舉行。

像這樣的公報，除了預言家以外，新聞記者是無法去捉摸消息的。以後的公報也大致如此。會議的公報較普通氣候報告更爲簡短，不久更設法使它們還不及氣候報告正確。

某日外長會議討論了蘇聯所提的控訴，說法國未能遣返蘇聯的人民。於是法國也指責蘇聯的拒絕遣返法國的人民。那天傍晚的公報，除了對所會討論的問題作一簡單報導外，別無其他消息。這是新聞委員會四國代表所一致同意的。但到晚上約七點鐘的時候，蘇聯代表向新聞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布朗（Walter Brown）先生說，莫洛托夫先生反對這個公報，要求扣留不發。布朗回答說，已經由當天担任新聞委員會主席的英國代表發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先生向外長會議提出控訴。貝文先生回答說，由於四國代表的一致同意，新聞委員會主席就把公報發出去了。莫洛托夫先生說：「我的行動不能受委員會的任何秘書或代表節制。他堅持外長會應該另外發表一篇公報，不提法國指責蘇聯未能遣返法國人民的事。皮杜爾先生當即表示反對。貝文先生和我都認爲如果另發公報將是對會議事情的不正確報導；已發的公報把事實報導得很正確；我們不能同意另發公報。莫洛托夫先生說，在這種情況下，他將要發表一篇他自己的公報。他果然發了。」

後來，我方知道另發公報對他是很重要的，因爲早一天晚上他拍電到莫斯科禁止蘇聯各報刊登新聞委員會的公報。於是，莫斯科方面就等待另一篇代替的公報。結果，莫斯科各報所發表的莫洛托夫的人公報，就算是那天外長會議情形的惟一報導。

倫敦外長會議的這種發佈新聞辦法使我大爲受窘，因爲在採訪外長會議的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我
的舊識——有的是我做參議員的時候認識的，有的是我進入白宮和國務院以後結識的。

某日，我在休息室碰到他們。一位舊識叫我「參議員，」並且問我願意被人叫作「參議員，」還是「法官」或「國務卿。」我告訴他說，沒有什麼兩樣，因為我知道新聞記者們那時在實際上並不把上面的任何一個頭銜來稱呼我。

到十二月我們去莫斯科出席外長會議時，遭到了和倫敦同樣的發佈新聞辦法。我雖然不喜歡此種辦法，但莫斯科會議既是我所提議舉行的，當然不地向地主國的蘇聯堅持我的新聞發佈辦法。如果我們得到了一個令人滿意的辦法的話，必將使蘇聯政府變更它自己國內的新聞檢查規則。於是，會議所發表的公報又和倫敦會議一樣的缺乏消息，而世界上的人民又將因此得到了許多關於會議事情形及決議前所發生的辯論的錯誤報導。

在紐約的安全理事會討論伊朗問題時，才第一次能向記者們公開並且坦白告訴他們關於會議所面臨的問題。安全理事會會議進行的情形既向外界公開，我當然可以不接受在秘密會議中所作保守秘密的約束。我常向記者解釋我們對情勢的意見，以供他們參攷。在我不能抽身招待記者時，我就派我的屬員代表我作上述解釋。這樣，人民就可讀到有充分認識和了解的記者們所寫的消息，而由此所產生的人民輿論就是造成伊朗一案最後結果的有力因素。

我認為在安全理事會所實行的良好發佈新聞辦法，對於外長會議也一定是一個好的辦法。但我明白不能由我自己去告訴記者，而需要由一位熟悉我國外交各方面情形，並與我關係十分接近，以致使他充分得知各種問題的情報的官員，來向記者就各項有新聞價值的問題作適當的解釋。我就請包倫接受這職務。他不但是老外交官，而且在莫斯科就過多年，俄語講得非常流利，曾經擔任過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出席歷次國際會議的通譯官。包倫和多年來一直在負責國務院的新聞聯絡工作，而且很能幹很有禮貌的麥德謨（Michael J. Mc Dermott）是一對很好的搭擋。

當外長會議又在巴黎舉行時，我向其他各外長說，我不願再同意過去的新聞發佈辦法，而將堅持我們有權發表美國對外長會議所面臨各項建議的觀點。我已堅具決心，如果外長會議繼續舉行秘密會議的話，就美國代表團而論，此等會議不能認為秘密會議。

在每次會議之後，包倫和麥德謨兩人就向新聞記者「概括說明」會中所發生的每一件重要的事。當然，新聞記者希望直接採訪會議的消息，但他們不久就明瞭他們雖被摒於會外，却仍能得到客觀的，正確的，肯定的報告。他們明白了秘密會議有時對於達成協議是很有幫助的；於是大多數記者就心悅誠服地自動放棄參加會議的權利，特別因為他們明白了我們所採的這種行動，是在迫使其他代表團也來採取同樣的行動。

在巴黎，外長會議員舉行多次「秘密」會議。除了譯員之外，每一外長祇可隨帶顧問二人參加這種「秘密」會議。第一次舉行時，有人就建議不向報界發表任何消息。但我表示拒絕，我說，「第一，我認為這種建議是錯誤的；第二，即使有這種約定，也不能令人遵守；參加會議的人如把所談或所發生的事和他自己的代表團磋商，消息就會透漏給他們所喜歡的記者。」

在這方面我會經吃過一次虧。我向其他外長說，在倫敦外長會議時，我會盡力去遵守不透露消息的約定。可是，某次我從紐約前鋒論壇報看到一段描寫前一天外長會議經過的消息，和事實完全相符。我就耽心在下次會議中或將被責為「走漏」消息。經過調查後，我才明白那個記者的消息是從一個與紐約前鋒論壇報駐巴黎辦事處有關的人那裏得來的。

我又向各外長說明我在倫敦的類似經驗。據我們的新聞代表事後調查，某次美國某報所載的一條真實消息是由英國外務部某官員所供給的。這事發生以後不久，又有某記者為芝加哥太陽報採得一項關於外長會議辯論的真實言詞的消息，而這是從蘇聯的塔斯社記者那裏得來的。

我向各外長說，倫敦的經驗已經足夠，所以我不願再同意一個使我不能向報界說明美國立場的任何發佈新聞的辦法。

從那時起，報章便能予人民以美國所認為外長會議有無進展的正確報導。這使其他代表團也公開發表他們的觀點。我很樂於注視這種發展趨勢，因為它已經把各國對各項問題的立場放到應該放的地方——輿論的公斷。

到後來，甚至莫洛托夫先生也受到了美國此舉的影響。七月間他在宣佈蘇聯對德方針的重要演說時，就採取了我們的方式。他在外長會議秘密會議中發表的演詞原文——事先即印就發給各報。我知道這事後，立刻向他道賀。以後莫洛托夫與葛羅米柯二人在聯合國的工作中，就時常照着這條路線走。我知道葛羅米柯現在甚至招待新聞記者向他們解釋蘇聯對聯合國各項問題的觀點，以供後者參考。

巴黎和會開幕時，我提議准許報館記者與廣播記者參加所有會議。我的舉動得到莫洛托夫先生的附議，他說，他熱烈予以贊同。我覺得我在揭去和平談判幕幔方面的努力，最後終於得到了成功。我的欣慰並不因蘇聯及其附庸國代表團之利用和會議事情形作為宣傳，而有所喪失。

在某次莫洛托夫先生的宣傳攻擊中，他指責美英兩國違反過去在支持通過某種和會程序規則方面的協議。這種宣傳的毫無根據，使我以尖銳的言語向他作答。我一再引述會議的記錄，證明他的話缺乏根據。在每一次引述之後，我說：「惟有莫洛托夫先生才作這類的指責。」最後，我提到我們的新聞自由，並向莫洛托夫保證我們的報紙將登載他的攻擊美國動機的指責。然後我說：

「我向他要求准許蘇聯報紙登載我現在所發表的言論……今日我們對於蘇聯人民惟有贊揚與敬意，我們不容這種贊揚與敬意被莫洛托夫的任何攻擊所損滅。」

不到四十八小時，我的演說在蘇聯報紙上登了出來。就我所知，這要算是我被他們如此尊重的僅有

的一次演說。我的惟一的遺憾是，這是不得不批評莫洛托夫的一次言論。

當莫洛托夫在紐約提議外長會議到莫斯科舉行的時候，我表示同意，但我提出一個條件，即會議形式須像巴黎及紐約外長會議一樣向報界公開。他也表示同意，並說，不過莫斯科的房荒或為對記者的惟一限制。我又和他商量取得一個保證，使廣播記者也可赴莫斯科參加會議。他說，這是另外的問題，要經他的政府同意後才無問題。後來他又告訴我，蘇聯政府答應廣播記者可自莫斯科發出廣播。記者們都認為莫洛托夫先生已經履行了他的諾言，使他們的電訊不受檢查。

一九四六年初，我決定覓取某種途徑，藉以把我們對世界和平問題所抱立場的真義，告訴給蘇聯及其附庸國的人民知道。因為在這些國家中，我們的立場每天被歪曲地報導着。我不欲覓取宣傳的工具，但我們既在從事民心的爭奪戰，我當然要覓取報導事實糾正錯誤的方法。惟一的可能，似為加強我們在慕尼黑廣播電台的力量。

我把我對這方面的深切關懷告訴克萊將軍之後，他就去照着辦理。助理國務卿班頓，以他的能力和機智也開始活躍起來。他派了許多工程師到慕尼黑去決定改進設備及使它成為完善工具的必需方法，並且把戰時我們在英國所用的設備搬到慕尼黑去。

在巴黎第一次和第二次外長會議的中間，我又回到華盛頓。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中有幾位我以前的舊同僚邀我和他們商討我所提出的一個建議——在國務院經費案中另加一千八百萬元，作以執行國務院新聞工作之用，包括推動「美國之聲」（譯者按即國務院主辦的廣播電台）在內。若干參議員對此項經費的有無益處表示懷疑，認為參加這項工作的廣播員中有的所表現的意見太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如果不是太激烈的話。

我向他們解釋，這些僱員是從戰時機關調入國務院的，他們有服務的保障，故惟有根據文官條例才

可把他們免職。結果國會就產生了一個「麥加蘭修正案」(Mc Carran Amendment)，使國務卿有權把僱員免職以免影響工作。我向各位參議員保證將作一次對國務院僱員的澈底調查，以確定他們是否忠於政府。於是參議院就通過了全部撥款。

我在動身回到巴黎之前，下令進行調查。我認為檢察的人，不應該同時是審判的人，所以我就下令要調查員把他認為足以證明免職為合理的證據，交給與調查完全無關的獨立委員會。由於這個委員會的建議，根據「麥加蘭修正案」罷免僱員，已有幾次之多了。

但是，國會中又發生了猛烈反對我所說過的繼續這計劃的事。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推行的結果仍是一個問題。如果國會不撥一筆適當的經費來推行這個工作，則為一件最不幸的事。我化了不少時間來協同發展這個計劃，因為我認為我們極需要某種方法去答覆針對我國的歪曲指責。僅僅自覺我們的純潔動機和無害於世的行動，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使世人相信。

我國在撥億萬鉅款援助他國之時，祇需要化一千多萬美元來維護美國的名譽，是多麼聰明的事情。

對於自由發佈消息給人民的一個小小（但却很重要）技術上障礙，在乎許多官員希望把文件加以「過份的分類。」每一個陸軍軍官都會碰到過一個問題（我相信他們和我的經驗一樣），就是，往往接到抄自報紙的某種資料，上面却寫着「機密」字樣，甚至於「秘密」的字樣。我發現許多國務院的文件，根本不配列入「秘密」檔案，但事實上却被分在「最機密」的一類中。戰爭結束後，我就下令國務院的僚屬放寬一切文件的分類。我深恐我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多大成就。雖然，年深月久的習慣需要很久才能糾正過來，但務必要糾正過來。

一九四六年初，我發現另一個糾正把外交文件歸入秘密一類的方法。在二月廿八日，我不用致送「照會」的方法，而用發表演說的方法來說明我國對當前各項問題所抱的立場。我希望結果能引起對這些

問題的公開討論。以後我又作了幾次這樣的演說，而我的努力竟比我所預期的成功更大。此後不但蘇聯官員發表公開演說以解釋他們對當前問題的立場，甚至史達林大元帥也開始接見美英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了。

當然，政府之間的某些問題是不得用這種方式來討論的，可是這種問題畢竟不多。我之所以決定採用這種方式，以及我之所以不再同意舉行秘密會議，是基於我從蘇聯政府的態度裏所不願得來的一種信念。如果在倫敦外長會議時，美國人民早已知道了羅斯福總統及杜魯門總統與史達林大元帥之間所往來的電報（本人已在上面幾章裏提到過），他們當更瞭解我在倫敦所遭遇的困難。這樣，人民自當更同情於我的處境了。

倫敦會議後，為對我們的立場作持平之論，我就不得不在廣播演說中敘述我們所會遭遇的若干困難。當時我並沒有把現在我在這本書中所說的事完全報告給國人，因為我還盼望並且願相信蘇聯的舉動是和我們一樣出於共同的目標——願望早日獲致和平。每逢代表自身利益或政府利益的人以共同目標來集會時，便應該小視方法上的歧見，以便這些歧見更易調和。這就是羅斯福總統逝世前不久勳邱吉爾在公開演說中小視我們與蘇聯之間的困難的用意所在。

在莫斯科會議時，我仍盼望蘇聯與美國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但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就各方面所得的證據來看，姑不論蘇聯的長期計劃可能是怎樣，他們當前的目標顯然是在拖延歐洲和太平洋方面的和平。

史達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所發表的演說——其中宣佈蘇聯的新五年計劃，著重在重整軍備而不在于生產蘇聯人民所亟需的消費品——使我大為震動。可是尤其使人感到威脅的是蘇聯對伊朗的態度，證明它有意侵犯其弱小鄰國的主權，也證實了莫洛托夫曾經向希特勒表示過的蘇聯想控制巴庫（Baku）

(按在外高加索)以南的土地的野心。這些事情，使我從一九四六年二月起開始不斷地發表一般人所認為反映美國對蘇態度更趨強硬的演說。小視我們之間的歧見的作風，已不再是明智的看法了，這是因為我們已無理由相信我們會被一個獲得早日和平的共同目標所鼓勵。

因為我國武裝部隊的狀況，更使我們不必小視我們與他國之間的歧見。在一九四五年秋季，美國陸軍的復員較任何人預期為速，復員的點分制度使我國僅存幾個基本部隊。當時我以戰時動員局局長的資格，會經贊同這個制度——因為我認為這是公允的制度，而且我以為世界將需要迅速與持久的和平。但這種制度，使最有經驗亦即服役最久的官兵首先復員。於是各部隊的重要幹部都在同時間內復員了。先前向我叫得最響，要求對蘇聯採取強硬態度的人，也是後來為着要求迅速復員而叫得最響的人。從前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很聰明地講過一句話：「山姆大叔應該帶着大槌而低聲說話，」我的批評家們却要我帶着小杖叫得高聲些。

一年以來美國的陸軍正在改組中，現在別無理由再把我們與蘇聯的歧見瞞着，不向人民作完全報告了。

既然決定這樣之後，我們的新聞政策就必須要有一個改變。人民應該知道進行中的事，否則我們就不能盼望他們的支持。從這時起，包倫，麥德謨二人與記者們所舉行的每日談話，以及我時常與記者們舉行的招待會，就使人民能夠充分知道我們與蘇聯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所作的談判了。

我繼續認為，如果我們要獲得持久的和平，這個和平就必須是人民的和平。惟有使人民充分知道外交的事，才能使他們充分影響外交事務的執行。

我認為基本的民主權利——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必須不斷地應用於外交事務的執行中。如果這權利對於美國國內民主的運用是不可少的話——我相信如此——那麼對於更需要認識和了解的外交事務方

面，至少同樣必須加於應用。要執行這個政策，就必須打破過去的外交習慣。但這種習慣是不易打破的。一方面，需要時間和努力；另一方面，還需要人民經常地要求知道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在一切有關我們與他國政府的關係的重大問題方面，如果人民完全不知道，他們就不能智慧地行動。

願光明到來——大量的光明！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

記不起確實是什麼時候羅斯福總統告訴我關於原子彈的事了。我却記得那是一個炎夏的午後，祇有羅斯福總統和我兩個人坐在他那間橢圓形的辦公室裏，討論戰時動員綱領的某些方面。突然，並無顯著的原因，他開始把曼哈坦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可驚故事告訴我。

我承認我覺得這故事是幻想的。我斷定總統之誇張那計劃的各種可能性，是爲着注意我驚異的反應。我並未使他失望。當他注意我的驚異表情時，他欣然進一步以科學家們對於原子能將作何用的預告來驚駭我。他告訴我道：一九三九年以前，德國人在他們的實驗方面已有若干進展，且他知道德人正在繼續努力，他說這是兩國之間的一個賽跑，待看誰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

在那時，我想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罷，總統認爲德國人在原子賽跑中已在我們的前面了。他的信念所根據之情報包含的猜測比事實多，這是很顯然的。我們的情報人員要得到這樣一個高度技術性問題的正確情報，勢必受限制。就在我們在戰後所知，總統對於德人在這方面的進展，顯然估計過高。然而，類似的報導有助於刺激我們格外的努力以實施曼哈坦計劃。

自第一次討論以後，總統和我彼此之間都有好幾個月沒有提起原子計劃。事實上，除非有絕對的必需要，從未有人談到它。我記得有一次向陸軍部長史汀生提起它，史汀生從曼哈坦計劃初創時就親自監督該計劃。他對我的知道這件事表示驚異。

即使總統未曾告訴我關於這個計劃的事，我既爲戰時動員局的局長，就難免注意這樣巨大計劃的某些方面。這個計劃當然無論在人員及物資方面都有最高的優先權。爲了人力是我們最感缺乏的一項，這

個最高需要十二萬五千人的計劃，逃不了我的注意，尤其因為這樣多的工人都是高度熟練的技術人員。但是，我未曾直接過問這計劃，並且因為太忙了，無暇對此發生好奇心。如是一直等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當勞工情況的另一方面使我看到真象時，我才確實知道我們已有了重大的進展。

那時橡嶺工廠 (Oak Ridge Plant) 方面正在努力組織工人；有關的勞工組織的管轄權問題發生了爭執，這些爭議會提交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在那情形之下所需要的公開審理會因陸軍部的請求而四次延擱；再度延擱是不可能的。

陸軍部次長柏德遜，格羅夫斯少將 (Leslie R. Groves) 來白宮和我討論這個問題。格羅夫斯將軍指出，審理就需要提出關於所雇工人數目，將雇工人數目，一個特別單位與整個計劃的關係等事的證據。格羅夫斯將軍相信這樣的證據勢必洩露許多事實，大足妨害這計劃的機密。他們認為如果我召集我們三人與有關勞工組織的領袖們在白宮舉行一次會議將是有益的。我表示同意。

在我們討論時，柏德遜先生說，陸軍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就可知道他們究竟能造成那種炸彈與否。他和格羅夫斯將軍都認為這項努力將達到成功，並且他們相信到那時就可見分曉了。這是我聽到任何人敢於指定一個日期的第一次。

會議定於十二月五日晨舉行，工會方面出席的職員是國際火夫及加油工人兄弟會的克拉克先生 (Joseph P. Clark) 及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的魏格納先生 (Al Wegener)。

我們把這些人引為我們的心腹，我們告訴他們很少人知道的那個計劃，在那時。我相信，祇有四個國會的議員得知任何具體的情報，我們要求勞工組織的職員們放棄華格納法案規定他們應有的權利，並在保護那個計劃的機密方面與格羅夫斯將軍合作，他們同意幫忙並且立刻照辦，他們奉命向他們各自工會的會長麥克納瑪拉先生 (John F. McNamara) 白朗先生 (Edward J. Brown) 解釋情形；這幾位領袖都同

樣允諾他們將全力合作。他們的諾言包含犧牲法律所給他們的權利，但他們是守約的。他們說服各地工會的領袖們，於是這件機密在戰爭期間得以保持。

就實際而論，這計劃沒有更普遍地被人知道，這事常使我感到驚異。國會那時竟願撥款約二十億元而不要求關於此款用途的更多情報，這事也是可驚異的。那少數國會的領袖的確知道一些這個計劃的性質，但他們竟能抵抗誘力，不將這事告訴同僚就這樣分擔起重大的責任，實在值得讚譽。

四月一日的限期到了，但這鉅大努力的結果仍在可疑之中。然而陸軍部長史汀生相信這是會成功的，他把他的信心漸漸灌輸給總統。他這樣做使我很高興。但我常引以爲憾的是羅斯福總統到死還沒有確知這計劃是成功的：當這項努力看來無望的時候，祇賴着他的眼光和勇氣，這計劃才得到結果。

羅斯福總統死後不久，史汀生部長報告杜魯門總統說，科學家們和他的指揮下工作着的其他人們，相信他們在極短期內將造出一顆原子彈，史汀生建議任命一個臨時委員會，考慮和向總統建議關於原子彈試驗，原子彈在戰爭中的用途，以及戰後原子能的用途等重要的政策問題。

杜魯門總統批准史汀生先生的建議並請他担任委員會的主席。總統要我在這委員會中做他的代表，這委員並包括海軍部次長巴特（Ralph Bard），助理國務卿克萊敦；科學研究及發展局局長布施博士（Vannevar Bush），哈佛大學校長柯南特博士（James B. Conant），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康浦頓博士（Karl T. Compton），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兼陸軍部長史汀生的特別顧問哈里遜先生（George I. Harrison），在陸軍部長史汀生缺席時，由哈里遜先生担任主席。我們在工作中又受到原巴與該計劃有關的一班科學家的協助。他們是康普敦博士（Arthur H. Compton），福爾米博士（Enrico Fermi），勞倫斯博士（E. O. Lawrence），歐本海默博士（J. Robert Oppenheimer）等。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及六月間，正當全國的注意力集中於歐洲戰事結束及舊金山會議之時，上述的人

在華盛頓靜靜而緊張地工作着。那是一樁有興趣的——令人興奮的——工作。當我被人推測正在南羅來納州休息時，若干新聞記者却注意到我在華盛頓，並且對我的行動發生好奇心。當然，我不能告訴他們，所以他們只好憑藉猜測。他們大多數推測我在那裏是與政府公務中的某種任命有關。

在那時期中我去過馬里蘭州碧西斯達(Bethesda)的海軍醫院幾次，去與前任國務卿赫爾(Hull)談話，並蒙他就國務院工作有所指教。國務院的工作是我在數週之內行將負責的，有一次我在去碧西斯達途中，遇到兩個年輕的水兵表明我戰時的服務是如何的不重要。

他倆正在招呼路過的車輛要求搭乘，但沒有多少成就。有一個實際上在靠着一顆柱子，微有醉意。我想他們需要乘汽車。他倆就與我同坐在前面的位子上。靠近我身旁的那位青年很機警。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他希望轉移我對他朋友的注意力，所以，就和我談很多的話。最後他問我做什麼行業，我說我沒有行業；我已離開一種職業。他同情我於是問我以前做的什麼，我想使他有點印象，我說，我會做過戰時動員局長，他的表情顯然表明他從未聽到過這職位。他沉默了一刹那之後，又努力來滿足他的好奇心而問我：「那末，你在那事之前做些什麼呢？」

我說：「我是經濟穩定局局長，」我看他也未曾聽過這名字。

他回答說：「我是說的戰前。」

我告訴他：「我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法官，」這次他動容了，並問：「你是說高等法院嗎？」

我說：「是的。」

他用肘輕推坐在他旁邊的那個有紅髮的青年說道：「你喜歡做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嗎？」

那個年青的水手答道：「我不喜歡做，沒有陞遷的機會。」

布施，柯南特及康浦頓三位博士會在臨時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敘述原子彈的破壞力量，我聽到他

們的話後相信，當原子彈造好後，就將使太平洋上的戰事迅速結束，我記得我做參議院海軍撥款委員會的委員時，常聽得海軍官員們說，已爲每一種進攻的武器製造一種新的防禦武器。我問科學家們對原子彈有什麼防禦方法。但這些曾經主持過關於原子彈的顧問工作的傑出的先生們，不能想到任何防禦的方法，他們確會預料更大，破壞性更烈的炸彈的發展。我問他們我該不該相信防止進一步發展的惟一方法爲殺盡所有的科學家。這個建議不合他們的意。

我們聽過科學家們討論那個計劃的發展後，就與那些曾在田納西州及華盛頓州完成建築巨大工廠，及創立生產原子彈的製造方法等驚人工作的工業家及工程師們在一塊兒盤桓一天。我問那些工業家及工程師們，他國政府要化好多時間才能造出原子彈，因爲這在決定管制制度時極有關係。這問題當然不單是一個物理學上的問題，而是物資的，工程技巧的，技術知識的，及許多其他因素上的問題。我從我們接到的所有情報中得一項結論：即任何其他政府至少需要七年至十年的時間才能造出一顆原子彈，並且我想如要以這樣的速度來完成這樁工作，必須較任何國家在近年內復原的速度更快地回復正常狀態。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臨時委員會一致向總統建議儘速用原子彈來對付日本。附帶聲明原子彈祇應用在軍用工廠或軍事設備的所在地。除了巴特先生之外，委員們都建議使用原子彈時不預發警告。這最下一項問題我們會仔細考慮過。

我們恐怕如果告訴日本人原子彈將用在一定地點，他們可能把戰爭中被俘的美國健兒帶到那裏。專家們並警告我們道，將於新墨西哥州舉行的一次靜止試驗，即使是成功的，仍不能爲一顆原子彈自一架飛機上投落時將爆炸的定證。倘使我們以這種新的高度毀壞性武器警告日本人，以冀感服他們，而事實上原子彈未能爆發，則我們適予日本軍閥以援助及安慰。嗣後，日本人民恐將不爲我們可能發表的，希望勸他們投降的任何聲明所動。

在新墨西哥州舉行試驗的安排也是該委員會的一個問題，因為沒有一個人能確定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的全部結果可能怎樣，所以在必要時不得不安排疏散整個區域。我們知道在最好的情況下，如果爆炸的響聲傳得太遠，將使秘密難以保持。新聞稿須先準備，只有情勢必要時，才向公眾發佈，其中有應付每一種可以預見的意外情形的報導。

我既為總統在該委員會的代表，將我們的各種建議的理由報告給他是我的責任。我告訴總統，我們在討論中，完全倚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所提軍事情勢的估計。他們的計劃主張於十一月一日進攻日本本島最南的島嶼九州。以後又於一九四六年春進攻主要的本州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預料我軍五百萬人以上將參加進攻。那時估計的日本軍約五百萬人——我們後來發現這個估計十分正確。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會告訴我說，日本空軍的自殺性攻擊增加我們船隻及人員的損失。我們離日本愈近，這類攻擊格外猛烈；一支進攻的部隊必然遭遇更狂暴及胡亂的攻擊。軍事專家們報告我們，從他們所得到的事實看來，他們認為我方進攻將使我們死傷一百萬人，我盟軍及敵軍的死傷更不必說了。

我把這些結論報告給總統。我也會將那些到委員會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及工業家們所所要說的話，告訴了總統。總統表示他的意見道，就他看來，這容或是可惋惜的事，但惟一合理的結論為應用原子彈。

當我們乘重巡洋艦奧古斯他號在赴波茨坦途中時，原子彈決定性試驗的準備工作正在新墨西哥州進行着。世界上空前的爆炸震動艾拉馬戈多（Alamogordo）沙地時，總統，李海海軍元帥和我正在察看柏林的瓦礫堆。不得不藉最秘密的電碼傳遞的關於原子彈試驗的報告，在數日之間尚未到達我們這裏。那時，會議正在積極進行；我是這樣的忙，以後我終不能記憶陸軍部長史汀生把消息傳遞給我們的時間及情形。我對這時間印象模糊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在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已使我相信原子彈將獲成功。關

於試驗的新聞看來祇是證實一樁已經很熟悉的事情而已。

英首相邱吉爾對這些新聞感到濃厚的興趣，邱吉爾與羅斯福總統的合作對於這樁偉大冒險的事貢獻極多。邱吉爾會與杜魯門總統詳盡地討論那計劃，並渴望自我這裏聽到關於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他除對原子彈在對日戰爭中的效果感到極大的興趣外，並且比許多其他人更清楚地預見施放原子能後所呈現的各種可能性。

我們會碰到一個極難決斷的局面。我們不能信賴日本的向蘇聯探詢談判式的和平，不能把它看作無須使用原子彈，日本就會無條件投降的證明。在事實上，史達林說，最後遞給他的函件說日本「甯願戰鬥至死也不接受無條件投降。」在那種環境之下同意讓和祇能引起錯誤的希望。我們不信賴這點，而信賴波茨坦宣言。

我們剛研究過自新墨西哥發出來的一切報導，總統和我下一結論說：我們應告訴史達林說，我們已研究出原子彈，並且除非日本迅速承諾我們所要求的投降，否則我們將建議應用原子彈。那時蘇聯政府並未與日本作戰，但我們會聽到說他們有意參加戰爭，所以認為史達林應該知道。

在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三巨頭會議閉幕時，總統沿着大圓桌跑過去與史達林談話。總統談話片刻後又回到我們這邊，我們就一同乘車回「小白宮。」他說他已告訴史達林：經過長時間的實驗後，我們已研究出一種毀壞性遠比任何他種已知的炸彈為烈的新炸彈，並且除非日本投降，否則我們打算很快就應用這種炸彈。史達林僅有的回答是他聽說有此種炸彈很高興，並且希望我們應用它。我對史達林的缺乏興趣感到驚奇。我斷定他尚未把握着這個發現的意義。我認為次日他將詢問關於原子彈的更多情報。但他却沒有問。後來我斷定，因為蘇人保持他們在軍事武器方面研究的秘密，他們認為詢問關於我們的研究結果是不相宜的。

在與史達林談話後的兩夜，波茨坦宣言發表了。我們誠懇地希望日本人注意我們的警告，就是除非他們無條件投降，他們軍隊的毀滅及本土的蹂躪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日本首相於七月二十八日發表一項聲明說那宣言不值得注意。這話令人喪氣。那時沒有什麼辦法，祇有應用原子彈了。陸軍部長史汀生選擇了有軍事意義的目標若干處，杜魯門總統批准了他的計劃。不久以後史汀生部長就啓程回美。

不論日本首相的聲明如何，我仍希望日本政府將改變主意。八月二日我們離開波茨坦的那天，還沒有接到日方進一步的回音，我大感失望，然後承認，我們避免應用原子彈的希望實際已告破滅。

總統接受了英王喬治邀他小遊普利穆斯港 (Plymouth Harbor) 的請求，我們將在該港會到奧古斯他艦，即乘該艦返國，因為繼承法規完在總統死亡或辭職時，總統職位該挨到國務卿繼承，所以杜魯門總統和我分乘兩架飛機自波茨坦飛往普利穆斯。我們在普利穆斯附近的哈羅比爾 (Harrowbeer) 降落。不久後李海海軍元帥 (Leahy) 和我陪伴總統登英戰鬥艦名譽號 (Renown)，英王喬治即在該艦款待我們午餐。

英王已從邱吉爾那裏得知關於原子彈試驗成功的事，並且渴望知道關於這事的一切。在我們午餐上大部份的會談都集中於原子彈。這一羣人中惟一懷疑試驗成功的是李海海軍元帥，英王取笑李海的悲觀。李海覺得科學家們大大地誇張了原子彈的破壞能力。英王喬治在整個會談中，實與若干美國人對他的印象相反，他表現對外交及軍事形勢的消息是靈通的。我認爲他對於當前未決各種問題的意見是正確的。晏午時分，英王至奧古斯他艦回拜，英王離艦後，奧古斯他號即啓程返國。

八月六日，總統和我與士兵們同進午餐，十二時前數分鐘，白宮地圖室的守候官葛若涵 (Frank H. Graham) 匆匆走入餐廳，把來自海軍部的簡單消息遞給總統，紙上說廣島 (Hiroshima) 已於數小時前被炸。十分鐘後葛若涵又遞來第二張電報，這是陸軍部長史汀生發來的。史汀生的報告顯示原子彈投擲的

結果，甚至比試驗後使我們預料的結果還要成功。總統把那消息朗誦給我聽，於是站起來並請全體艦員聽他講一會話。他宣佈道：他剛纔接到兩個消息，報告他我們第一次應用威力驚人，爆炸力為「Z」炸藥二萬倍的新武器已得到很成功的結果。當總統手裏拿着那兩張消息離開餐廳時，艦員們鼓掌並歡呼。他又走到艦上的士官室，向軍官們宣佈同樣的事，艦上喝采之聲又起。數分鐘後，艦上無線電開始廣播華盛頓方面所發關於原子彈的新聞以及原子彈發展的報告，這報告是總統剛離開德國前所批准的。

我想日本本部軍隊南方大本營及軍需庫——廣島——的被炸，將使日本人相信盟國在波茨坦宣言中所說的話是當真的。飛機投下數百萬份傳單警告日本人說，名單上開列的十個城市中有一個將為下次轟炸的目標。我們未接到他們的照會，於是在八月八日，第二顆原子彈投落於有許多戰時工廠的主要海港長崎。

像廣島那樣，長崎的破壞是可怕的。日皇不等待我們打算執行波茨坦宣言的進一步證明。他打開了存在於日本內閣中已有幾天之久的僵局；在八月十日提出了降議。無人該懷疑原子彈所有的破壞，影響了日皇和日本內閣的行動。

那兩顆炸彈就是我們當時備供應用僅有的兩顆，但其他原子彈正在製造中，預料有幾顆的威力更大。在這兩次轟炸中，有很多的死傷，但如果我們的空軍跟着向日本各城市投擲燃燒彈，死傷一定更大。原子彈使戰爭結束，的確拯救了大批美國健兒的生命。

凡在原子彈發展或我們使用原子彈的決議中負一部分責任的人都不對投擲原子彈一事感到愉快。人們為執行犧牲如許生命的一樁任務而感憂戚乃是自然而正當的。這些人大都是文人，但我不懷疑在軍隊中一切有思想的人對於空襲，投擲燃燒彈以及犧牲許多生命的類似舉動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身為軍人，並不像文人那樣寫文章給報紙發表他們的意見。但事實是，戰爭仍如余曼將軍(William T. Sherman)

所形容的那樣。

日本投降後不久，許多人要求我們立即把我們所有關於原子彈的全部科學及工程知識公諸世人。大多數有思想的人都想對原子能實行國際管制。但有些人並不考究我們爲防範違反國際協定者所必需的保障。我同意那些認爲若干其他國家勢將造出原子彈的科學家們的話，但我認爲我們若果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便不應縮短發表原子彈的時限。我認爲如果任何國家反對將原子能完全交給一個國際組織來管制，使其有防範違反國際協定的保障，那末我們能使該國不握有原子彈的時間愈長，對於全世界的人民就愈有好處。我現在仍舊這樣想。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英首相艾德禮及加總理金氏來華威頓和總統商談我們未來的原子能政策問題。他們到達的那天，總統邀請他的客人陪他在星期天乘總統的遊艇「威廉斯堡號」(Williamsburg) 往波托馬克(Potomac)河下流巡遊，往遊者尚有哈里法克斯勳爵(Halifax)，安德遜爵士(Sir John Anderson)，海軍元帥李海和我本人。那天下午開始會談。當夜繼續會談，一談數日之久。十一月十五日，總統，艾德禮先生及金氏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們宣佈三國政府同意需要在聯合國主持下採取國際行動，規定管制原子能藉以保證它僅用於和平的目的，宣佈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的主要武器爲非法，並規定藉視察制度作有效的保障。

歷史將不能顯示堪與這種慷慨的建議相比擬的任何政府的行動。我們與我們的盟邦英國及加拿大合作，研究出一種毀滅性使一切有思想人士都感駭異的武器，這是我們消耗了一大筆經費才得到的結果。我們原可以保持這種武器並利用它來威脅其他政府作種種讓步。三國政府並未這樣做，却趕緊將這武器的秘密貢獻給一個國際組織，俾供和平而非破壞性的用途。

我原定於次日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理士敦(Charleston)演講國際貿易問題。這個歷史性的協定既

已發表，我便把我演講稿的前半部重新寫過。我不想忽略絲毫機會來向我國人重申管制原子能的重要性，「俾原子能不用於戰爭和毀滅，而用於謀世界的和平與幸福。」

爲着對付原子能的挑戰，我們必須「讓我們心地勇敢。」同時，我警告道，「我們切不可樂觀地想像，以爲一個睿智，力足以保護我們全體，並且十分寬容和民主，值得我們傾心愛戴的一個世界政府，可於一夕之間完全成長起來。」

「如果我們將保持文明生活的延續不斷，我們必須用手頭所有的物質來，改進及增加現有的制度，直到它們能應付我們時代的嚴厲試驗爲止。」

我敘述前一天在華盛頓宣佈的計劃並說道，我們知道那計劃是必然綿長及困難的旅途之極謹慎的第一步。「我重申縱使我們已提出一個計劃，「但建立及發展各種保障，以保護我們全體免於難以形容的毀滅，却是……所有各國政府的責任。」

我說「沒有世界全體國家一致的努力和不懈的合作，將不會有持久與有效的保障以對付原子彈。」一個月後，當貝文先生和我赴莫斯科時，我們帶了一個以十一月十五日華盛頓協定爲基礎的很明確的建議去，該建議主張由聯合國設立一個原子能及大規模毀滅性的一切武器的委員會。

我建議我們把原子能建議列於議程之首。莫洛托夫先生反對，並要求把它置於議程之末。我表示同意，但我懷疑他爲什麼採取這樣一種立場。起初，我認爲這或者是因爲報載蘇聯最傑出科學家之一，傳說是一位原子核物理學家，現在巴黎。我以爲莫洛托夫希望他參加討論，所以延緩該項議程。但當那位科學家回到莫斯科仍不出席會議時，我那想法被推翻了。我於是得一結論；莫洛托夫的要求祇不過是給我們一個印象，就是蘇聯政府不認爲原子能問題是重要的。

在莫斯科，如同在波茨坦及倫敦的外長會議上一樣，沒有一個蘇聯代表團的代表是對於原子能表示

任何好奇心的。在波茨坦，自總統與史達林談過原子能的事後，無論史達林或莫洛托夫都沒有提起這事。在倫敦，莫洛托夫先生毫不關心；他惟一提及原子彈的地方是偶爾說到希望我口袋中沒有藏着一顆原子彈。我斷定我在波茨坦所得的結論是對的，即蘇人從沒有把關於這樣一個發現的消息透露給任何人，所以認為他們不宜對我們的發現表示好奇。

但原子能問題的延擱對於哈佛大學校長柯南特博士大為不便，他這次是慨允以顧問的資格陪我赴莫斯科。其所以這樣做是預料一俟原子能建議案通過，他即可回國去處理等待着他的急務。但他却不得不呆坐十天左右，以等待討論全無關係的問題。

在大多數會議中，柯南特坐在我附近。他做了約一個星期的沉默觀察者之後，有一天把身子傾向我說道：

「我想美國每一個大學的校長都應被邀出席一次外長會議。於是他們或可體會與我們的蘇聯朋友成立協議所需的耐性了。」

我似覺他對他的同道大學校長們懷着些隱密的惡感是不應該的，但我却佩服他的想法。

柯南特博士的參加我們的代表團後來為莫斯科報紙所注意。他和我都預料若干蘇聯科學家將會拜訪他。但他們並不會來拜訪。

一天下午，莫洛托夫先生招待三國代表團。他常是一位良好的東道主。莫洛托夫先生與柯南特博士談話時說道，像這麼大的哈佛大學的校長，他在訪問莫斯科期間應向莫斯科大學演講原子能問題。當晚柯南特博士把莫洛托夫的話告訴我，並且說他願意作這樣的演說。他認為這是刺穿「鐵幕」及解釋我們對於原子能意見的一法，但他不能確定莫洛托夫真有此意。次日我對莫洛托夫提起這事說，如果他是認真的話，柯南特博士將樂於向莫斯科大學演說。莫洛托夫先生他並不是認真說的，他並無權力為莫斯科

大學發請帖，他不過想尋尋開心而已。

當我們最後討論到原子能問題時，莫洛托夫先生對我們的建議僅提出幾點修正。我們略加修正就接受了蘇聯的建議。有一項建議述及擬設立的原子能委員會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關係。修正後的建議規定：鑒於安全理事會保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安全理事會在影響安全的事情上應對原子能委員會頒發指令。這事應由安全理事會去做是顯然的，安全理事會是繼續開會的，並且有權採取行動。在另一方面，大會是不常開會的，而且甚至在開會時也祇能提出建議而已。

我們的建議中惟一引起莫洛托夫嚴重反對的一節規定是：「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應分期進行，每一期工作的順利完成將增進世界應有的信心，然後下一期的工作才可以開始。」

莫洛托夫先生辯論道，這是一個應由原子能委員會決定的問題。我告訴他這是我們整個建議的精髓，沒有它，我們也不會提出這個建議了。我說這項措辭會經總統，英首相艾德禮及加總理金氏的同意，我們要堅持保留這節。他收回他的異議。因此，我們預料將引起激烈討論的建議，只經過比較議程上任何其他問題為少的辯論就被通過了。

在史達林大元帥作東的聖誕前夕宴會上，我把柯南特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對原子能計劃的成功，尤其卓越的貢獻等話告訴了他。史達林不似莫洛托夫先生所顯出的那樣漠不關心。他說，雖然科學家們說的是他所不明白懂得的話，他們的確做了一樁驚人的工作，並且他認為負責發現原子能的美國科學家們，尤將受到慶賀。

數分鐘後，負責勸酒的莫洛托夫先生建議敬柯南特博士一杯酒，很有禮地，表示希望博士沒有在他的口袋中藏一顆原子彈，柯南特博士也同樣有禮地回敬一杯酒。我坐在史達林大元帥的旁邊，史達林起立道：就這樣輕輕略過柯南特博士的工作是會使他不滿的。他說，他相信，柯南特博士及他的同志已貢

獻一樁偉大的功績，他要慶賀他們的成功。

在我自莫斯科返國及我動身赴倫敦出席聯合國大會之間的數日內，我預料我們的建議將被通過而有所行動。我指派一個委員會開始擬訂將於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時提出的計劃，該委員會由副國務卿艾克遜爲主席，前陸軍部助理次長麥克勞，布施博士，柯南特博士及格羅夫斯將軍等爲委員。

在倫敦，英國政府代表安全理事會所有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及加拿大，向大會提出了在莫斯科擬定的建議。一月廿四日，適當該議案未經修改一致通過之前，我向大會作一簡短的報告，重申管制原子能的共同責任。

我重申「因原子能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力量的發現而呈現的問題，不能藉任何一個國家來解決。這些問題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責任，我們每一個國家都應盡我們的責任來應付這些問題。在應付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知道在這個原子時代及這個互相依賴的世界中，我們在保持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遠比或將使我們分裂的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爲重要。」

在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的前一日，我在華盛頓任命組成的委員會組織了一個顧問會議，以李連塞爾(David E. Lilienthal)爲主席，其他委員爲新澤西電話公司總經理巴納德先生(Chester I. Barnard)；洛杉磯拉摩斯(Los Alamos)原子實驗所所長歐本海麥博士；孟桑妥化學公司(Monsanto)副總經理湯瑪士博士(Charles Allen Thomas)，及奇異電氣公司副總經理文尼(Harry A. Winne)。

所謂艾克遜—李連塞爾報告是委員會及其顧問們的工作。該報告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通過並公開發表。我爲該報告所作的序文中述及該報告是「有知識者的公開討論的適當起點，有知識者的公開討論是發展健全政策的要素，」並重申「公開發表文告並非作爲一個政策的聲明，祇是當作這種討論的一個基礎而已。」

這個報告的目標達成了。全國都舉行討論，並且報告中所陳述的目標已獲得普遍的贊同。

該報告的要點已由副國務卿艾克遜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廣播中加以討論，他在廣播中說：「明白地說，這報告訂定了一個計劃，依照這計劃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製造原子彈及其原料。一切危險活動均將由抱着世界上純正目的並能吸收合格人員的一個行動國際機關來執行——不僅視察而已。這種危險活動的獨佔仍將一片安全活動的龐大的生產園地，留給各個國家和它們的工業與大學去開發……美國目前所享有的關於原子的發明事物的極有利地位不過是暫時的，這種情形不會持久。我們現在必須利用這種機會以促進國際安全，並藉國際協定來執行我們建立一持久和平的政策……」

我向總統保薦任命巴魯區(Bernard M. Baruch)負責將艾克遜——李連瑟爾報告所引起各項建議變成一個可以實行的計劃。巴魯區在最近的戰爭如同在第一次世界戰爭中那樣，對於公務會有卓越的貢獻。當我任戰時動員局局長時，他會擔任過總統及幾個戰時機關首長的非正式顧問，他本來已擺脫公務，但洞察這種指定任務的重要性，他同意擔任這項工作。總統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把他的名字提出參議院。這項任命，大家都報以其應得的歡呼，於是巴魯區的提名很快地被批准了。

關於我們參加聯合國的一項法律規定，我們在這機構及其各附屬委員會的代表們必須遵守總統所決定而由國務卿轉致的政策，因此，巴魯區先生要求頒下一項說明美國管制原子能政策的指令，我請他協助擬定這政策。巴魯區先生，他的同僚韓柯克先生(John M. Hancock)，艾克遜先生和我個人之間舉行了數度會議以後，我們協議了一個廣泛的長達十一頁的政策聲明。我將這項聲明提請總統考慮。後來，總統、巴魯區先生和我再加以討論並作若干修改；總統就把這修正的聲明和他的指令，交給巴魯區先生。總統當時指示巴魯區先生自行判斷最可能完成所述目標的方法。

指令中所敘述的美國政策由巴魯區先生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提交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那是提

交該委員會的一篇有價值的演說，開端就對委員會作了這樣莊重的訓誡：

「我們是在這裏就生死之間作一選擇。」

美國建議設立一個國際原子發展局，將發展及使用原子能的所有階段，自原料開始，都付託該局，其中包括：

- 一、經營或擁有可能危及世界安全的一切原子能活動。
- 二、管制，視察及特許一切其他原子活動的權力。
- 三、扶植原子能有益的用途的責任。
- 四、研究及發展的責任，目的在使該局站在原子知識的最前線，俾該局瞭解，以致能查出，原子能的濫用。

巴魯區先生說，當包括否認原子能為武器的一個適當的管制制度業經議定及付諸實施，而違反管制的規定的懲罰辦法業經規定時，即將停止製造原子彈；現有的原子彈應按照條約的規定予以處置；並將關於製造原子能知識的全部資料交給該局。

此項政策並規定懲罰下列違法舉動：（一）非法擁有或使用一顆原子彈或可用於一顆原子彈中的原子原料；（二）強佔屬於該局或為該局所特許的任何工廠或其他財產。

巴魯區先生選拔了一批優能的人才，包括韓柯克先生，韓氏在兩次世界戰爭中的服務是可貴的；前戰時生產局副局長伊柏斯特特(Ferdinand Eberstadt)；曾於第一次世界戰爭中在戰時工業局為巴魯區先生同僚的斯瓦浦(Herbert Bayard Swope)；曾在戰時動員局及國務院做過我的特別助理的西爾斯先生。他並召法勒爾先生(Thomas F. Farrell)和托爾曼博士(Richard C. Tolman)協助他為美國代表。巴魯區自始就堅持該計劃應規定，條約一旦獲得批准，任何違反其條約義務並為毀壞的目的而發

展或使用原子能的政府應受迅速及確實的制裁；以及在違反管制原子能條約的案件中，任何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都不准否決安理會的懲罰行動。我們的立論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在這特別情形中應事先同意放棄否決權。

自六月到十一月原子能委員會所發生的每一椿事都已全部報告大衆。當外長會議在紐約舉行時，巴魯區先生和他的同僚和我商討請求原子能委員會立即表決美國建議的原則一事是否適當。

這幾位先生研究這問題已有六個月之久，並斷定美國的建議在大體上是原子能委員會每一個會員國所能接受的，惟蘇聯和波蘭爲例外。他們對於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先生的策略的敘述，祇不過是我在一年前的外長會議中因其他問題所遇到的拖延策略之複述而已。他們使我注意一件事，就是原子能委員會中兩個會員國的任期將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如果到那時未採取行動，在一月中葛羅米柯先生或將勸議延擱進一步的行動，理由爲兩個新會員國應有時間研究該問題。我知道他們是對的，並且同意他們應立刻行動。

十二月五日，巴魯區先生向原子能委員會提出立即行動的要求，並提出一串一般性的判斷及建議，這些判斷及建議襯托出美國的計劃。他指出原子能委員會及其諸附屬小組委員會已開會七十餘次，所以有資格採取這步驟。在蘇聯及波蘭棄權之下，原子能委員會上同意採取行動。後來在十二月三十日，原子能委員會通過以第一個報告提交安全理事會並附帶一項建議，即建立一個廣泛的國際管制及視察制度，其職權由一個條約來規定，所有的聯合國國家均有權利參加該條約，這次表決仍爲十對零，蘇聯和波蘭棄權。

該報告建議設立一國際機關，在所有國家間促進關於原子能用於和平的目的之科學情報的交換，防止爲破壞的目的使用原子能；及施行保證原子能僅供和平目的用途所必需的管制。該國際機關能執行研

究和發展的責任，俾在原子知識方面保持第一位，並有進行破壞性目的的原子研究的專權。

該機關的代表們將有爲視察及其他職務關係，在每一個參加國家的領土內出入無阻的權利。該機關應有權利禁止原子武器的製造，擁有及使用，規定任何現存原子武器的處置辦法，並保證可用於武器中的原子核燃料的適當應用。

原子能委員會報告道：該條約應特別指出如何決定違反條款的情形，並應界說構成國際罪的違法情形。該條約並應確定如何實施其措施及如何徵罰違約者。該委員會建議嚴重的違約事件應立即報告簽字於該約的國家，聯合國大會及安全理事會。

原子能委員會擁護我們的論點，即違約情形一經確定及實施條約與徵罰的方法通過後，一個違約者的行爲的後果應不受司法權或其他方面的法律保護。報告中並說，一樁違約事件可能非常嚴重以致可能行使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承認的固有的自衛權利。

最後，該報告規定條約中應包括實施國際管制及視察制度的全部方案，並應規定逐步的計劃以完成其程序。原子能委員會將決定任何一特別階段或若干階段何時已告完成，以及下一階段何時將可開始。

當巴魯區先生正催促對原子能問題採取行動時，莫洛托夫先生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一個普遍裁軍的建議。我不重視該建議。蘇聯代表團真正圖謀的是使原子能委員會與一般裁軍委員會合併。

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以來的記錄顯示如果這項努力成功將發生何種情形，安全理事會迄未能同意建立軍事部隊以實施聯合國決議的比較簡單的問題，所以容易猜想想使一個委員會同意包括減少海上，空中及陸上軍備的一般裁軍方案需要多久的時間——一定好幾年。所以，如果兩個委員會合併，將有更多的藉口可以稽延關於管制原子能的協定。

雖有管制原子能的明白而顯然的需要，雖已獲得蘇聯及其附庸國以外各國所批准的一個計劃存在，

但協議之期似仍遙遠。如果，我們不能同意管制這一種主要的武器，我們必不能同意一切軍備的限制。蘇聯未考慮到巴魯區先生所提出的美國建議已貢獻了一個有過於管制原子武器的型式。創立原子能委員會的決議特別授權該委員會調查如何管制其他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為管制原子能而發展的型式可被援用於這類其他的武器，如細菌戰爭等。該型式可表示出真正裁軍的開始，但蘇聯寧願忽視本來可能及將來仍舊可能有結果的一樁事。

蘇聯的策略是非常漂亮的。「裁軍」一辭對於一個厭戰的世界極有吸引力。但想使裁軍有效必須顧及將來。現在容易看出，當火藥已經發現的時候，開始藉限制弓和箭的使用來「裁軍」是一樁愚蠢的事。但事實上這就是蘇聯所建議的。

大會堅持普通軍備管制委員會的工作與原子能委員會應當有所區別。然而，蘇聯代表繼續力謀兩委員會合併。

我相信我知道他們的動機。

他們想藉這樣一個合併問題擺脫他們在莫斯科所同意並已經聯合國通過的原子能決議。該決議規定保障及適當的視察，並規定工作應分期進行，該委員會在開始下一期工作以前，應由視察證實這一期工作進行圓滿。這一項是莫洛托夫先生在莫斯科所反對的但終於接受了。我想他自此以後一直懊悔該項協定。該節防止在視察及管制制度有效實施前充分交換情報。該協定將使國際組織的代表能視察蘇聯的工廠，這些代表可為任何國家的國民。這是與他們的整個制度相衝突的，他們的整個制度是建立在秘密的基礎上，並且是為秘密所支持的。

所以，原子能決議是蘇聯想使世界遺忘並急於希望看見其將廢除的一個協定。

這決心反對有效管制的原因是同樣明顯的。當葛羅米柯先生最近說，美國的計劃建議「建立一個視

察制度，而給予無限的權力，並使其可能干涉各國的內部經濟生活」時，不啻宣佈了那個原因。

不幸的但顯然真確的是，蘇聯認為資本主義者的干涉比原子彈更爲可怕。保護蘇聯經濟制度不受干涉，似比保護人類不受原子戰爭的災難更爲重要。

這種恐懼並說明蘇聯關於否決權用於原子能問題的立場。葛羅米柯先生會說過，蘇聯不願使其本國內部經濟的命運受多數表決的支配。他辯論說否決權是保護國家主權所必須的。蘇聯的領袖們尚未感覺今日在危險中的不是國家的主權而是文明。

無人要想干涉他們國家內部的經濟生活。但蘇聯對於外人的猜疑如此根深蒂固，他們相信國際組織的代表所作的任何視察，足使世界其他地區滿意的，都將干涉他們的內政。葛羅米柯先生每次關於裁軍及原子能管制問題所作的談話，應依照上面所述的事實和蘇聯在戰後這些年間所做的事來閱讀及考慮。你勢必要下這樣的結論說，美國不同應意使任何國，包括蘇聯，可能避免有效視察的任何計劃。

如果美國毀滅所有的原子彈並同意不再製造而後來又希望違反我們的條約義務並製造原子彈，我們的機警的及無拘束的報紙將立即發現這事並宣布我們破壞諾言。但這在蘇聯是不可能的。蘇聯政府如果自國際組織獲得科學情報及工程知識並決定建立一工廠來製造原子彈，在紅軍準備使用它們以前，蘇聯以外的人將沒有一個會知道這件事。那麼就太遲了。

我知道目前蘇聯政府的官員們會辯護他們是在小心翼翼地實行協定。我躊躇於譴責他們違反協定，但我確說他們有一種解釋若干協定的極特別的方法。

那末，如蘇聯拒絕參加包含他們在莫斯科及倫敦原則上接受的保障——這個保障顯然是有效管制所必須——的條約，我們將怎麼辦呢？答案是令人不快的，但我想不到其他的答案，我們應祈求蘇聯的領袖們改變他們的思想。當我們祈求的時候，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能力發展更好的原子彈及更多的原子彈

，爲保護我們自身起見，我們必須繼續推廣我們科學知識的領域。

這是一個苛刻的判斷，但這武器的性質要求我們爲現實着想。

我們目前並無，並且我不相信我們將有利用『原子外交』的罪過。其他國家可能懷疑我們這樣做，因爲這事是他們在同樣環境之下所將做的。但是，如我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理士敦所說的，如果說我們可能使用原子彈『作爲對於任何國家的一個外交或軍事的威脅，不僅在事實上是正確的，而且完全是對美國政府及人民無理的非難。』

我們民主的固有特性之一是我們祇有在我們的人民真正同意之下才能作戰，沒有一個總統在國會未宣戰的時候能下令施行原子彈轟炸而無遭受彈劾的危險。凡知道我國民愛好和平心性的人，沒有一個相信我國會將通過違反我們在聯合國憲章下所鄭重負起的義務的宣戰書。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的歷史是國會避於宣戰的明證。任何人確實沒有理由相信國會將更渴望從事比我們所已知道者更爲恐怖的一個未來戰爭。

當我們等待原子時代現實情形以破除蘇聯領袖們的恐懼及疑慮時，我們不應容許美國動機的偉大在人們的心目中變成模糊。這是一個明白顯示我們不願繼續造原子彈的記錄。

在原子力量順利證明後的一年內，美國已做了這些事：

- 一、已經獲得我們在原子能發現中的合作者同意將這項發現置於國際管制之下。
- 二、在創立機構以考慮國際管制計劃方面已獲得五大強國的合作。
- 三、已獲得聯合國一致通過該建議。
- 四、已設計藉代表所有聯合國家的原子發展局實施世界管制原子能的一個詳細計劃。
- 五、已藉國會的行動建立一個文人委員會對一切可分裂物質施行嚴格管制。

六、發放有放射性的物質（同位素）供醫藥、生物、及科學研究。

七、將我們的國際管制原子能詳細計劃提交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並且，在第一年結束後的幾個月裏面，已經獲得原子能委員會全體會員國贊同我們的計劃，只有兩個會員國是例外。

我不同意那些預言如果蘇聯繼續阻礙進程，在數年以內必有大規模毀滅行動者的話。在剛結束的戰爭中，德人及日人都有毒氣，致死亡的細菌，一如蘇聯人，英人及我們都有毒氣及致死亡的細菌一樣。這次戰爭並不是客氣的茶會，它是殘酷的。然而，沒有國家敢使用這些可怖的武器，因為他們知道同樣的武器可能用來對付他們。

我說這話的時候，並沒有小視危險性。如果敵國政府擁有原子彈將是不幸的事。但如果我們拋棄我們的原子彈，把我們的知識交給一個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施行有效管制的國際組織，致使另一個政府在我們不知道之下就製造原子彈，且遠較我們不以知識供給該國際組織時可能製出的時日為快，則將更屬不幸。

此後的歲月並不對人類作更大的挑戰，在受我們支配的時日中，恐怖及猜忌尚可能屈服於保證原子能供人類福利而非供致命的戰爭用途的智慧。

第十四章 蘇聯要什麼

深切願望和平的美國人民的心裏和腦裏，對於蘇聯懷有甚多渴望知道的問題。我最常碰到的兩個問題就是：

他們是怎樣的人？

他們要什麼？

這兩個問題都問得好。我們不能釐定將可促進和平的政策，大部份要看我們對蘇聯的領袖和人民以及他們的目標有無獲得些許了解的能力。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最好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答覆。而我個人的經驗明顯指出的第一個結論就是蘇聯領袖們都是倔強而極富機智的談判者。

我對於應付人很有一番廣泛的經驗。當時任出庭律師時這種經驗就很豐富。後來在參眾兩院內當議員前後同僚的眾議員有兩千以上，參議員也超過兩百。排解兩院內和兩院間之分歧時會與他們的大部份會談過。就任最高法院法官，經濟穩定局局長以及戰時動員局局長時，復會遇到各方面甚多的人士，並會解決很多問題。可是歷年來迄未獲得能訓練我，使我與莫洛托夫先生談判的經驗。

記得有一次在倫敦，一個記者不大相信莫洛托夫先生甯願使會議破裂而不願順從我們大家的意見，他以懷疑的口吻問我：

「你能確定你已經探求解決各種問題的所有途徑了嗎？」

「我的朋友，」我回答說，「我不但已經探求過所有途徑，用盡所有大大小小的途徑，而且已經把

我在參院和衆院中所學的手段都使用過了。可是我在國會內是依據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規則行事。這次會議比較像個陪審團。如你有個頑固的陪審人，則你能期待得到的只不過是樁有欠公正的審判而已。」

我常常想，對於一個代表被控應當賠償損失的法人，而專門企求拖延時間使原告不耐久等法庭的判決只好接受一筆較小賠款的律師，應付莫洛托夫先生該是一種良好經驗。

我已經說起莫洛托夫先生在莫斯科會議閉幕之際，議定書已經簽字而我也已離開會議桌時，他所採取的策略。莫洛托夫先生在那最後片刻宣佈他在考慮後，決定接受美國在前一天下午對巴爾幹問題所提出的建議。這就可以表現他的堅忍。

倘使聖經上告訴我們的關於約伯 (Job) 的種種堅忍確是事實，那末莫洛托夫先生一定是他的後裔。莫洛托夫先生不但有無限耐心，而且有清晰的頭腦，和充沛精力。別人若態度燥急或發脾氣的話，他反覺得有趣。在這種場合下，看看他抗議說他絕沒有任何存心挑撥時的那副嚴肅而莊重的神情，甚有意味。莫洛托夫先生對多得喀尼斯羣島的立場把他種種長處發揮無遺。

一九四五年九月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其他國家外長一致認為多得喀尼斯羣島應自義大利手中轉讓給希臘，同時並應解除武裝。然而莫洛托夫先生反對。他說他雖可能於最後同意多得喀尼斯羣島轉讓希臘，但是反對解除武裝的建議。鑒於人所知道的蘇聯對希臘立場，他必定是不願目前的希臘政府有權在多得喀尼斯羣島設防。他顯欲暫緩行動而希望共產黨將控制希臘，然後在多得喀尼斯羣島設防，或則他日可以利用他對轉讓多得喀尼斯羣島的同意作為談判他的領土要求時的讓步。

這問題每天都在會議中提出以求採取行動，每次他總說須將這問題提請政府定奪。我們也總問他能不能把這問題迅速提請蘇聯政府定奪以便獲得指示。他當時表示很成問題因為蘇聯必須要考虑一番。等到一個月後我們已閉幕了，他還沒接到指示。次年四月我們在巴黎再度舉行會議時，他當然不大好意思

還如此推託。於是育了一個新藉口。他不能同意，因為希臘從未會正式要求轉讓多得喀尼斯羣島。我們費一大番功夫詳細指出已有許多領土未經正式請求而轉讓的。最後，他說無論如何這事應與其他領土問題一同解決。

我們齊聚巴黎來舉行第二次外長會議後不多久，我們再度提起多得喀尼斯羣島。莫洛托夫先生說他本來盼能討論這問題，然而那天早上他獲悉希臘大使將訪維辛斯基，而他必須等待他們會談的結果！我們大家對這個最新而理由最不充足的托詞不禁大笑。就是他自己亦笑了。莫洛托夫先生等到已有很多問題他認為滿意解決後，便建議多得喀尼斯羣島應轉讓給希臘並解除武裝。他提出這建議就好像這問題還是第一次提出似的。

莫洛托夫先生喜歡討論程序問題。在這種討論中他沒有敵手。他將辯論半天那些議題列入議程。你不但得忍耐而且還要仔細注意他敘述你的建議的方式。要不然你就得費半天工夫設法使你的全部建議能在會議中提出以備討論。莫洛托夫將答覆你說「Нет」——這就是俄語的「不」字。這字，我已聽得如此之多幾乎把它當作我自己語言的一部份。他會拿英語說「我同意」，可是他表示同意的時候如此稀罕，所以他的發音并不十分好。

在任何會議中，無論有沒有必須一致同意的規定，他總使你對他在拖延策略中所表現的機智不得不表示欽佩。他將泰然自若地坐在那裏，摸摸他的鬍子或者弄弄他的夾鼻眼鏡等待譯詞，並且似乎不斷地抽着蘇聯香烟。

在一個重要方面，莫洛托夫先生可為所有蘇聯代表的典型。那就是，當他們斷定確已盡他們討價還價的能事，即使再加拖延也不能獲得繼續讓步，他們還是以表示同意為妙的時候，他們對於改變立場，甚至於完全改變以前堅持的立場，絲毫不感覺難堪。照例莫洛托夫先生臉帶笑容地宣佈蘇聯代表團，為

謀獲協議起見，願提出一項建議。他隨即把數週以來成爲爭執主題的你的建議提出來，僅加以幾個不重要的修改。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士已經討論這問題如此之久，急於想把它了結，因此竟以很愉快的心情接受這個聲明。他們往往還要對莫洛托夫先生數週或數月以來即應做而延至今日才做的事表示感激。

另一種常常使用的策略就是反攻。只要莫洛托夫先生一懷疑美國或另一國家將對蘇聯未能履行的諾言，例如對雅爾達會議中關於新聞自由選舉自由等任何一協定提出責難，他馬上就在討論中先展開攻擊。他或則親自出馬，或則使蘇聯的一個附庸國發動，攻擊的對象通常老是希臘。

他指責希臘政府腐敗；對於其和平的鄰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三國具有侵略意圖並任意加以襲擊。他疾呼反對英帝國主義者統治希臘人民，英帝國主義者駐軍於希臘的目的，純在剝奪希臘人民的自由並支持希臘的法西斯主義者。他通常表示美國政府竟支持英國，因此對英國的不軌行動亦應負一部份責任；這實爲遺憾。他對於希臘的指責反覆申述的次數竟如此之多，我恐怕他逐漸相信他所說的都是實話。

莫洛托夫先生所不贊成的人總被稱作「法西斯份子」。所有共產黨和同情共產黨的人都是「民主力量」。這種分類實在簡單。

康納利和范登堡兩位參議員從未被莫洛托夫先生直接稱爲法西斯份子，可是共產黨報紙彌補了他所忽略的一點。他們倆都被稱作代表「大資本家」的人。巴黎方面的共產黨挑選參議員范登堡爲法西斯的眞正代表，可是參議員康納利却設法在和平會議中，很高妙地聲明美國對的里雅斯德的立場時，採取領導地位。共產黨報紙暗示如果我獨自行事，可能做得很對，可是這兩個法西斯參議員老在我身旁使我反對「民主」力量。

我離開華府出席和平會議時，這兩位參議員因爲國會中有要事不能同行，可是答應日後去巴黎。我

會以擺脫他們的「壞影響」一點向他們打趣。

和平會議開幕約一週光景，莫洛托夫即指責美英兩國違反外長會議中關於和會程序的協議。那時我已了解他的爲人，預防到他要作這種指責，所以曾在外長會議中耗費不少時間作一記錄。在那記錄裏我們永遠保留對我們關於程序問題的意見表決的權利。他指責我們不守信用，這實在使我忍不住。我便宣讀我的記錄且對莫洛托夫先生作了幾句我極不願說的批評。這是我對他最嚴厲的一次批評。我國代表團團員提議我應請那兩位「法西斯」份子來巴黎出席會議，並且說那兩位與我比起來性情和平得多了。

一天下午和會舉行辯論激烈的會議後，包倫仍在和蘇聯代表團的一位團員談話。那位蘇聯代表說，他無從瞭解美國人。他們雖有會做生意的美名，而國務卿貝爾納斯兩日來不斷發表關於原則的演說——就好像個教授一樣。

「他爲什麼不少說關於原則的話，而老老實實的開始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呢？」蘇聯代表以極爲誠懇的態度問包倫。

包倫企圖對他解釋好些問題，美國人認爲涉及原則不能以討價還價方式解決，可是完全不得要領。與史達林大元帥洽商和與莫洛托夫洽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驗。莫洛托夫彎彎曲曲的地方，史達林是爽直的。然而我屢次與史達林洽商之際，我老忘不了羅斯福總統在戰爭初期所告訴我關於他和史達林通訊的故事。有一天他收到史達林所發來的措辭非常不客氣的電報。他也以同樣語調令人筆錄一覆電，可是決定把這覆電擱置一天。第二天早上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接到史達林的第二個電報，其措詞客氣無比，同時保證偉大的私人友誼。羅斯福總統對這種矛盾的舉動感覺莫明其妙。然而這種事發生已不止一次。

我在雅爾達最初看到史達林的時候，對於總統所遭遇的經驗也不能了解。史達林對總統異常慫恿，

就一般而言，似乎急欲和他獲致協議。他總是很高興，對於戲言也能欣賞而不介意。就是我見到他在一個下午的會議中吩咐坐在他後面的一個蘇軍將領替他取一杯茶時，我對他的良好印象亦未因之有所改變。我曉得有很多美國兵願意出錢看看一位能命令一個將領伺候他的人。

史達林大元帥與莫洛托夫先生的個性雖然不同，我們却能確定莫洛托夫先生所追求的目標都是史達林所同意的。唯有在波茨坦談判賠償問題及蘇聯拒絕締結解除德國武裝四十年條約等事時，我才覺得是莫洛托夫說服史達林的。其他時候顯然是由史達林作主定下宗旨——而由莫洛托夫設法盡量保持史達林的意志。蘇聯政治局對史達林有多大力量我不知道。我猜凡是他不特別關切或沒有堅決信念的時候，他寧接受政治局的建議。他和所有成功的領袖一樣，認識必須獲得僚屬支持的重要。但是在任何有關他具有堅決信念的外交事項中，我確定政治局是支持他的。我會見他迅速採取這麼多的重要決定，使我不認為他對於政治局的控制有何顧慮。史達林和政治局的諸位先生們都認清如果他們在重要事項方面不給黨員和人民一個意見一致的印象，那他們便不能使人盲從他們的決定。

我想我所說的已足可表明在衡量蘇聯的任何行動時必須切記的一樁重要事實。這就是他們為達到目的可不擇手段。我們因此要提出的問題就是蘇聯領袖的目的是什麼。換句話說，蘇聯要什麼？

我的經驗僅證實實際上在蘇聯歷史上所發現的一個答案。熟悉蘇聯歷史的美國人沒有幾個，而我也自認為其中之一。但是根據我所曉得的，可以下個結論說，今日使我們感覺麻煩的問題中，有許多可以在蘇聯歷史上求得解釋。不管蘇聯革命的變動是如何的大，布爾希維克外交與帝俄時外交相差的地方却極微末。而史達林及莫洛托夫自從戰後以來所追求的目的，和他們向希特勒所提的要求沒有差別。

很奇怪的，在戰後使我們關切如此之深的蘇聯領土擴張主義，曾經共產黨革命之父馬克思加以明顯的揭露。馬克思一八五三年在倫敦為紐約論壇報撰寫的多篇文章中，曾詳細討論「東方問題。」下面是

他的一部份見解：

論及俄國憎惡擴張一點，我現在可從俄國自彼得大帝以來所獲得的領土中敘述一些事實。

蘇聯邊疆向柏林，德黑斯頓及維也納推進約七百英里；向君士坦丁堡推進約五百英里；向斯德哥爾摩推進約六百三十英里；向德黑蘭推進約一千英里……俄國近六十年來所獲領土，在面積及重要性方面等於其六十年前在歐洲的整個帝國。

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說：

征服之後必有另一次征服，兼併之後也必有另一兼併，故俄國之征服土耳其亦必成爲兼併匈牙利，普魯士，加里西亞(Galicia)，以及最後實現若干瘋狂的沈斯拉夫主義哲學家所夢想的斯拉夫帝國的前奏……遏止俄國兼併計劃實在是最爲重要的事。

這話多像現代人的口吻！

俄國自一八五三年馬克思撰寫上述文章的那時起繼續獲得領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爲止。帝俄在一八五三年到一九一四年間所獲的領土總共達九十七萬一千二百七十七方英里，使戰前俄羅斯帝國的面積增至八百六十四萬五千方英里。

蘇維埃力量在俄國上台時失去近五十萬方英里的領土。新生的蘇聯沒有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些都已成爲獨立國家。卡斯剗給土耳其；比薩拉比亞讓給羅馬尼亞，另有一大塊地方喪失給波蘭。

蘇聯統治的最初二十年內，唯一的領土擴張就是一九二六年兼併北極方面的若干島嶼。可是一九三九年蘇聯展開積極的擴張政策。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以迄一九四五年底，蘇聯會攫取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比薩拉比亞，庫頁島南部，千島羣島，芬蘭的一部份，波蘭的一部份，東普魯士的哥

尼斯堡地區，越過喀爾巴阡山脈的烏克蘭部份，及唐努烏梁海。蘇聯亦佔領旅順，蘇聯在那裏雖沒獲得主權，然而確會獲得權利在該地與中國共同維持一個海軍基地爲期三十年。總算起來，蘇聯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已獲得近三十萬方英里的土地，使蘇聯的版圖增至八百四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九方英里，較帝俄最盛時的面積相差有限。

那麼，確然的，領土擴張主義並不是共產黨政權所倡行的新政策。它在蘇聯歷史上由來已久。所變換的僅是人物與策略而已。

關於他們願意採取以求達到目的的手段，蘇聯的現代領袖會給我們一個良好的例證。這就是自一九三八年九月簽訂慕尼黑協定，經過德蘇在次年八月締結不侵犯協定，以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爲止的德蘇關係經過。

在雅爾達時，史達林某次在晚餐後談話中，說要不是慕尼黑那次討好希特勒的企圖，及英法事前未能和蘇聯磋商的話，蘇聯政府將永不會與德國簽訂不侵犯協定。

自從慕尼黑協定以後，蘇聯報紙對於批評德國的運動確已開始改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時德蘇兩國延長商務協定後，蘇聯報紙覺得能自由讚譽這種行動爲德蘇關係向前的邁進。此後不久，史達林對共產黨大會演說時會說德蘇僅有思想的分歧，此種分歧更被欲使旁人爲他們「火中取栗」的人們所誇張。

一九三九年春天，史達林對蘇聯與英法兩國的談判結果表示失望，以瞭解「西方」著稱於世的外長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遭免職，另由莫洛托夫繼任外長。

希特勒對於這些前奏舉動似乎漠不關心。直到一九三九年夏天希特勒才顯然決定他必須獲得蘇聯支持，才能進行計劃中的進攻波蘭。其後所發生的事情震驚全球各國政府，並嚇壞了我們中間希望能夠避免戰爭的人們。

德蘇談判的經過迄爲世人所不詳，直到在齒獲的納粹政府檔案中發現關於談判的記錄後，真相始明。這些記錄對幫助我們了解蘇聯的目的有重要貢獻。那一段包括主要談判人物對話的記錄是由担任翻譯的德國駐蘇大使館參事希爾格（Gustav Hilger）報告的。他的報告是以在決無存心假造或故意使它不準確的時候所作的筆錄爲根據。其餘的談判經過則以德國外交部檔案中所發現的正式文件爲根據。

因此談判記錄是德方的，未經蘇方人士證實。然而凡想曉得希特勒進攻蘇聯前一年內所發生事情的真相的人，都不能輕視這記錄。凡想了解今天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所懷的念頭的人，也同樣不能輕視這記錄。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是僅企求安全嗎？爲得到他們所認爲的安全，他們意圖將他們的控制力量擴展到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身上嗎？我們往往可以根據一個人在過去對於相同問題的言行而料到他的存心。那末，讓我們看看德蘇談判的記錄。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Graf von Schulenburg）接到指示，叫他通知莫洛托夫：（一）思想上的分歧未必就沒有友好關係的可能，而德蘇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利害衝突；（二）德國對蘇聯並沒有侵略的意圖，並相信類如波羅的海國家等問題，雙方可以圓解決；（三）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將嘗試煽動蘇聯對德作戰，如此的戰爭徒使資本主義國家坐收漁人之利；（四）由於英國的販賣戰爭，德蘇關係必須澄清，俾避免將使德蘇友誼及東歐領土問題的解決成爲不可能的情形；（五）因此外長里賓特羅甫願訪莫斯科，向史達林先生解釋希特勒的意見。

德國大使提出上述諸點後，莫洛托夫表示對此很有意思，可是在舉行會議以前雙方應有準備。他想知道德國政府對於兩國締結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的立場，也想知道德國是否將使用它對日本的影響力量以改進日蘇關係。他並想確定建議舉行的會議中，是否將討論波羅的海各國問題。他馬上獲得德國的肯定答覆。

莫洛托夫對於德國政府不像英國僅派外交部助理次官史特朗（Sir William Strang）那樣的一位常務官員，而竟願派里賓特羅甫外長來訪莫斯科的這種誠意表示尊重。他建議兩國政府都草擬一個互不侵犯協定。

八月十九日德蘇貿易及商務協定在柏林簽字。莫洛托夫在同日將蘇方所擬的互不侵犯協定草案遞交德國大使。

希特勒那時感覺不耐煩。他顯然準備進攻波蘭，可是急欲先和史達林完成這個協定。他親自致電史達林說他將接受莫洛托夫的不侵犯協定草案。他說德國對波羅的海灣及波羅的海上的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等國家，都沒有企圖。這個保證，希特勒說，可以列在附於不侵犯協定的秘密議定書裏。他同時建議這秘密議定書裏也可以規定兩國在東歐方面遵守的勢力範圍。

希特勒在他電報裏最後說，波蘭的挑釁行動日見增加，危機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所以他敦促史達林至遲在八月廿三日以前接見將有權簽署互不侵犯協定和秘密議定書的里賓特羅甫外長。

莫洛托夫馬上看出希特勒來電的重要性。德國大使將這電報遞交莫洛托夫還不到三十分鐘，他就請德國大使轉告德國政府，蘇聯準備里賓特羅甫來蘇討論以希特勒電報中所說的條件為根據的協定事宜。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史達林對局勢的這種突變，感覺欣喜。他惱恨英法未能共同參加他所希望的保證。他要獲得希特勒將不進攻蘇聯的保證。他曉得在最近的將來，德國將與波蘭作戰。他當時必定推想如果互不侵犯協定使西方國家無從援助波蘭，那末全面戰爭即可避免，蘇聯即可有更多的時間，擴充軍力。在另一方面，如果西方盟國確加入戰爭，則雙方將呈均勢，也可使蘇聯仍有時間訓練並裝備它的軍隊。而且他憑着互不侵犯協定可以不作戰的危險而攫取波羅的海諸國。

里賓特羅甫八月二十三日抵莫斯科。參加會議的計有史達林、莫洛托夫、里賓特羅甫、德國大使舒

倫堡和希爾格。

史達林堅持在祕密議定書中應載明蘇聯對比薩拉比亞的特殊企求，並規定以立陶宛北部邊界作為德蘇兩勢力範圍的分界線。他的意見被接受了。互不侵犯協定和祕密議定書均獲通過。雙方慶祝共飲香檳，史達林且會舉杯遙祝希特勒。里賓特羅甫次日即返柏林。

自舒倫堡大使首先與蘇方接洽以迄協定完成不過才有九天！他們取得協議之速令我驚嘆，因為我會費十五個月的功夫，想使蘇聯對五個次要國家和約表示同意。在德蘇談判時，蘇聯要獲得協議。在戰後談判中，他們不願獲得協議。

德蘇兩國的宣傳機構雖會力使人民準備幡然改變，但是兩國人民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一定莫名其妙。這個推論應該是準確的。因為住在這個半球的人們，包括共產黨報紙在內，對於其中真相也難以了解。

我認為這個互不侵犯協定是價值尚不如其所用紙張的協定的良好例證。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中的聲明證實蘇聯代表通常採取的方針：蘇聯所以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其目的純在獲取時間以應付蘇聯人深知無從避免的衝突。因此，蘇聯締結這協定時，顯然存有極欲加以違反的意圖。希特勒的意圖不得而知，然而我們見到他違反這協定的行動。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史達林或希特勒在同意這協定時所存的誠意。希特勒侵略波蘭的神速初非史達林所能料及。希特勒的大軍追擊潰退的波蘭軍隊時，進入蘇聯勢力範圍。史達林於是請里賓特羅甫再度去莫斯科，就分割波蘭的界線成立新協定。

里賓特羅甫九月二十七日抵莫斯科。這次德國同意蘇聯應取得立陶宛。雙方劃定分割波蘭的界線，並且認可蘇聯成立自治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計劃。德國准許蘇聯獲得特羅和比茲（Drohobycz）及波瑞斯勞（Boryslaw）等地（譯者按此兩地在波蘭羅夫省羅夫城西南三十英里）的油源，蘇聯應依據合同，

以該兩油源所出產但未會提煉的石油三十萬噸供給德國。莫洛托夫先生於是在九月卅日再度舉行宴會互申慶祝。

從此以後，瓦格納的歌劇在莫斯科又可聽到。德軍戰報也刊載在蘇聯官方報紙的首頁上。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發表一篇演說。他說，德國處於一個力求戰爭從早結束並且力求和平的國家的地位，而英法則主張繼續作戰反對和平。希特勒則向朋友說，德蘇友好協定將維持多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受到蘇聯勢力嚴厲的束縛。他們被迫以軍事基地讓予蘇軍。可是，芬蘭拒絕這種要求，因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蘇軍遂不宣而戰，侵入芬蘭。波羅的海二小國前對蘇聯的讓與僅不過成爲階石而已。這些國家不久即被迫加入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在這時英希寺劫與史達林的合夥開始發生裂痕。

德蘇以前瓜分土地時，立陶宛西南角上的一小塊地方是劃給德國的。可是蘇軍開入立陶宛時，佔領了這地方。德國提出抗議。蘇方承認德國的抗議具有理由，但是辯稱這小塊地方難與立陶宛的其餘部份脫離。這事拖延數月之久，直到後來，蘇聯才同意付給希特勒二千一百五十萬馬克，作爲這塊土地的代價。

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向羅馬尼亞索取比薩拉比亞。德國不能反對，因爲希特勒已經說過他對於比薩拉比亞沒有企求。可是蘇聯又接着向羅馬尼亞要求布哥維納的北部地方。這地方并未在德蘇以前的討論或協定的範圍內提起，所以德國提出抗議。莫洛托夫先生只回答說，他認爲德國沒有反對的理由，因爲那地方是烏克蘭人居住的。他且溫和地說，蘇聯不但期望德國支持蘇聯這要求，而且還希望德國對蘇聯日後索取布哥維納南部的要求也加以支持。

希特勒逐漸有點不高興。他顯然認爲德國以血肉所獲取的土地，而蘇聯不作戰也堅要分贓。德國大使接到指示叫他告訴莫洛托夫，德國欲保證羅馬尼亞領土的完整，德國需要羅馬尼亞的糧食與石油。德

國對匈牙利也是如此。德國大使並說，不侵犯協定規定任何一方必須就互有利益關係的事項向對方諮商，可是蘇聯對鄰近地區採取行動時并未與德國諮商。他列舉立陶宛的那塊地方和蘇聯在比薩拉比亞與布哥維納突然採取的行動爲例子。

莫洛托夫堅持（我如聞其聲！）德國的步驟不符合協定，德國應該已經知道蘇聯對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企求。

此後彼此越發猜忌。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里賓特羅甫向史達林寫一封長達十九頁的信，詳細闡釋德國在前數月所採取的步驟，以及採取這些步驟的原因。他邀請莫洛托夫來柏林。史達林的答覆并未表明態度，但是同意雙方關係的改進絕對可能，並說莫洛托夫將在十一月十二日抵柏林。

莫洛托夫與希特勒曾談兩次，一次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另一次是在十三日，每次都是三小時。雙方的討論會由前德國外交部情報司長舒米特（Paul Schmidt）加以記錄。我認爲這兩次會談就是整個戰爭的轉捩點。事實上，就我所能看到的，我認爲這兩次會談實爲歷史上具有決定性的事件。因爲莫洛托夫先生過於固執己見。十三日他與希特勒的那次會談尤爲一重大外交錯誤。

希特勒當時顯然正懷着誇張而豪闊的心境。他說勝利既然不成疑問，那麼德蘇應就不久即將轉入他們手中的不列顛帝國的瓜分問題獲致協議。他認爲德國應向西發展而蘇聯則致力於東方。蘇聯必須獲得通往一個不結冰的暖水海洋的出口。蘇聯可經伊朗，波斯灣至阿刺伯海而求得這個出口。希特勒敘述德蘇兩國平分秋色的世界時滔滔不絕。

可是莫洛托夫先生的那副嚴肅而固執的腦筋和希特勒的大言不慚的計劃未能相合。他認爲希特勒所提出的是個饒有趣味的長期計劃。但是，他說，蘇聯政府僅欲討論當前問題。他接着說，德蘇兩國間目前的辦法顯爲「德國所不滿。」因爲依據協定芬蘭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可是芬蘭境內駐有德軍。該處

德軍應迅速撤退。至於德國保證羅馬尼亞疆界的完整一點，蘇聯必須抗議，他不能不懷疑德國的保證是針對何人的。

這使希特勒的狂夢如何掃興？希特勒解釋德國在芬蘭必須駐軍，以保護對德國作戰最關重要的瑞典礦砂和石油的運輸線。芬蘭方面的德軍將從早撤退。德國所以在羅馬尼亞出面干涉的原故，是因為倘不如此，羅馬尼亞將和匈牙利衝突，而這樣一來將損及羅馬尼亞方面德國的利益。希特勒繼續說，羅馬尼亞已對匈牙利及蘇聯割讓領土，故必須保證其邊疆以維持羅馬尼亞的和平與安全。德國在羅馬尼亞僅有一個軍事代表團，而這代表團也是由於羅馬尼亞政府的邀請才派去的。他強調德國對巴爾幹國家沒有政治企求，僅有經濟企求；他要保護羅馬尼亞的油田使油田不受攻擊。

莫洛托夫以率直的口吻說，他對於希特勒的答覆不認為滿意。他說除此以外，由於保加利亞的地位與達達尼爾海峽的關係，蘇聯將與保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且可能簽訂一個互助協定。他所提的成立達尼爾新管制辦法的最後要求將產生實際而非紙上的保證。

希特勒回答說，他須待與墨索里尼與保國政府諮商後才能答覆。

這就是莫洛托夫鑄成最大錯誤的地方，他堅持立即要有一個具體的答覆。担任翻譯的人在報告上說，希特勒對這點大為憤怒。

我可以想像那種情景。希特勒剛把他所確實相信的話說出來。他相信必獲勝利；他認為他統治全球；他剛剛描繪一幅關於未來世界的圖畫，且把全球土地中面積極為廣大的一部份，配給在戰爭中未損一兵一卒亦未耗費分文的蘇聯。可是莫洛托夫只說「甚為有趣，」而對希特勒定會認為相當瑣碎的事——羅馬尼亞的疆界，與保加利亞締結互助協定等等——要求立即答覆。我們很容易想像易於激動而具有爆炸性的希特勒，對於莫洛托夫竟敢大胆告訴他——希特勒——他的答覆不令人滿意，一定驚訝，因為希

特勒相信莫洛托夫所代表的政府猶未能準備作戰。

歷史學者或可發現希特勒是在何時決定對蘇聯作戰的。他可能先已概括的考慮過這點。不過我在看到其他證據以前，我將相信希特勒這次接見莫洛托夫實在是具有決定性的時刻。德蘇關係確是自這有關大局的十一月十三日以後才逐漸惡化的。

那天後來，里賓特羅甫向莫洛托夫宣讀德國所草擬的一個協定和兩個秘密議定書。他建議蘇聯應與軸心國家共同簽署這些協定。這一個協定及兩個議定書顯然是在莫洛托夫抵達柏林和晉見希特勒以前所草擬的。這一個協定規定蘇聯將和其他三國合作，每個國家均將有它的勢力範圍，各國均同意不支持其他國家集團攻擊四國中的任何一國。第一個秘密議定書載明希特勒所憧憬的四國領土願望：德國將為中非洲；義大利為北非及非洲東北部；日本為日本本土以南的亞洲地區；蘇聯為趨向印度洋的所有蘇聯以南的地區。第二個秘密議定書規定取消關於黑海海峽的蒙特婁公約；另外訂立一個協定使蘇聯有使用黑海海峽的無限制權利；除沿黑海的國家外，其他所有國家將放棄軍艦通過達達尼爾海峽之權利。此外，里賓特羅甫自願為日蘇兩國調停，藉以促進持久的諒解。

莫洛托夫對這個建議的答覆尤其值得注意，我們應該根據最近的歷史把它仔細研究。

莫洛托夫說，日本已自動建議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政府僅在等待關於蘇聯所提出的若干問題的答覆。將來必須有關於伊朗的「具體」討論；蘇聯將堅持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具體保證。莫洛托夫然後又提起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的將來，和瑞典的中立。（我當時閱讀到這報告時，使我感覺它好像外長會議的議程一樣！）他最後說未來的重大問題不能完全掩沒了當前的問題。

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時，沒有作過比這個更為明確的答覆。十一月二十五日他請德國駐蘇大使去克里

姆林宮，隨即提出關於里賓特羅甫在十三日所提的建議的詳細答覆。就後來的事態而言，這個答覆也殊有特別注意的必要。

莫洛托夫告訴德國大使，蘇聯政府準備在四個條件之下接受里賓特羅甫所擬的四國協定草案：（一）德軍應立即自芬蘭撤退；（二）應與保加利亞締結互助協定並在達達尼爾海峽方面建立蘇海陸軍基地，以保證蘇聯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安全；（三）應承認蘇聯對巴庫及巴統（Batum）以南直到伊朗及波斯灣的地區內的願望；（四）日本應放棄自北庫頁島獲得煤斤和石腦油的權利。

莫洛托夫顯然沒有認清他在柏林方面的表現如何愚謬，也沒有認清希特勒憤怒的程度。

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對希特勒的緘默都開始感覺不安。一九四一年一月，他們經過他們的代表，與德國商妥第二次經濟協定。蘇聯已經小心翼翼地第一次協定中規定輸送的物品如數交給德國，現在又同意增加交換的貨物。一月間，莫洛托夫由於希特勒沒有答覆而感到不安，又建議雙方舉行會談。德國政府僅告訴他已接到他的建議，並已以此事通告日義兩國，並盼在最近的將來能繼續舉行會談。如此的答覆——在蘇聯提出建議的兩個月以後德國才給蘇聯的答覆——表示希特勒已不再關心這事。德蘇的會談也始終沒有舉行。

在另一方面，德國集中大軍於巴爾幹半島，他們把他們的行動通知蘇聯。二月二十八日，舒倫堡大使告訴莫洛托夫，保加利亞已加入軸心國家的三國協定，並將於三月一日簽署一同意議定書。莫洛托夫聽了非常着急。他強調保加利亞方面的事態，造成與十一月廿五日蘇聯提出建議時的情勢完全不同的局面。莫洛托夫顯然沒認清他在十一月間提出的建議，實等於終止希特勒與史達林的奇怪婚姻關係的離婚狀。

三月一日舒倫堡告訴莫洛托夫，德國已決定調軍前往保加利亞。莫洛托夫馬上在舒倫堡面前撰寫一

件照會，對於德國實行如此的軍事佔領而且已經侵犯蘇聯的安全利益一點表示遺憾。

四月五日，蘇聯與南斯拉夫締結友好及互不侵犯協定，而差不多同時，德國就開始進攻南斯拉夫。史達林爲什麼要與南斯拉夫締結協定，原因不明，不過當時有人說，蘇聯支持南斯拉夫後，可使德國在巴爾幹方面牽涉太深，以致可以減少德國進攻蘇聯的危機。幾個禮拜後，事實顯示史達林對於南斯拉夫估計錯誤了。

此後，蘇聯力求避免可能開罪德國的行爲。原料如期輸給德國。外國報紙發表德軍集中在蘇聯邊境時，蘇聯政府，經過官方的塔斯社，說這些謠言是由戰爭販子造成的，德蘇關係和好，現存的條約中表明蘇聯不受威脅。但是自然他們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

舒倫堡大使也不相信這些話。他非常關切，且於四月間會親攝備忘錄一通，往柏林說明對蘇作戰的危險。希特勒是否看到這備忘錄，我不知道。證據中也未洩露希特勒和舒倫堡談話時曾提起它。然而舒倫堡會說希特勒與他分別時，表示他將不對蘇聯作戰。

以後數週的時局千鈞一髮。莫洛托夫與舒倫堡不再見面。六月間，德國大使館接得指示，囑以不令人驚動的方式，將僑居蘇聯的德國婦女及兒童送回德國。

六月二十二日，莫洛托夫請舒倫堡去見他。他說德國飛機在蘇聯領土上空擅自飛行的次數日見增加，並堅持德國應採取步驟防止這種侵犯蘇聯領空行動的發生。舒倫堡答應把這事轉告德國政府。莫洛托夫接着說，世界各地都謠傳德蘇將發生戰爭，他現在又聽說德國大使館職員的眷屬將離開蘇聯，他要求加以解釋。舒倫堡弄得很窘。他回答說毫無所聞，大使館職員眷屬只是因爲假期的關係離開蘇聯。莫洛托夫當時一定曉得他在說謊。

第二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舒倫堡接得柏林方面的指示叫他去見莫洛托夫，並說：

「集中在德國邊疆上的蘇軍已增加到德國政府不能容忍的程度。所以德國政府已決定採取對策。」
「這是宣戰嗎？」莫洛托夫問道。

德國大使僅以手作毫無辦法的表示。

莫洛托夫說，他對於德國大使所說的話唯有作此種解釋。德軍已越過蘇聯邊境，納粹飛機轟炸蘇聯的幾個城市已有一個多鐘頭之久。他說德國進攻會與其締結友好不侵犯協定的國家，實在是世界上從沒見到的一種不守信用的行爲。莫洛托夫並說，德方所稱蘇軍集中於德國邊境一點僅是藉口而已，因為蘇軍只不過在舉行通常的演習。如果德國政府加以質問，蘇聯將有充分的解釋。

舒倫堡並沒有說「通常的演習」只是通常的解釋。他只說他對於目前情勢不能再有所述。

德蘇兩國間歷時僅二十二個月「永垂不朽」的友好及互不侵犯協定便如此壽終正寢。德蘇戰爭隨之而起。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段歷史給我們的指示。我認爲有理由推想，蘇聯的野心仍包括莫洛托夫向希特勒發出的電報內所說的領土希望。其中有一部份已經達到目的，勝利的興奮激勵蘇聯政府擴展它的野心。

在北方，他們對芬蘭的要求已經滿足。戰時，莫洛托夫先生曾試探藉挪威的讓步將蘇聯力量稍形擴展的可能。一九四四年，他要求挪威給蘇聯在斯匹茲北爾根羣島(Spitzbergen Is.)方面更大的經濟特權。他要立即獲得熊島(Bear Island)和在斯匹茲北爾根羣島中的其他島上建立軍事設備的權利。

莫洛托夫先生提出這個要求，不顧一九二〇年三十四國(包括蘇聯在內)所簽訂承認挪威關於這些島嶼的主權的條約裏有但書規定不能在這些島上建築防禦工程，這些島嶼永不能作爲軍事用途等等。挪威政府先會答應討論這兩點，後又宣佈挪威僅將考慮經濟問題，並指出軍事建議必須經過多邊談判。

在東方，蘇聯目前已奄有整個庫頁島，此外則佔領千島羣島，兼在旅順大連獲得權利。蘇聯對滿洲

鐵道也復有權利。史達林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滿洲方面得手的引誘是否將繼續加以拒絕，這問題在撰寫本書時，猶不見動靜。蘇聯對巴統和巴庫以南地區的願望并未實現，可是已經過一番努力。蘇聯已要求土耳其割讓卡斯和阿達漢（巴統以南）兩省。蘇聯自巴庫以南向伊朗擴展的努力則為安全理事會所阻止。蘇聯也使用它慣常使用的在蘇軍保護下成立傀儡政府的策略。蘇軍干涉弱小伊朗的武裝部隊。蘇聯鼓勵在亞塞爾拜然成立獨立政府。此案會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蘇軍在伊朗逾期不撤退後，安全理事會便就伊朗提出的責難採取行動。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除蘇聯和波蘭以外都投票保障伊朗的完整。蘇聯結果遵守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因為它還沒準備或願意和世界其他各部份隔離。

現在，讓我們把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提出的要求和今天的歐洲局勢比較一下。

紅軍設立並保護的保加利亞政府，使蘇聯現在毋庸再與保加利亞締結互助協定。莫洛托夫所要的介於蘇聯和兩海峽間的「安全區」已經實現。在羅馬尼亞，蘇聯已依我在前面所敘述的那種策略設置相同性質的政府。蘇聯在匈牙利實現它的野心的事，較為晚近，然而方式仍舊是那一套。

波蘭已淪為附庸國的地位。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被緊緊地掌握在蘇聯統治下的斯拉夫集團裏。捷克斯拉夫也是這集團的籠中鳥。在莫洛托夫會表示存有企求的所有歐洲地區中，只有希臘和土耳其仍保持自由。爭取這兩國家的鬥爭正在進行中。

我們的幹練觀察家，艾德立治先生，在他的報告裏表明，要不是爲了（一）聯合國所採取的行動，（二）蘇聯認識它如果攫取希臘，則英美政府將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對付這種侵略行爲這兩個原因，則寄生在蘇聯統治下各希臘鄰邦內，並受他們接濟的一個人數雖少，但是組織嚴密的共產主義少數黨早就要攫取希臘的政權了。

安全理事會的巴爾幹調查委員會阻止並揭發這種努力。然而希臘情況依然混亂，希臘命運的安危尚

未決定。格里斯伍德 (Dwight Griswold) 所領導的美國代表團正企求促進希臘在政治及經濟上的健全，纔有如此才能撲滅共產黨煽動的不安狀態。

至於土耳其，我們必須記着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說過，蘇聯對達達尼爾等海峽仍有企求。蘇聯嗣後會要求有在那地區內建立一個海陸軍基地的權利。我們想以集體保證保持達達尼爾海峽自由的努力未能成功。我們現在已採取其他措置保護土耳其的主權。

馬克思及其他歷史學家都明白指出蘇聯的領土欲望和帝俄的欲望相差無幾。而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提出的要求可為最近將來的良好指示。

至於蘇聯究竟是企求安全抑或發展，我想蘇人分析他們的動機時，也難以準確說出安全與擴展的分野。就是他們確實曉得安全與擴展的分野，我敢說他們也不肯承認。考慮這問題時，我總在想那些購買和他們接連的房屋或者農場以保護自己的那種人。我們知道這種人的很多。困難的地方就是你購買不盡，總有幢相連的房屋或者一所農場。蘇聯人也是如此。他們認為就安全起見，與蘇聯或者蘇聯的附庸國相鄰的政府，必須為「友好的政府。」主要區別就是蘇聯不出錢購買相連的領土，他們不惜違反法律和諾言，以獲取他們安全所需要的地產。

一般人常常問，就安全而言，蘇聯是否意圖統治歐洲大陸。我認為他們想要在所有歐洲國家裏有數量足夠的而且有組織的共產黨，俾蘇聯可以左右各國的政策。我認為他們現在不想統治歐洲各國政府。他們恐怕西歐人民不接受蘇聯現在的那種政府。他們也認清在那些國家內，他們還沒訓練出能使蘇聯形式的政府成功的領袖。倘若失敗，則將使他們在全球的地位遭受損害。目前，他們一方面訓練各國的領袖人才，一方面靜待良機。他們藉罷工的威脅和煽動人民不滿現狀兩種手段，能夠在很多國家內運用力量而毋需負任何責任。希臘顯然是他們的第一目標。其次，他們可能藉慣常的滲入方法企求控制義大利

政府。由於控制義大利對希臘及土耳其的軍事影響，他們必將如此。我也確定他們的最後目標是以種種方法統治全歐。

決定我們的行動方針時，馬克思很有幫助。一八五三年時，他論及沙皇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說：「俄國在多次重大勝利後，實在不能向土耳其提出更爲廣泛的要求了……倘若其他國家態度堅決，蘇聯必以非常漂亮的方式告退。」

如果蘇聯政府獲得一種印象，認爲美國和聯合國的其他會員國將僅提出抗議而毫不採取行動，則蘇聯將繼續追求這些歷史上由來已久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將好像它在雅爾達會議後不久對於羅馬尼亞採取的行動；它將控制一個政府然後說事情已經解決，沒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不過，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現在能使蘇聯認清，它若採取侵略行動，則我們將立即訴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如果我們表明蘇聯在安全理事會若使用否決權，則我們將喚起聯合國的其他會員國採取集體行動，支持並實踐聯合國憲章——如果我們能把這些向蘇聯表明，我不相信蘇聯將破壞伊朗，土耳其，希臘，義大利，或其他任何國家領土的完整。

爲了許多原因，蘇聯眼前不想作戰。我認爲他們將「非常漂亮地告退。」可是其他國家若不像馬克思就帝俄的行動而警告我們所說的「保持堅決，」則「征服之後必有另一次征服，兼併之後也必有另一次兼併。」

我們不要作空洞的威脅。我們必須不做虎頭蛇尾的事。我們必須以堅決的抵抗應付侵略和壓迫。同時，我們在分析每個局勢時必須保持公正及客觀。我們應永遠表示友誼。我們應時常表明我們願與鄰邦和平相處的懇切願望。

現行的蘇聯政策，已由我所列舉的歷史記錄而明顯揭露。我仍願指出另一啓示。這就是史達林在一

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蘇聯舉行戰後第一次選舉時，他對共產黨同志發表的演說。我想在這一種場合中，對這些聽衆發表的演說實在是比較史達林對訪問他的美國人和外國記者所說的話更遠爲可靠的指示。史達林在演說中論及前途說：

我深信如果我們對我們的科學家加以必要的協助，那麼他們不但能夠趕上，而且在最近的將來還能夠超過我們國境以外的成就。至於較爲長期的計劃，本黨意圖使國家經濟有偉大的膨脹而將使我們能增加生產，譬如說，爲戰前生產的三倍。

爲達到此一目的，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工業每年產銹鐵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五萬萬噸；石油六千萬噸。唯有在如此情形之下，我國才確能應付意外的事件。如欲達到上述目的，或將至少需要三個新五年計劃。然而此項目的能夠達到，並且我們必須達到。

時間對於蘇聯政府不是完全有利的。

我以前試行答覆「他們是怎樣的人」一問題時，并未提及蘇聯人民。我所說的僅是蘇聯領袖。他們爲我所僅認識之蘇聯人士。真正對於蘇聯人民曉得很多的美國人沒有幾個。

我們在衡量現行蘇聯政策時能夠忽略蘇聯民衆；他們對蘇聯外交政策毫無作用，就好像在帝俄時代一樣。不過在考慮未來政策時，我們不應忽視他們。我認爲他們是我們的希望。我不相信會如此英勇地捍衛他們的田園和祖國的蘇聯農民，欲使和他們一樣的人民遭受外國的統治。我也不相信，在近數年前才脫離近乎奴隸的情況的蘇聯工人，將有意剝奪其他國家的工人的自由。

我曾說過「沒有人類集體情緒所不能洞穿的鐵幕。」我確信如此。我也相信也許我們能有足夠的時間使人類集體的情緒能對蘇聯的人民和領袖發生作用。

我又會說過「我們切不可相信我們企求完成我們的目標時，所遇的稽延或挫折將使武裝衝突無從避

免。」這就是蘇聯領袖的那些使我們工作困難的信念之一。可是如果我們自己爲這種信念所迷惑，則我們將永不能擺脫這些信念，或使全球其他人士不相信這種信念。

就非蘇維埃國家方面來說，時間對蘇聯亦未必有利。

蘇聯今日在德國，奧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滿洲都駐有軍隊。佔領軍是游手好閑軍隊。游手好閑的軍隊就是壞軍隊。在外國保持軍隊的目的就是限制那國人民的生活與自由。凡欲自由的人民都憤恨佔領軍的駐紮，因此逐漸仇恨遣派佔領軍的那個國家。他們也會逐漸仇恨外國軍隊所扶持的傀儡，而且也許恨得更爲激賞。佔領軍在的時候，人民屈服順從。可是等到紅軍走了，他們所遺留下的仇恨對於政府和民團裏的傀儡就是個困難而吉凶莫測的前途。

蘇聯政府不能永遠尋得在各國駐軍的理由，現在已有五國和約締結完成。蘇聯還沒有批准五國和約。可是我相信它是會批准的。我國參議院也是在提出的四個月後才批准的。蘇聯批准五國和約後，對於和約中所規定的減少佔領軍一端，勢難拖延很久。這些國家到那時候有加入聯合國的資格。他們成爲聯合國會員國後，聯合國的所有會員國即有保護他們不受侵略和壓迫的義務。

我們向他們愈早證實確將履行這種義務，他們也就會因此受到鼓勵，而愈早致力於它們的獨立。我的結論是，蘇聯現在想要得到在對希特勒書面聲明裏要求的一切，和他們獲得勝利後所產生的很多的新願望。

蘇聯當初并不是爲了他們喜歡希特勒而把他們的願望告訴希特勒的。他們實在是恐怕如果未得希特勒同意即奪取土地，希特勒將使用武力阻止他們。今日歐洲方面沒有遏抑蘇聯的武力。只有聯合國的力量可以做到這點。聯合國必須表明採取行動保護受威脅國家的決心。美國也必須表明使用所有的力量以支持聯合國的行動的決心。

美蘇外交秘錄

第十五章 我們何處去？

在前面各章，我會嘗試說明我們今日的處境和所以有這種處境的經過，希望能夠協助我們決定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我敘述至此，感覺不應該不就我的經驗，談談大家都如此關切的問題：我們何處去？這不是個容易答覆的問題。對於遭戰爭破壞的世界所患的病症沒有迅速奏效的良方，也沒有萬應靈藥。我認爲人類能奠立持久而公正的和平。我也認爲我們切勿輕信以爲祇要採取一種表示誠心的行動，便可奠定和平的老是抱樂觀的人，也不要輕信堅認只有另一次戰爭才能奠定和平的冒險的悲觀主義者。

釐定行動方針常是一樁冒險的工作，尤其如此的就是我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把本書草稿交給出版人，而此書要到十月中旬才能問世，因此問題更見複雜。目前局勢變幻無常，只有先知和卜者才敢逆料在這三個月中將發生的事態。我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卜者。我深知每天都有新危機，而往往今天的危機明日即爲人所遺忘。顯然的，今日根據現存事實和現狀所發表的意見，如果依據三個月以後的事實和情形，將需要大大的修改，或者竟至完全沒有關係。提出這點保留以後，我現在建議採取若干步驟，這些步驟我認爲是走向和平的漫長的道路中，我們應當採取的。

我認爲我們應立即從速締結對奧，德，日三國的和約。我在前面會提出在企求締結這些和約時，我將採取的方針。我切盼蘇聯將洞鑒與各國共同作這種努力的睿智。但是蘇聯的反對必不能阻撓其他國家採取一種方針。這方針，各國曉得，是對世界建設所不可缺少的準確途徑。這方針需要各國奉行集體行動原則，也需要果敢。

我們目標的重要性需要我們採取行動。包括軍政府，及大量佔領軍的戰爭狀態的繼續，實足危及和

平及安全，並損及盟國及前敵國中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幸福。

即在我們計劃締和時，國外事態已使我們懷疑和平的永久性。甚至自從歐洲戰爭結束以來，我們就有理由憂慮蘇聯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態度。勇敢的希臘人民，由於他們抵抗義大利及後來抵抗納粹的英勇，獲得全球愛好和平人民的欽佩。不幸，敵軍的撤退并未使希臘人民的困難與痛苦消除，反而遭遇內戰。希臘政府相信種種襲擊是受人煽動的，而且定是蘇聯附庸國所激勵的。

英軍最後加以干涉，恢復治安。然而自從一九四五年夏天以來，希臘國內恆不安定，與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接壤的地區內發生游擊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復率制希軍並阻止希臘恢復殘破的經濟。希臘政府認為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訓練的游擊隊越過邊境襲擊一處村鎮後，即退回外國境內。他們這種見解，至少已有一部份由聯合國巴爾幹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加以證實。這種遊擊隊受希臘共產黨的支持。去年與這三國家接壤的地區內居民沒有從事耕種，因為他們不期望能夠獲得收成。居民一家家的離開田園而奔往城市以求更大的保障。希臘政府爲了抵抗此種襲擊保護人民，不得不採取很多人認為壓制性的措施。

一九四六年我在巴黎時，常常遇見希臘總理查達雷士(Constandin Tsaldaris)和其他希臘政府官員。查達雷士表示的立場，就是我們這些沒有天天獲悉希臘兵士和平民被殺身死的報道的人，或會批評的我認爲壓制性的那些措施，不過對於負責維持希臘領土完整的人，問題并不如此簡單。

一九四六年初夏選舉中，希臘人民投票擁護君主國體並擁護希王回國。若干在希臘選舉時住在希臘，而我認爲消息十分靈通的人士，相信希臘人民并不贊成君主國體，僅認爲它是除了他們真誠反對的共產主義以外唯一的選擇。選舉完成以後，查達雷士告訴我，希王很想使各自自由黨派代表加入政府，他自己也如此。使自由黨派加入政府的途徑是我敦促他的。可是他沒有成功。

查達雷士於十月一日左右在巴黎和會裏告訴我，由於國家收入的大部份必須充作軍事費用，致使希臘經濟情勢更爲嚴重。他說希臘需要財政協助，希臘陸軍也需要額外配備。他答覆我的詢問時說，英國一向以軍用品接濟希臘並且已經同意繼續加以援助。我說我們能以軍事配備接濟他們，不過僅限於歐洲剩餘配備中所能有的配備而已。我請負責這批剩餘物資的官員盡力設法協助希臘。我也告訴查達雷士如果美國國會不同意撥款，我不能答應他能獲得救濟用途的貸款。如果國會批准我們所請求的作爲救濟用途的三億五千萬美元的撥款案，希臘定可獲得很大的一部份。我還告訴他，我將促請進出口銀行對希臘的貸款申請採取有利的行動，並且答應他的請求委派一個委員會訪希作經濟調查。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時，查達雷士在紐約。他和我再度討論希臘的需要。我邀他去華府和進出口銀行當局及副國務卿克萊敦商量他請求協助一事。

在他沒來以前，杜魯門總統和我曾與進出口銀行負責人檢討一般局勢。他們說，依據法律，除非他們獲有一確將償付的合理保證，「否則不能貸款，而鑒於希臘情勢的不定，他們對於希臘能否提出保證表示懷疑。他們說將考慮希臘的申請，不過我知道要是不修改法律，希臘却很少希望獲得貸款。

查達雷士先生在紐約時，我也曾與貝文先生討論希臘局勢。他告訴我，英國，一向在財政及軍事上援助希臘，英國政府將繼續在軍事配備方面援助希臘，不過他希望我們將供給經濟援助。他說英國極想在適當時日撤退在希臘方面及其他幾個地方的英軍。但是他并未表示，無論希臘情形如何，英軍總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或其他規定的時日撤退。

土耳其的局勢也和希臘差不多。土耳其的經濟情形比希臘好些，可是土耳其的主權所遭遇的威脅至少也和希臘相同。不但當時如此，就是現在也還是如此。關於蘇聯對希臘的願望容或有人辯論，可是蘇聯對土耳其的願望則毫無疑問。

過去記錄告訴我們：（一）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請求希特勒同意蘇聯在海峽地帶建立海軍基地；（二）史達林在波茨坦又重申這個願望；（三）蘇聯政府直接向上土耳其要求建立海軍基地的權利，並要求割讓卡斯和阿達漢兩省。這種神經戰使土耳其必須保持七十萬至九十萬人的軍隊。土耳其不得不把經濟善後和發展所需的稅收充作軍費。

一九四六年秋，我對土耳其採取和我對希臘的同一立場——我們不能供給軍事配備但將盡力在經濟上加以協助。我告訴土耳其代表，如果國會批准為數三億五千萬美元的救濟用款，我將建議土耳其可以獲得一部份，我並將敦促對土國從事建設用途的貸款加以同情的考慮。

同時，土耳其政府通知我們，蘇聯會提出照會再度要求在海峽地帶建立基地的權利。我們立即通知土耳其我們將恪守我們去年十一月的立場——蒙特婁公約的修改應成為國際會議的議題。我們對管制海峽地帶僅與黑海國家有關一點不能同意，也不能同意土蘇兩國共同組織海峽地帶的防務。我們說海峽地帶的防務應當基於聯合國的目的和原則，並依此目的與原則管理。我們說我們將堅持這種態度。

這就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我離開國務院時的局勢。三月一日左右，英國政府通知美國說，英國在三月三十一日後將不能繼續供給希臘和土耳其的經濟及軍事援助。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出席國會。他說美國政府接到希臘政府要求經濟和軍事協助的急迫呼籲，希臘如沒有這種協助，則不能以自由國家的地位而存在。他並說英國已不能繼續供給所需的協助。

杜魯門總統說「我們必須協助自由的人民，依他們自己的方針奠定他們的命運。」他敦促國會撥款四億美元援助希臘及土耳其兩國，並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以供應品和軍事配備供給希土兩國。他並且要求授權派遣美軍軍事人員去希土兩國教導並訓練兩國所挑選的人員。

雖然沒有得到直接的情報，可是我認爲是英國去年冬天天氣的惡劣，工潮，而尤其是美元的匱乏，都使英國財政部官員感覺不安，而慫恿英國政府突然通知我們說，英國想在三月三十一日後停止對希土兩國的協助。

我認爲英國政府的財政情形已使英國必須停止對希土兩國的財政援助。若干美國官員雖會發表議論，但是我當時確定英國在三月三十一日時，或是我們沒有機會決定我們的行動方針以前，決不致撤退希臘方面的駐軍。英國從來不會這樣做的。

我的判斷沒有錯。希臘方面的英軍在今天，七月一日，仍未撤退。希臘的英國駐軍傳有八千人左右。我們主張只派七十五名海陸軍軍官去希臘。就是我們的軍事當局也將承認七十五名美國海陸軍軍官不能代替八千英兵保護希臘以防侵略。不過我們隨時準備採取必要行動，以保護希臘不受侵略的這種心意已使希臘人民得到安慰，同時也給可能的侵略國家一個警告。

我固然認爲英國宣佈不再協助希土兩國時有點過份慌張，可是也認爲我國答覆英國時也同樣的慌張。但是我國的態度是對的。我說我們的態度是對的，因爲在當時情形之下，我們不能拒絕協助。我說我們的態度也是慌張的，這是因爲我國解釋爲何要加以協助的若干理由；這些理由似乎暗示我們將反對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企求控制政府的努力，即使他們並不是由於外國政府的干涉而是經過本國人民自由投票來採取行動的。我國政府的立場並不是如此，而且永不應該如此。憑着真實無欺的投票(Ballot)來控制政府和以鎗彈(Bullet)或依據外國政府的脅迫來控制政府，兩者之間，大有區別。可是在像我們的一個政府裏，不同的理由可以使國會和行政方面的不同人士獲得相同的結論。不過主要的就是我們對這種事所採的行動是對的——我們必須予以協助。

我們供給軍事供應品是合理的。我們用不着決定土耳其政府和希臘王國是不是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中

卓越的模範。我們并不干涉希土兩國的內政。希臘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責難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國民正侵犯希臘邊界。如果這是確實的，如果侵略行動確是由這三國政府贊助的，那麼這種侵略行動便成爲全球和平的威脅。

希臘最初要求調查這種和平威脅時，蘇聯反對。那時外長會議正在紐約開會。莫洛托夫當時對於幾點和我表示同意。我便要求他合作。我告訴莫洛托夫，美蘇應共負維持和平的責任。而我深信他可以對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施用量而緩和希臘局勢。他說這三個國家並沒有過錯。希臘政府是腐敗的，不受人民信任。我表示異議，同時說出我的理由。第二次和他會談時，我告訴他，他的情報既和我的如此不同，合理的辦法只有先調查事實真相，然後或可協議補救辦法。後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居然指示出席安全理事會的蘇聯代表支持調查希臘邊境糾紛的議案。這議案通過後，我即命艾德立治先生爲美國代表。

調查委員會自工作開始以來，就遭遇稽延和困難，（我國代表指責種種稽延和困難，大部應歸咎於希臘的諸鄰邦。）甚至在希臘政府繼續訴說它仍舊受到來自邊界對面的襲擊時仍是如此。

杜魯門總統就是在這些情形之下向國會演說的。他沒有說美國永久的主義將是，我們一旦認爲一個自由國家的獨立受到威脅，我國應該採取片面行動，且於必要時使用武力以防止侵略。這是聯合國應該担任的工作。美國沒有撤開，破壞或損害聯合國之意。杜魯門總統的演說不可作如此解釋。

參議員范登堡對授權總統援助希土議案提出修正案時，曾將美國立場表示明白。這已由參院通過的修正案，承認聯合國認爲必要時可以有對希土兩國局勢的管轄權。

聯合國今日還沒有軍力。這也是由於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的軍事參謀團裏採取拖延策略而造成的。身爲聯合國發起國之一的美國被迫使蘇聯政府及全球曉得一點，這就是，安全理事會調查對希臘政府

的侵略行動時，我們將採取行動維持現狀，直到安全理事會能夠獲致決定，或有軍事力量以控制希臘局勢爲止。我們是在幫助聯合國而非損害聯合國。同時我們也必須維持土耳其的現狀，直至聯合國具有如此力量爲止。

我這種相信堅決才有效果之見解也由伊朗問題而證明其爲正確。蘇聯對伊朗，也像對希土兩國一樣，企求實現其歷史性目的之一。它所用的方式也一樣。亞塞爾拜然省內一個傀儡政府在紅軍保護之下成立。我們迭次警告蘇聯說，美國及蘇聯本身在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所簽訂的德黑蘭宣言中已規定有保護伊朗領土完整的義務。我自己曾向史達林強調過，如果伊朗向聯合國提出抗議，我們將支持伊朗。可是我們一切的努力都不能使蘇聯政府相信我們將履行德黑蘭宣言裏的諾言。因此，伊朗向聯合國呼籲時，我們即採取行動。

主要的爭執，好像是常常在公務方面發現的情形一樣，僅在於一個枝節問題；就是，伊朗有無權利向安全理事會陳述案情。我認爲如果創下先例，不准任何國家迅速列席安全理事會，則聯合國將成爲自成立時即已殘廢的情形。我對於伊朗的主權及其迅速列席安全理事會的問題如此重視，甚至親自在安全理事會中爲美國的理由而辯護。蘇聯對抗的態度也強硬到葛羅米柯先生退出安全理事會的程度。可是堅決的立場和聯合國終於獲勝。

史達林大元帥在給一個通訊社總經理（譯者按，係指合衆社總經理白里而言）而非安全理事會的電報中，宣佈撤軍。去年十二月時，伊朗亞塞爾拜然方面的傀儡政權即告垮台。伊朗人民并未受蘇聯宣傳的愚弄。盟國觀察員和伊朗當局前往亞塞爾拜然時，當地人民都歡呼「聯合國萬歲。」這種歡呼，我們未來歲月中是不能遺忘的。

正式的意義而言，安全理事會從未採取行動。不過它是使伊朗能向全球呼籲的座談會。蘇聯可能

再度企圖實現它對伊朗的願望。但是，我們可因這次在聯合國內採堅決及積極行動的成功而獲得勇氣。對匈牙利問題也需要同樣的堅決。蘇聯蓄意使會在史達林和莫洛托夫認為自由的選舉裏獲得百分之五十七的投票數的匈國政府官員去職。匈牙利總理被逐走，共產黨已上台。匈國總理稱這種行動是蘇聯命令的。關於這點并無佐證。如果屬實，則蘇聯在匈的行動實違反蘇聯在雅爾達會議中對他的盟國的諾言。我不知道英美將採取何種行動。不過我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要求安全理事會調查，並且決定這些事實是否構成侵略行為。如果理事會有所決定，即這個決定應規定將匈國政權交還曾獲得匈國人民百分之五十七的投票的政黨；或者採取相似行動保證匈牙利有獨立生存不受蘇聯政府壓迫的權利。如果有侵略希臘和土耳其的行為發生，我們料將採取行動。那末現在既有證據證明蘇聯在匈牙利已經做了我們所說將使我們在希臘和土耳其採取行動的事，那末我們為什麼不對匈牙利的案件採取行動呢？我國爲了匈牙利的事，已經把供給匈國購買我國剩餘物資的一千五百萬元左右的貸款取消。如果我們獲得證據使我們有理由取消貸款並且提出抗議，我們自然具有證據足以要求進行調查。我們不能袖手旁觀，聽其自然，只因爲蘇聯還沒有正式批准對匈和約。這和約是莫洛托夫外長所同意的，已由英法美三國批准。我們應該不准蘇聯享受他們從事拖延的利益。如果，明天蘇聯以同樣的方法控制義大利政府，則即使對義和約還未批准，我們自然也將採取較抗議更爲積極的行動。我認爲匈牙利案件是在杜魯門總統就希臘和土耳其所發表的政策聲明的宗旨的範疇內。所以，我們目前不應該創下一個不採取行動的先例。

我們可以爲蘇聯聲辯說，目前威脅全球和平的各個地方——伊朗，希臘，土耳其，匈牙利及其他巴爾幹國家裏，都涉及蘇聯的國家利益，或者說蘇聯係由於恐懼和猜疑而採取行動。這也許是事實，然而片面的追求國家利益行動再加上隱懼和猜疑，徒然引起衝突——違反所有國家的利益的衝突。

列強間關係的改變恆易使全球杌隉不安。蘇聯久已成爲一個重要的強國，可是從未像現在那樣明顯

的成爲歐洲大陸上有支配力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國勢大盛時，它的繼續擴張的可能性，自爲人所關切，尤其是在當那擴張中的國家的領袖們懷有侵略的思想的時候。

當一個國家——例如蘇聯——在國際間獲有偉大力量，可是國內的生活標準遠不及其他各國的時候，全球有一種特殊的不安。

除了蘇聯以外，別的國家也企求土地。法國想要薩爾，希臘想要伊庇魯斯，荷蘭希望獲得與荷蘭接壤的一塊土地，比利時也可能要求與比利時接壤的德國領土。所不同的就是，這些國家想藉和會或外長會議等國際機構而獲得他們所尋求的領土，而蘇聯顯然喜歡以片面行動獲得它所尋求的領土。蘇聯的行動常常是政治滲入方式。

聯合國憲章規定所有會員國「不得藉武力的威脅或武力的使用，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這定義并不能限於武裝侵略，它也可以指威逼，壓迫，或者例如政治滲入的詭計而言。

政治滲入的威脅在政治和經濟機構被戰爭破壞的國家裏尤其嚴重。因此總免不了引起從事報復的對策。當所有有關國家都認爲他們是爲了自衛而採取行動時，馬上可以產生一種局勢。不久即可能有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情形，使全球都可能爲戰火所吞噬。

如果我們要避免這樣的一場巨災，不但要遏止侵略，而且要設法消弭這些侵略行動的原因。甚多國家，由於戰爭的結果，人民食住都大成問題，易爲侵略思想犧牲品。這種侵略性的思想給人民以能夠逃避日常生活的艱苦現實的一種幻覺。如果我們要使這些人民珍視自由，尊重法律，我們至少必須給他們以解決他們自己和家庭的衣食住問題的機會，也須給他們以維持內部治安所必需的工具。我們必須使他們感覺他們能有獨立的生活而毋須淪爲蘇聯，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附庸。

作經濟援助時，我們切不可企求控制一國的人民，我們實應設法使他們自由。我們必須相信如果我

們給人民自由的機會，他們將不希望依靠我們或其他任何國家。在沒有自由的地方，我們必須確定我們的經濟援助不會被用來對付我們。

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現在并非與蘇聯競爭控制其他國家。我們實在應該強調，我們將歡迎蘇聯與我們合作來共同重建並保護政治及經濟獨立的真心誠意。

如果我不再提起我們迄今為止與蘇聯合作的努力幾乎毫未成功的話，那我將不是在說老實話。我在這方面的努力已在前面各章裏說過。今天我們又見莫洛托夫先生拒絕貝文先生和皮杜爾先生爲了答覆國務卿馬歇爾在六月五日所作的建議而提出的計劃。馬歇爾國務卿在哈佛大學發表的演說裏，會要求歐洲國家商量「目前局勢所需的事物，以及爲使美國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得發揮適當的效果計，此等國家將應採取的立場。」

馬歇爾國務卿並沒說美國將以一定數額的任何款項援助各國所議定的計劃。他只說我們將盡可能支持這樣的計劃。然而政府其他官員會發表言論（這種言論國外會予轉述）估計這計劃將耗費我們每年五十至六十億美元，爲期四年至五年。這種估計甚至是在歐洲國家猶未舉行會議以前即發表的，表示我國官員對於這全盤計劃已有若干概念。這種估計自然使甚多歐洲官員興奮。

我歡迎貝文先生和皮杜爾先生所採取的主動，但是政治上的現實使我們在歡迎這個促進歐洲復原的計劃時，必須略進警告之言。我們應該表明美國將依據它的資源決定所供給的援助的數額，使用援助的地方，以及使用這筆援助時的條件（如果有條件的話）。

若干歐洲政府及人民不明瞭我們的行政官員非待國會確實撥款後，不能作關於財政的諾言。我們應務使他們勿遽認爲他們所商妥的任何計劃，均必將由美國付款。否則國會日後拒絕撥款以實施他們議定的計劃時，必將引起誤會與失望，而這種誤會與失望將危及我們與歐洲國家間的關係。

考慮國會可能的舉動時，我們切勿忽略最近所做的事。我們并未嘗試延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命運，因為我們已決定撥充救濟用的款項不再由其他國家分配，而由美國加以分配。

我國國會准許以三億五千萬美元從事救濟時，並未聽任行政機關決定使用款項的地方。它規定其中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僅能用在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波蘭、的里雅斯德及中國，只有一千五百萬美元可以用在其他國家。同時也規定每國家內將有美國公民組織的代表團監督並管制用途。

最近由國會通過並由杜魯門總統批准的撥款四億美元以對希臘及土耳其作軍事及經濟援助的法案，規定援助款項應在一個美國委員會監督下使用，而這委員會主席必須由參議院批准。

莫洛托夫先生在六月下旬拒絕出席巴黎經濟會議的行動（除非他先曉得美國供給財政援助的條件，並獲得聲明不致干擾各國主權的保證。）使主張全球合作的人都感覺失望。但是我對有些官員和主筆的意見不同意。他們認為莫洛托夫的拒絕是蘇聯欲使歐洲繼續混亂的鐵證。

就蘇聯在其他事項方面亦拒絕合作一點而判斷，完全可能的就是蘇聯將不反對歐洲繼續混亂。莫洛托夫先生對這事項採取的行動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英法兩國的邀請使他處於窘境。那些附庸國，就好像拮据的人們一樣，對於這個要他們向美國說出所需要的財政援助的邀請必定歡迎不暇。尤其是報章上的報道表示美國協助將成爲一種贈予而非貸款。如果蘇聯現在強迫他們不接受美國的財政協助，蘇聯必須在經濟上自行協助一般附庸國，因此將稽延蘇聯自己的建設計劃。

我認為莫洛托夫先生的拒絕參加，是由於會使他拒絕在我們的原子能建議和甚多其他建議方面合作的同一恐懼。他們恐懼將被迫同意准許其他國家代表赴蘇視察，而這些國家代表能夠要求在蘇聯境內自由旅行的權利。

莫洛托夫先生對於涉及其他國家代表在蘇聯控制的地區內視察的所有建議一貫是拒絕。顯然的，莫

洛托夫現在認為如果我們對友好的國家例如希臘及土耳其作經濟援助時，要求監督或視察，那麼協助其他國家時，我們將堅持作相同的要求。我認為，如果蘇聯沒獲得美國代表將不在蘇聯或蘇聯控制的地區內視察及監督的保證，蘇聯將繼續拒絕在巴黎經濟會議中合作。

今天是七月一日。我目前的意見就是莫洛托夫先生由於拒絕合作，已無意中為美國政府解決一個困難的問題。倘若蘇聯和它的附庸國出席巴黎經濟會議，我們可以有理由推想英法兩國不但必將提出他們本國需要的經濟協助，而且定將建議我們應以大筆款項貸給蘇聯及其附庸國。這將使我們的國會感覺窘困，就好像英法兩國的邀請使莫洛托夫受窘一樣。我推想協助歐洲所有貧乏國家的建議在向國會提出以前先已提交兩黨領袖。不過縱然如此，我們亦只能臆測國會在那些情形下將採取的行動。

如果國會需要像對希土援助及救濟撥款的那種用途方面的監督，則蘇聯和它的附庸國將拒絕接受美國協助。他們將宣稱他們已經知道美國協助的條件。另一方面，如果要求國會對蘇聯和它的附庸國作一大筆毋須監督的撥款，國會諒將不會答應。莫洛托夫拒絕出席巴黎經濟會議後，國會可毋須作這個困難的決定。他負起使歐洲劃分為兩個經濟和政治範圍的重担。

美國人民及國會認清我們不能僅僅應付全球杯障不安的狀態而必須應付其原因。協助的需要已證明遠較意料者為大。美國戰後既然物價上漲，勢須作較前認為必需的數額更大的贈予或信用貸款。不過我深信這些是實造和平所必需的。話雖如此，援助計劃必須為合理的。否則我恐怕國會將不撥給適度的款項。如此，那還不如不會建議援助的好。

使歐洲經濟恢復的初步就是我們應集中於將能幫助消除經濟障礙的計劃。這些經濟障礙使各國不能增加貿易和增加生產。我們用不着使所有歐洲政府取得協議，或者舉行廣泛調查而決定這些障礙是什麼——我們曉得這些障礙。

第一，我們不但須使用我們的金錢而且須使用腦筋以設法提高歐洲的煤產。煤斤的需要幾乎是歐洲每個國家的經濟問題的中心，歐洲煤斤問題在於魯爾。

魯爾煤礦在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承平歲月中每日產無煙煤四十四萬噸。一九四七年，歐洲戰事結束的兩年以後，這些煤礦日產二十一萬四千噸。一部份的匱乏由自美煤礦購得的煤斤補充。然而魯爾所產煤斤僅值十塊美金一噸。而運往那不勒斯（Naples）的西弗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產煤約值二十二美元。本年歐洲國家將為自美運來的煤付出六億美元，這筆款項的一部分來自美國貸給歐洲國家的款項。這是一種不經濟而浪費的辦法。應該從早停止。

魯爾煤斤的生產與分配的紊亂以及漫無組織和管理不善，是造成這種局勢的一個因素。缺少改良的機器是另一因素。不過主要原因還易了解。一個礦工只須每週工作兩天即可賺得足夠購買他的最大限度配給品的工資。魯爾方面又沒有東西可買。國家的前途又如此不定故毫無鼓勵他們儲蓄的原因，他對人家付給他的工錢不信任。改良德國礦工的命運可能引起想懲罰德國的一班人士的紛紛抗議。但是如沒有這種行動，則不但德國將受處分，所有歐洲人民亦將受罰。

我們現在可以不待其他國家同意即開始處理這問題。

我們如果將魯爾礦工的配給量大大地提高，如果有美國來的進步的採礦機器，並且還有供給礦工及他的家庭更多的消費品的計劃，那末煤產幾可立即提高。

西里西亞的煤礦也是重要的煤產地。我們應該考慮提高那地方煤礦生產的方法。不過我們的援助應該附帶條件，這就是所產的煤斤須有一部份供給戰前依賴西里西亞接濟的西歐國家。波蘭雖沒有出席巴黎經濟會議，不過我們可以和波蘭的代表會商而力求解決這問題。

談過煤斤以後，我們應考慮的就是增加電力的生產和電力的接濟。我最後一次和羅斯福總統見面時

，我會把將赴德國的克萊將軍介紹給他。我告訴總統，工程師出身的克萊會在得克薩斯州建築一個規模龐大的電力廠。羅斯福總統馬上把他腦中所常存的計劃，在中歐建築一個電力廠的計劃告訴我們。渠預先見及燃料將或爲主要的歐洲問題。

我們不可有所偏執祇考慮歐洲的經濟問題。建設亞洲經濟對世界和平也同等的重要。我們在亞洲和歐洲協助進行的計劃，應該使目前正竭力重新建設他們殘破生活的人們，獲有自立的希望並得到更大的自立機會。由於科學的進步，各國如通力合作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即可以保持並且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

我們只要說起這個問題，便顯出它的廣大性。我們美國人所做的事必須在我們資源的限度以內。如果爲了應付目前的緊急需要，我們用盡我們的經濟力量，那時世界安定的長期目的將毫無所補。

繁榮就好像自由似的。必須是共享的。這種共享的方式并不能基於「施捨」而應該基於自由男女的生產品的公平及誠實的交流。如果我們要想使我們的協助獲得償還，我們必須願意接受物品及勞務作爲償還的一部分。但是非待歐洲的經濟奠定在自立的基礎上以後，我們不能現實地期望償還。

具有有效的經濟制度的世界能夠供給人民衣、食、住、學校和其他必需的事物。這個世界將極容易應付。不過我們致力於經濟復原的時候，我們在其他方面也必須繼續努力。與經濟復原同等重要的就是建立集體安全制度。

我們會藉集體行動，擊敗德國與日本。這兩國現在都沒有發動戰爭的力量。他們在一代之中將沒有力量發動新戰爭，除非盟國在爭權的鬥爭中蓄意把他們作爲賭注或是夥伴，而允許他們重整軍備。當然，我們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驗已獲得充分的教訓，曉得如果要修改和約條款，最好是我們自己修改，而不要讓我國以前的敵人得到強行修改的武器。

我會建議四強應共同簽訂四十年條約，保證德日兩國都不致再度威脅全球和平，作為表明我們希望使以前敵國保持廢止軍政的狀態的具體表現。這條約規定如果有破壞條款的行動即迅速加以懲罰。它也規定某種懲罰辦法，拒絕四強中的任何一國有否決行動的權利。

這個條約的接受，實為任何國家有無使這些國家廢止軍政的誠意的明白考驗。英法兩國已經贊同。史達林大元帥在原則上贊成，可是莫洛托夫先生堅決反對。我們將再度要求接受這條約。我們有理由為將來擔憂。

我仍存着這條約能夠通過的希望。我相信蘇聯一旦認清祇要德國一天有佔領軍，我們的武裝部隊也將在德國駐紮一天，那麼他們將接受這個條約。他們需要長久的時間才能認清我們自歐戰勝利日後即在歐洲保持的軍力并未解體。在他們未認清的時候他們總希望我國駐軍逐漸退出歐洲。由於某種欲望而形成的結論改變得很慢，可是至於上面所說的蘇聯結論；蘇聯領袖們，無論願意與否，遲早必將改變。我已在新圖加特說過「我們在歐洲是準備逗留的。」

四十年條約的通過將成為我們對集體安全原則的信念的另一憑證。這種集體安全原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達到頂點。我對聲稱蘇聯的不能合作已破壞聯合國者，不能表示同意。我仍認為我們對和平的最大希望在於支持並培植聯合國。聯合國的潛在力量遠非一般所能認識。它使我們有機會促進合作的嘗試，只有合作嘗試才能保證和平。

有人說聯合國的成功端在於各大國合作的能力。這種論調只有一部份是對的。的確，如果各大國合作維繫和平，自然決不會有一個甘願冒險破壞和平。然而所有各大國的合作雖是我們所希望與謀求的，可是并非絕不可缺的。我否認聯合國憲章（憲章無條件地約束會員國以和平途徑解決糾紛，並禁止使用武力，除非在維護憲章原則的時候。）能為安全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單獨的一票所廢止。

安全理事會在常任理事國意見未一致以前，確不能要求會員國採取行動。然而這並不是說會員國沒有採取行動的自由，也不是說如果有明顯違反憲章的行為發生的時候，他們不認爲自己在道義上必須採取行動。

當然，確實懷疑有無違反憲章的行為發生的國家，不該僅爲了任何一方恰巧得到一定數目的票子的原故，而必須在道義或其他方面上採取行動。但是憲章內載有法律原則，這種法律原則應視作所有國家的法律。如果我們和聯合國的其他會員國表明我們決定於必要時使用武力以保護這種原則，那末這些原則定將被視爲所有國家的法律。

如果我們和其他國家準備爲保護法律而採取行動，則聯合國必能夠防止戰爭。我們也必須表明我們將不爲其他任何目的使用武力。

然而，倘若我們要盡我們的職責保護這些原則，我們必須保持我們採取如此行動的力量。我們切勿繼續削減海陸軍經費。我們必須鼓勵並扶助繼續進行的科學研究，我們也必須採取一種普遍軍訓的計劃。國際會議中一種理論的力量不致因國內擁有軍力而稍衰。

我們表明我們準備實踐憲章並不是對任何一國的威脅或敵意行動。實踐憲章實在是將加強國際間法治的一種精神及活力，它也是尊重法律所必須有的態度。

我不相信蘇聯需要戰爭。但是蘇聯的政治家似乎認爲，他們的職責在於盡力折衝以促進他們的權力與利益。我們必須絕對表明，如果他們的折衝越過一定範圍，則將對他們執法以繩。否則他們可能懷着錯誤的見解，認爲我們將不追究他們的越軌行動而可以僭越範圍。

我們必須準備承認有許多問題可以產生光明磊落的歧見。我們不能而且萬不可認爲我們的決策是毫無錯誤的。我們切勿以爲聯合國中的辯論不像我們的國會，我們的立法機關及我們市議會裏的辯論的

那樣激烈。

如果我們願意順從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這就是，尊重他人所有而我們所無的觀念，意見和生活方式；則思想的分歧和觀念的對立對於進步與和平都有貢獻。

這個世界常有那一種以上的思想和一種以上的生活方式共存的餘地。蘇聯的生活方式既能容納，美國的生活方式亦可存在。認為種種思想難免衝突的見解，比較主張這世界上只尊崇任何一種思想或生活方式的見解，更易引起衝突。就是歐洲不幸劃分成兩個經濟及政治範圍，也不能成爲談論難免衝突的理由。現在關於戰爭的議論過多，而關於和平的議論過少。如果我們使用我們的力量，則對於所得結果毋庸畏懼，但是我們畏懼以我們的力量作不必要的使用。假若我們企求和平的一切努力都告失敗，我們自己心中必須確信過錯并不在我們本身。

甚至在戰後這幾年混亂的時期中，聯合國一直是企求和平的有力工具。

當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我以國務卿的資格宣佈已經收到足數的批准書時，聯合國憲章於是正式生效，成爲全球人民的基本法律。回憶此後聯合國的種種事態時，我想起了國際聯盟是在成立近十個月以後才召開第一屆大會的。可是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間，就在倫敦舉行第一屆會議。同年十月，大會再度召開會議，一九四七年五月，復舉行特別會議。

聯合國大會在第一屆會議中產生了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國際法院，並曾選出祕書長一人着手成立一個祕書處——這個祕書處就是世界的公僕。

安全理事會和每年僅開會四次的國際聯盟的行政院不同，它差不多不斷地開會。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利益衝突影響理事會的效率，但是沒有使理事會喪失它的活力。安全理事會在伊朗案件中所表現的力量，我已敘述過。希臘的領土亦因安全理事會調查委員會駐在希臘的原故，而得以保持完整。英法

兩國並會依據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的決定，而撤退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駐軍。法國與暹羅的邊界糾紛經過談判而告解決，南斯拉夫迅速順從美國就我國飛機被擊落事而提出的要求等等，都是安全理事會能採取行動促使以和平方式調整各種局勢的例證。

我們對於安全理事會的附屬機構——原子能委員會，普通軍備委員會和軍事參謀團等的工作缺少進展感覺失望之際，也不可忽視它們的真正貢獻。全球人民都以建立一種將能產生並實行法治的集體安全制度的最重要工作付託給這些機構。他們所以沒有獲得其工作上所需要的進展的原因，在於蘇聯不願接受國際管制，或以國家主權委託聯合國，而這兩點是極大多數國家認為必須實行的。

美國就國際管制原子能及其他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的有效制度首先採取步驟。我們應保持主動。如果這種制度能夠建立，我們將有足可使全球安全地解除武裝的保障。在這種制度未建立以前，我們不能而且切勿解除武裝。

同時，我們將不斷要求成立特別協定。這種協定猶待軍事參謀團草就。協定完成後，安全理事會將有充分軍力以執行它的決定。

我們必須在已經奠定的其他基礎上繼續建設。這些基礎不但包括依據憲章而成立的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及國際法院等主要機構，也包括種種專門化的機構。在這些專門化的機構裏，很多是具有國際性業務的，其中計有國際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國際民航組織，世界建設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難民組織，擬議中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貿易組織。事實上，過去兩年內，在全球人民具有共同利益的活動方面，各種活動均已成立了工作繼續不斷的國際合作機構。

截至一九四七年夏天為止，完全參加所有專門化機構的只有美英加三國。蘇聯至今僅宣佈加入一個

機構——世界衛生組織。

我雖會敘述與蘇聯代表相處的困難，但是我深信我們必須致力於世界合作。雖然明知蘇聯可能不合作，但是我們仍將這樣做。如果我們的努力失敗，我們必須使全世界知道誰應負失敗的責任。經驗已表示蘇聯政策是有伸縮性，蘇聯發言人可能隨時更改他們的意見。我們必須使他們曉得我們懇切地需要他們合作，但應保持一種堅定決心，這就是，如果我們沒得到蘇聯的合作，我們當將與所有能合作的國家共同進行。

我們致力於世界合作時，必須謹慎，切勿犯我們指責他人的種種過錯。在國際會議中我們以平等的地位共聚一堂，不能有「要不要隨你」的態度（“take it or leave it” attitude）。兩年來，我們的忍耐會使所有觀念公正的觀察家獲得良好印象。我們的利害過大不容我們沒有耐心。與蘇聯人士談判可能使幾位政治家的神經受影響，可是另一次世界大戰將更嚴重地影響億萬人民。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經由聯合國產生一種國際間的不成文法律，規定確定的和意見一致的行為標準。這種不成文法律必須不僅藉規則，武力，或恐懼來維持。它必須靠全球人民將產生的共同友誼，共同利益及共同觀念來維持。

在尋求對「我們何處去？」這問題的多方面的答覆時，我認為還有一條最為重要的途徑。這途徑就是檢討我國和我們自己。現代世界的領導需要我們在國內有堅固的基礎。我們步入國際會議室時必須懷着堅定而謙遜的自信，這種自信是惟有完全信任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產生的。

如果我歷年來為公衆服務曾得到些什麼教訓，那就是傑弗遜和林肯的學說能比馬克思與列甯的學說使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大的快樂與滿足。

沒有比下面一段話裏所包含的思想更偉大更為所有的人民所樂聞的，這就是：

「我等認為下列真理是顯而易見；人皆生而平等；創造者會賦予他們若干不能轉移的權利，此等權

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譯者按此語見於美國獨立宣言中。）

也沒有比「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在思想上更爲崇高，更能適應共同幸福的政府制度。

這些理想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果我們能表明我們正不斷努力，逐步邁進以求實現這些理想，我對於未來結果就毫無恐懼。

我們是全球最偉大的工業國家。如果我們能把自己的事料理得很好，並向全世界證明：我們已自過去的錯誤中得到教訓；我國不是曇花一現的國家；我們使我們的人民有機會在擴展的自由和增長的幸福中生存，我們能對建立政治自由及經濟穩定的世界，作無上的貢獻。

過去兩年，我會多次深感沮喪。我們企求在和平的世界中達成合作的再三努力，似僅遭遇經常的挫折。然而我們在我們的努力中始終保持忍耐和堅定。我并未失望，但是今日我將顛倒次序並變更着重之點。我將說我們的政策應是堅定及忍耐的。

我仍深信我們如「秉着上帝使我們實現正義的權力堅持正義，」我們必能以合作的努力達成公正的和平。

在邁向公正和平目標的道路中，自由的往事鼓舞着我們，自由的未來在召喚着我們。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四	十一	從來	從未
五	三	並將	並增加
五	四	經費酌予提高	經費
五	十二	通過	通過
十	八	通過	通過
四八	十一	那是我	那時我
四九	十八	舉上一舉	舉一舉
五四	一	Marshal	Marshal
五五	十三	Fovestal	Forrestal
六二	二	不符合，	不符合
七六	九	往裏去	往那裏去
七七	七	犏牛兒花	犏牛兒花
七八	十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八六	十二	美國們	美國將
八六	十九	船隻	船隻
八八	十二	對牠旁邊	對她旁邊

頁數	行數	誤	正
九四	十六	第三項	這三項
九五	十七	價值遠	價值遠
九八	十一	衡被為	衡被任為
一〇〇	十六	因為要	因為它
一〇二	二	驗，	驗，「
一一一	十四	電稱	宣稱
一二六	十	我們不	我們才
一二八	六	蘇聯敵人	共同敵人
一三六	十九	我也雖	我也會
一三六	十九	開得慢些。	開得慢些，
一三七	十八	望蘇聯	由蘇聯
一四一	一	民族的和平	人民的和平
一四一	二	民族的和平	人民的和平
一四八	十一	我說的	我說，
一四八	十六	聲明使它	聲明，使它
一四九	十八	看的	看得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六〇	八	「攔。」	攔。
一六三	九	多邊	雙邊
一六八	十六	這些	這些
一七一	五	另一項	另一次
一八三	十二	不覺	不感
一八五	二	人民商品	人民，商品
一九七	十四	各式	各樣
二〇六	十九	限制為	限制到
二一四	二	他	也
二一四	三	他	也
二三四	二	寬恕。」	寬恕。
二四一	十九	發生生	發生了
二四二	十三	「託管制，」	「託管制」
二五七	三	更給我	便給我
二五九	九	你內閣	您的內閣
二六〇	三	華萊士先生	華萊士先生
二六〇	十三	閣下政府	您的政府
二六三	十三	戰略情報處	戰略情報局

頁數	行數	誤	正
二六九	十三	如此之小	如此之少
二七四	十五	作以	以作
二七四	十六	推動	辦理
二七六	十七	盼望	盼望
二七七	七	司時間	同時間
二七八	一	加於應用	加以應用
二七八	三	他國政府的	他國政府問
二七八	三	如果人民完全	如果人民被矇在
二八〇	十六	不知道，	黑暗裏，
二八一	十三	在那時。	在那時，
二八一	十五	這委員會	這委員會
二八一	十五	Compton	Compton
二八二	十一	南羅來納	南卡羅來納
二八四	十二	所所要說	所要說
二八六	八	規完	規定
二九〇	十九	先生	先生說
二九四	十六	Ferdinand	Ferdinand
二九七	九	原子能委員	原子能委員會
二九八	十	不同應意	不應同意
三〇七	八	說，	說，「
三一二	四	說，	說，「
三一八	九	說，	說，「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美蘇外交秘錄 (Speaking Frankly)

每冊定價國幣 元

著者 美國貝爾納斯
(James F. Byrnes)

譯者 中央通訊社總社編譯部

地址南京中山東路七十二號

行 者 中央通訊社總社

電話二一八八四號

地址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南京印刷廠

電話二一八八六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封 底